

超越竞争文化

在相互依存的时代从针锋相对到互利共赢

[美]迈克尔·克尔伯格·著

成 群 雷雨田·译

本书《超越竞争文化》原著《Beyond the Culture of Contest》由迈克尔·克尔伯格（Michael Karlberg）著，版权所有 © 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 2004 年 10 月出版(George Ronald Publisher, Oxford, 2004)。

中文简体字版由成群和雷雨田翻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 2015 年 9 月出版。

目录

致 谢 /I

前 言 /I

导 论 /1

第一章 文化 / 1

一、人类本性——人的文化 / 1

二、文化维度 / 5

三、文化变革与适应/ 8

四、文化规范 / 8

五、对文化规范的影响 / 16

六、社会关系的作用 / 17

七、意向问题 / 18

八、霸权 / 20

第二章 权力 / 24

一、权力竞争 / 24

二、两种权力模式 / 26

三、反思权力 / 29

四、从理论到实践 / 36

第三章 规范性对抗主义 / 37

- 一、三核体系 / 39
- 二、互相协调的三方体系 / 52
- 三、日益加强的制度和实践 / 55
- 四、综合性的文化形态 / 77
- 五、人性问题 / 78
- 六、作为霸权形式的竞争文化 / 81

第四章 古今互惠主义 / 83

- 一、历史表现 / 83
- 二、当代表现 / 84
- 三、缺乏整合 / 126

第五章 替代性文化形态 / 128

- 一、案例研究：巴哈伊社团 / 129
- 二、分析 / 134

第六章 超越竞争文化 / 185

- 一、回应质疑 / 193
- 二、实证检验 / 196

注释及参考文献 / 203

外文参考文献 / 241

致 谢

本书得益于多人的高见、勉励和反馈意见。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凯西·勒施，她的价值观和奉献精神早在数年前就在我心里播下了写作本书的种子。她的以身作则激励了本书的写作，她卓越的见解丰富了本书的内容，她的认真编辑大大提高了本书的可读性。此外，我还要深深感激其他家庭成员，我每前进一步，都得到了他们的支持、鼓励和容忍以及反馈意见。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我的妻子安妮·玛丽肩负了最重的担子。她的支持永不动摇，使我终身感激不尽。我还要感激我的女儿杰莎和莉亚，她们作出了许多牺牲，以便使我完成这一计划，尽管当时她们还很年轻，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一点。我向她们承诺，我会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平衡和正常的生活。我还要感谢我的父亲斯蒂格和弟弟斯蒂芬，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给予我持续的支持和鼓励。我还要感谢玛西亚·库尔贝格，很多时候，当我写作之时，她帮我照料我的女儿。多年来，罗纳尔德·勒施都给了我支持、鼓励和建议，在此谨表谢忱。

我还要感激我读博士时的导师罗伯特·哈克特、帕特·霍华德、里克·格吕诺和罗伯特·安德森，他们支持了本书的起步我要特别感谢他们的雅量和开明作风，允许我在他们的监督下依循非传统的考察方式。他们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是我砥砺自己对这个主题进行思考的磨石。

还要感谢其他许多对本书作出贡献的良师益友和同事，其中包括(但不仅限于):霍达·马哈茂迪，感谢她在我完成本书的过程中给予我的热情支持和重大贡献。还有格拉尔德·菲尔森、库尔特·海因、托德·史密斯、珍妮特·格林斯蒂德、多丽丝·布鲁诺、戴尔·彼得森和鲍伯·博德，他们审校了本书的初稿。温蒂·莫门对本书进行了最后的仔细审校。霍利·汉森在我学术生涯的关键时刻给予了我指导。胡珀·邓巴、法尔扎姆·阿巴卜、彼得·卡恩和道格拉斯·马丁，他们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学术思想和作风。

最后，我还要感谢戈登·费尔曼的《获胜的压力及其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一书，当本书手稿完成之后，签了出版合同，准备最后的审校工作，我有幸偶然发现了费尔曼最新出版的这本书，其与拙作雷同的风格令我震惊。虽然太晚，没有能够在我的手稿中吸取和回应他的高见，但我还是想把费尔曼的论著推荐给本书的读者。假如你感到本书的分析激发了你的兴趣，那么你会发现费尔曼论著中的分析与本书一致且互补。

迈克尔·克尔伯格

前言

本书的宗旨是将自己从文化和交往的批判性理论中所获得的思考，同自己参与的世界范围的巴哈伊社团所产生的看法加以协调。具体来说，我虽然分享着激励自己教学和研究的那些支持批判性学术的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广泛目标，而且我看重这个学术团体所包含的分析眼光，但与批判性理论常常联系在一起对抗政治总是令我不安。我并不认为社会变革最好通过对抗性策略进行。我的怀疑直接根源于我在巴哈伊社团里的观察和经历。

作为一位对文化与交流批判理论感兴趣的学者，我在专业上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在我经常参加的有关批判性学术的讨论会、会议和论坛上，我对社会变革的对抗性策略的保留看法，常常被误解为轻视与这些策略具有广泛联系的批判性理论，因为许多学者把文化批判与这些对抗政治的联姻视为理所当然。他们常常难以在自己的头脑里将二者加以分离。结果，在这些圈子里，我努力将其分离开来似乎成了天真的或“不加批判的”。根据我的经验，这是由于我接触的批判性话语并没有提供允许这种分离的语汇。对抗政治似乎完全与批判性学术语言交织在一起。

我一方面致力于批判性学术，另一方面又从事社会变革的非对抗性策略研究，我所经历的这两者的紧张关系是由于两种文化，或者两种“话语宇宙”冲突的结果。一方的特征是相当对抗

性的世界观，另一方的特征我视之为相对的非对抗性或“有机性”世界观。在后者中，这些同样的现象是以互惠主义和相互依赖的话语表述的。

本书意在协调这些紧张的关系——将来自当代批判理论的关键概念和那些传统上遭到批判理论家忽视或拒绝的概念加以调和。此为本书的独创性贡献。就与批判性学术规范的这种脱离对许多批判学者来说，本书无疑有点“异端”色彩。幸运的是，几个世纪以来“异端”已经成为批判思潮的酵母。以此观之，我感到自己至少处在优势合作之中。

虽然本书在这方面作出了独创性贡献，但我撰写本书的根本动机在于提出一种理论框架，借此可以进行自己的批判研究和教学，同时忠实于自己有关人性、社会组织和追求社会变革的信念。当然，这一理论框架的效用及支撑它的前提最终都需要根据经验性证据加以验证，而且本书在这方面的确引证了初步的证据。它还根据如何寻求进一步的经验性证据的讨论得出结论。但这一切是很难在单本书中实现的，从这里开始的更大的经验性计划尚有待完满。与此同时，我邀请读者评价这些激励这个计划的理论命题，并以科学探索的精神参与允许我们检验这些前提的社会实验。

最后，虽然整本书都受到巴哈伊观点的激励，甚至有一整章都在讨论巴哈伊的各种方法和实践，但本书的写作初衷并非是作为宣传巴哈伊的一个工具。它是旨在提出这样一个论点：我们当代的“竞争文化”在社会意义上不公正，在生态意义上难以持续，周围的“竞争文化”是对其产生的社会和生态问题的不恰当

反应。为了这一目的，我的最初意向是不考虑提及巴哈伊社团以免整本书被曲解为仅仅是学术的“特洛伊木马”，其构思是在学术舞台上鼓吹巴哈伊。但经过反思，我认为，巴哈伊社团的方法和实践提供了我竭力证明的那些观点的无比宝贵的例证，所以它们需要被收入进来，尽管它们可能在某些读者之中引起警觉。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目的不是使读者脱离本书，而对巴哈伊产生兴趣，或者献身于它。然而，假如我推动了读者趋向于支持有关当今竞争文化的对抗主义规范的批判性自我表现，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

导 论

我们生活于一个竞争文化之中。在西方自由社会，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法律体系，以及其他许多社会机构和实践活动，都带有竞争性和对抗性。围绕着这个竞争文化的是一个抗议文化。作为对这种竞争文化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回应，我们参与抗议、游行、非暴力反抗活动、党派组织、诉讼、罢工和其他社会宣传和变革的对抗策略。

这些竞争性和对抗性社会规范已经无处不在，以至于对许多人来说，它们的存在似乎是自然的，不可避免。诚然，传统智慧表明，这些社会规范是本质上自私和好斗的人性不可避免的表现。根据这一逻辑，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是人性的一种必然表露。但是，竞争和抗议文化真的是人性的必然反映吗？人类是否可能拥有对抗或互惠行为的发展潜力？人类文化而非人性，有无可能决定着这些潜力更为充分的发挥？流行的竞争和抗议文化能否只是培育前者而非后者？如果是这样，意义何在？这种文化在促进社会正义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吗？

本书的分析提出，竞争和抗议文化并非人性的必然表露。在一个人类越来越相互依存的时代，它在社会意义上反而被证明是不公正的，在生态意义上是不可持续的。在进行这种分析之前，有两个简明的概念应当摆正。贯穿于全书的对抗主义和互惠主义

这两个术语，将被用来表示两种形成鲜明对比的社会行为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对抗主义指的是个人或团体相互争斗，追逐相互排斥的利益。竞争、比赛和对抗都是对抗主义的表现。相比而言，互惠主义这个术语则指的是个人或团体相互协作、追求相互包容的利益。合作、协力、配合与协调行动都是互惠主义的表现。

考古学和人类学都有证据表明，这两种社会行为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在早期人类社会¹或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出现过。在这个意义上，对抗主义和互惠主义就像两根明显不同的线条，相互交错，编织成人类的全部文化。虽然这两条线均出现于一切文化中，但它们是以不同程度、不同模式交织在一起的。

本书的命题之一，是对抗主义已经成为当今西方自由主义社会的主线。在整个当代的公共领域内，竞争和对抗活动已经成为制度化的法则。²的确，社会组织的竞争模式和社会变革的抗议模式已经无处不在，以至于对西方自由主义社会哺育出来的人来说，它们已趋于貌似规范、自然和不可避免的了。有鉴于此，人们常常很难憧憬其替代物。假如你孕育于一个竞争文化中，就很难设想出一个没有政党的公平政府，很难设想一个没有法律辩护的公正司法体系。再者，当你成长于一个抗议文化中，你就很难想象若不借助于抗议策略和战术，该如何对伴随这些社会组织的竞争模式而来的社会和生态弊端发表意见。本书提供了一个在这方面发挥我们社会想象力的机会。

本书的布局如下：为了批判地分析一种文化，就需要一种文化理论——借以解释何为文化，以及它如何塑造生活于这种文化中的人，如何被这些人所构筑的。第一章援引了广泛的学说从人类

学到社会学再到符号学及当代的文化研究，从而提出一种文化理论。本章始于在概念上界定“文化”这个术语，讨论了人性和文化间的复杂关系，然后区分了文化的心理结构维度(即文化意义上人类心智的偶发性结构)以及文化的社会结构维度(即文化意义上社会组织的偶发性结构)，旨在突出这些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文化层面。反过来，借着文化规范概念才得出文化变革和适应理论。最后，本章以霸权观的讨论结束，这种霸权观是理解这种现象的有益工具：占优势的文化规范可能以牺牲广泛的集体利益的方式，服务于社会特权阶层的狭隘私利。

在第二章中，我通过分析人们如何理解并实践权力关系，从而批判竞争文化。我指出，权力一般被理解为：在追求相互排斥的利益过程中，人们利用它来控制或反对他人。然后我又指出这一有限的理解突出了某些权力关系，同时也模糊了某些关系最明显的是，它掩盖了互惠主义或曰合作式地运用权力——在追求相互包容的利益的过程中，同他人分享权力的真相。我的结论是，以竞争和冲突方式理解权力的这种倾向，表明了一种根本的文化倾向，我将其称为规范性对抗主义——即臆断竞争是社会交往的标准和必然模式的倾向。

在第三章中，我指出规范性对抗主义在西方自由主义社会无处不在，虽然表现为“理性的”和一般的非暴力形式。我先考察了自己称之为三方竞争体系——经济、政治和法律方面，它们构成了竞争文化的制度核心。考察了这个体系的互相协调的性质及其社会和生态意义之后，我便转向其他日益增强的社会机构和实践，包括商业媒体、学术界和社会抗议。我指出了这些竞争和抗

议模式是如何相互加强的，最终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而效劳那些更有权势的集团的利益。在这方面，如第一章所界定的，我主张规范性对抗主义是一种霸权建构。换言之，规范性对抗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人为的一套“常识性”臆说和信念，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效劳于社会特权阶层的狭隘私利——他们对人类事务的主宰就归因于此。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文化建构的霸权主义，我在第四章中考察了互惠的不同表现。在简要地讨论了互惠的各种历史表现之后，我更为深入地考察了它们在当代的多种表现，包括在女性主义、系统理论、生态学/环境论、交流理论的替代解决方式中的表现。之所以选择这些例证，是因为每一个例证都针对规范性对抗主义及其替代性的社会实践模式提供了独特的批判视角。与此同时，由于这些可供替代的选择在流行的竞争文化中相互比较隔离，所以我认为，它们的实际效能始终很难评价。在一个实际上从每个角度均与其抵触、对其破坏的文化里，这些边缘化可供替代的选择常常显得幼稚和理想主义——这个结论与第一章介绍的霸权主义理论完全一致。

为了进一步评价社会实践的非对抗模式，我认为，观察它们在一个将其全面整合在一起的文化社团里的应用是有益的。我在第五章中对一个巴哈伊社团做了个案研究——这是一个新兴的全球性信仰社团，它将广泛的非对抗结构和实践整合进一个统一的文化系统中。我以探讨这个赋予巴哈伊结构和实践以活力的整体有机世界观为开端，然后比较详细地考察了它的一系列结构和实践活动，包括巴哈伊集体决策模式、制度结构和巴哈伊从事社会

变革的策略。接着，我转而探讨支持巴哈伊规范理论每一个要素的有关人性的设想。最后，我对这一章进行了总结，对巴哈伊社团今日的实际经验给予一个简要评价。

在最后一章中，我将自己的整体分析浓缩成一系列简明的理论命题，将其概述后，我探讨了更为广泛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又依次回应了人们对这些命题及其提出的理论架构预期的批判意见。最后，本书以讨论这些命题如何以经验证明作结。

第一章 文化

要批判地分析一种文化，就需要一种文化理论——借以解释何为文化，以及它如何塑造生活于这种文化中的人们，这些人又如何反过来构筑这种文化。文化一词具有复杂的历史和多重意义。依其当前流行的说法，文化常常指的是将一社会群体区别于另一群体的艺术、衣食以及其他各种美学和礼仪。在现代的文化研究中，文化趋向于指称社会群体中的各种话语、意义、信仰和其他意识形态系统。就其最广泛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而论，该术语还包含了社会群体中的各种政治、经济、法律和其他结构。然而所有这些意义都涉及从社会上习得的或由其塑造的那些现象，所以，在族群和跨代之间，文化是相当流动和可变的，同生物学意义上继承或确定下来、因而相当固定的那些现象截然相反。

一、人类本性——人的文化

鉴于本书主旨的需要，我们从广义上将文化定义为：一个群体

的全部社会遗产，包括其物质表现、思想表现以及结构或制度表现——全部都是在社会上习得或由其塑造而成的，因而形成了它的偶然性和可变性。¹ 相比而言，人类本性这个术语则是用于表示那些共有的物种特征，它们是从生物学意义上继承而来的所以相对固定或长久不变。

譬如，饮食需求是人性的一种内在特征，而我们对食物的品味以及我们生产和分配食品的诸方式，则是人类文化的一种表现。同样，使用复杂语言的能力是人性的固有特征，不同族群实际发展出来的不同语言则是人类文化的表现。也同样，生活于社会群体的倾向可能是人性的先天特征，而我们实际上构建自己社会关系的多种方式则是人类文化的表现。假如这样来理解人类那么它就是相当可塑(即使不是完全)的造物。虽然我们人类具备的物种特征有限而确定，但却能够拥有几乎无限的文化表现。当然，正如这些例证所阐明的，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微妙而复杂。目前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举止都是由上述两者的互动形成的，所以就这一点而言，需要辩证地理解自然与文化。这两者相互作用，虽然为了分析目的可以将二者分开来考虑，但其真实世界的表现却密不可分。不过，它们仍然可以充当有用的分析范畴。比如，想一想用构成它们的原色来分析色系的情形吧。在一定意义上，绿色既非蓝色亦非黄色。它有其独立的特征，可以相应加以研究。在另一种意义上，绿色却是由蓝、黄两色构成，可以按照两者的相互作用或混合加以分析。目前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也犹如色彩的浓淡，可以根据生理冲动和文化教养的互动或协调进行理解。

人性和文化的辩证关系也可以从这个事实中看到:我们创造文化的能力本身是人性的固有特征。此外,这种文化创造力还能够使人节制自己的各种生理冲动。例如,试想一下人类的性欲,虽然性冲动是我们的生理本能,但多数文化都有一些规范,用来控制其适当或不适当的表现。虽然这些规范因文化不同而异,跨代之间也有所变化,但所有文化却均有此类规范。所以,讨论人性与人类文化之间的关系,重要的是承认我们具有控制各种自然冲动的文化能力。

许多人类学家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指出人类生物进化的后一阶段曾出现于早期原始人类文化的母体中。正如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说,文化并不是对另一个未完成进化的物种——智人的最后补充。相反,最早期的原始文化似乎在原始人进化到现代人的过程中起了指导作用²,所以,人类身体和文化的进化过程并非是明显而有序的。恰恰相反,其中有一个重叠的阶段两者相互赋予活力,特别表现在人类大脑的进化方面

尽管自然与文化的区别微妙而复杂,但在分析时仍然是一种有用的划分。考察了自然与文化的辩证关系之后,格尔茨本人承认:

人类行为的本能控制与文化控制的界限定义不清,摇摆不定……有些事情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都完全是由本能控制:譬如我们不需要文化指导去学习如何呼吸,就像鱼不需要学习怎样游泳一样。而一些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却几乎必然属于文化范畴:我们不会从遗传的角度解释某些人为何信任计划经济,另一些人则依赖自由市场……同样,我们

说话的能力肯定是与生俱来的，但我们说英语的能力则无疑来自文化。³

由于自然化问题，自然与文化的区别在文化研究中适用于个特别重要的目的。当文化活动被内在化之后，对将其内在化的人来说，这些活动就常常显得自然不可避免，而且不可改变了因此，正如许多文化评论家和改革家所了解的，改良特定文化习俗的第一步是去自然化，即证明它们的出现是出于一种文化偶然性，而非生物确定性。例如，在整个历史上，许多文化都将奴隶制视为一种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现象。于是，18~19 世纪废奴运动的一个首要策略就是证明奴隶制的文化偶然性。同样，在历史上的许多文化中，妇女的从属地位被视为是天生的必然现象。多数力图解放妇女运动的首要策略之一，就是证明性别不平等的文化依据，而非其自然基础。

总之，文化与自然的区分是批判生物决定论臆说的起点。这个臆说主张，我们的行为和身份即使不是完全地，也是很大程度上直接取决于我们的基因。⁴ 虽然这些臆说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但直到今天，诸如社会生物学等，在话语方面仍有回响——偶尔会出头露面，为现存社会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现象辩护。与此相反，文化评论家质疑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竞争性的物质主义等的自然化——无论是在个人方面还是集体或结构性的表现方面。同样，鉴于对抗主义已经变成一种更加普遍或者根本的文化表现，本书也针对这种自然化现象提出了质疑。

当然，怀疑论者会争辩，人性从根本上是自私和好斗的，对抗关系就是这一本性的必然表现。的确，这些被广泛认同的臆说至今仍充斥于西方自由社会。⁵ 本书的分析认为，这些臆断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会造成社会压迫，以及生态的不可持续发展。为了使这一广泛的讨论便于进行，以上提出的有关文化的简明定义需要扩充为一种较为综合性的文化理论。

二、文化维度

同生物学意义上继承而来，因此相对确定的那些物种特征相比，文化是从社会上习得或塑造的，因此具有偶发性和可变性——对文化的这种定义仅仅是一种有用的文化理论的起点。如果按照这种定义，就会有太多的现象都被归属于文化领域，那么这种定义作为一种分析范畴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鉴于本书的主旨，文化的两个基本维度需要加以区分：一方面，文化可以按照人类意识的结构（即人类心智的内在结构）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它可以依据社会组织结构（即外在的制度结构）进行阐释。

同上面讨论的人性文化的范畴一样，这些心理学和社会学范畴也需要辩证地加以理解。两者密不可分、互相激励。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充当了有益的分析范畴，因为它们彰显了文化形成和被人类心智的内在世界以及社会组织的外部世界所塑造的方式。正如人类学家马克·霍华德·罗斯在其论述文化与冲突的一本著作里所阐明的那样，如果离开上述两者，文化便不可能得到充分理解。⁶

为了本书的主旨，这两大范畴将被称为文化的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维度。⁷ 心理结构指的是文化上共有的态度、价值观、信仰和反应倾向——或称之为人类意识结构——它们均通过社会学习过程所获得。这些心理结构在文化母体中发展，被广泛共享，而非个人的特质。当然，个人也会发展出自己对周围世界某些独有的态度和看法。此外，在同一个文化中，不同个体之间的思维方式也存在着重大差异。文化不是完全统一的实体。在任一特定文化中，都存在着许多态度、理念和行为的潮流、反潮流和亚潮流。与此同时，我们理解和应对世界的许多方式是从社会上学习而来，在文化上具有偶发性和广泛的共享性——这些就是心理结构所指。

另一方面，“社会结构”这个术语是指政治、经济、法律和其他社会体制或管理（如权力结构、生产关系、资源分配体系和劳动分工），它们约束和培育着人的态度、观念和行为方式。这些社会结构塑造着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心理结构倾向，同时也被其塑造着。因此，这两大范畴密不可分、相互激励。同时，它们在分析上又是有益的区分，因为它们使我们能够交替地聚焦于文化的两个不同的切面上。

比如，在分析社会群体中的冲突时，这种区分的价值显而易见。社会结构分析常常经验主义地突出社会组织内部可以确认的利益冲突，表现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劳资双方、父权社会的男女之间或后殖民世界秩序中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关系方面。社会结构的变革方法相应地倾向于着眼改良这些根本的结构冲突——即重组经济中的生产关系，制订保障男女

平等的法律，取消第三世界的债务，使无制约的全球经济服从于民主管治结构。

另一方面，心理结构分析常常强调不同集团对何为其利益以及某社会结构在多大程度上满足那些利益的主观理解。最终我们对各种社会结构的态度和反应，便通过我们观察这些社会结构的解释框架得以表达。也就是说，利益一定要得到解读。因此，心理结构的变革方法常常聚焦于提高认识、反思价值观或身份，或者改造人的态度和信念(即心智的主观结构而非社会组织的客观结构)。考虑到儿童早期的发展在塑造这些心理结构倾向方面的重要性，这些策略常常着眼于儿童或青年在其形成期的认知和情感的发展上。当然，心理结构倾向继续受到广泛的社会机构的塑造和强化。因此，正如在当代“社会营销”运动(即推销态度、价值观和信仰而非物质产品的媒体运动)中所看到的那样，改良这些倾向的策略也可以面向其他年龄层群体。

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分析各自在揭示某些事物的同时，也会掩盖同样多的事物——就像看同一枚硬币的不同面一样。虽然社会结构可以被客观地加以认知，但利益认知却是相当主观的，在拥有类似社会结构的跨文化间迥然不同，所以若要分析和理解这些差异，就需借助心理结构研究。此外，即使社会结构理论常常承认多重交叉利益的可能性，但若要解释不同的人群在类似的环境下如何以及为何将同样的利益进行优先排序，则需借助心理结构研究。同时，心理研究可能因仅仅聚焦于意识的内在结构而掩盖了较多的社会结构。所以，社会结构分析显然也是需要的。正

如罗斯的解释，客观形成的利益冲突只是问题的一半，利益的主体间解释为问题的另一半。⁸

三、文化变革与适应

既然许多心智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在文化上具有偶发性，而非由遗传基因决定，那么，一种文化理论同样需要解释怎样和为什么这些结构在不同的文化中差异甚大。换言之，一种文化理论需对文化的变革和适应过程作出解释。可惜，这些过程的复杂性和相当难以理解的性质意味着人们对它们仍然知之甚少，而且非常难以模拟。

下文概述的文化变革和适应的范式取之于一系列理论传统从人类学和社会学到当代的文化研究和符号学(符号与意义系统的社会生产研究)。文化规范的概念是这个范式的核心。在界定了这个核心观念之后，我将展示文化规范在一系列不断扩大的文化现象中——从单独的表征到更加复杂的话语建构，再到完整的话语，最后到综合的话语形态——是如何运作的。当然，这个范式只是一个粗糙的工具，用来思考和评论这些十分复杂和微妙的现象。然而，它却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词表和一套核心理念，使我们得以开始理解文化变革和适应的过程。

四、文化规范

心理结构倾向和社会结构的安排在各种文化中千差万别。甚至在某一特定的文化中，它们也常常应时而变。然而，任何时候在任何给定的文化中，由于共有的文化惯例或“规范”，人们一般都能够相互了解、沟通和有效地相互影响。

由此而论，文化规范这个术语指的是构成某一文化的复杂元素（即意识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之中和相互之间广泛共享的一致规则，或称之为结构性关系。⁹ 某些规范是明确规定的，其他的则很隐晦。某些规范是学习而来或通过自觉努力所构建的，另一些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内在化或产生的。不管它们是如何传送或出现的，文化规范都在建立常规或一致规则。借着它们，人们的思想、言行在一种共享的文化中得以相互理解。

在符号学和文化研究中，要想理解文化规范的功能，则必须清楚一个关键概念，即表征。¹⁰ 虽然一种成熟的表征理论对本书发展的这种分析是不需要的，但对此概念的综览却可以提供一种理解文化规范运行方式的手段。

表征这个术语指的是借助语言或“象征系统”¹¹ 创造和交流某种意义的社会过程。语言方便了同一种文化内的意义交流，因为语言和其他符号经过编码之后便代表了我们同它们建立联系的意义和事物。

另外，表征这个术语还包括这个过程的产品：表征可以按照三个基本维度或部分来理解：首先，表征是跟某种符号或能指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一个词，一种姿势，一幅画面或任何用来指代他物的东西；其次，表征与世上某种实物或实际行为有关——除了能指之外的某种物质或社会现象；再次，表征还与某种意义有关——某种认知解读和情感交流——它们在概念上与各自的符号和事物相关联。¹² 符号、事物和意义间的三向关联便构成了某种表征。¹³

对于任何特定表征，这三个层面的关系都是由文化决定的。也就是说，在给定的表征中，我们将其联系在一起的符号、事物和意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意义并非“属于”事物，因为同样的事物在不同文化中可能具有明显不同的意义。意义不属于我们用来指称那些事物的符号，因为同样的符号在不同文化中也可能具有不同意义；任何特定事物和我们将它与之联系在一起的符号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关联，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同样的事物也常常用不同的符号来表示。因此，我们在心里并通过语言，以文化上的偶发方式，而非基因决定的方式将符号、事物及意义联系在一起加以联想。换句话说，这些关系借助于文化规范，在特定的时间于特定文化中被稳定下来。

对这些表征元素及其文化规范关系的正式研究，产生了对社会实体构建的有益见解。例如，符号学家指出，虽然规范暂时确定了某一文化中诸表征元素间的交流规则，从而使人类群体能够以相互理解的方式传达意愿，但是，文化规范从未完全或永久地被固定下来。一种文化中的子群体常常挑战或改变广泛共享的文化规范。可替代性或对抗性的规范常常和占优势的文化规范相依并存。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文化中和文化间的复合力的作用，主流规范也在发生变化和更新。

虽然表征，以及使得表征清晰易懂的规范属于文化的最基本元素(文化得以建构的“符号砖块”)，但是，如果目光只是狭隘地关注这些孤立的建筑砖块，我们就很容易忽视由这些砖块累积而成的更加广阔和复杂的文化构建。当表征和规范接合而形成一

个更加复杂的建构时，它们就被赋予了深度和维度。“接合”在这个意义上具有双重含义。¹⁴ 首先，它指的是语言表述，语言在此被理解为某种组织化的词汇或符号系统。另外，它还指两个或更多个事物的相互联结，比如两块骨头接合在一起。这两种含义并不像它们乍看起来那样明显，因为语言表述始终包含着许多词汇或符号的联结或联系。

按照以上符号学的见解，接合在文化研究中比通俗用法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因为所有词汇和符号都是表述三元组的构成部分——这个三元组还包括具体事物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交流过程中，语言层面上的符号联结同时伴随着人们头脑中不同意义，以及物质世界不同事物或社会实践的联结。最终，社会实践能够以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形式接合在一起。因此，社会结构的文化维度(人类思想之外的世界的事物与实践系统)便以文化规范的方式与心理结构的文化维度(人类思想中构建的意义系统)借助于符号(意义系统)联系起来。

例如，“这就是人性”这个短语表面上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表述，但与此语言表述相关联的却是一套由文化规范决定的意义和实践。在许多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中，这个短语体现了人们对于某些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比如对个人利益的竞争性追求——所持的一套复杂的态度和信念(即意义)。正如以下章节的讨论将要阐明的那样，这些态度和信念会转化为常常宽容甚至鼓励这些行为的社会实践和结构。

这样，正如单个词汇一起表述，在一个特定语言行为中形成复杂的语法结构一样，和这些词汇(或其他符号)联系在一起的意义和事物(或实践)也同时一起被表述出来，形成了更为复杂的结构，即下面将会提及的话语建构。¹⁵ 同接合概念一样，“话语”一词也具有其表面意义和深层含义。¹⁶ 在表面上，它仅仅指的是比一句话更长的复杂的语言表述。在深层意义上，它指的是同这些语言表述相关的意义和事物或实践。它提醒我们在物质和社会领域，语言、思想和事物或实践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换言之，我们谈论和思考事物的文化方式影响着我们针对这些事物的行为方式。许多比喻提供了这方面显而易见的例证。

比喻是话语建构，不论在个人或集体的层面上¹⁷ 都在塑造着人的思想和行为。比喻是借别的事物作为典型，来帮助我们理解某一事物的方式。当托马斯·霍布斯提出，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理解为“所有人打所有人的战争”之时，他表达了一个对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思想和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学上的特定比喻。与此相反，两千年前的孔子认为，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理解为一个大家庭，其特点是需要内部和谐。他是在提出一个迥然不同的比喻，这个比喻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

因此，话语建构是对某一特定现象——比如上述例证中的“人性”或“社会”——进行谈论、思考和行为的方式，这种方式是通过社会构建的。此外，话语建构又受文化规范或惯例支配。也就是说，文化规范决定某种特定的话语建构在某种特定文化中是否有意义。例如，当个人主义、自私和侵略这些观念同有关做人意义的理念放在一起表述时——比如在“这就是人性”这句话里——所导致的话语建构就是西方自由主义文化规范所熟悉

和可以理解的，而某些其他文化却从关联和集体的角度来理解人性。在这些文化中，西方自由主义者的人性表述是相对令人费解的。¹⁸因此，话语建构具有文化和历史的特殊性。

将这个模式进一步加以扩展：话语建构同时可以表述为一种高度复杂的表达系统——完整话语——它们也往往为文化规范或惯例所左右。话语是一些广泛共享的表述系统，它们从文化和历史角度为人们提供了谈论、思考和实践某类现象的方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文化规范和社会实践之间的联系变得特别明显。

例如，在这个世纪的很长时间内，西方的医学话语为人们提供了思考、谈论和行医文化上的特定方式。它表达了一种概念系统——首先是医学上的“疾病模式”，它以一套思考和谈论人体的特定词汇为特征。它表达了一个决定着何为有效的医学知识的研究和专门的知识系统以及医患关系，其方式主要是规定了前者提供专门服务，后者是疾病的受害者、医疗干预的被动接受者它还明确表达了制度性安排——医院、健康保障等——组织和规范了现代医学实践。其他诸如有关教育、商业、法律、政治等方面的话语，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加以理解。它们都是对某种特定现象进行思考、谈论和采取相关行动的文化规范方式。

所有话语都共有一系列类似特征。对于任何给定文化和历史中的某类现象，它们影响着哪些“可言说”或“可思考”。它们代表着标准“知识”，界定了这种知识的权威生产者，这些知识反过来又构成了特定文化和历史中有关这类现象的特别信念和“真理”。它们界定了自己的“对象”——活动于其中或受其作用的人们。于是，这些对象可以被看出来，甚至已经开始被人格化或遵

守其内在的逻辑。最后，它们按照符合自己内在逻辑的方式，催生了组织和调控集体实践活动的社会结构。

再者，关于话语的定义，不仅要看它囊括什么，还要看它排斥什么。它们同样也影响着某个特定文化中哪些不可言说或不可思考、哪些不属于权威知识或真理、哪些人不是这类知识和真理的产生者、哪些行为“对象”不可从事，哪些机构配置不可存在，等等。

譬如，在西方医学话语这个例证中，诸如“保健”和“预防”这些整体的概念，至今仍被疾病处理和危机干预等简化论所遮掩，因而黯然失色。如此一来，基于营养学的预防性医术、使用草药、肢体运动、针灸等，在 20 世纪的很长时间内都被大量排除于有效知识系统之外。然而，西方医学中的人类“对象”在康复和治疗过程中，却很少被看作是重要的行为主体。因此，对于这些替代性的康复和治疗方法，制度方面的支持严重缺失。这样的话，在理解现代医学话语时，不仅要看它带来什么，同样要看它缺失什么。

将这个模式进一步扩充，既然话语建构可以一起联结成整个话语，那么整个话语也可以反过来与其他话语联结成综合性话语形态。¹⁹“综合性话语形态”这个术语指的是，独立但却相互兼容的话语的相互联结。这种方式加强了对许多现象进行思维、讨论和行动的类似方式。这些话语再次根据文化规范或惯例，整个被联结成更大的话语形态。

例如，上述医学话语以将自由市场货物发送和服务理想化的话语加以表达，它们构成了更大的话语形态，实际上转变成了一

种商业化的医疗系统，将医疗保健像商品一样售给买得起的人，从而像任何自由市场主体那样运作——就如今天的美国那样。另一方面，当上面描写的医学论述以那些重视必需品和服务的公共发送的话语加以表达的时候，它们就构成了一种实际上转变成了公共医疗保健模式的话语形态，它提供服务而不论接受者的财务状况——正如当今加拿大和美国的情形。

在这方面，一种话语形态可以被视为一个话语宇宙，即相关话语的荟萃，它表示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定文化，成员在其中诞生、成长、发展，学习“规范”的思维和言行方式。虽然这个话语荟萃并不永远确定，而且常常会以新的方式重新加以表述，但对在其中被抚育长大的人来说，它却显得完全“自然”换言之，我们常常自以为自己的文化和话语环境理所当然。（世界观、意识形态、范式、知识、人生观或知识系统这些术语均从稍有不同的角度处理或对待这个抽象的概念。然而在本书中，话语分析的优越性是，它专注于这些比较抽象的精神和文化现象的相当切实和可理解的交际痕迹或指向——使其更便于分析。）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话语形态应当，甚或能够加以回避。话语不仅为我们提供帮助，同时也带来约束。它们给人类的交谈、思考和实践提供了实用的工具，即使这个工具同时在很多方面也限制了我们，但不论怎样，话语是社会存在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必要特色。我们始终存在于话语环境之中。人类就是话语生物，我们将永远存在于话语环境中。从文化研究的观点来看，挑战就是始终意识到，我们的话语环境是由文化构建而成的，它们是可以变革的。

再则，即使符号学和文化研究学者常常使用话语概念，强调语言和表征系统在文化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集体社会结构和实践所起的作用却不应被忽视。语言提供了一种思考文化的模式，因为语言提供了使文化得以发展的思想方式和交流方式，但语言仅仅为文化提供了局部的模式或比喻。一旦这一比喻所提供的深刻见解得到理解——特别是文化规范所起的核心作用——就有助于将话语概念回转为更广泛的文化观念。在这方面，我们不仅可以用话语建构，而且可以用文化建构的措辞进行思考。同样，我们不仅可以用综合性的话语形态，而且可以用综合性的文化形态进行思考。在这两种情况下，前者的措辞突出了文化的语言或表述维度，后者则使我们的注意力被引回到全面的文化表述上来，包括存在于人的话语之外的社会结构和实践活动、尽管它们是借人的话语而被了解的)，所以，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我将根据自己强调文化的“陈述”表达方式还是“实践性表达方式，交替地使用这些措辞。

五、对文化规范的影响

从孤立的表征分析到愈加复杂的话语系统分析，再到综合的文化形态分析，它们提供了一种考察和评论文化的更为广阔的优势。从其中的每个优势来看，上面讨论的任何话语或文化系统更加显著的特征，都是其社会和历史的相对性。不同社会采用不同的规范，这些规范又产生了不同的话语或文化形态。

认识到这一历史特征会导致这些问题的产生：特定的文化形态如何及为何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这些文化形态的社会

影响和意义是什么?怎样以及依据什么能够对支撑这些文化形态的规范进行批判、评价和改革?上述理论模式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和其他问题,以及影响或改革我们的文化环境。

请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不同文化规范是怎样在某一文化中取得突出地位(或统治地位)的?最显然的是,自然环境似乎起了一定作用。文化规范起码可以被理解为对环境特征和压力的社会适应。因此,许多文化发展了对自然环境特征——从热带雨林到冻土地带、从沙漠到海洋环礁——进行思考、谈论和行动的复杂系统。一方面,历史机遇和环境无疑在传播各种文化规范中起了作用,因为不同文化通过人的迁徙和探查相互接触,从而出现了语言、思想和实践的交流。另一方面,个别的创造性想象和发明无疑对新文化规范的创始产生了影响,因为个别人表达了激进的新见解——比如爱因斯坦把握了能量与物质的关系(即 $E=mc^2$)——转而对社会思想、谈话和实践(在爱因斯坦的例证中,是迎来了一个原子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社会关系的作用

许多文化研究学者在这些基本力量之外,还关注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性别、种族、民族和年龄等——在各种文化规范走向支配地位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学术界的绝大部分人都聚焦于不平等权力在这些进程中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规范至少可以被理解为:竞争性的社会团体为了构建我们的文化世界——从我们的意识结构到社会结构——以利己方式所进行的持续历史斗争的产物。(应当注意的是,互惠与合作也似乎在社会和文化

演进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但迄今为止，西方学术界都常常忽视互惠与合作是话语和文化的重要决定因素。本书后面的章节还将重提这个主题。)

虽然并非所有的社会团体都会受到激励，为促进自己的私利而不惜牺牲他人，但历史记录清楚地说明，的确有些团体因此而受到激励。许多文化中历史和当代的奴隶制度的实践都提供了这一现象的明显例证。男性对女性的控制提供了另一个明显的例证。

此外，即使历史可以(部分地)被解释为竞争性社会团体试图建构一个能够最好地服务于自我利益的世界的过程，但必须记住，公平竞争环境并不总是表现为竞争的。在历史上，某些社会团体传播促进自我利益的文化规范的能力明显优于其他团体。通过剥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掌握文化生产方式的平等权利，从而使男人们在这一方面获得了许多优于女性的历史条件。由于同样的原因，许多少数民族和“穷忙族”也经历了接近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上的不平等待遇，有着同样的命运，所以，因各种物质和历史原因，某些团体(和团体联盟)在历史上占有了特权地位，借以定义或建构我们的文化世界。

七、意向问题

权力关系影响我们的思考和言行方式，这样说并非意味着这种影响必然是自觉或蓄意而为——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这是显而易见的。譬如，纳粹德国的领导集团显然就是希望通过有意鼓吹德国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论调，实现他们的企图。

即使定义现实的努力有时可能是自觉或有意而为，但利己主义的现实定义并非总是借着自觉和蓄意的过程而得以实现。我们常常倾向于以利己主义的方式来“看”世界，但并不一定能意识到我们正在这样做着。换句话说，我们可能对符合自己私利的观点具有一种意识不到的亲和力。²⁰ 我们很少是在权衡一切可能解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自己的私利之后，再有意识地决定这样而不要那样解释事物。恰恰相反，我们对现实的解释是通过动机、合理化及社会化等复杂、微妙和常常是潜意识的过程的相互影响而出现的。

再则，因为语言、思想和社会实践之间那种复杂的“鸡和蛋”的因果联系，归因于意向性的努力也大有问题。意向性怎么可能仅仅而且确定地归因于特定的个人或团体呢——因为这些个人或团体的意向是受前人的语言、思想和实践影响的？意向的形成至少部分地受制于我们没有选择继承的心理结构倾向。这并不意味着个人或团体应该被免除对自己行为所负的责任，相反，它意味着意向性问题常常被复杂化，自觉的意向性并不总是能够假设的。我们的确行使自由意志，但我们并非是在自己完全选择的精神和社会结构中这样做的。

不管这些过程是自觉和有意与否，最终某些文化规范凌驾于其他规范之上仍然是社会关系作用的结果。由于某些团体处于较高的特权地位，它们由此能确定如何解释各种现象，结果就是它们的表征系统——无论有意或无意地——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某一文化中就处于支配地位。²¹ 例如，可以考虑一下大众传媒在当代文化中的功能。在现代世界，更有权使用大众传媒工具的

人就拥有一项特权，能借以建构对现实的支配性表征或优先定义。²² 在大众传播学研究领域受到多数人一贯支持的实证结果之一，就是一个使用商业传媒的“等级制度”是存在的，其特征表现为一个处于顶端的相当排外的精英群体。²³ 然而，在这个“使用等级制度”中，一个明显狭窄的利益和一个解释范围的优势并非意味着处于这个等级制度顶端的个人有意共谋促进对现实的自私定义。他们许多人很可能十分真诚地致力于简单地解释和回应自己看到的这个世界。不过，他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常常不自觉地迎合了自己的私利。

这些特权集团在其对现实的话语建构中成功的程度，等同于他们所培育的这些规范在自己文化中显现为正常或自然的程度后者又是选择性文化规范被忽略或被边缘化的程度。另一方面文化规范从来都不是完全固定的，来自边缘的促进替代选择的努力有时会获得成功。在这一方面，文化史至少可以被部分地解释为在不同社会团体之间，话语或文化持续“协商”的过程——无论自觉与否。

八、霸 权

关于建立和巩固，以及挑战或改革支配性话语形态或文化形态的过程，七八十年前安东尼奥·葛兰西²⁴ 就加以探讨过了葛兰西的分析要点是重新修订了传统的霸权观。历史上的霸权观，指的是一个政治实体对其他政治实体在空间或地理范围内的统治。这种霸权是典型的主要靠武力而取得和维持的。与此相反，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观指的是相对于他人而言，各种社会阶级建构自己

观察和解释世界的方式的相对能力。它的取得主要不是依赖物质力量，而是借助于文化领导力。

自从葛兰西修订了霸权观的含义以来，这个术语的使用就变得相当刻板，从而失去了某些原有的价值。现在，这个术语经常被用来简单地指代任何类型的支配行为。可是，根据葛兰西的用法，该术语意指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以非强制的手段培育流行世界观的能力，这种世界观将其社会统治地位自然化，使这些结构安排看起来也服务于所有其他社会阶级的利益。只要从属的社会阶级基于这样的设想，认为从属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实际上它还服务于自己的最大利益，那么这个社会阶级就会同意自己的从属地位。

葛兰西主要依据经济阶级的主宰权而发展了自己的分析。当代的文化理论家保留了葛兰西对该术语的原先定义，还将霸权观应用于种族、性别、民族关系等方面。在这个扩大的范畴内，霸权优势的取得是由于某个社会团体(或其联盟)能够如此有效地提出自己对现实的表征——以至于不仅自己的团体，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处于从属地位的那些团体也接受了这种“共识”。但关键是，文化霸权显然不是借武力取得的。相反，它的取得是靠对某一社会秩序的赞同，因此相当不易觉察。其有效性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特别的思维和言行方式都常态化或自然化了——而且还伴随着替代选择的边缘化。如此一来，霸权优势使某些文化规范变得合法化，还使其他文化变得不再被信任。

历史上妇女曾被竭力排除在从高等教育到公共决策的公共生活舞台之外，其主要工作是从事家务，这个例证可以被理解为一

种霸权过程。它涉及在男女中间都培育关于妇女在社会上的“适当地位”的“共识”。当然，并非所有妇女在历史上都接受这些观念，而且也有许多人对其加以反对。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妇女接受这些观念，证据是有些妇女组织群起反对妇女选举权运动因为她们确信，妇女参与公共生活会损害其道德的纯洁性，整个社会结构将因此而被削弱。²⁵

正如这个事例所证明的，霸权优势从来都不是不可更改或绝对的。即使许多权利尚待争取，但西方妇女(以及许多种族的和其他历史上受压迫的族裔)在最近几十年还是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因此，历史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霸权斗争或协商的持续进程。话语的“界限”随着时间而同支撑自己的那些文化规范一起转换和变迁，间或在很长时间显得非常难以变更，有时渐进地发生变化，有时又经历了迅速而激进的转变。然而，在特定的霸权优势阶段，变革常常出现于边缘区，即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共识的外部。

因此，变革既定文化规范努力的历程常常是艰苦的。即使这些变革可能与民众的广泛利益有关，但其语言、思想和行为主要受现存推论或文化形态，以及那些因此而将一些观念内在化的人的预设所影响。这些观念可能最终导致他们的利益从属于历史上的其他特权集团，也可能恰恰反对将他们从被压迫环境中解放出来的变革。简言之，你常常很难越出你曾经诞生、成长于其中的那个松散的宇宙之外，很难想象在它之外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甚至连承认你生活于一个文化和历史上的特定话语形态中都有困难。霸权优势的作用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这个形态不仅

表现为文化建构，而且成为了“现实”本身，变得正常、自然和必然。

总而言之，我们生于并非我们自制的文化建构的世界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可能充当自己栖息于其中的文化世界的变革者或重建者。鉴于文化规范的根本是流动性，这种可能性始终存在。无论如何，这些变革都取决于我们辨识自己文化环境的历史特征并步出这种环境的能力。哪怕我们首先在自己的想象中，像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试图对竞争文化所探讨的那样也好。

第二章 权力

上一章提出，人类文化可以通过研究构成它们的话语被部分理解。基于这个模式，话语分析可以被视为文化分析的一种有效方法。为了理解竞争文化，我们可以从分析人们在其中思考和评论权力的方式入手。在一种竞争文化中，人们不仅倾向专注于权力关系，而且常常思考和评论权力，就好像行使权力就一定会发生竞争和冲突。只要我们的思考和谈话方式影响了我们的行为方式，这就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一、权力竞争

一切竞争都基于竞争性的行使权力。既定竞争中的权力形式取决于特定的竞争性质。在体育比赛中，比如足球或网球，力量、耐力、技能与协调等身体因素决定着结果；在精神竞争中比如象棋或桥牌，战略思想、专注力和记忆力等智力因素决定胜负。但在一切竞争中，目标都是赢，即控制或打败对手，以某种方式制服他们。

因此，竞争提供了一个思考和评论权力的特别框架。在竞争文化中，说某人或某团体很强大，那就意味着他们处于一个可以支配、击败或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位置。大众话语充满了传达这种权力观念的表述。下面的话源自大众媒体话语和普通交谈，也是这种用法的少数例证：

政治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成功的政客都知道如何行使权力……

权力就是金钱，金钱也是权力。掌握权力者就是掌握金钱者。“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老生常谈。这就是我们为何要在政府中实行分权制的原因——目的是将权力的滥用现象最小化。这也是为何新闻界要充当政府的监督者——旨在揭露权力的滥用。

人为何追求权力？因为权力就是力量，权力就是特权它是影响或控制他人的能力，攫取权力就是希望为所欲为。攫取权力是人的本性。

我对选举已经不胜其烦了。我无力改变它。利益集团以其财政捐助把持了一切权力。

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人多力量大。

美国是今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可以采取单边行动，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

跨国公司拥有真正的权力。它们为所欲为。它们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内政府。民族国家已遭废弃……

抗议，组织，抵抗，反抗制度，反抗权力……

如果这些话听起来耳熟，那是因为其例证了在一个竞争文化中，人们思考和评论权力的方式。不过，人们还有思考和评论权力的其他方式。

二、两种权力模式

思考和评论权力有两种被广泛利用的方式。经过几十年后现在研究权力的人对这两种方式进行了区分。这种区分通常是“行动权”和“控制权”的表述加以对比。¹就像瓦顿伯格解释的那样：

行动权和控制权的表述，是将“权力”这个术语出现于其中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日常用语加以区分的简略表达方式。依赖于人们视为自己权力论基础的措辞，一个人会获得权力在社会领域地位中的绝然不同的模式。²

这样，“行动权”可以被理解为达到目的的一般能力。人们能够依靠“行动权”这种能力来举重、筑桥、协力登月或建立民主政体。另一方面，“控制权”则指的是某些人控制他人的能力——支配、击败或以某种方式剥削他们。³历史上一个种族控制另一个种族、一个性别控制另一性别或一个国家控制另一国家，都有经典例证，在有关权力的文献中引起很大的关注。“控制权”这一用法通常与竞争文化相一致，其中权力是以一种竞争和对抗性的方

式被理解的。“行动权”的用法暗示了另一种思考和评论权力的方式，表示的是一种互助合作、互惠主义的行使权力方式，它将权力表达为能力而非冲突。

建立这种区分之后，许多学者放弃了“行动权”的用法，因为它与社会分析不大相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多大程度上，竞争文化不仅塑造了大众话语，而且塑造了学术话语。在权力观方面，发表了大量论著而蜚声国际的社会理论家史蒂文·卢克斯例示了这一趋势。卢克斯在其著作中明确地摒弃了“行动权”的模式，认为它比“控制权”少有分析价值。⁴他提出了两点理由：首先，他断言“行动权”理论与传统理解的“权力”的核心意义，以及始终引起研究权力的学者全神贯注的问题不一致。因此，卢克斯承认，他之所以放弃将“行动权”作为一种思考权力的模式，其首要原因乃是迫于学术传统；其次，卢克斯主张，当人聚焦于“行动权”相关概念时，那么“权力的冲突方面，即权力施于人这个事实便完全从人们的目光中消失了，而且同其一起消失的还有起初研究权力的核心论题”。卢克斯继续指出，“行动权”理论最终掩盖了权力的核心层面，将它们排除在了定义之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像许多社会理论家一样，卢克斯放弃了“行动权”模式，反过来却重蹈其覆辙。他无视“行动权”的范畴，而界定其同社会探究和观察没有关系——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揭示了自己的见解和设想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竞争文化的塑造。考虑到他参考学术传统，将其作为自己放弃“行动权”理论的理由，卢克斯的论证就倍加具有讽刺性了。这个讽刺之所以在这里出现，是因为学术传统被多数批判理论家视为对批判思维

的一种潜在的霸权主义约束——所以应持久地受到批判，而不应毫无批判地加以接受。但是，卢克斯在乞灵于传统的同时，又明确地认同霸权理论。

卢克斯虽然承认“控制权”只是思考权力关系的一种方式，但又明确地赋予其特权，将其首选为社会分析的焦点，即使这种思考方式并不是独一的。这一倾向也是其他许多研究权力的理论家的特点。例如，瓦顿伯格在对“行动权”和“控制权”进行了同样区分后，也继续争辩说：“作为一种绝对优先权，权力论明确表达了控制权观念的意义，因为社会理论将这种观念作为把社会上根本不平等的本质概念化的首要方式。”他因而断言：“控制权是权力的第一要义。”同卢克斯一样，他认为，集中于“行动权”关系仅仅“使理论家的目光脱离一种社会理论必须理解的一系列现象，即存在于现代社会的非法不平等”。⁵

其他许多学者在自己的论著中甚至不承认思考和评论权力的其他方式。他们只是设想话语权和“控制权”同义。他们不需要承认或证明这种设想的合法性，因为它完全符合竞争文化中的流行惯例。⁶

但是，正如在第一章中的评论提醒我们的，话语建构并非只是被动的或中立性的语言设计。它们影响人们认知周围世界的方式，而我们的认知又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当我们的话语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竞争性和冲突性的权力关系时，互助合作的关系就开始脱离我们的目光。结果，我们易于对人性作出假设，规定社会组织的模式，否则，我们可能就不会这样——正如下一章讨论的。但首先，为了充分理解这种关于权力的传统论述，我们需要更为有效的语汇，借以思考和评论权力关系的方方面面。

三、反思权力

仅仅从“支配”这个角度来理解权力，并不能为社会理论或社会实践提供一个充分依据。社会理论或社会实践所需要的是个清楚思考社会关系整个领域的更为全面的方式。将主导关于权力的学术文献达数十年的“行动权”和“控制权”加以区分，是扩大我们对权力理解的起点，但其仍嫌不足。

将“行动权”和“控制权”加以区分，意味着两种地位相当却又互相排斥的权力模式，就好像我们要么按照这种方式，要么按照另一种方式来思考权力，但经仔细观察，这些模式既不相同，又不互相排斥。广义的“行动权”仅仅表示能力。譬如，吉登斯将权力界定为“转化能力”或“取得成果的能力”。⁷此为对权力这个术语的首要定义。另一方面，“控制权”是作为能力这个首要概念的一个特殊例证。如果我说我拥有控制某人的权力，只不过是“我有权对那人实施控制”的另一种说法罢了。所有关于“控制权”的可能表述都可以按这种方式，将权力理解为对他人实施控制的权力，所以，发展一种思考和评论权力的更为全面的模式的第一步，就是承认“控制权”关系仅仅是比较普遍的“行动权”观念的一种特例而已。⁸

其他有关“控制权”关系的范畴也可以得到认同。譬如，细想一群人集体或一致决定建一座桥梁或学校。这些人为了追求一个共同目标，会行使自己的权力进行协作。假如这个例证适合义的“行动权”概念，那它显然就不是“控制权”的一个例证。人

们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以合作或互利的方式行动，就是相互行使自己的“行动权”而非“控制权”。为了定义的目的，这种“权力合作”的范畴会被称为互惠主义的权力关系——它是作为能力观的一个权力的基本子范畴。⁹

但是，“权力合作”与“控制权”仍然不是地位相当而又互相排斥的分类。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例子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运用权力相互攻击，这种方式最终导致两败俱伤。这些对手都没有行使权力来控制对方，但他们显然既未以合作的方式，也没有按互惠主义的方式相互进行“权力合作”。由此而论，人们要么以互惠主义的方式相互进行“权力合作”，要么以敌对的方式相互进行“权力对抗”。¹⁰ 为了定义的目的，这些基本范畴的第二项将被称为对抗性权力关系。互惠主义的权力关系和对抗性的权力关系一起，在作为能力的比较普遍的权力概念中，构成了两个地位相当而又互相排斥的关系范畴。

那么，“控制权”在这个模式中处于什么地位？为了分析的目的，我们可以将互惠主义的权力关系和对抗性权力关系各自分成两个附加的子范畴，正是在这个层次上可以放置“控制权”的概念。行使对他人的“控制权”显然是对抗的而非互惠主义的权力关系的子范畴。对抗性权力关系的另一个子范畴是“权力制衡”关系，譬如上面提及的两败俱伤的例证。¹¹ 将“权力制衡关系同“控制权”关系区分开来的是对手的相对平等或不平等，在“权力制衡”关系中，权力是平等分布的，所以任何一方都不能控制另一方；在“控制权”关系中，权力的分布是不公平分布的，所以一方可以支配另一方。为定义的方便，这些地位相当而又相互

排斥的对抗性权力关系的子范畴将被简单地称为权力平等(即“权力均衡”)和权力不平等(即“控制权”)。

权力平等和权力不平等在互惠主义的权力关系范畴里有镜像对应物。换言之,两位或更多的代理人合作共事也可能具有平等或不平等的权力分布,但其后果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互惠主义的关系和竞争性关系截然相反。互惠主义关系中的权力平等导致所有合作人的“相互授权”。例证是一群拥有同样经济资源的人所创造的购买或行销合作社。另一方面,互惠主义关系中的权力不平等导致了更强大的代理人对较弱者的辅助授权。其例证是父子间的抚育关系,或师生间的辅导关系。¹²在这两个例证中,权力不平等可以被理解为是必要的,但又是这些关系的暂时特征。当它们健康时,这些关系的最终目标是养育和教育不平等的一方直到它们达到相对平等的情形。

正如图 1 摘要所阐明的,上面概述的这种模式,提供了一个思考和评论整个权力关系领域的全面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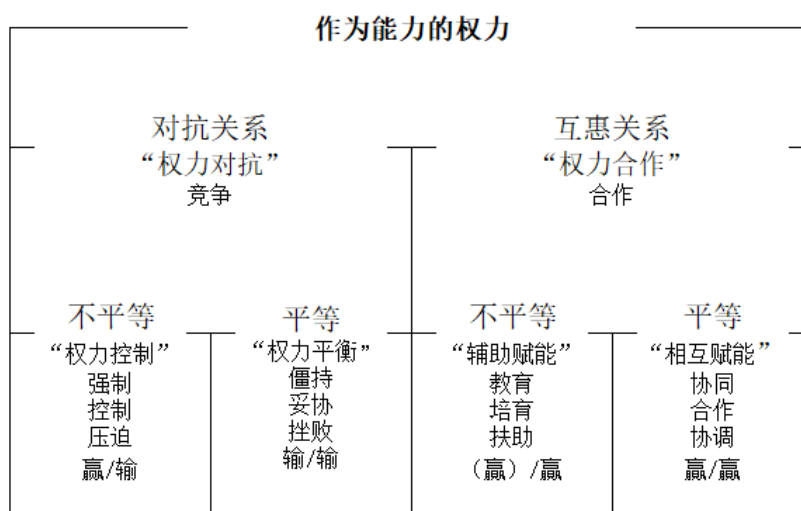


图 1 权力: 综合图解

这个视觉模式当然仅仅是一个概念模型——一个试图帮助思维和讨论的视觉、心理表述。分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持它的一成不变或丝毫不差。相反，它们提供了一个理想型的语汇，正如韦伯使用了这个术语，广泛的模式和区别便借此而被认识和讨论。

然而，这个模式的确帮助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区分，它们在西方自由派关于权力的论著中常被遗漏。显然，这个模式形象地表明，有关“控制权”的狭隘视野模糊了其他广泛的社会关系。这种狭隘的视野将权力的关系方面(对抗性的和互惠主义的区分与权力的分配方面(不平等与平等的差别)混为一谈。若将二者混淆，就很难清楚地理清权力关系。

除此以外，该模式还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人们可以理解其他许多类型的社会关系，它们在有关权力的论著中通常都模糊不清。例如，在这个框架内，权力不平等不会自动地与统治关系、剥削等量齐观。权力不平等可能令人难以忍受，特别是其与对抗性权力关系相提并论之时，但在互惠主义的权力关系的背景下，不平等实际上是被允许的，比如在父子之间的养育关系中或师生之间的教育关系中。整个社会团体间的统治关系有可能被改良为辅助授权关系，以便改正历史上的权力不平等现象认可行为策略和渐进的税收计划——当其被精心设计并带着善意的时候——就提供了这种社会结构层面的辅助授权的例证。

等级制度，作为一种组织原则，也有可能被视为一种潜在可取的不平等形式。在一个社会或组织环境中，等级制度指的是结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无疑，许多人将等级制度和压迫等同看待，但这种做法，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与对抗性的权力关系混合

了起来。在协作关系的语境中，等级制度能被认可为是一种有价值的，而且常常是必要的组织原则。除此以外，当任何的团体平等参与者规模过于庞大，不能有效地使每个成员参与每个决策过程时，如果有意将某些决策权托付给较小的、通常是被选举出来的群体，这个团体就会受益。这种一致同意的结构不平等——或等级制度——可以授权给一个小组，以便达成某些事情，否则便不可能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它还可以解除大批人持续承担决策责任的压力，由此他们可以自由地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其他可能有益于整个团体的工作中，使之富有成效。

由此观之，等级制度在正当的情况下可能是一种有价值的可取的组织原则，但这些情况包括其他平等者中的协作关系。在这方面，当这个框架表明等级制度必然不可以与压迫相提并论时，必须提醒人们，等级制度也不能像许多传统的功能主义理论家常常臆想的那样，反过来必然与授权制相提并论。¹³ 在对抗性关系的情况下，等级制度确实常常导致压迫，而且这些情况在流行的竞争文化中普遍存在。

正如这个框架揭示了权力不平等的积极和消极方面一样，它也显露了权力平等的两面。尽管权力平等在许多互惠主义的权力关系中明显是一种可取的条件，它导致了相互授权制度，但在许多对抗性权力关系中，它也可能发生高度的机能障碍，结果常常引起两败俱伤。例如，想一想派系对峙的僵局，这简直就是今日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中政治决策的共同特征。这种僵局不仅削弱了

势均力敌的党派的权力，而且也削弱了全体公众的权力，使公众手中仅有的集体决定权失去效力。

再看看被称为确保相互摧毁战略(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AD)核武器论调的极端例证。这个论调盛行于整个冷战时期，而且有证据说它在今天仍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核武库一直存在。MAD 是对抗性关系的一个典型例证，被解释为在其他方面可取的特有“权力平等”(在此为核均势)，但这一对抗性的权力平等的表述却使人类在脆弱的平衡中悬而不决。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就可能导致彼此同归于尽同时，它将持续沉重的军费负担压在劳动者头上，他们的生命不断受其威胁。在这方面，它不仅威胁着要毁灭我们，而且还可能剥夺我们的权力。MAD——很大程度上是以核能力相对制衡为特征的对抗性地缘政治结构不可避免的产物——也有可能支持‘确保相互削弱’(Mutually Assured Disempowerment)。

这些少数例证说明，上述框架提供了一些可以更清楚地思考和评论权力关系的语汇，给了我们一幅比较有用的权力关系“地图”。事实上，借助二维方式表示这一框架，的确使我们能够绘制同对抗主义——互惠主义和平等——不平等的两坐标轴有关的关系“地图”，正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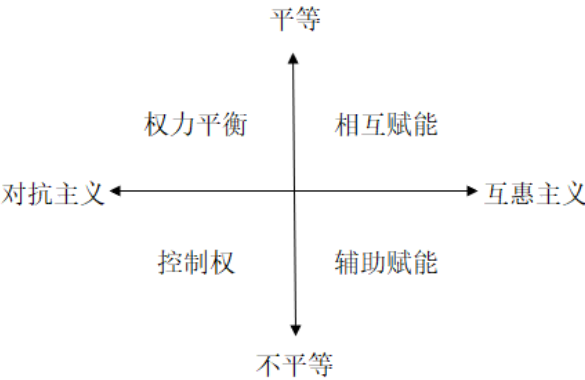


图2 权力的关系及分配维度

在这幅概念图上，“控制权”关系仅仅是四个可能的象限之处于该图的左下角。折中、拥堵和其他“权力制衡”关系处在图的左上方。养育、教育和其他“辅助授权”关系处于图的右下方。报答、协调和其他“辅助授权”关系处于图右上方。

一方面，这个概念(比图 2 的框架更有效地)帮助我们认识对抗主义和互惠主义或平等与不平等的相对特征。某些关系或多或少地比其他关系更富有对抗性或互利性，就像某些权力分配或多或少地比其他分配更为平等或不平等一样。因此，极端对抗主义或极端不平等可以与两者更为温和的表达区别开来；而互惠主义和平等则可以被认为是一些理想，即使我们不可能完全实现，但在很多情况下却值得努力争取。

另一方面，这个概念图提示我们，沿着任何一极都是可以运动或变更的。正如父母身份、教育和其他发展关系的例证所示抚育关系可能始于高度的不平等，但会逐渐发展为相对平等的状态。或者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关系可能越发趋向对抗性，也可能转向协作，如同在政治党派偏见或两党关系(甚至无党派)间摇摆不定。

最后，这幅概念图表明了区别“行动权”和“控制权”的困难。因为“控制权”被描绘为左象限，“合作关系”——或作为能力的权力——可以被理解为整个平面，两极(对抗主义—互惠主义和平等—不平等)都被刻在了它上面。当然，这个概念图只是为便于思考和讨论而设。实际的社会关系是不可能根据这个平面上确切的序数坐标精确定位和比较的。

四、从理论到实践

上面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的思考和评论权力的框架但我们为何要煞费苦心对此进行讨论呢?原因很简单。我们的思维和评论方式常常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竞争性和对抗性的权力论著对此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证,因为它们转化成为了竞争性和对抗性的社会实践模式。这应当是毫无疑问的。即使冲突和竞争似乎是人类相互作用的不可避免的状态,因为这是大众以及学术论说常常强调的方面,但为了社会的最大利益而约束那些竞争性和对抗性的力量,而将我们的集体事务组织成竞赛还是有意义的。

然而,即使冲突和竞争曾是历史进程的首要动力——该假定本身就值得怀疑——这也极易将人类曾经如此的或现在依然如此的事务和可能如此或应当如此的事务混为一谈。这就是自然化的问题。通过将竞争性和对抗性关系自然化,我们就会对合作与互惠主义的可能关系和的确在人类事务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在相当程度上视而不见。因此,社会组织非对抗模式一直没有得到论证、研究和规定。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承认和规定竞争模式是社会规范。换句话说,竞争文化立足于规范的对抗主义前提之上。

第三章 规范性对抗主义

我所用的规范性对抗主义这个术语，指的是这种臆说：竞争是规范和必要的社会组织模式。¹这个臆说深深植入了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规范中。²古闪米特人的对抗二元论和古希腊人的对抗性的修辞实践只是其谱系的两大源头。霍布斯的“社会就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这一观念，是这些被继承下来的文化规范的最新体现。

在最近几个世纪，西方社会战争不断。这符合霍布斯的观点。的确，西方社会完善了现代战争和大规模破坏工具，并且应对我们这个物种在历史上发动的最具破坏性的战争负责。除了真正的战争实践外，涉及军事的比喻也充斥于西方人的语境中。在经济学中，我们常说“市场战争”“贸易战”和“不良收购”。在政治学中，我们常说“战争钱箱”资助的选举“战役”，以“口水战”

为特征。在媒体上，几乎每个社会问题都经常借战争的比喻来表述，如从“随胎战”到“向贫困宣战”再到“向毒品宣战”。

同这些军事比喻密切相关的是西方社会理解男性的方式。³从战场到运动场，再到工作场所，竞争和攻击对手的理想一直是构筑西方男性身份的中枢。假如男性继续主宰大部分西方社会的公共事务，那么这些男性对抗的理想实际上就会继续存在于每个公共生活领域：从市场到立法，再到法院，直至国际关系舞台。

所有这些对抗理想和比喻以及更多的来自西方社会各处的随声附和，都源于同样的对抗主义的根本规范。为了说明这些继承下来的文化规范的实际作用，本章将考察其在整个社会制度和实践范围内的表现，从构成竞争文化制度核心的经济、政治和法律体系开始，到加强和扩大对抗主义根本规范的其他制度和实践结束。⁴在开始之前，需要先说明几个条件。

首先，这一考察包含了一个公认的英美偏见，主要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例证说明。然而，除了英美法律对抗体系是个例外，这里使用的多数例证都符合整个西方的文化实践：受到希腊-罗马和犹太-基督教传统、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思想以及西方社会其他社会、经济 and 知识纽带的共同影响。

再则，虽然本章没有试图将对抗性结构推广至西方文化范畴之外，但这些对抗性结构和实践中的许多显然也存在于世界其他地区。这一方面是由于非西方文化中的军国主义、大男子主义等类似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最近几个世纪许多西方国家施以强大国际影响的结果。此刻，在由美国对大众媒体内容的全

球主宰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影响——它将暴力、冲突、结党集社和好讼的文化表达不仅出口到其他西方国家，而且实际上还出口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最后，我集中讨论对抗主义，并非意味着我所考察的每一个制度领域完全缺乏合作和互惠主义的实践，而是旨在表明，对抗主义在其每一个领域都已经成为一种规范性的理想，互惠主义的例证即使存在，也是出现于那些曲解和限制它们的较大的对抗性结构中。

一、三核体系

当前的经济、政治和法律体系构成了竞争文化的制度核心在英美社会中，这三个舞台不仅仅构成了竞争，而且以整合的三方竞争体系发挥作用。在——讨论了这些舞台之后，我们再来考虑其三方结合。

1. 经济竞争

在当代西方社会，市场竞争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原则。根据这个原则，经济学术语将其表述为，人类在很大程度被理解为是自利的生物，以消耗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和服务满足自我。据称能够实现这种满足的机制就是自由竞争市场。

作为一种标准理想，自由市场竞争原则首先是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他概括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依据的是斯密的这一论断：不受制于国家干预和控制的自由市场，能够为绝大多数民众带来最大利益。根据斯密的说法，竞争性

自由市场的那只“无形的手”，自然可以借最有效的可能方式通过供需平衡来协调个人消费者和私营企业的自私追求，这反过来又会产生最大的集体财富。⁵

于是，斯密这位道德哲学家就为自利的追求提供了一个道德的辩护，将其从一个历史上的不道德行为变成了现代的美德。公平地说，斯密是将自我利益的追求理解为潜在价值上的利益追求，严格说来，就是无需唯利是图。虽然斯密认为仁慈在市场上作用有限，但一个开明和利他的市场参与者可能会有志于改善其同胞的生活条件。此外，斯密还假设，甚至物质上的自利行动也会受到每个市场参与者都赞成的那个较大道德架构的约束。⁶这种道德自我调节，而非外部的国家调节，可以保障不受市场不正之风的危害。正如埃文斯基所说的：

道德是古典自由主义所期望的建设性竞争的要素。只有在一个由有道德的个人组成的团体里，那只无形的手才可能正确地行使自己的职责。因为是道德使那只无形的手不至于失去能力，从而歪曲它的行动。缺少这种道德群体，竞争会变得富有破坏性。在斯密的主要比喻中，道德是仁慈社会和霍布斯地狱的仲裁者。⁷

但是，从斯密之后，西方社会就很少致力于发展斯密思索的那种非物质利益或他设定的道德自律，以及经济学家通常明确规避的道德哲学。大概为填补这种道德真空，在利己主义市场交易的一种功效非常的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信仰开始兴起。

由于西方自由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斯密对道德自律的呼吁，但是却接受了他有关国家管控的警示，所以人们就承袭了一种实际上放任自流的市场竞争文化。于是，竞争成为了浓厚的物质主义时代的突出价值观。由于缺乏内外市场规则，这种竞争文化，或曰争斗文化，导致了普遍的社会冲突和生态恶化。

最为明显的是，这些过度竞争的价值观导致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悬殊，一些工人为了工资而与另一些工人竞争，一些资本家为了利润而和其他资本家竞争。贫富极端悬殊的状况使世界处在一个持续不稳定的状态，由此导致政治冲突、犯罪、恐怖主义和战争。再则，这些过度竞争的价值观加重了先前存在的导向劳资冲突的趋势，这种冲突来源于他们与经济生产方式的不同关系。由于缺乏国家的管控和道德约束，许多资本家试图从其财富的主要来源——劳动力身上榨取最多的剩余价值。作为回应，为了争取较为公平地分配这种剩余价值的可能，工人们也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当然，其结果就是马克思明确表述的那种持续不断的阶级冲突。

这些过度竞争的价值观演变为世界各国间的对抗。每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己公民的消费，试图追求最大可能的利润目前都在世界市场上同其他所有国家进行着激烈竞争。争夺资源、资本、劳动力、商品和信息的积累和控制的斗争，每天都在世界市场上演着——通过对国内生产总值、贸易差额报告、汇率和国家相对占优势的其他指标的比较，每个国家的公民都被提醒要对这种竞争状态保持警觉。此外，在一个十分不受约束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甚至连保证国家间公平竞争和竞争环境不失公允这样的

自我标榜都没有。这些经济争夺很少带来赢家，却带来许多输家，因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赋予的残留优势在强权国家对弱势民族的持续剥削中已经消失殆尽。

最后，在国家外部管控和内部道德自律都相对缺乏的情况下，这些过度竞争的价值观引发了地球上我们自身这个物种和大多数其他物种间前所未有的冲突。人类生产能力和人口规模的变化，加上人们对物质私利贪得无厌的追求，导致了一个似乎不可满足的消费社会——它事实上将我们“智人”置于同地球上其他大部分物种直接竞争的境地，正如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争夺领地食物、能源和原材料一样。的确，物种间的竞争并不是新鲜事但使当前这场竞争独一无二的是其全球性的由一个物种——“智人”绝对控制并波及全球。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国家管控和道德自律相对缺乏而导致越来越多的物种永久灭绝，这种竞争本身的可持续性就令人生疑。

在所有这些方面，把竞争价值观奉若神明，反映和加强了多数西方文化所继承的对抗主义的根本规范。竞争理想在持续进行的物质获取和控制的竞争中使工人与工人相斗，资本家与资本家相争，以及劳资之间相互对立。它们还促使国与国之间的相争相斗，以及人与自然的对立，这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彼得拉所主张的，竞争已经不再是一种手段，相反，它成为企业家，也成为政府和整个社会的主要目标。⁸

当然，现代经济也并非完全没有协作关系。在生意方面，如同在运动会上一样，双方即便赞同按少数规则进行竞争，也需要和其他竞争对手进行基本程度的合作。此外，在生意方面，如同

在体育竞赛中一样，一个公司团队内部的合作也常常是成功所必需的。这样，竞争就可以成为培养合作技能的一种方式，而且通过视努力和风险而定的奖励，竞争还可以激励个人以及团队去追求优秀、创造、发明和效率。这一切通常都是经济领域里或运动场上追求的理想目标。

鉴于竞争关系规范的复杂性，在评论竞争的任何特定的例证和形式时，对动机和背景的考虑是很重要的。相互利益(比如相互娱乐和享受或集体创新和效率)引起的竞争，可以说比围绕着持久地相互排斥的利害得失(比如战争或经济剥削)所进行的争斗更有价值。再则，按规则进行的能够确保公平竞争和公平竞争环境的竞争(比如体育竞技比赛或在有责管控的经济)可以说比缺乏这些规则的竞争(比如战争或无序的经济)更令人满意。为了解释这些规范的复杂性，某些经济学家开始用诸如合作型竞争和冲突性竞争这些措辞区分不同的竞争模式。⁹

无论如何，假如市场类似于体育运动，那么就可以认为，体育竞技是人类一切活动中最井然有序的活动之一。此外，绝大多数娱乐性体育运动都力图培育内在的价值观和对运动员的限制诸如体育道德和公平竞赛的精神等，来补充这些外部施加的规章条例。现存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就不能作如是说。

另外，公平竞争不仅需要竞争者遵守同样的规则行动，而且需要他们在同样的时间内开始竞赛。然而，在当前的全球经济环境中，一些竞争者已经进行了许多代的资本积累，而另一些人仅仅是在最近才被邀入竞争，所以才觉得自己总是处于劣势地位。这就如同少数人开始玩一种垄断游戏，直到将一切财物全都收入

囊中才来玩，然后邀请许多其他玩家参与其中。后来者永远都处于劣势，因为他们需要不断地支付参与的费用，因而就没有机会积累自己的财富，永远不能平等竞争。

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因其过度竞争的价值观和缺少来自内部、外部的管理，成为广泛的社会冲突和生态恶化的根源。通过将人类界定为自私自利和竞争性生物，以此相应地构建了人际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它将经济活动主要置于（图 2 左边）对抗主义、互惠主义连续体——“权力对抗”领域之内。也就是说，自由市场竞争体现了规范对抗主义的根本原则。鉴于在许多经济舞台上缺少公平竞争和平等竞赛环境，自由市场竞争实际上常常转变为压迫性的“权力对抗”关系（见图 2 的左下象限）。

2. 政治竞争

西方党派政治体系也产生于规范对抗主义的原则。政治学家简·曼斯布里奇直接将这些体系称为“敌对民主制”¹⁰。在西方自由主义者的语境中，民主一词几乎与党派性概念同义，尽管两者并没有必然的一致性。党派民主制在西方已经本土化，属于特定文化的民主制模式。

毫不奇怪，党派民主制的演变同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交织在一起。两者都源于这一臆说：人性在本质上是自私的，富有竞争性，所以竞争是社会组织的一种正常和必要的模式。当然，在经济学中，物质产品和资本的分配，或曰经济权利的分配是由竞争决定的。另一方面，在政治学中，公权力和决策权的分配，或

曰政治权力的分配取决于竞争。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根本的文化规范非常雷同。

一切党派政治体系的核心都是政治利益观。这个术语广义上指的是个人或团体的需要、价值观和要求。如此构想的利益被假定为个人或团体在决策过程中选择权的基础。利益据说(有意无意地)指导着对自身或本团体何为最佳选择的评估。在多元化社会中，不同个人和团体的利益似乎常常相异或冲突。

西方自由主义哲学假设，一种政治体系的首要功能之一就是以功利主义方式使社会中互有冲突的利益达成一致，尽可能最大范围地满足这些利益，所以，西方社会倾向于借以评价政治体系的标准，非常类似于他们评价经济体系的那种标准：据称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尽可能地满足互有抵触的私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治舞台的建构酷似资本主义市场。正是在这个舞台上，个人以及他们创立的党派力图以利己主义和竞争方式来推进自己的理想和利益。¹¹正如莱昂所主张的：

虽然党派活动的利己一面得到广泛认可，但政党政治的支持者则认为，如果将视野放宽，看看几个政党、媒体、利益集团和个人都在其中相互作用的“政治市场”，民主需求还是以一种神秘方式得到满足……(好像)另一只无形的手在起作用。¹²

在这方面，西方政治体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源于市场模式¹³的“政治企业家”的舞台。这种情况的出现起先借助于代

表相互对抗的利益集团的形成。于是，富有竞争性的“政治选战”（注意这个军事术语）就影响着领导阶层和政党内部及政党之间的管控。因为政治家和党派会组织起来，为赢得选举而进行战斗。正如赫尔德所指出的：

党派的目标或许是实现一个蕴含“理想”政治原则的纲领，但除非其活动基于为胜选而制定的系统策略，否则，一切注定会毫无意义。因此，政党首先要转变为战斗和赢得选举的工具。¹⁴

在其致力于“击败”对手，“赢得”这些选战的胜利过程中政治家参与针锋相对的交锋，其特点通常是公然敌对的表述，正如开始充斥许多当代竞选运动的那些毁谤和负面广告所表现的那样。¹⁵

一旦政治领导阶层和控制权通过这些对抗性的竞争得以确立，公共决策过程内部亦将富有对抗性。决策成为对立的利益集团代表间的一种党派辩论，即口水战。在这些辩论中，政治对手们要尽花招、争讼不休，试图打败对手，并在公共舆论的舞台上获得制高点。这种对抗性的辩论模式体制化的程度，最明显地表现于“忠实反对派”的议会观中，这种观念或明或暗地被许多西方国家的议会或国会奉为主桌。

因此，这些富有对抗意味的辩论，其特色便是各方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互相攻讦，缺乏规则引导下的冷静思考。¹⁶ 党派们起初阐述自己的立场，目的是确保该党派自己的立场获胜。结果，一

个党派的身份便与其拥有的立场密切相关，其立场的失败导致该党派“政治资本”的丧失。这样，决策过程便与选举过程形影不离，因为党派辩论在下一轮选举的期盼中，成为不断竞争的舞台，目的是为了扩展“持久的竞选战役”，争取政治资本。¹⁷

当然，许多党派决策也出现于这些正式的公开辩论之外。实际上，这些辩论常常只是幕后交易和谈判的一种引人瞩目的虚饰而已。然而，甚至这些幕后过程通常也是以党派互动为其特征的。¹⁸

围绕这些密切相关的党派竞选和辩论的是另一个政治竞赛领域：游说团体和政治活动委员会的相互竞争，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向党派施压和塑造公众舆论。政府正式机构内的竞赛由此而被其非正式对手之间的竞争反射出来。事实上，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认为，游说团体和政治活动委员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在许多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中作为首要代理人的民意代表。于是，正式立法机关之外的组织化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影响力至少已经和那些立法机关内部的竞争相当。¹⁹

然而，游说和政治筹划是代价高昂的活动，要求有权使用重要的物质资源。在影响党派决策的竞争中，并非所有的利益都能得到同等地位的表述。这样一来，党派集团倾向于臣服经济上强大的利益集团，政治进程通过政治献金这样的机制更加受经济上强大的利益集团控制。同战争一样，政治战役代价昂贵——“选战基金”应运而生，用来描述党派候选人为准备党派选举而

募集的巨额资金。在竞争性的政治体系中，成功选战的发起者要么拥有巨额个人财富，要么有其他富人提供赞助。²⁰

西方自由主义拥护者们捍卫这些由竞选、辩论、游说等构成的竞争制度，将其视为政治暴力和战争的合理替代物。基于这种常识性的前提，我们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建构成非暴力竞争，虽然多数人承认，这些竞争倾向于讨好更有权势的社会集团。这一权衡普遍被视为一种“必要之恶”，其前提是理性的党派之争比非理性的暴力或战争的替代选择更为合理。但这一前提体现了一种错误选择：它出现了民主观与党派竞争观的混同。通过将二者混同，然后又使它们同暴力和战争的选择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就忽略了第三种选择——非党派民主制，它可能在很多情况下比党派民主制和暴力/战争这两者更令人满意（这个主题将在第四、五章中进一步谈论）。

因此，西方自由主义社会便将这些民主进程（参见图 2 对抗主义—互惠主义连续体草图的左方）——“权力对抗”关系领域——自然化了。相对平等一旦出现，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间的竞争便易于导致僵局、相互挫败、离间或妥协，正如该图左上方“权力平衡”区域所示。²¹ 平衡若不存在，一种竞争性的政治制度便会导致图 2 左下方所示的“控制权关系”。²²

3. 法律竞争

同其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对应物一样，西方法律体系至少在英美社会也体现了规范性对抗主义的原则。无疑，英美法律竞争体系的演变与其政治经济竞技上的竞争模式的演变紧密交织在一起。这三种模式统统是作为欧洲启蒙运动早期特征的社会思潮变

迁的产物。正如以上所讨论的,这种变迁之一,就是由国家独裁主义走向市场和政治的自由主义。伴随着这一变迁,还出现了两大运动:一个是脱离传统宗教教条而迈向世俗的理性主义,另一个是脱离古老的希腊-罗马知识体系而走向知识的进步主义。

然而,这些文化变迁并未完全颠覆古老的文化秩序。相反这个阶段见证了对某些文化建构的拒绝和对其他一些文化建构的保留。在法学领域,这个过程包括了拒绝承认世袭贵族,以及僧侣权贵是真理的最高仲裁者的观点,抛弃了陪审团仅仅是君主意志的工具的观念,不再遵守罗马-教会法系(罗马法和中世纪教权主义各方面的混杂),其中规定法官同时指导调查,权衡证据,最后作出判决。与此同时,又保留了这一观念:在善与恶或真相与虚妄的公开斗争中,前者必然战胜后者;保留了陪审团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修正,使陪审团成为自由个体间司法竞争的中立仲裁者;保留了法庭的辩护和反驳活动(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希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其中真相要通过事实或观念的主张和批驳来证实。²³

再则,虽然大部分欧洲大陆国家接受了法律调查和诉讼程序应受中立第三方控制的前提,但英语世界却采用了这样的前提:司法程序应像经济和政治程序一样,仿效竞争性的市场原则。这个前提基于这一逻辑:假如司法诉讼是由竞争对手自己主导并被建构为公开的竞争活动,就会最大程度地推动公正与效率。按照这种逻辑,在一个公开的竞争中,便没有人愿为真理而献身,而只是为合法竞争效力了。²⁴ 从而可以这样假设:合法竞争者如同在一个自由市场中经营的企业家那样,能比任何没有利害关系的(或潜在的)第三方做得更加有效。

结合邪不压正的观念，中立的陪审制度和继承下来的辩论传统，这一竞争模式演化为我们今天所知的司法竞争体系。这个体系逐渐发展出详尽的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目的是在法律纠纷中产生“各方的激烈交锋”²⁵。由于这些规则的日益复杂，并且这些对抗的结果取决于越来越高超的辩护技巧，法律争讼中的当事人也越来越依赖于技巧娴熟的律师。由于律师数量和声望的提高，他们的辩护热情也随之增强。委托热情的律师取代了对真理的承诺，因为律师仅仅致力于为支付诉讼费用的当事人争取利益，代表他们“赢得”司法辩论。²⁶ 在这种环境中，事实模糊策略，诸如隐匿可能带来潜在危害的信息，提出夸大的或虚假的中诉，模糊或歪曲证据和教唆证人——便应运而生。²⁷ 所以弗雷德曼在其《法律对抗制的伦理》一文中恬不知耻地断言：“律师的职业责任就是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设计障碍。”²⁸ 事实上，在美国这样的国家，现任律师可以在法庭上公然作虚假和消极无用的（但在策略上却是有效的）陈述而完全不受惩罚，因为他们享有免受诽谤中伤罪指控的绝对豁免权，这些罪名同样适用于目击证人。可是，律师与证人不同，并不被要求诚实宣誓，不会因为作伪证而被起诉。律师们日益滥用这一特权，诽谤无辜的受害者和第三方，目的就是促使陪审团支持自己的当事人。²⁹

在这个体系中，律师本质上成了代当事人作战的“法律雇佣兵”。³⁰ 但最好的律师的辩护技能和专门知识，以及组织论据常常需要的调查研究却是索价不菲。即使在抽象意义上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可是法律对抗制度却显然偏爱那些能够为法律辩护掏钱最多的人（更不要说能够付得起钱来影响司法程序的人了，法律本身就是通过这些程序得以表达的）。³¹

简言之，司法对抗制度倾向于偏袒更有权势的社会集团。正如斯特里克所说，体现于司法对抗制中的“战斗伦理”

不仅服务于直接行使司法的律师和法官，而且效劳于社会中自上而下各阶层的掌权者。因为对抗是一种非常有利于权势的模式，所以多数受益人都以一种发自母性而万般慈爱的方式眷恋着对抗程序。他们要么始终无视其缺陷，认为尽管如此，它服务的也是更高的善，要么致力于在众目睽睽之下遮掩其欺骗性，但这依然是欺骗，因为究其根本，解决争端的对抗性方式会对我们其余的人构成危害——甚至是彻头彻尾的危害。³²

与世无争的人在对抗性法庭上是情绪上的弱势群体，他们酷似穷人在财政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状态。³³

但是，我们的竞争司法体系，它的设想和价值观，是我们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而且实际上从未受到质疑的制度之一。此外，我相信，这已不合时宜，是观察和思考世界的原始方式的一种遗存。³⁴

当然，司法对抗体系的辩护者们仍给予其辩护，一方面将其作为对精英司法机构武断判决的一项理性替代物，另一方面将其作为调解争端的暴力手段的替代物。基于这种常识性主张，我们构建了自己的(英美)司法体系，视其为理性的非暴力竞争，虽然多数人看到，这些竞争倾向于偏爱更有权势的社会集团。此外，这种权衡被广泛承认为一种“必要之恶”，它基于的前提是：理性

辩护比武断的、非理性的或暴力替代选择更为合适。但这一主张又体现了一种错误选择，因为它隐藏了这样的可能性：理性的非对抗可能比上述任何选择更令人满意。

司法对抗体系显然将司法实践置于本书第 34 页图 2 对抗主义——互惠主义连续体左边的权力对抗领域，而且因为最有权势的社会阶层能够承担起最好的司法辩护，所以这个体系倾向于将司法实践置于图 2 左下方，即权力控制关系领域。即使相对平等出现于司法竞争内部的敌对双方之间，司法对抗体系也易于导致效率极低，共同的挫折和异化，正如上图 2 左上方，即“权力平衡关系”领域所示。³⁵

二、互相协调的三方体系

尽管上述三种竞争模式都有内在的问题，但许多人仍继续将其视为可以利用的最佳模式。这种观点认为，任何制度都不完美，而当前的竞争模式当然优于之前的封建模式。丘吉尔在论及党派民主制时曾说，除了已经试行过的所有其他形式之外，这是最糟糕的政体。³⁶ 根据同样的逻辑，我们把竞争模式视为在这所有三大核心领域内一切邪恶的较小者。

不过这种说法有两大缺陷。首先，它基于下述前提：社会革新过程已经寿终正寝。根据这个“历史终结”论，构成人类历史如此重要特点的社会实验本身已经结束，西方自由主义竞争模式是作为唯一可行的社会组织模式而出现的。³⁷ 但是，这是一个完全没有根据且可疑的论点。还有人说，人类作为一个相互依赖的物种，居住于同一个家园，其历史才刚刚开始。的确，这种说法同样貌似有理。我们的再生产和技术的空前成功，导致全球越来越

相互依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才刚刚开始进行社会组织的公正和可持续模式的实验。社会革新的进程显然并未终结，本书下面的章节将予以证明。

“众恶相权取其轻”*论的第二个缺陷是，它假设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是各自独立运作的离散系统。然而，它们并非各自离散或独立的系统。实际上，应当更精确地将其视为一个互相协调的三方系统。原因很简单：政治和法律的竞争是昂贵的，经济竞争起决定作用，凭借金钱在其中占据上风，因此，政治和法律竞争同经济竞争难分难解。此外，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功能之一就是规范市场活动。政治和法律制度应当最低限度地用立法规定和实施物权法、合同法的基本框架，以及节制市场上的一切犯罪活动。政治和法律制度也可能制定和实施旨在减少贫富极端分化的法律，以及旨在培养经济根本上依赖的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工作的法律。经济竞争由此而进一步与政治和法律竞争联系起来。

那么，这些联系是如何否定支持所有这些领域的竞争模式的“众恶相权取其轻”论的呢？既然经济、政治和法律竞争作为一种互相协调的三方竞争系统运作，一种内部的等级制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于这个系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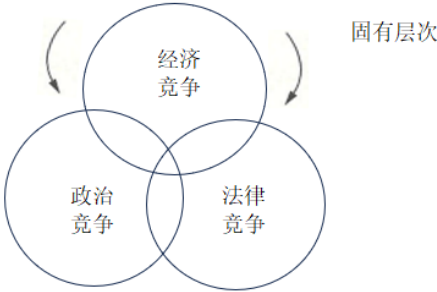


图 3 三方竞争体系

* 注：原文为 lesser of all evils。

这个等级制内在地使政治和法律监管职能服从于市场结果因为政治和法律竞争代价昂贵，所以，有钱的经济竞争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这个三方竞争体系中，不可能以一种社会公正和生态方面可持续的方式规范经济活动。事实上，在这个系统中是经济而非其他方式最终控制了政治和法律决策。这个等级制并非源于有意设计或某种图谋，而仅仅来自于竞争的本质。

这并不是说，竞争在社会活动的每一个领域都有内在的问题。如果以适当的心态从事娱乐性竞赛，它就具有本质的价值。³⁸ 甚至在经济舞台上，奖励勤奋、创新和效率的市场体系看来也是合适的。事实上，上述分析表明，问题不在于市场经济，而是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法律都同时被建构为各种竞争活动，而正是由于这个事实出了问题。因为要避免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恶化和资源耗竭，经济竞争需要人们负责任地进行调控，但在这个三方竞争体系中，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再则，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始时所讨论的，为了取得效果，政治和法律的调控都需要参与经济的个人以道德自律加以补充。只有通过一致努力，这些内外调控形式才能提供市场所需要的抑制和激励作用，最大化地发挥自由市场经济的效益，同时控制其失范之处。但是，正如三方竞争体系未能提供对市场活动的外部调控一样，在此它也没有在市场参与者之间培植道德自律精神。既然一切公共活动几乎都由对物质私利的竞争性追求而导致的一系列竞争构成，那么文化环境就几乎不可能有益于道德发展和自律的形成。无处不在的任意竞争易于培植好斗的利己主义价值观而非互利合作精神。³⁹

因此，并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它在那个更大的三方竞争体系中的关系有问题。这个三方体系的后果因其失于市场活动的国家和道德两者的调控而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导致了世界上各个国家内部和国与国之间都能看到的日益扩大的贫富严重差距；⁴⁰ 另一方面，它加速了这个所有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大规模恶化。

三、日益加强的制度和实践

虽然上述讨论的三方体系可能是竞争文化的制度核心，但其他几种社会制度和实践也易于加强和扩大支撑它的那些对抗主义规范。它们包括商业性大众传媒和某些社会激进主义行为。

1. 商业性大众传媒

对抗主义规范深深植根于商业性传媒的话语之中。大量传媒的新闻和娱乐内容由冲突、竞争和暴力构成。政治、法律和经济舞台上的对抗性竞争为这种内容提供了大量原材料。反过来，这些原材料经过了筛选、构建和强调，其手法是夸大和过分渲染西方社会业已达到高度的冲突和竞争。⁴¹ 这样，大众传媒就有助于建构和加强竞争文化。在多数商业传媒眼中，公共生活仅仅是种对抗的景象。

驱动这些对抗性画面的商业逻辑涉及多个层面。首先，绝大多数当代的大众传媒通过广告收入获得了巨额利润。靠广告支持的媒体首要目标就是“制造”或“收获”受众，以便将其卖给广告商。⁴² 对抗的景象提供了传媒业借以吸引受众的大批诱饵。新频道和新媒体的泛滥，导致对受众的竞争更加激烈，愈加壮观的竞争和辩论被用来招揽那些日益浮躁和支离破碎的受众的注意力。

此外，在主要不是靠广告支持的商业传媒中，譬如电影业全球化也促使媒体内容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冲突和暴力。这并非国际受众对电影内容的品位低于国内受众，而是起因于那些易于翻译的影片的收益性。⁴³ 许多国内现代影片的生产费用只是靠国内票房收入加以抵消，利润来源常常只能靠国际上的拷贝发行。围绕暴力和动作(以及性)制作的电影是最赚钱的，因为它们很抢眼，里面的对话简单，容易翻译，小叙事的展开主要靠容易理解的和视觉冲击强烈的一组组镜头(打斗、汽车追逐和性等)实现，所以，在一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冲突和暴力就成了最能盈利的生产、翻译和出口的内容形式。

然而，对抗场面并不限于传统的娱乐性媒体。当代新闻业的压力也迫使它倾向于夸大竞争和冲突的表述。多数新闻业也是靠广告来维持的，同样面临着借制造看点来吸引受众的压力。此外，为了尽力在大众市场获得最广泛的传播，媒体人采用了“客观性”加“平衡”这一信条，它需要千篇一律地将复杂的问题归纳为两种看法或利益集团的截然对立，所以，新闻工作者便以激战正酣的看法和利益集团为素材，杜撰新闻故事，从而勾勒出一幅幅具有对抗性的新闻画面。⁴⁴ 将复杂的环境问题简化为环保人士和工业间的争论是一个经典例证。再则，除了这些离散的新闻报道之外，一个全面新闻分析流派也应运而生，其中的来自“左”“右”翼的权威人士，都摆出一副势不两立的架势，因为他们都是从极端对立的角度对当前的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⁴⁵

通过所有这些方式，商业媒体与上述三方竞争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三方体系稳定地供给原材料，可以被用来制作对抗性的媒体内容，无论新闻还是娱乐活动。这样，劳资之间和各自内部的冲突、党派政客或权威人士的对立、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之间上演的法庭戏码以及其他可资利用的社会冲突，统统都被加工和包装成了媒体内容，加强和扩大着有关人性和社会的臆说。

因此，商业媒体倾向于制造对抗主义——互惠主义连续体草图左方的内容：“权力对抗”关系领域。鉴于媒体话语具有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⁴⁶ 所以许多社会团体争相去塑造这些媒体的话语，⁴⁷ 而媒体通道的高层也允许某些集团比其他的更有效地影响媒体。⁴⁸ 大众传媒至今仍然常常起着另一社会控制领域的作用。在这方面，商业媒体与其经济、政治和司法媒体伙伴一样，倾向于进一步加强图 2 左下所示的许多“权力控制”关系。即使各种社会团体能够相对平等地影响媒体话语，其结果也常常导致竞争社会团体之间相互激怒，以及受众中的犬儒主义思想和挫折感他们会把社会生活视为一股偏执且明显难治的冲突潮流。⁴⁹

2. 学术界

西方学术界的许多人士也已经将支撑竞争文化的对抗主义规范内在化。试想一下普遍流行的学生评价体系，这些体系都以分数为据，且具有竞争性。这些竞争制度不是认识和建立于个体大学生独特的优势和劣势之上，而是促使学生在一系列不曾间断的学业竞争上相互争斗，这种竞争是同广泛流行的竞争文化一致的。事实上，许多教育家将课堂竞争视为大学生毕业后参与经济、政治和法律竞争的必要准备。

以分数为据的竞争也跟西方关于知识生产的臆说一致。与自然和知识的产生有关的西方哲学分支一般被称之为认识论。在西方学术界，主流认识论模式是思想的竞争。按照这一模式，产生知识的最佳方式是将其产品建构为对抗思想间的一种竞争。

思想竞争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在一般意义上，希腊文学显示了一种在相对的事物中进行思考的倾向。⁵⁰ 当然，这些对抗二元论并非希腊人特有的古代闪米特和琐罗亚斯德文化也具有相当对抗的或二元论的世界观。而且二元论也并不是无根无据，它们能够为思考和论述许多事物提供有益的模式。但是，同其他古代文明相比，希腊人更热衷于将这些对抗的思想方式转变为生产知识的对抗模式。这些反对或对抗的认识论，给西方世界留下了一份恒久的遗产。正如翁(Onge)所写的：

希腊人似乎比其他任何文化中的人都更为仔细地将对抗性用作一种分析工具和操作性的智力程序。对抗性为中部希腊人改变世界的发展搭建了舞台：形式逻辑以及伴随它的一切……古希腊人利用逻辑将对抗性形式化，其他任何文化中的人都没有这样做过。⁵¹

翁指出，形式逻辑并非出自对真理的公正或沉思的探求，而是源于跟希腊人的政治和修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言语辩论和知识竞争。古希腊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中心是集会，一种综合性的政治论坛、市场和聚会点。公民们为了各种目的汇聚这里，活动包括商讨和辩论公共政策、道德甚至哲学问题。若要窥其大概，就要

考虑一下集会(agora)这个词。agon 一词源于希腊语的 agon, 其字面意义为竞争, 这个词继而又通过(其特征为竞争或打斗的)agonistic 或(行为对抗或敌对)的人们更为熟悉的 antagonistic 等词汇进入了英语。于是, 集会场合上便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言语和智力竞争。

这种对抗性传统的最佳体现便是诡辩家——以掌握善于游说和好辩技能而著称的哲学家和智者。在其影响达到巅峰之际, 诡辩家常被有法律和政治抱负的公民物色为可信赖的资深顾问。诡辩家中最知名的人士有普罗泰格拉斯, 据说他是撰写正式论文阐释辩术的第一人, 并且声称凭借这些辩术, 任何论辩较弱的一方都会变成胜方(这依然是今天参与竞争性论战或用于辩论赛的大学生, 以及英美法系律师们追求的目标)。⁵²

正是在这种知识和修辞环境中, 古希腊的形式逻辑应运而生。⁵³ 正式撰写并发表了关于逻辑系统著作的希腊哲学泰斗亚里士多德, 利用了一系列希腊知识传统, 包括上述辩术的主要部分。⁵⁴ 直到今天, 正式和非正式逻辑系统都仍然继续以逻辑“辩论”的术语加以表述。“辩论”这个术语一方面仅指论题或一套逻辑命题。另一方面, 亦指逻辑推理过程, 不同党派开始为自己的论点或命题辩护, 反驳他人。对抗性认识论便由此植根在希腊的形式逻辑中。正如翁所写的:

貌似最中立和客观的这一主题(形式逻辑)并非起源于孤立的学术沉思, 而是来自辩论的分析。它是集会在修辞领

域的产物。当有人问：“为何你的话驳倒了我的话？”形式逻辑分析便这样开场了。⁵⁵

孕育了形式逻辑的集会场合以及希腊的学院，几乎毫无例外地都由男性占据着。注意这一点很重要。上述对抗性探究模式便这样在一个高度男性化的（而且常常是歧视女性的）⁵⁶ 知识文化中产生了。

从古希腊起直到 20 世纪中期，除了少数例外，男性知识文化都是西方学术的特征。在历史学家大卫·诺布尔的《没有女人的世界》一书中，他回溯了西方科学在这一环境里的发展状况。⁵⁷ 通过大约 4 世纪拉丁教会的崛起和巩固以及所有男修道院的出现，西方学术跟随希腊人的脚步持续发展。⁵⁸ 这些修道院认定，妇女是通往知识和救赎道路上的诱惑和迷乱心性的源头而加以回避，因而在整个中世纪早期修道院都充当了追求和保护知识的场地。最后，这些早期修道院学校又促使更为复杂的教会学校的诞生，由教会直接提供校舍和支持，由教士主持，致力于教士培训。这些教堂学校仍然是男性主导的，在 11~12 世纪代表了中世纪学术的高峰。它们充当了中世纪大学的摇篮。

到 12~13 世纪早期，欧洲大学出现之时，人们熟知的完全男性化的环境仍然持续着，但形式更趋于复杂。这些新机构的功能扩大，已经超越了教士培训而将日益扩大的教会管理机构以及广大教会主宰或控制的职业培训也包括了进去。但它们继续充当由所有男性民众把持的教会机构。由清一色男性构成的教会机构也是由独身的男性教士管理的（实际上直到 1882 年，牛津和剑桥

“兄弟会”才不再要求保持独身)。这些现代科学发源地直到19~20世纪还仍然是只有男性的堡垒。

随着修道院学校演变为教会学校,再由教会学校演变为大学,一条歧视妇女的信仰和态度的共同脉络便相承下来:妇女作为尘世有罪之人不被信任,男人们相信回避她们就可以洁净自身。这些机构都表现出一种高度军国主义文化的特征。它们特别受着严格的纪律和军事化制度的支配。其成员常常将自己视为战士,是反对“异端”和“异教徒”的精神战士,有时甚至是为世俗而战斗。其例证不仅有宗教传道,而且有十字军和宗教裁判所。在早期的大学中,学生也将自己内在地相互划分为“不同的国民”,参与仪式化的武装竞赛。有时这种仪式化的攻击还发展到周边社区,全副武装的学生在夜晚走上街头,使当地居民特别是妇女感到恐惧。

正是在这种男性化、歧视妇女并且常常是军国主义弥漫的环境中,西方科学在两千多年中逐步发展着。毫无疑问,西方科学是一种对抗性认识论的体现。到早期大学成立之时,学术争论令人想起好斗的希腊传统在新制度的背景下已经更加形式化和礼仪化,成为知识训练和探究的首要方式。⁵⁹在这种背景下,知识或真理是由学术辩论中的建议和反驳性的观点所证明的。

曾经由西方科学的早期教会文化稳固建立的这种对抗性认识论,在最后随之而来的学术世俗化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被完整地保留下来。由于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的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相当世俗化的文艺复兴院校在贵族而非教会的赞助下破土而出。接着,世俗大学开始建立,越来越多的教会大学也在逐渐地世俗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直到19世纪,而且在许多情况

下直到 20 世纪，这些机构的成员几乎毫无例外都是男性的，之前拉丁教会文化以及希腊文化的对抗性遗产被保留下来。

在 18—19 世纪西方学院和大学的整个男性世界中，师生间体制化的敌意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包括对抗性的教学和考试方式以及经常性的体罚威胁。⁶⁰除教学方式外，教授内容也受到对抗性传统的影响。容易引起学术争论的课程比其他课程更受青睐。课文中充斥着暴力记录和勇猛故事，还伴有使演说家相互斗嘴的演说，这些都旨在相应地培养青年学者的思想。正如翁所描述的，“来自于鞭笞的身体威胁、教学和考试的对抗性方式以及高度军事化主旨的综合性影响，常常营造了一种学术氛围，有点类似于今日的生存训练课程”。的确，幸存者基于共同患难的经历而易于产生一种“男性情谊”的强烈观念。⁶¹

当女性最终在 19 世纪中期得以步入男性主导的学术领域之后，这些极端传统才逐渐消失(但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女性进入了现代大学的教育领域，但她们很快便面临着直到 20 世纪对女性的态度仍然保持不变的清一色男性职业团体的出现)。虽然比较极端的传统在学术界开始隐退，但对抗性的思想和探究方式继续以更为微妙的方式影响着当代学术。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多数研究生院仍在要求、学位论文和综合考试的公开“答辩”。然而，对此更为普遍的底层表达是贾尼丝·莫尔顿所称的“敌对范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当今学术的特征。在自己的哲学领域描述这种范式时，莫尔顿解释道：

根据敌对范式，人们认为唯一的，或者无论如何至少也是评价哲学论著的最好方式就是使其受制于最有力或最极端的异议之下，而且这样设想：哲学上最好的展示活动的方式是使其向假想敌致辞，并集合所有证据来支持它。使用这种方式的理由是：一种立场应当得到或受制于最有力的异议的评判；这种方式是战胜双方的唯一途径；经得住这种方式检验的论文很可能比其他的更有说服力；承受了这种方式的论文间通过一种“客观”检测，即最极端的可能检测，反之比较而言，任何较弱的批判或评价都将有利于要求得到评估，所以就不会成为可能的目标。⁶²

根据莫尔顿的结论，敌对范式是“一种接受正面看待攻击行为的方法论，并将其用作哲学推理的一种范式”。⁶³ 这种结论在波特的以“作为战士的哲学家”为题的论文中得到响应。波特分析道：

每一位辩论者的角色都存在于一种系统的逻辑系列中目的在于说服那些听众或读者，如果那些貌似有理的前提被接受，某些重要结论便随之而来。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们都是以这种方式进行自己的讨论的。他们的会议、期刊论文和书籍主要(和常常完全)是由论辩构成的。⁶⁴

智力竞争就这样充当了当代追求知识和认识的规范模式。⁶⁵ 其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这种学术的竞争模式推动了人类知识的探求，并达到了先前未及高度的认识。很多我们这个时代认为

理所当然的科学技术都是这种模式的产物。我们都熟知这些成就，在此无须赘述。另一方面，在这些巨大成就的阴影下面，一种对抗性认识论常常伴随着一系列代价而被忽略。

思想竞争的代价中有许多声音，它们常因不利的氛围而被排斥或驱离学术的舞台。这种氛围可能排斥或抑制那些个人，他们因其本性或教养或两者的某种结合，既不倾向对抗性争辩，对此也没有好感，虽然他们可能提出了深刻的学术见解。在这方面对抗性辩论甚至可能在最自信和好斗的人士身上破坏其明晰的推理。⁶⁶ 这种环境可能使信心不足和不太有野心的人们完全沉默

引申开来，对抗性竞争无疑易于给予许多男性学者以特权他们往往也是因其本性或教养或两者的某种结合，历史上就比女性更好斗，因此常常感到自己在这种竞争模式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⁶⁷ 许多女性经历过的这种不利局面，也可能为许多弱势群体所体验，后者常常被迫学会采取从属姿态与占优势的社会集团相处。此外，女性和弱势群体可能更加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即使男性或统治集团的好斗表现常被视为自然与合理的，但同样的表述如果被女性或地位低下的弱势群体利用，就常被视为反常和大逆不道的。所以，同样的奖赏就不一定因为同样的对抗性表现而归于女性和弱势群体。⁶⁸

此外，被认定为抑制和双重标准的上述对抗性范例，也倾向于限制、孤立可利用的多样化的视角，甚至在那些乐意和能够按照对抗规则进行游戏的人中间也是如此。对抗性辩论假定某些理论将被证明为正确，其他的则是谬误。或者某些理论家会赢，其他人则会输。当然，在理念上可以说，能够充分解释现实的理论

会占上风，但这也可假定，现实通过独一的理论框架被充分地加以解释。不过，如果要有一个本来需要贯穿整个20世纪加以学习的认识论功课，那就应该是充分把握既定现象常常需要的多重互补的理论框架——其中每一个都阐明了同一现象的不同角度。

这一见解不仅适用于社会科学，也适用于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经典例证就是亚原子物理学上的波粒二象性。事实上，最初有关是否能够按照粒子理论或波浪理论对电磁能进行最佳解释的辩论，是对抗性范例的极化和简化论趋势的最好说明。只有经过粒子理论家和波浪理论家长达一个世纪的辩论之后，物理学家才最终接受，充分把握主题需要运用两个明显对立的模式，这个事实。类似的论战此后在许多其他领域开始进行。最近一次是在生态学领域。⁶⁹ 解决这些论争的方式提供了一些寻求对抗范式替代物的经验。然而，对抗性认识论往往妨碍对互补视角的考虑因为互补性表明，没有明显的赢家或输家和单一的对错。通过将单一视角凌驾于多视角之上，对抗性范式偏向于简化论和绝对论思想。

与对抗性范式相关的另一套代价是对参与者的情感、心理和关系的代价。知识上的怀疑论和建设性批判被应用于个人超然和诚心追求真理的氛围之中，无疑是知识探求的重要工具。在理论上，对抗性范式通常以此方式被理解为理念，而非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但实际上，理念和自我间的界限常常是很不明显的，学术论争却常常形成个人化和对抗。诚然，这种个人对抗的腔调已经成为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上司空见惯之事。

在一篇题为《战斗口号》的文章中，简·汤普金斯抓住了这一趋势进行了雄辩。她回忆了近期学术会议上的一个熟悉的情

景，进而描述了一位学者。这位学者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另一位学者的论著。她的描述被详尽地引述于此，作者提供了有关当前经常处于对抗状态的学术界的看法：

一位女士发表了一篇文章，攻击另一位女士新近出版的论著。整篇文章对其极尽败坏之能事，作者确实干得漂亮。读者开始了解到这篇诙谐、雅致和犀利的文章之精义。他们欣赏其精巧、才华和优雅，但内容中却暗藏杀机。作者的聪慧迎合了读者的理解力……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她的文章的境界，与作者同仇敌忾……

在听到她的文章之时，我非常欣赏我曾提及的那种表演价值，但却越来越感到不快……我担心这位女士有朝一日会将矛头指向我。事实上，在其毁灭性的旁敲侧击中，我已经感到被她的匕首隐隐擦伤——而且我想象着仅仅在前几天还热情称赞我的文章的读者，会如群犬那样对我狂吠。文章结束之际，我感到自己好像参加了一场某种死刑仪式，处在斗牛比赛的中途，人群欣赏着斗牛士的技艺，分享其对公牛的胜利和公众的激情燃烧，在此，人群见证着对罪犯的公正惩罚。因为学术经历综合了欣赏、嗜血和道德沾沾自喜的因素。

然后，我开始在一种幻景中回想起我所有读过的出现了类似死刑的文章。并非文章本身使人想到它们自己造成的那些触动……我记得自己看到某人因为措辞受到讥笑、其不情愿选择的比喻被嘲弄的情景……人们无数次被自我矛盾绞死。但最生动的时刻还是隐含于某人风格或观点中的

性格缺陷被令人愤慨地展示出来。依循传统思路被解释为怯懦，信赖其他学者的作品被说成奉承，没有提及另一学者的作品被视为小肚鸡肠，等等说法，不一而足。在模糊的语言中，我意识到，我们都在相互指责对方愚蠢、无知、胆怯、嫉妒傲慢、恶毒和伪善。

(然后)，我想起了另一件事：就是我在1981年发表的一篇曾两次入选文集的文章，此后使我多次发迹。这篇文章开始正面攻击另一位女学者。在我撰写时，我感觉到一种按西部牛仔行事的英雄姿态。这位批评家不仅质疑a、b、c，甚至连x、y、z也一锅端！这是一个粗暴挑衅的明显例证。再则，她是知名学者，而我不是。在这种大卫与歌利亚争斗的情况下——我是在以卵击石——的确，我被证明是在竭尽全力地攻击她，所以，我将自己装扮成受压迫的斗士，运用骇人的语录和毁灭性的讥讽，向世人展示其行事之邪恶，并在其所处的屠场之外，持续建造我自己的庙堂。⁷⁰

的确，这种相当极端的知识竞争(或战斗)模式，并非所有学科都司空见惯。不过，根据汤普金斯的结论，在较为挑剔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某个时候，实际上大家都在这样践行着”。⁷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好斗方式不仅其基于道德和人道主义的理由可能被论断为带有攻击性，而且采用这些方式的那些人也易于侵犯其“对手”，而不是让他们信服。正如波特指出的，接受这种方式表明没有意识到，这种敌对和好斗的强烈欲望如果真的

存在，那么就不可能完全隐藏起来。它不是威胁人们屈服，而是激起同样的欲望予以回应，所以对手几乎肯定不会信服。⁷²

除了这些较为极端的对抗模式外，整个学术环境和与其相关知识的政治经济学的竞争性质影响着所有学科的学术活动。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中，对稀有资源的物质竞争塑造和约束着一切学术活动。它们首先表现在决定着公用事业支出优先趋向的党派立法系统，这种趋向又反过来影响研究与教育活动。其次，它们还表现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中，因为强大的企业在运用游说集团的压力来影响上述公用事业支出的优先趋向时，公众的筹资危机又迫使学者们直接转向私人公司求助津贴和研究支持。最后，它们也最明显地表现于学院和大学的校园里，个体学者以及整个系都在为筹资、奖励和晋升而相互竞争。

由于这个原因，一种期待客观和超然的思想竞争的抽象理想实际上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动机和表述，而这些跟追求知识和认识毫无瓜葛。所以，学术机构内部的勾心斗角常常以对抗性谈判和作秀为特点，因为关于理论、学科或思想领先性的战斗与创造教学和科研环境有关经费的“地盘战”结合在一起。在这种气氛中，野心政治常常流行并占据上风，而对知识和认识的共同追求反倒不能成为首要目标了。此外，这种气氛又被存在于学术界以外的那种更强大的竞争文化所引进的价值观和态度推动和加强。

总而言之，即使思想上的学术竞争已经将人类的知识和认识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伴随着它们的许多代价常常在这些成

就的阴影下被忽视。诚然，知识争论与有形的暴力殊异，但是——一种知识冲突和竞争的气氛会排斥或阻碍缺乏信心和进取心之人参与学术探究。由于妨碍对互补真理的考虑，它可能限制和孤立观点的多样性，甚至是愿意而且能够按照竞争规则进行游戏之人可以获得的那种。通过个性化敌意的规范化，特别是在更带批判性的学术论文中，这些学科中可能急需一种高度情绪化的、心理的和相关的代价。最后，作为一切学科之特征的竞争性政治经济学范畴内，它可以营造一种气氛，获胜而非共同追求知识和认识在其中可能成为首要目标。当然，这种对抗范式的辩护者捍卫理性的论争，原因是同不理性的甚或暴力替代选择比较而言的，它更适宜。所以，上述认定的代价被看作必要的权衡。但这种常识性的主张体现了一种错误选择，因为它隐藏了这种可能性：同样是理性的但却是非对抗性的替代选择，也是可能存在的。⁷³

3. 社会抗争

文化“共识”导致许多人相信，组织每个社会机构的最佳方式都是以竞争形式出现的。自相矛盾的是，它又使许多人认为处理这些机构所产生的弊端的最佳方式，是抗议和其他社会变革的对抗性策略。

随着近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文化变迁，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控制和剥削的斗争已经展开，而且日益多样化。劳动力、民权、女性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后殖民时代、反对全球化和其他社会宣传运动纷纷出现，成为当代文化环境的突出特征。在其进行社会变革的过程中，这些运动利用的方式各不相同，其中不少是对抗性的。抗议、游行示威、党派政治组织、

诉讼、罢工和非暴力反抗行为已经在许多社会宣传运动中成为行业工具。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暴力和恐怖主义也被用于追求社会变革的过程中。

这些运动的合法性和紧迫性，促使其产生的压迫史和引发由此带来的绝望，这里均不予置评。我们正在考察的是弥漫于他们试图改革的这些制度中的各种规范内在化的对抗主义方式。对抗性社会变革策略给这些运动制造了一种悖论。一方面，这些策略看起来似乎是进行社会变革唯一有效的方式。除了通过党派组织、诉讼或“走上街头”外，社会活动家还能怎样带来变革呢？另一方面，同样的对抗性策略常常由于多种原因而造成自我限制。对此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讨论。

这并不意味着对抗性社会变革策略都是无效的。实际上，历史上就有许多对抗性运动取得了有限的成效。这也并不是说，这些策略在一切情况下都成问题。对抗主义在某些情况下还是一种必要与合适的反应。此外，假如社会变革的策略被视为一个连续体：从激烈对抗到相对互惠，极端对抗的威胁有时可能促成较为温和或合作的社会变革方式。然而，正如下述讨论所示，将对抗性策略内在化需要付出高昂代价，而人们往往对此不予注意，而且对这些策略的惯常信赖可能并不是一种社会变革的长期、有效方式。

想一想对抗性改革运动常常面临的那种内部派系化问题吧实际上，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左派”社会变革的所有计划都受到过内部冲突的困扰。其最初几十年是以共产主义革命先驱的政治内斗为特征的。中期的特征则是左翼知识分子间的论战。结束期

显然是“新左派”在身份政治的离心压力下的分崩离析。基于这种明争暗斗的模式，党派化似乎有将分歧，包括阶级、种族、性别、观念或政治方式各方面，解释为对抗和冲突根源的倾向。

作为“新左派”的一位著名活动家和学者，托德·吉特林对自己经历的三十多年进行了反思，并针对这一现象撰写了大量作品。⁷⁴正如他所观察到的，“新左派”最初的团结——至少在美国——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青年文化的共同希望造成的。然而，种族、性别、阶级等分歧沿着日益狭隘的身份路线开始分裂运动。吉特林解释说，每个新的身份集团都声称的一件事，都是不同队伍中的对手。⁷⁵根据吉特林的观点：

集体主义的那种语言被新运动视为一种殖民主义式窒息——将白人男性统治合理化的一种意识形态争执很快出现，不仅是在思想上，而且在比共性更深的层面，更为突出、更为活跃、更为急迫。它已经超越了严格意义上的智力范畴，更是一种体验世界的完整方式。人们更为深刻地感受到分歧而非团结。⁷⁶

通过反思这些造成分裂的态度所具有的自我限制的性质，吉特林得出这样的结论：“差异政治基于一个根深蒂的哲学谬误：强调人与人之间一定不能相互理解，分裂人的事物必然压倒团结人的事物。”⁷⁷

然而，即使吉特林似乎也忽视了他（在谴责宗派化时）不断提出的那些“左翼”“右翼”的区别，同样表达了对抗主义的本规

范。政治左翼和右翼都是按照一个公敌——以政治分歧界定的“另一方”来界定自己的。因此，为了战胜处于所谓政治派别上另一方的自己的对手，不论左翼或右翼的拥护者都祈求内部团结。但是，由于“左翼”“右翼”这些术语都是人为创造的，没有反映实际社会价值、信仰或关系的复杂性，所以在各自阵营内难以获得持久团结，因为两者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确切的分界事实上，社会价值、信仰和关系极其复杂多变。不过，一旦采取一种对抗态度，假定分歧是冲突的根源，那么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最初差别就不可避免地随其内部的差别而来。这种离心过程一旦发生，就很难抑制了，即使这不是不可能的。

除了内部派系化的倾向外，当社会活动家采用对抗方式时，他们也把自己试图改革的不公正和无法维持的社会结构的基础——对抗主义规范合法化了。当社会活动家参与党派政治组织过程时，他们也将竞争的管理模式合法化了。这些模式由于政治竞争的昂贵成本，使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永远处于不利地位。同样，当社会活动家参与诉讼时，他们也将法律对抗体系合法化这个体系也由于法律竞争的昂贵代价而使他们永远处于劣势地位。的确，当社会活动家参与任何竞争性的社会变革策略时——从抗议和游行示威到政治和法律组织，再到暴力和恐怖活动——他们就将支撑三方竞争体系的对抗主义规范合法化了。但正是这个三方体系应对这些社会活动家试图处理的许多社会不公和生态弊端负责。

固然，社会鼓动者的确运用这些对抗策略“赢得了”偶然的“战役”，但他们所关注问题的症结仍未得到解决，一些规模更

大的战争理所当然地进展不顺。例如，想想环境保护运动的例子吧。不计其数的环保游说团体、法律诉讼和抗议由整个西方世界的社会活动家上演着，也稍有所获，但从整体而言，环境恶化继续加速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在这些有限的战役中获得的高度受限的预付款。⁷⁸ 因为这个三方竞争体系不可能制定负责任的、可持续的环境保护规划。

在劳工运动方面可以举出一个类似的例证。尽管经过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罢工、抗议和政治组织，它还是见证了贫富间、劳资间、国内乃至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⁷⁹ 诚然，在很多国家取得了有限的胜利(例如最低工资法和⁴⁰小时工作周)，但是这些斩获都是以牺牲别国工人为代价取得的。在劳资间持续的斗争中，工人们一般都无力竞争，特别是在国际舞台上。由于经济全球性，对抗性劳工策略已经接近其有效性的极限。当前全球性政治经济构架是以主权国家为特征的。这些国家相互竞争，为的是在一个既无国际劳动规范，也不能够阐述和执行这些规范的制度舞台上，争取资本投资和积累。在这个环境中，各国政府即便在本国的经济中都无法发展或执行有意义的劳动规范，因为担心巨额资本流到没有这些规范的更具竞争性的地区。

另外，因为本国政府本身是按党派模式建构的，所以政治决策倾向于服从公司资本的意志，包括跨国公司，它们行使政治和经济的权力超过了国内政府。这就使阐述和推行有意义的国内劳动标准和法规这件事，可能实际上在多数国家无法成为现实。在这种情况下，甚至通过进步的税收方案，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

重新分配资源的方式来缩小贫富差距，实际上都不可能。这一方面，是由于党派决策服从于资本积累的逻辑，另一方面，是因为在缺乏税收标准化的竞争性民族国家的体系中，资本存在外流的恒定风险。在这个体系中，一切地方的劳工策略都极端受限于其有效性——只要放纵的全球资本主义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继续发展，并超过协调和敏感的综合政治结构，它们就有可能越来越不相干。

除了这些社会——结构方面的考虑，劳资关系也应当考虑心理——结构维度。经社会培育而由个人表达出来的价值观、态度和信仰也在阶级冲突中起着一定作用。消灭贫富两极分化，改善所有行业劳动者的条件需要一个社会结构变革和心理结构变革的双重策略。后者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在社会层面上培养新的价值观、态度和信仰。这一计划要求资助公共教育、公共广播等公共决策集团的积极支持和参与。然而，在一个三方竞争体系中，这些支持实际上也不可能取得和维持下去，因为政治意志从根本上要服从经济势力。

有一方面与此密切相关，需要注意：劳工、环境和其他社会游说团体也不可能在有利于自己的媒体报道方面与占优势的富裕社会集团进行竞争——但大众传媒是对心理结构倾向发挥着重要影响的机构。某些在民主社会进行的最重要的竞争就是影响公众态度和意见的媒体竞争。正如在本章开始部分所讨论的，多数游说集团必须参与极端和对抗性的策略，以便获得任何商业媒体上的声音。通过为竞争提供原材料，这些团体以简化和歪曲自己的信息而告终，反过来也简化和歪曲了它们试图处理的那些问题的公

共认知，所以，将社会宣传综括为对抗性的壮观景象，破坏了任何社会游说集团处理复杂和敏感问题的能力。

绿色和平媒体运动提供了这种浮士德式讨价还价的经典例证。社会游说集团在公众领域寻求话语权时常面临这样的情形。⁸⁰ 绿色和平组织的职员们甚至承认，他们发起的运动常常导致一些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以及使这些问题之间的重要联系变得模糊不清。⁸¹ 但是，作为首先发起的游说组织之一，绿色和平组织及其媒体策略为不计其数的其他社会游说集团起到了示范作用。由于这些策略的泛滥，任何特定的对抗性景观的政治货币都被贬低，这导致了媒体策略的逐步升级变得越来越极端和引人注目。这个升级过程进一步简化和歪曲了社会倡导者的关注。此外，它疏远了居民中那些可能在其他方面表示同情的人们，所以，竞争文化使社会倡导者在公共舆论形成的竞技场上始终处于劣势地位，同时使规定着进入公众领域条件的商业媒体结构合法化。

由于这种种原因，对抗性社会变革策略已经达到其有效性的极限。虽然人类过去在社会和生态方面较少相互依存之时，采取对抗性策略可能是必要和可行的，但现在这样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作为一个物种，我们的再生产和技术成就已经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地球上再也没有哪个社会团体是孤立的了。在这些新的条件下，新策略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变得非常必要。只要其成员被封锁在竞争关系中，一个内部相互依赖的社会实体就不可能协调其成员共同行动。生态恶化、资源短缺、物种灭绝、全球性的疫病流行、核武器和生物污染、恐怖主义、军事冲突等都

在迫使我们寻求共同和一致行动的新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竞争性策略已经到了阻碍社会和生态复原的地步。

当然，有人可能主张，对抗性策略实际上和非对抗性策略是互补的。例如，社会运动具有极端对抗性的外围活动，可以促使公众注意某个问题，进而通过比较而使运动的温和核心看起来具有吸引力。这样一来，就可以激励那些有可能反对改革的人，同比较温和的改革者进行合作。因此，对抗性集团就可能充当一种社会运动的先锋。尽管大量的改革常常是通过较为合作的方式取得的，但是，即使这是事实，我们也需要对潜在利益和成本加以比较和权衡。如果对抗性策略同时忽视一种社会运动，将其信息简单化，疏远许多可能的支持者，那么成本就可能超过收获。但当这些策略把对抗主义——社会倡导者试图解决的那些问题的根源——的规范合法化后，净成本还要更高。

此外，还可以举出一个例证：争夺权力的对抗斗争易于自我堕落为社会或政治变革的一种策略。历史提供了不计其数的抗争运动的例证：它们推翻了一个阶级或政权，但仅仅是以另一个将其取代而已。即便是美国革命也主要是以一个特权阶级取代另一个，因为领导它的欧洲有产人士随后便将妇女、黑人、贫穷的劳动者和其他团体排除出公共决策的舞台。与此同时，他们推行了一个消灭和取代当地土著的大陆性规划，创造了一种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经济，随后建立了市场经济——这种经济扩大了居民中豪富和赤贫人群之间的分化。

四、综合性的文化形态

正如前面的讨论所示，规范性对抗主义在当代西方文化中普遍存在。三方竞争体系、对抗性媒体景观和学术上的思想竞争是相互兼容和互补的。无论我们转向哪个角度，对抗性结构和实践都在这种竞争文化的范畴内左右着我们的视野。甚至周围的竞争文化也符合并最终加强着同样的根本价值观和设想。

从这种开阔的视野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上述讨论的每一种社会结构和实践都联系着一种综合性的话语或文化形态，已如第一章里所界定。回忆一下：一种综合性话语形态是由各种不同但又可以兼容的话语表述构成的，这种态度加强了社会舞台上思想、谈话和行动的类似多种多样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在整个经济、政治、司法、大众传媒、学术和其他方面的社会游说舞台上盛行的思想、谈话和行动的对抗性方式。这些话语共同组成了一个更大的话语宇宙——一个话语群，西方居民在其中诞生，并发展和认知了这样的道理：按照竞争和冲突性方式进行思考、谈话和行动是正常而自然的。这些话语体现了有关人类社会的“真理”，告知了他们所构筑的社会现实。他们界定人性的方式倾向于按照个人的作用和行为加以制定和表现。他们也构建那些组织和调节我们的共同行为的社会机构。总之，他们构了一个全面的竞争文化——不仅在其心理结构，而且在其社会结构维度内——它对其中的人来说似乎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

五、人性问题

当然，多疑者会这样主张：人性归根结底是自私的，具有对抗性，所以，社会组织的竞争模式只是反映了我们的遗传继承物而已。诚然，这是整个 20 世纪许多社会科学部门中的传统知识。⁸²但这些关于人性的臆说根源却扎得相当深。⁸³正如罗斯列万廷和卡明所指出的：

关于人性的这种看法在哲学上非常古老。它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资产阶级的出现以及霍布斯关于人类存在的观点“所有人打所有人的战争。”这引发了一种导致明确彰显为竞争、相互畏惧和追求荣誉的人类关系状态。对霍布斯而言应当注意的是，社会组织的目的仅仅是调控人类生存状态的这些不可避免的特征。霍布斯有关人类状况的观点来自他对人类生物学意义的认识。正是生物学的必然性使人类成了这个样子。⁸⁴

然而，因为在大量新学科内出现了一种新共识，关于人性的这些臆说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⁸⁵正如人类学家豪厄尔和威利期所指出的：

绝大多数研究者声称“侵略性”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使人类关系在一个社会背景下维持一段时间，必须以某种方式指导和控制侵略性冲动和行为。科学家将自己的观点介绍给一般公众，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社会、法

律和宗教领域的论争。所以，在其构成一部分的这个道德群体中他们关于人性问题的观点具有首要意义。

我们希望提出一种可供替代的方式，以挑战攻击性是人的内在能动性这一假设。攻击性在西方社会被视为人性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例证，但这或许能更多地告诉我们有关西方社会而非人性的情况。我们希望主张的是，我们不能臆测人类身上存在着一种先天的好斗的能动性。一方面，内在合群性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证明对它有利。人类首先是合群的生物，正是他们的协作而非侵略性冲动，使他们得以幸存下来。⁸⁶

包括李基和柳文在内的其他著名人类学家，附和了这些有关人类的合作能力的意见：

在人类晚近的进化史上，特别是狩猎生活方式出现以来，一定有着极度的选择压力，促使我们培养群体合作能力……对合作的选择压力的程度、团契意识和认同如此强烈，它运作的时段如此长久，以至于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在我们的遗传构成方面形成根深蒂固的影响。⁸⁷

当然，这些主张无需否认人类社会存在着冲突和侵略。相反，人类似乎拥有冲突与合作的发展潜力。何种潜力被充分地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文化环境的产物——正如事实所证明的，不同社会在其冲突与合作的表现上是截然不同的。⁸⁸

在人类学之外，许多经济学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些经济学家完全反对主宰几个世纪之久的有关“经济人”的自私和竞争性的理解，赞同对人性进行更广泛的诠释，以此作为对合作利他主义甚至自我牺牲行为的解释。⁸⁹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经济理论和研究表明，竞争性的自私追求常常是比互助合作更低效的策略——即使参照物质利益的指示进行严格仔细地斟酌。⁹⁰在这种情况下，博弈理论家和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证明，合作策略可能在人类进化中已被选择过，因为它们比竞争性的策略更具优势。9 因此，某些经济学家同上述提到的人类学家的意见相同：自然选择可能更赞同人类的合作个性。

此外，许多经济学家(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已经开始表达对那些臆说的有关自我实现或生殖本能的关注。这些臆说认为人性就是无可救药的自私和好斗。例如，很多研究表明，经济学家本身比非经济学家倾向于表现得更为自私，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持续受到这些臆说的影响。⁹²反过来，假如经济学在当前的公众领域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那么这些传统的经济学臆说就易于转化为公共政策和实践，反映了“竞争是健康的，合作不可行”这样的观点。⁹³萨马格尼说：

我们关于人类的信念，有助于塑造人性本身。这是出于这种认识：我们对自身和可能性的思考决定着 we 渴望成为何种人。在这种明确的意义上，自私论在道德上不是中立的，它违背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信念。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自私的范例可能是自我实现，有些学科开始将自私理解为理性行为的标准特征，而且开始了相应的行动。正是在这里，自私论的效果最为混乱。⁹⁴

此外，类似关注可能被表达于这些臆说自我实现的本质上，它们支持着其他舞台——政治学、法律、媒体、学术和社会宣传，正如本章开始时所讨论的。通过对各个领域的冲突、竞争和其他对抗性表现，这些话语也许可以很好地产生和让人们记住他们仅仅声称要反映的现实——这样，就培养了他们借以使自己合法化的经验性证据。的确，陶冶理论表明，不断揭示一组一贯而无处不在的表现，就可能以一种共同的和累积的方式递增地影响人的认识和行为。换言之，文化的培育，部分地通过我们常常告诉给别人的有关我们自己的那些“故事”，包括我们有关人性的故事。⁹⁵

六、作为霸权形式的竞争文化

因为混淆有关人性本身的文化构建，我们很难看出，更不要说想象其他文化发展的潜力了。从竞争文化提供的有利之处来看，人性和社会组织的非对抗模式似乎是幼稚和不切实际的。结果，思想、谈话和行为的替代方式便被竞争文化塑造的“现实主义的态度和行为”或实力政策边缘化。正如基欧所指出的：

实力政策和“现实”形象一样，是某一特定文化的产物。它本身是霸权性的，是一种使其竞争者“致残”的表述，其方式是将范围狭小的分类描述为似乎带有普遍性。⁹⁶

在这方面，竞争文化可以被视为是一种霸权主义文化形态正如第一章里所讨论的，霸权优势是在对现实的特定解释成为一个社会，乃至其利益被置于次要地位的团体都公认的“常识”时

取得的。正如第一章里所提到的那些反对妇女有权参政的女性的想法，即使自己的权利被其边缘化，你也常常很难置身于自己诞生和成长的那个话语体系之外。此外，甚至也难于认识到你生活在历史上一个特定的文化形态之中，因为霸权优势的有效性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文化形态不会表现为某种文化建构，而仅仅是“现实”的本身——正常、自然和不可避免的。

这样一来，我们生来就进入了一种并非由我们自己构筑的竞争文化之中，我们个人和集体的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已为现在视为常识的文化规范所预设。这些文化规范使我们最广泛的集体利益附属于那些受益最多的特权集团的利益。当然，由于文化规范的根本流动性，变革总是可能的。但是，这种变革的条件是我们有能力走出这种竞争文化——即使仅仅是在我们最初的想象中——以便承认和展望替代选择的可能性。

第四章 古今互惠主义

一、历史表现

在任何文化中，对抗主义不可能是唯一的特征。从最早期的人类社会至今，互惠主义在人类所有文化中都有迹可寻。正如第三章的讨论所言，许多人类学家认为人类进化取得成功，正是归功于这些合作的倾向和能力。很明显，这些合作倾向和能力已经成为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留给后人的一笔遗产。

虽有此说，但切不可将这段古代历史理想化，进而勾勒出一幅虚幻的田园时代景象，人们宁静和谐地生活其间，远离侵略冲突和竞争。我们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里恩·艾斯勒等作家笔下的互惠与合作的黄金时代曾经出现过。¹虽然里恩·艾斯勒所描绘的“伙伴文化”富有些许浪漫吸引力，但是，这只不过是作者根据一些零零散散，甚至彼此矛盾的考古资料，对新石器时代这段历史而做的一厢情愿的重新解读罢了。²艾斯勒欲通过构筑过往历史的画面给未来以希望，因此她的观点不免有夸大之嫌。

不过，艾斯勒确实指出了“原始文化必然是敌对和野蛮的这个假设的本质错误。这个假设就相当于霍布斯世界观的人类学翻版。如果你只是抱着这个假设审视考古记录，那你得出的也必然只是这个假设。然而，艾斯勒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了考古资料，从中发现了古代人类某种程度的和平与合作的证据，而这些证据通常被其他考古学家所忽视。另外，一些针对现存狩猎与采集社会的研究也为这个一般结论提供了佐证。罗斯对此类研究进行了广泛的元分析，结果显示，在这些狩猎与采集文化中，互惠主义和对抗主义以复杂且各异的方式交织并存。³

除了这些相对早期的社会结构形式，互惠与合作还存在于更加复杂的前工业社会中。譬如，许多传统的亚洲和其他非西方文明，特别强调和谐与集体依存，而非冲突和个人竞争。这种合作与互惠的态度进而促使了更加复杂的艺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以及精细和广泛的公共管理体系的诞生。然而，必须再次提醒的是，切不可理想化或夸大这些文化的合作与互惠层面，其实这些文化之中也从来不乏封建军阀战争、压迫妇女和贫富悬殊等问题。因此，在这些社会里，互惠合作与对抗压迫同时存在。

二、当代表现

在近代西方历史中，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互惠与合作的身影。在个人或私人关系领域，许多人际互动多是合作和互惠的即使在公共制度和实践领域——此亦为本书的关注点——也很容易找到互惠与合作的踪迹。国家建立的历史过程、民主管理体系的问世、国家法律法规的制定，凡此种种，无不表明互惠与合作以

空前的规模展现于世。联合国的问世，以及在 20 世纪下半叶许多其他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诞生，都是互惠与合作在全球层面的表现。尽管这些机构现在仍存在各种缺陷(这些缺陷的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产生且受制于竞争性的国家主权体系，以及无序的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但是它们宣告了一些原则(比如《世界人权宣言》)，这些原则正在对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公共话语产生深远的影响。

除了这些更广阔的地缘政治成就，各种社会运动也纷纷涌现，它们致力于倡导更加互惠与合作的社会生活方式。废奴运动和世界范围内的女权运动就是最好的例子。此外还有美国的民权运动，以及 20 世纪草根阶层组织的无数和平运动，这些都是其明证。

互惠和合作还表现在经济领域。譬如，合作性经济运动付出了卓越的努力，它们倡导的经济所有制和经济贸易的合作模式超越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在这个方面，许多合作试验成就斐然。当然，合作性企业还需要在竞争性市场关系这个更广阔的框架内与其他企业竞争。尽管如此，它们仍体现了一种从对抗与不平等到合作与平等的相对转移——它们同时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模式。

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同样发轫于合作的理想与信念，其范围覆盖了政治和经济领域。尽管社会主义形式各异，但是社会主义者均试图用更加合作或集体的组织结构取代资本主义的竞争结构当然，有些社会主义者采取的是较为对抗的策略以实现目标，而有些则采取非对抗的社会变革策略。譬如，费边社会主义者通常拒

绝对对抗或革命策略，而更倾向于在现存体制结构内进行逐步改革。⁴不管这些社会主义者采取何种策略，就其本质而言，他们都坚持认为人类能够且必须从根本上以互惠与合作的方式相互协作。即使是马克思——他主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阐释历史，也不接受“人类是无可救药般自私和野蛮的”这个观点。相反，他认为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有着社会结构的原因，当这些结构原因消除时，对立随之消失。⁵

同样，无政府主义运动也是受到类似观点和信念的启发。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是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倡的是一套“经济互惠”体系，在这些自愿的经济体中，物品与服务按成本(没有利润)进行交换。⁶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写过一份长篇论文，驳斥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关于人类斗争与冲突不可避免的观点，同时指出人类继承了为共同利益而协同合作的基因能力。⁷尽管克鲁泡特金倡导以较为对抗的策略以推翻现存社会结构，从而为以自由社团为特征的新型合作社铺平道路，然而，蒲鲁东和其他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却诉诸相对和平的变革策略。无论这些无政府主义者采取何种策略，其最终目标通常都是一致的，即用可以自由结社与合作的体制取代独裁或高压的国家体制。另外，正如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所示，这些目标通常与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即创造一种体制以取代主流的竞争资本主义体制——紧密相连。

尽管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体现着人们对互惠主义的强烈渴望，但这些政治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极为有限，且至少在现在看来，它们的历史效应几乎消耗殆尽。不过，互惠规范和实践出现

了许多其他的形式。本章接下来的部分将探讨一些当代学说，看看它们是如何超越当今主流的对抗主义规范的。与上一章相同以下探讨仅是选取一些例子，而非对所有学说进行通盘梳理。

1. 女性主义

第三章开篇，已经提到对抗主义与男性之间的关系，因此女性主义的话语中经常提到规范性对抗主义的替代途径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女性主义包含各种思想和实践流派，且某些流派对对抗色彩都相对浓重。可与此同时，一些女性主义者的针对对抗主义也提出了深刻的批判。虽然以下讨论并不意味着所有女性主义者的声音一致、观点相同，但是我们仍会引述一些具体女性主义者的观点，因为它们对支配当今话语的规范性对抗主义提出了明确批判，且给出了替代途径。

女性主义者针对对抗主义的批判分为多种，他们想表达的共同的观点就是，侵略和竞争的文化规则在历史上是为男性主宰的社会结构服务的。⁸就最浅显的层面来说，它表现为男性对女性的直接身体侵犯。在许多历史时期和文化中，男性对女性的侵犯一直被认为是正常和自然的。由于男性在体力方面较女性明显占优，因此这些文化规则就明显衍生出了为男性主宰服务的结构。尽管近年来许多国家将暴力侵犯女性列为犯罪，但是这些历史规范的余毒在世界各地仍随处可见，包括西方世界。

除了身体上侵犯女性，许多女性主义者声称，侵略、竞争和崇尚权力斗争作为一种更加隐秘的方式，为男性主宰的结构服务。在我们的经济、政治制度、司法体系和教育体系中，奖赏体制总是青睐那些传统上认为具有“男性阳刚”的对抗特质，而非

那些传统上认为具有“女性阴柔”的特质，比如关爱与合作。由于野蛮和竞争与男性在历史上就存在着联系，因此这些奖励体制通常属于男性特权体制。⁹

不管对抗主义和男性之间的关联是由生理决定，还是从社会习得，或者两者兼有，真实情况似乎就是如此。一方面，如果男性在生理上比女性更富侵略性和竞争性，那么这种青睐男性特质而非女性特质的奖赏体制，将会基于生理差异而赋予男性以特权；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差异是性别社会化的结果，那么这种青睐男性特质而非女性特质的奖赏体制会通过性别差异社会化赋予男性以特权。不管怎样，只要侵略和竞争能够获得奖赏，男性就通常处于优势，而女性通常处于劣势。

此外，即使女性果真卷入传统的权力斗争之中，奉行侵略和竞争规则，她们的付出通常也换不回相应的回报。在很多情况下，男性表现出侵略和竞争可以赢得奖赏，因为这被视为正常与合适的。相反，如果女性在同样的情况下表现出侵略和竞争，则不太可能获得奖赏，因为她们的举动会被视为不正常和不合适的。¹⁰ 这种双重标准强化了代代相传的男性主宰结构。

除了女性在历史上因处于这种奖赏结构之中而遭受相对不公之外，许多女性主义者还表达了如下担忧，即男性特质（不等同于男人）相对于女性特质（不等同于女人）占据着主宰地位——不管这些特质是由男人还是女人表现出来。¹¹ 简言之，一种青睐男性特质和权力斗争的文化必然是一种轻视互惠特质与互惠关系的文化。在竞争文化中，养育关系和品质——它们在为人父母、教育和医护工作中不可或缺——却无一得到重视。不仅如此，相互共赢和集

体力量所需的合作与互惠关系也遭贬值。最后，社区与安全所需的和平关系也落得个贬值的下场。这些关系和品质遭遇贬值，其后果有二：第一，将绝大多数需要这类品质的职位让给女性承担，可同时这些职位已遭贬值，从而导致女性也遭到歧视；第二，由于这些品质贬值，男性则缺乏动力培养这些品质结果占世界人口半数且执掌大部分公共事务的男性，其养育、关爱和合作技能严重缺失，无法满足其在社会中所处权力位置的需要。

这样，竞争文化很容易通过性别等级结构将女性置于从属于男性的地位，同时遏制处于该等级顶端的男性培养养育和合作的能力。上述两类趋势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已经波及私人 and 公众领域。因此，在当今这个时代，居家父母——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养育家庭的工作已不再算入我们的经济生产总量和社会福利¹²。在当今这个时代，双收入家庭变成了规范，而照看孩子的护工——那些照看孩子成长且人数日增的群体——却是社会中薪酬最低的劳动者之一¹³。在当今这个时代，无休止的军备竞赛霸占了太多本已稀缺的公共卫生、教育和其他社会福利资源，其程度和规模可谓空前¹⁴。

然而，在这种(可以说是男性)竞争文化——一种崇尚侵略、竞争和权力斗争的文化——的边缘地带，许多女性就社会关系和权力表达了不同的话语。这种话语发声于数代人之前，它明确提出了以非对抗的方式思考和讨论权力。譬如，在 20 世纪 40 年代，玛丽·帕克·福莱特区分了两种权力，即“胁迫权”与“协同权”，或称“控制权”与“合作权”。¹⁵(相关内容在第二章的讨论中已有涉及)。福莱特称，人们通常认为权力关系是一种胁迫关

系，这种理解具有局限性且问题重重。她提出要拓宽对权力的理解，主张“一种合作权，即一种共同培养的能力一种协同权而非胁迫权”，以此作为新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的范式基础。¹⁶

这种区分很快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赞同，其中包括 20 世纪 50 年代的多萝西·埃米特和 20 世纪 60 年代的汉娜·阿伦特。¹⁷用阿伦特的话来说，“权力不仅是指人类行动的能力，更是指一致行动的能力”¹⁸。她警告称，简单地将权力与支配二者糅合成一体，将会“无法看清”人类的社会现实。¹⁹“只有停止将公共事务简化为一种支配活动”，她坚称，“人类事务才能呈现，或者说重现它们真正的多样性”。²⁰

20 世纪 70 年代，诸如琼·贝克·米勒之类的著名理论家重拾这种区分。米勒写道，“权力”这个字眼：

被赋予了某些特定的含义，它们体现着某些男性而非女性的典型行为模式。可是，这些行为模式或许与这个字眼本身的意义并无多大关系。与统治集团的所有概念和行为一样，“权力”的含义或许也遭到了扭曲和歪解。它几乎完全操控在那些时刻需要维持非理性统治地位的人手中。在他们的手中，这个字眼已经被染上了独裁的色彩。²¹

“因此很有必要，”米勒表示，“审视权力的某些含义……在妇女挣扎于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的同时，看看能否重新定义权力。”²² 她解释说，

女性承担着抚养他人的传统角色，在此过程中，她们展示了巨大的权力，她们发现，赋能他人是一项有价值且愉悦的活动。然而，赋能他人并不符合人们所认可的权力概念和定义……(因此)绝大多数权力研究并没有将女性的观点囊括在内。²³

进而，米勒主张将权力重新定义为“产生变化的能力”，其中包括“养育”和“赋能他人”之类的活动。²⁴她总结说：“通过促进而非抑制他人的权力，从而使自己获得权力，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其出发点与当今世界所奉行的权力概念截然不同。”²⁵

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女性主义文学开始涌现，它们试图以不太男性化的方式重新定义权力。²⁶南希·哈特索克在回顾“女性主义权力理论”²⁷之后总结道：

女性所提出的权力理论与男性所理解的权力——即权力是一种支配力量——存在着系统的差别。尽管只有为数不多的女性将权力理论化，但是她们的理论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²⁸

一条共同的主线是……作者反对将权力理解为是一种主宰或支配力量，而是更多地强调权力的其他含义，比如能力、才能、资质，呼吁重新审视一些权力假设。以上这些权力理论在当代女性运动中已经非常普遍……²⁹

女性强调的权力不是支配，而是能力，将权力理解为整个社区的能力，这意味着女性在待人处事与人际关系方面的经验影响着她们对权力的理解，因此，她们的观点更容易摆脱性别偏见和束缚。³⁰

正如以上诸位作者所言，很多女性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将权力区分为(可以说是男性)“控制权”和“压制权”关系，以及(可以说是女性)“行动权”和“合作权”关系。换言之，他们试图提出一种替代性权力话语——一些新的思考和讨论人类关系的方式，从而在人们之间确立这些关系。许多权力理论家也作了此类区分，可是他们的目的在于将“行动权”的概念排除在重要社会分析之外，而上述讨论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则与之不同他们作此区分正是为了强调互惠关系与社会分析和社会理解的关联性。

女性主义运动正在努力将理论付诸实践，虽然进展缓慢，但是已经在许多领域持续取得了进步。在大多数西方文化中，侵害妇女的行为虽然没有绝迹，但是它们已经被驱逐出了个人生活的黑暗角落，被赶到了公众谴责和刑事诉讼的阳光之下。同样，在家庭劳动方面，尽管还留有一些文化禁忌和持续的男女不平等但是父亲作为抚养孩子的角色已经逐渐被许多人群接受和重视随着女性在工作场所地位的提升——尽管在许多部门男性沙文主义遗风犹存——她们慢慢地在西方文明史中首次趋近了机会公平这个目标。在那些致力于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前线，出现了女性的身影——尽管在这个仍由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统治的世界，这些目标依然飘忽不定——她们为这个历史追求提供了

动力、见解和信念。³¹ 还有，女性正式走进了政治领域——尽管她们必须通过党派选举过滤机制，以及遵守党派决策流程——她们在决策过程中至少逐渐拓宽了诸如利益、价值和观点的范围。

通过上述以及其他许多方式，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不断渗透当代社会机构，与此同时，他们的思想也在不断拓宽当代社会想象。绝大部分的这些思想和做法与规范性对抗主义(它是数个世纪以来男性主宰的西方文化之特征)形成了鲜明对比。³²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女性主义者已经提出了一些完备的解决方案，也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非对抗的。不过总体来说，当代女性主义者基本上趋于反对“控制权”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是西方历史上男权主宰文化的典型特征(如本书第 34 页图 2 左下方所示)。另外，不管这些“控制权”关系所针对的是女性还是其他社会群体，情况皆是如此。³³ 不仅如此，许多女性将其批评范围延伸到了更加广泛的“压制权”关系(如本书第 34 页图 2 左上方和左下方所示)。³⁴ 这些女性致力于在她们的家庭、工作场所和更宽泛的社团中发展替代性和非对抗的思考和行为模式。尽管在很多方面，这些努力在文化上仍处于边缘，但是它们起码让我们瞥见了一种替代性的文化规范，并为之奠定了理论基础。

2. 系统理论

与女性主义者一样，许多系统理论者同样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当今流行的竞争文化。这些系统论观点的出现，正是受到复杂系统研究中“关系范式”的启发。实际上，一些女性主义者已

经指出，系统理论和女性主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正如埃尔斯伯格和梅拉米德所言：

我们女性对各种各样的关联非常感兴趣，且容易领会这些关系。然而，男性觉得这种能力很神秘，谓之“女性直觉”。按照这种叫法，这种能力听起来似乎并不是思考能力然而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思维方式，即男性理解不同关系时所用到的“系统思维”。³⁵

与还原主义者多是关注当代科学的做法不同，系统理论采取整体或系统的关注方式，从而揭示某个系统中的关系或关联。在社会系统中，这种关注方式针对社会关系，包括权力关系，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基于这些见解，许多系统理论者提出了一些替代性途径，以取代西方社会中典型的规范性对抗主义。为了充分掌握这些替代性途径的理论根据，有必要首先回顾系统理论的一些基本假设。³⁶

系统理论的根本假设是，不同类型的复杂系统——物理、生物、心理、社会等——在结构和功能方面存在诸多的相似性。在这些相似性当中，最首要的当属整体和相互依赖这些特性。复杂系统是一些有机的整体，而非仅仅是各部分相加的总和。按照系统论的说法，复杂系统的突显特性在单独部分中并不会体现出来。正是通过系统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系统的特性才能呈现出来。而这些不同部分是通过一些复杂的关系网络而存在，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交换。

在动态系统中，这些突显的特性包括根据正面和负面的反馈进行自我调节、改变和适应的能力。有些改变和适应是渐进、直线和确定的，譬如哺乳动物身体的热量调节，或者猎手追捕猎物时逐渐调整追捕路线。然而，彻底改变和进化适应多以突然、非线性，且经常混乱的适应为特征，譬如从液体变为气体、新物种的进化、某个社会政治体制的变革等。通过这些断断续续且不可预知的变化，进化系统发展出了一些新的子系统及其之间的新关系，以及该系统与更广阔的环境或超系统之间的新关系，从而逐渐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在这一点上，系统理论者坚称进化系统与目的论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由规模小、动力弱和组织结构复杂程度低，向规模大、动力强和组织结构复杂程度高的方向发展。这些相似性既可以从单个有机体的生长和发育，也可以从物种的进化中看出来。此外，它们还可以从人类思维的心理发展，以及社会系统的社会政治演变中体现出来。

最后，结合上述讨论的突显特性，动态进化系统经常被视为一些功能综合体。它们可以施展各种功能，而这些功能是它们的组成部分无法单独完成的。譬如，一个细胞可以通过新陈代谢作用产生能量，然而其组成要素若分离开来，则无法完成这项工作；一个有机体可以自我繁殖，然而其组成器官若分割开来，则不可能实现这项功能；一个物种可以进化，然而一个单独的有机体则无从谈起。随着系统的复杂程度和整合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功能才能得以实现。在此背景下，许多系统理论者和其他学者将

人类社会概念化为“功能综合体”——至少是潜在的。然而，即使在这个功能社会理论学派中，对现存社会系统之功能的阐释也是各不相同。一方面，一些传统理论家认为当代西方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系统是高效能的。³⁷ 这样，功能主义经常成为西方文明的辩护工具。资本主义因此被形容为最有效的经济体制，因为它声称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不同的物质利益，党派民主因此被形容为最有效的管理体制，因为它声称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不同的政治利益。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然而，与这种传统功能主义不同的是，一些更富批判精神的功能理论者认为，从本质上来说，当代西方的社会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功能失调的。在传统功能主义者对西方现状提供规范性辩护的同时，批判功能主义者也在为社会改革提供规范性辩护。他们通过研究现存社会系统的功能失调和内部矛盾——即它们不公正、不平等、不适当和不持久的程度——从而提出更高效的替代方案。

例如，许多批判功能主义者坚称，当今的大众传媒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功能失调，因为它们并不能保障民主自治系统所需的信息和公共讨论的畅通。³⁸ 其他人的批判范围则更广，扩展到了整个当今资本主义经济系统，认为它正在破坏自身的生存环境。这些人称，当下的经济系统要么消亡，要么调整，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³⁹ 另外还有一些批判功能主义者总结称，党派政治体系作为一种民主管理手段，也处于功能失调状态，究其原因，除了民众对公共生活越来越冷漠且远离之以外，政治党派在他们本来最

擅长的领域也无法发挥效用，比如利益表达与汇集，纽带与代表角色，以及建立有效的政府机构。正如莱昂宣称的那样：

政党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功能失调”要远多于“功能正常”……政党的表现存在着诸多缺陷，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重新寻找一种更好的方式以体现民众的利益，以及组织政府机构……这些缺陷如此明显，以至于根本就不用搬出以下这个重要论据——竞争的政党模式遏制了参与文化的发展，而在当今这个极度私有化的社会，参与文化意味着个人和社会将会得到极大的丰富。我们只需审视这些政党所宣称的“优势”，就可以发现这种竞争型的政党模式应当受到指责。⁴⁰

在此背景下，其他一些批判功能理论者发现了对抗主义更户泛的表现，并以此作为社会功能失调的进一步证据。譬如，在其系列文章《当今价值观、文化和政治的异端反思》中，系统理论者欧文·拉兹洛在当今社会系统中发现了许多内部功能失调之处。⁴¹在这些功能失调中，即包括人们将侵略、竞争性攫取和无节制竞争视作了理想规范。拉兹洛呼吁，在出现这些规范的地方，人们应该重新定位基本的人类关系，从对抗的“负和博弈”和“零和博弈”关系走向合作的“正和博弈”关系。⁴²拉兹洛借用了当今的国际秩序来阐述他的观点，他解释道：

在当今这个相互依存的时代，国际关系最显著的特征，便是这些基本的长期过程为正和博弈的存在提供了可能。

然而遗憾的是，国家领导人只顾为自己的国家攫取短期利益彼此不信任，且不说相互仇恨，根本无意参与到这种正和博弈之中。譬如，就算往好的方面说，国际上的权力制衡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零和博弈，一方赢必然伴随着另一方输。这种游戏或许会沦落为负和博弈，并引发大规模战争……然而，这种情况也可以演化成正和博弈——即通过裁军和双方允诺和平来建立一套世界安全体制。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承担被侵略或被消灭的风险，所有国家可以将大部分投入在国防和军事上的资金转移到真真切切造福人类的项目上。⁴³

为了应和拉兹洛的观点，博尔丁提出了一种非对抗性或者“综合”权力理论，他希望这种权力理论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更具功能主义特点的方式，以思考和讨论当今这个相互依存时代的社会关系。⁴⁴ 博尔丁解释说：“综合权力是一种构建组织、创建家庭和集体、激发忠诚、团结民众、发展正当性的能力。”⁴⁵ 按照博尔丁的说法，这种权力关系体现着合作、友谊、集体认同社区意识提升、共同创造和追求未来，这些建设性远景之能力的增强。⁴⁶ 这些转而有赖于一些更基本的人类能力，比如互助、尊重、爱，以及坚信个人利益必须通过他人利益的增加而获得。⁴⁷ 博尔丁结合自己的系统理论背景、关于经济与和平的研究，以及自己作为贵格教徒的经历，最后总结道，有效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必须建立在这些规范性的综合权力关系之上。尽管博尔丁承认在一些有限的情形下，对抗的权力关系存在着其合理性，但是他认为，当今世界状况需要人们更大程度地认可在处理人类事务过程

中“综合权力的极端重要性”⁴⁸。他的综合权力理论就是为创造一种新的权力话语而作出的努力，这与上文讨论的女性主义者的努力非常相似，他们都是为了创造一些新的词汇以思考和讨论社会关系。

按照拉兹洛、博尔丁和其他同类理论家的观点，对抗关系在当今的人类社会已经不合时宜。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宗派主义、种族主义、竞争物质主义以及其他社会失调的表现，都是人类社会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的体现，即无法在这个越来越相互依存的时代，按照人类集体利益发展所需的“正和博弈或“综合”关系来调整社会系统。另外，结合上文讨论的进化系统动力学，这些理论家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人类社会朝着一个更加有效的社会转型的图景：这是一个非线性、混乱或瓦解的过程其中不时伴随着对不断变化的条件而作出相应调整。拉兹洛解释说，与其他复杂的动态系统一样，社会系统：

拥有一个确定的稳定上限，一旦到达和超过，便会造成它们内部结构的崩塌。接着，秩序被混乱取代，但是混乱并不等于随意或毫无秩序。混乱通常(尽管不是所有情况下)是一种新秩序形成的过渡站，而该新秩序通过一种名叫“分歧”的突然变化而产生。这个系统会发现，相较于之前的各种秩序，新产生的秩序更加适应整个环境。⁴⁹

结合上述讨论，拉兹洛等理论家认为，随着人口持续增长科技发展、资源匮乏、全球范围内相互依存，竞争文化正在接近

“稳定上限”。与此同时，随着旧的对抗秩序的瓦解，这也为一种新的且根本的文化调整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然而，正如拉兹洛本人指出的那样，进化动态学并不能保证成功实现这种文化调整。

我们可以依靠新的系统科学推测历史的发展，可是，这件事情并不意味着这种推测的结果在真实世界中具有必然性。这种对未来的预测并不能保证其必然会实现，其中的原因在于，当进化逻辑应用于历史时——与其应用于自然领域一样——都是以偶然性而非必然性为基础的……当且仅当我们超越自己的内部限制——这些限制将我们拴在了当今这个充斥着过时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世界——的时候，这些进化愿景才能“化作现实”。⁵⁰

拉兹洛、博尔丁和其他类似的系统理论家提出的权力和社会实践模式，与竞争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新的社会关系话语反对“控制权”和“压制权”关系（如本书第34页图2左侧所示），认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功能失调且不合时宜。他们从系统论出发，提出了互惠或“综合”的替代性话语。尽管这种替代性话语在竞争文化中仍处于边缘位置，但是它们起码让我们瞥见了对抗主义规范的一种替代性途径，并为之奠定了理论基础。

3. 生态学/环境论

与许多女性主义者和系统理论家一样，许多生态学家和环境论者同样针对对抗主义提出了各种批判，并从中衍生出了一些替代性的文化规范。这些环境论批判存在着两种相互关联的形式。

第一，生态学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概念性见解，这些见解已经融入了一种逐渐兴起且很大程度上非对抗的生态世界观；第二，环境运动在实践中，针对党派政治系统和行为中出现的生态功能失衡情况，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政治见解。接下来，我们将会逐个讨论这些见解。

从概念上来讲，生态学与上文讨论的广义上的系统理论存在着紧密联系。它在借鉴系统理论的同时，又推动了后者的发展、因此，整体论和相互依存也是生态学的核心概念。然而，生态学及其倡导的环境运动在传播这些见解方面，影响力可以说要远大于系统理论。在 20 世纪最后 25 年里，整体论和相互依存成为新兴生态世界观——一种“环境意识”的觉醒——的核心概念这种世界观不仅改变了人们思考和谈论自然环境的方式，也改变了社会环境的方式。

在此背景下，整体论和相互依存逐渐成为人们理解人类社会的生动隐喻。这种“社会生态学”隐喻将关注点投射在了一套彼此关联和相互影响的复杂网络上，而这套复杂网络正是社会中个人或群体之间关系的特征所在。⁵¹ 在这套相互依存的复杂网络里，对抗主义变成了一种具有反效果甚至破坏性的社会规范。譬如，我们知道，压迫、贫穷、人口增长、环境恶化、食物匮乏社会冲突、政治动荡和战争，这些事件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关于这些联系的确切本质众说纷纭，但是许多观察家逐渐认识到，正是通过这些复杂的相互关联，任何族群遭受压迫和贫穷，都会影响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生态圈里的所有成员。譬如，我们看到，贫穷与人口增长存在着紧密联系，而反过来，二者又

与环境恶化和食物缺乏有关——这些状况导致社会永远处在冲突和不稳定的状态之中。继而，这些冲突和不稳定的状态必然导致警察和军队预算的增加，给社会成员——不论贫或富、压迫者或被压迫者——造成负担，其结果只是加重了冲突和不稳定，这个恶性循环，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因此，导致这种恶性循环的“控制权”和“压制权”关系与人们对社会相互依存的整体理解，者之间格格不入。

与对抗关系不同的是，生态世界观强调互惠与共生——另外两个关键的生态学概念——的极端重要性。尽管自然界存在某利程度的竞争、侵略和掠夺，但是生态学认为互惠和共生同样重要，甚至是一种更基本的生态动力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植物和动物只有相互依存、交换氧气与二氧化碳，才能创造出一个能够维持地球生命的环境。大多数开花植物的授粉必须通过互惠或共生的方式，与一些授粉昆虫进行交换才能实现。共生关系允许氮和其他必需的营养元素在土壤微生物和陆生植物根部之间进行交换，从而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转。就连许多动物，包括人类的消化，都离不开共生性肠道微生物的帮助。上述事例表明，互惠与共生是一种基本的生态动力学。⁵²

另外，自然界出现的侵略和掠夺，多是表现在物种间而非物种内。尽管在物种内，比如一些动物之间，存在着某些极具挑衅性的争夺交配权的行为，但是它们通常只是虚张声势，很少真枪实弹地伤害对方。相反，在所有的“社会物种”（从蚂蚁和蜜蜂到狼和灵长类）中，人类所体现出来的物种间的侵略行为，无论其范围抑或程度，皆无可比拟。许多进化理论家因此总结道，在

人类这种物种内，侵略行为是通过文化习得，而非由生理决定在这个越来越相互依存的时代，从侵略文化转向互惠文化已经刻不容缓。⁵³

还有一个生态概念启发了一些社会类比，即生态多样性原则。在自然界，多样性通常被视作生态健康和稳定之源。依此类比，可以说社会生态亦是如此。从这个观点出发，一些通过文化习得的行为和观点，例如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歧视女性，则与生态世界观截然对立，因为前者无法容忍多样性的存在。相反生态世界观不仅没有将差异视为冲突和敌对之源，而且将其看作是社会力量与稳定之根本而加以重视和培养。换言之，多样性并非一件坏事。

此外，生态世界观不仅重视物理多样性，而且强调视角多样性。在此背景下，生态学也提出了一种非对抗的认知论。⁵⁴这种认知论之所以形成，还要源自生态学初期，在本学科内产生的紧张对立，因为当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研究方法。一方面，许多生态学家主要关注单独生物体与该生物种群之间的内在关联却很少注意一些系统因素，例如营养循环或能量流转；另一方面，其他一些生态学家过多地关注营养循环、能量流转以及其他一些系统层面的生物物理过程，却很少注意单独的生物体。为了调和这两种紧张对立的局面，许多当代的生态学家开始将这两类研究方法同时纳入一个参考框架之内，并将二者视为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这种包容性的框架否认只用一种方法描述生态系统相反，它承认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要求人们采用多种不同的概念框架，其结果将产生一些不同但互补的“观测集”。这种更加整体的认

知论可以让生态学家在讨论的同时，兼顾单独的生命体和功能完备的生物物理系统——虽然二者完全不同。正如沃伦和切尼阐述的那样，这种研究方法：

在讨论分离(或者在不同程度和形态下，独立)的个体，以及整个系统时非常有意义……它主张以网络或者关联的角度看待生物体，不管是将这些生物体视作“生物球状关系网络上的节点”，还是单独(虽然不是分割或隔离)的个体、物种成员、族群或社区。不管哪种情况，生态系统都是一些网络结构，要么是由相互作用的个体、族群和社区组成的网络结构，要么是由相互作用的能量流，以及营养流和营养循环组成的网络结构。⁵⁵

因此，生态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调和“对立”观点的认知模式。沃伦和切尼进一步解释说，它提供了：

一种参考框架，该框架将历史上处于对立状态的研究方式视为互补。在这种框架下，二元论逐渐让位于多样的观点，以往只有对抗的地方也发现了互补……这种框架否认两极对立，但是它并不是将族群-社区的描述简化为过程一功能的描述，或者反过来，也不是将二者纳入一个更加基本或原始的本体论框架。相反，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以供我们研究和关联各种不同的分析，而每一种分析都是基

于它们各自的认识论和相关背景中的本体论。作为一个“统一理论”，它是一个不会消除差异的统一体。⁵⁶

通过认识到多种观点并存的必要性，进而从对立转向互补这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非对抗社会关系模式。结合上文讨论的其他概念见解——整体论、相互依存、互惠、共生、多样性等——这种从认识论上接受多种观点并存的作法，无疑强化了最近几十年新兴的生态世界观的非对抗本质。

除了这些概念见解，几十年来的环境运动也产生了大量合理的政治见解。譬如，一些环境主义者——除去他们的政治工作和政治活动不说——总结说，竞争性或者党派政治系统作为环境管理系统，从根本上来说是功能失调的。⁵⁷正如巴克维什和内维特所解释的那样：

关于党派性质的标准文献坚称，较高程度的兴趣、教育和参与度之间相互关联，它们共同作用，从而很容易获得并强化党派认同感。不过，一些环境论的文献，以及更广义的“新政治”模式的观点则与之截然相反。环境论者不仅对传统党派失去了兴趣，而且明确宣称不愿意跟随任何党派……(倾向于)无党派，甚至反党派态度。⁵⁸

许多环境论者倾向于无党派甚至反党派的态度，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从某个层面来说，许多环境问题需要长期的规划与投入，而竞争性的政治系统却经常受制于短期的政治眼光。为了夺

取和把持权力，政治活动家(不管他们与正式党派联结与否)通常不得不照顾选民的当下利益，这样他们才能在较短的任期内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就算某个候选人或政党出于道义，作出了一些长期的政治承诺。可是，下一届的继任者或政党为了远离他们之前不得不反对的政策(也就是他们在竞选活动中，或者就是为了发出反对的声音而反对的政策)，通常会废除或者拒绝执行前任领袖或政党确定的项目，因此，这些政治承诺的连续性很容易被打折扣。当然，拥有改变既定路线的能力是民主系统的一项重要特征，但是，必须思考改变路线背后的动机所在。在党派系统中，这些动机多是为了争夺政治资本，而非出于根据具体环境作出最负责任的决定的目的。⁵⁹

另外，由于竞选活动和政治党派的关注点通常集中在当代选民的身上，这种趋势很容易损害我们对未来子孙利益的承诺。在这些未来子孙的利益中，最显著者莫过于环境的可持续性。可是，在争夺和把持权力这场无休无止的竞争中，候选人和政党通常无暇顾及可持续性这些问题——特别是当可持续性需要牺牲当代人利益的时候。综上所述，党派政治系统并不适合长期有效的环境管理工作。

还有一些环境论者称，对抗式辩论过于简化论的作风，因此很难达成有效的生态决策。⁶⁰ 环境问题通常极其复杂，且牵涉大量社会和生态层面的问题。然而，对抗式辩论有一种偏向简化论的内在趋势。上文讨论过生态认知论，它重视观点多样，并努力将明显的对立视为观点互补，那么与此相反的就是一种对抗的认知论。对抗式辩论——特别是在政治领域——通常使用一些对立

和矛盾的术语来制造一些观点，从而将复杂的问题简化成简单的立场之争。

这种简化主义的做法经常通过煽情的宣传口号加以强化，而在这个政治家的声音片段广泛传播的政治时代，这些口号宣传是政治家们不可或缺的手段。因此，诸如“工作与环境”之类的单政治口号充斥公共领域，它们扭曲了这些问题的复杂本质，束缚了社会想象。如此一来，在政治领域，对抗式辩论的简化主义做法可以说，造成了政府对环境方面更加功能失调。⁶¹

此外，许多环境论者之所以反对竞争性政治，是因为它从结构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经济。⁶²正如第三章中所讨论的那样，从本质上来说，三方竞争体系要求党派政治体系必须服从自由市场竞争。（在西方社会，教会与国家的分离是他们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们却很少意识到，市场与国家分离的必要性——也就是让公共决策免受强权经济利益的指使和压迫。）在这个三方竞争体系内，迫于资金募集和竞选资助、媒体和公共关系管理，以及游说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等方面的开销和压力，这些竞争政治过程不得不服从一些强制的经济任务——此举对环境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许多历史悠久和强势的行业通过一些破坏环境的行径攫取利益，并利用竞选资助、游说和媒体等手段制造或者扼杀一些环境政策辩论的术语；另一方面，那些最容易受到环境恶化影响的人群——也就是那些穷人、少数族裔和女性（从统计学上来讲，他们最有可能生活在危害健康和环境恶化的地区）——由于被剥夺了经济权，因而无力影响政治决策。⁶³结果，那些富人后花园中绝不允许的环境破坏行为，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边缘地位的人群中却屡见不鲜。⁶⁴如此一来，政治领域服从经济领域的

做法使得竞争政治系统作为一种环境管理的手段出现了更加严重的功能失调。

此外，由于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敌对，国家内部的竞争政治系统生态功能失调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正如环境论者很早之前便已指出的那样，许多现代环境问题（例如臭氧层空洞、全球变暖、酸雨、水污染、迁徙物种保护等），具有跨国界的性质，因此需要从全球层面进行协作与配合。⁶⁵ 然而，由于受制于这些不合时宜的国家主权模式，现存的国际秩序（或曰无秩序）从根本上来讲无法应对当前紧迫的生态问题。在这个现存的国际体系中，由于国家之间野蛮竞争，欲将长期的生态资本转化为短期的经济收益，因此可持续性不得不让位于当前国家自我利益的追逐。这种竞争性国家主权系统无法负责任地解决环境问题。在缺乏一个有效的国家监管机制的背景下，随着越来越强势的跨国企业的全球化运作，且几乎不用承担任何环境（还有社会）责任因而经济全球化只会加重这些破坏生态的趋势。

除了国家之间经济竞争所造成的后果，许多环境论者还指出了国家之间军备竞争所造成的生态功能失调。即使在没有真正战争的时期，武器的制造和储备，以及数量庞大的常备军训练和维护都会造成巨大的生态损害。且不说军队占用了大量本可以用于社会和生态生产的物资和人力资源，它还在环境记录上留下了最恶劣的一页，其程度之甚，任何现代工业都无可比拟——哪怕是在和平时期。⁶⁶

在战争年代，环境付出的代价则更高昂。从越南的枯叶战到波斯湾战争的油田燃烧，生态破坏逐渐成为一种正当的军事策

略。此外，许多新的军事技术，包括地雷、生化武器、核武器甚至现在连常规武器也选择用核废料制造，所有这些都增加了战争的环境风险。在历史上，人类可以说第一次具备了一种军事能力，即让地球变得不适合多数生物生存，包括人类自己。尽管这种灾祸还未曾上演，但是，由于无数的军事试验、演习和对抗地球局部地区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适合居住。

为了更加彻底地讨论军国主义，许多环境论者还指出，战争和军备导致环境恶化程度不断加重，而反过来，环境恶化又不断引发军事动荡和战争。⁶⁷ 处于主流民族主义军事范式中的修正主义国防分析人士开始认识到，“环境安全”正在成为国家安全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⁶⁸ 洁净的水资源、耕地和其他许多生态资源的争夺或将成为 21 世纪最重要的冲突。然而讽刺的是，国际政治秩序的功能失调——其部分原因在于上文所讨论的经济和军事竞争——是这个环境不安全局面的根源所在。对抗主义带来不安全，而不安全又加剧对抗主义，如此形成一个生态(以及社会)的恶性循环。

在许多环境论者的头脑中，当代政治机构无法与环境相容这其中体现的并不只是某个政治家在道德或智力方面的失败。相反，竞争政治、竞争民族主义和竞争军国主义的对抗结构同样难辞其咎。⁶⁹ 鉴于这种认识，有必要寻找一种替代规范，以取代主宰当今政治领域的对抗主义规范。因此，许多环境论者在致力于环境管理的同时，同样也在努力培养一种更加合作的政治行为模式。其实，结合上文讨论的所有理由，和平与生态可持续性生态世界观中两个不可分割的目标。⁷⁰ 没有什么比“绿色和平”这

个短语更加明确地体现这种理念了——它在环境运动中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⁷¹ 正如乔纳森·波里特在《看见绿色》一书中解释的那样：

“看见绿色”就是将所有民族和人群，不管他们的分歧和差异看起来有多大，皆可视为一个相互依存的人类大家庭的成员，人们因彼此之间的责任，以及照顾和保护我们地球的义务而联结在一起。生态政治教导我们，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全球层面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学会与地球以及生活于其上的所有生物和谐相处，这才是当今政治议程上唯一真正有意义的事项。⁷²

最后，和平与生态的关联同样在许多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中得到了体现。生态女性主义发轫于一个越来越强烈的认识，即男性的“控制权”关系不仅导致女性被主宰和剥削，还导致自然被主宰和剥削。为了寻找一种替代的权力关系，许多生态女性主义者开始将生态学概念，诸如整体论和相互依存，与女性主义概念诸如养育和“协同权”关系(本章前文有述)联系在一起。这样，许多生态女性主义者借助生态学的观点，对当今社会的男性权力关系进行了更全面的批判。⁷³ 正如佩特拉·凯莉写道：

女性虽然被排斥在男性的权力场之外，但是在养育他人的日常生活中却展示着更大的权力。这种权力不是控制他人，而是与人合作的权力，与人分享的权力，这种权力必须取代男权制的权力……纵观历史，男性领导的社会运

动，其结果大多只是权力的更迭，基本的等级结构却依然未变。从根本上来说，将女性和男性从男权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这是一项建设一个和平、正义和生态社会的事业。我经常听到人们争论世界的诸多罪恶，认为应该首先将它们消除殆尽这种片面的方式本身就存在问题，它体现了男权制思想的线性和等级制之本质，却未能抓住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能够综观各种问题的视角，以整体的方法来解决它们。⁷⁴

因此，环境论者、生态学家、生态女性主义者以及其他学者提出了一套与竞争文化截然不同的思考、交谈和行为模式。其中的举措包括制定教育策略，提升意识，在家庭、学校和社区培养新的价值观和态度，以及提出新的社会和政治行为模式(比如基于共识的决策过程)。从概念模型和隐喻到有理有据的政治见解生态话语中包含了大量针对“控制权”和“压迫权”关系(如本书第 34 页图 2 左侧所示)的批判，并提出了替代途径。虽然从很多方面来说，这种话语在文化上仍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它可以让我们进一步瞥见主流对抗主义规范的替代途径，并为之打下理论基础。

4. 交往理论

从我们思考和谈论“交流”——关于“人类话语”的话语——的方式中也可以发现竞争文化的替代选择。譬如，许多人交流理论认为，对抗模式在家庭内部、朋友和同事之间会产生消极的作

用。⁷⁵特别是身处高度依存的长期关系里，人们通常不会采取高度对立或对抗的交流方式疏远和攻击他人。正如社会语言学家德博拉·坦嫩所言：“公共话语中常见的那种侵略风格在人际交流中并不是好的。”⁷⁶

因此，许多人发现，人际交流应该遵循政党辩论和法律辩护的模式。这种说法是多么荒谬！确实，一些人在人际交流过程中略显粗鲁和敌对，⁷⁷但是与在公共领域不同，这些行为通常不会受到嘉奖。虽然规范性对抗主义引导我们在公共领域不断走向对立，但是在我们的人际交往中，互惠规范通常促使我们走向与之相反的方向。在竞争型的公共文化中，“现实主义”这种常识认为，这种不调和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在许多人看来，人们在私人领域交流过程中所采用的合作和互惠理念，在公共领域显得似乎不可能、不合适，甚至压抑。按照对西方自由的常识看法公共领域是一个充满着利益冲突的领域。那么据此常识，冲突的利益必须通过竞争和对抗才能得到最妥当的处理。

另一方面，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哲学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约翰·杜威和欧洲批评理论重要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两人均提出了公共交往理论，这些理论都是“合作探究”模式，而非党派对立模式。⁷⁸从广义上讲，两位作者都呼吁在公共领域采取更加理性、包容和参与性更强的集体决策模式。此外，两人还呼吁通过社会培养交往能力，以此为有意义的民主话语奠定基础。最后，两人还预言，当传统的政治交往模式被理性的集体解决问题模式取代之后，这些交往能力将具有的革命性影响。⁷⁹

反过来，许多女性主义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公共交往模式，这些交往模式相较于杜威和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模式更加明显地体现出交往与互惠的特点。许多女性主义者认为，“私人”与“公共”领域这种传统区分实际上是一种男性构想，它通过将公共领域定义为一种需要男性或对抗品质的领地，从而将女性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⁸⁰从这个角度出发，“现实主义”这种常识拒绝在公共领域出现合作或互惠规范，且认为它们不合时宜，此举无异于一种压迫性的性别歧视。

许多女性主义学者还批判了人们过于强调理性说服的做法而理性说服几乎是所有公共交往模式的基础，包括哈贝马斯的交往模式。在一项针对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至今的西方修辞传统的批判中，萨莉·米勒·吉尔哈特总结说，从古至今，关于公共交往的研究和教学方式一直与女性主义的理论背道而驰。吉尔哈特解释说，“数世纪以来，人们的假设从来都是：修辞学的关注点即是说服”，“演讲者或征服者”的作用就是“战胜或改变(他人)”。⁸¹ 吉尔哈特将这种以争论或战胜为特征的说服模式等同于暴力，她还坚称，法律对手、党派政客以及其他一些精于理性说服手段的人们

会暗暗庆幸他们是理性之人，他们选择了文明的话语而非打斗。然而……一场说服与一场猛烈的炮火袭击之间的区别，界线非常模糊，它们只是程度之差，并无本质之别。我们的理性话语——它较之于战争与野蛮行为或许已是巨大的进步了吧——原来也只是“强权就是公理”的一

种隐晦形式而已。演讲和修辞教师一直以来都在培训一批精
千的武器专家——一批精于情感操纵和智力逻辑的专家。⁸²

当然，这种争论式说服模式与真实暴力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
比喻，很少有人会认为口头竞争与真实战争之间的区分不足轻
重。正如本书第 34 页图 2 中对抗主义—互惠主义连续体所示理性
说服较之于身体暴力很明显要更靠右。然而，诸如吉尔哈特之
类的女性主义者指出，不管是选择理性说服还是真实暴力，其结
果都是错误的。于是，杰尔哈特提出了第三种更具对话特性的交
往模式，它来源于女性主义对“氛围、聆听、接收、集体而非竞争
模式”的兴趣。⁸³ 她认为这种模式体现了“女性修辞”⁸⁴ 的特点。

受吉尔哈特的启发，福斯、福斯和格里芬* 提出了一种“邀
请式修辞”模式，她们希望这种模式能够为“那些致力于发展合
作、非对抗和道德交往模式的学者提供帮助”。⁸⁵ 这种针对交往
理论与实践的“女性主义重构”，其特点是在“一种安全、有价
值和自由的环境中提供各种观点”。⁸⁶ 正如福斯和格里芬指出的那
样，公众演讲者努力“展示他们卓越的知识、技能和品质……以
此操纵听众的观点和知识”，这是一种“男权式”的作风，因为
它“贬低了其他人的生命和观点”。⁸⁷ 相反，福斯和格里芬主张
“超越说理”，采取一种明确的非对抗参照框架，让所有的人：

参与对某个问题的思考，这样每个人都能更好地认识到
这个问题的微妙与错综复杂……这种认识有助于产生理解

*注：原文为 Foss, Foss and Griffin。

价值和公平感……在这个框架里，没有人想主宰他人，因为所有人的目标都是认识和理解他人的观点，而不会因为与众不同而诋毁之……(参与者)相互交往的目的不在于改变对方，使之踏入自己的阵营，而是相互分享信息、交流思想，批判地思考所提出的全部观点，理解讨论主题，了解彼此情况……他们提问题、作评论，目的不是为了凸显对方提出的观点有多么愚蠢或者错误，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对方更加强大或专业。相反，他们的提问和建议是为了更多地了解对方的思想，更加透彻地理解对方的观点，进一步丰富他们的视角，并且为每一位参与互动的人提供别的思路以思考这个主题。⁸⁸

邀请式修辞为当今盛行的规范性对抗主义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替代模式。在第二章所示的对抗主义—互惠主义连续体中，邀请式修辞所处的位置相较于哈贝马斯的“理想话语情境”——尽管这种情境杜绝主宰、压制或排斥，但是它仍是一种基于说服的模式——更加靠右。

尽管这些理论存在上述差异，但是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从对抗辩论转向互惠对话。这样，对话与辩论逐渐成为两种相反的公共交往范式，正如以下对比总结所示：

对话属于合作性质，双方或以上朝着同一个共识而努力。辩论属于对抗性质，双方彼此敌对，竭力证明对方的错误。

对话的目的是寻找共同立场。辩论的目的是战胜对方，在对话中，倾听对方是为了理解对方，寻找对话的意义，达成共识。在辩论中，倾听对方是为了找到对方的缺陷，驳倒对方的论点。

对话拓宽或者改变一个人的观点。辩论让一个人固执己见……

对话可以达成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优于任何原始方案。辩论坚守原始的立场，认为它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排斥任何其他方案。

对话培养一种开明的态度：承认犯错，愿意改变。辩论培养一种封闭的态度：坚持自己是正确的。

在对话中，一个人提出自己的最好想法，他知道其他人的思考有助于改善而非扼杀这个想法。在辩论中，一个人提出自己的最好想法，竭力维护它免受任何挑战，以此证明这个想法的正确性。

对话要求一个人暂时搁置自己的信念。辩论要求一个人全身心抱守自己的信念……

在对话中，一个人寻找对方立场的优势所在。在辩论中，一个人寻找对方立场的缺陷和弱点所在。

对话要求一个人真正关心他人，不能离间和攻击他人。辩论要求一个人反驳他人的立场，不要顾及他人的感受或关系，且时常贬低或非难他人。

对话认为众人之中，每个人拥有一小块答案，这些答案拼凑在一起就能形成一个可行的方案。辩论认为正确答案只有一个，且仅仅握在某个人手中。⁸⁹

与对话概念紧密相连的一个概念便是协商式民主。虽然对话与协商这两个术语有时可以交换使用，但是二者还是存在如下区别：通常认为，对话是一种非正式且通常具有持续性的参照框架，以此交流不同的观点，思考不同的价值观。⁹⁰与诸如政党辩论之类的对抗参照框架不同，对话以参与者之间非对抗的关系为特征，每个参与者都付出真切的努力去理解，而非贬低他人的观点和价值观，最终深化理解，产生共鸣。因此，不同的观点被视为互补，而不是彼此对立，并且相互理解和情感共鸣是每个人的根本目标。

相反，协商通常是指采用对话的基本原则以实现一些重要的目标，比如达成某个具体的决定，或者确定某个具体行动路线协商是一个更加正式的过程，目的是在有限的时间跨度内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不过，协商的特征与对话一样，都是在相互依存与合作关系的背景下，彼此交流观点和价值观。⁹¹

因此，对话和协商模式为主宰当今公共交往的对抗主义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替代方案。在公共领域，人们支持更多公共对话（和更少对抗辩论）的呼声越来越高，尽管这些声音大多数仍发自边缘地带。除了交往论学者，许多教育研究者和理论家也开始倡导对话与协商的教育价值。⁹²不仅如此，大量非营利机构开始支持新兴的市民网络，这些市民网络致力于在公共生活中开展“学习小组”“事务论坛”和类似的实验活动，从而培养在非对抗参照框架下集体解决争议问题的能力。⁹³迄今为止，全世界的教育

家、社区群体、图书馆、宗教团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为了这个目标，已经组织了超过五千个学习小组、事务论坛和类似的实验活动。⁹⁴

同样的运动还可见于新闻工作者，他们试图改革传统媒体的行为，使之更具对话或协商的特性。从 20 世纪初开始，这些人便在公共新闻（或日市民新闻）的名号下联合了起来。他们之所以付出如此努力，是因为他们普遍感觉到公共领域出现了功能失调——至少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于传统媒体。⁹⁵ 为改善公共交往的质量，一些具有改革头脑的新闻工作者一直致力于培养一种包容和参与的市民文化。他们将公众视为积极的市民而非被动的消费者，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协商论坛，而非上演对抗表演的戏台。这些新闻工作者试图拓宽新闻工作的作用，超越传统的事实报道，真正地促进公共协商。这种拓宽之举需要邀请公众参与以下过程，譬如设定议程，持续报道公众解决优先问题的情况，提供相关的背景信息，征询不同的观点，探究和明确相关的公众价值观和利益，寻求不同问题的解决方案，根据已有信息评估这些方案、收集到的观点，以及需要调和的价值观和兴趣。⁹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闻工作者变成了某些具体观点的公共倡导者。相反，按照上述理念，新闻工作者的作用是为了促进公众以尽可能中立的方式进行协商——这是新闻工作者特有的作用，他们充当着当今社会大众传媒的实际媒介。⁹⁷

在公共关系领域也出现了与新闻工作领域类似的对话与协商运动。⁹⁸ 譬如，公共关系学者格鲁尼格和亨特坚称，一种双向对称型公共关系模型正在出现，并成为该领域第四种最新的实践模式。⁹⁹

按照这些学者的说法，最早的公共关系模式是一种简单的新闻宣传或新闻代理型模式，它通过制造轰动效应引起公众的注意。后来出现了一种更加复杂的公共信息型模式，其特征是管理和传播真实但却经过严格筛选的信息，从而进一步提升某个组织的自身利益。这两种都是单向非对称型模式，在此模式下，组织与公众的交往是单向和不平等的。当公共关系人员开始应用复杂的研究方法，借助社会科学的知识，采集关于公众的数据以帮助他们制定更具说服力的公共信息策略之后，第三种公共关系模式便出现了。虽然这种双向非对称型模式以组织与公众之间的数据和信息“流”为特征，但是这股“流”主要服务组织的自身利益，因此它依然是不平等的。最后，格鲁尼格和亨特称，第四种新兴模式正在逐渐被一些进步组织采纳，其特征是组织机构与公众之间的双向对称交往。这种模式要求组织机构完全认清自身与公众的相互依存关系，愿意为了实现相互理解与适应而参与有意义的对话。尽管在公共关系领域，这种双向对称型模式仍处于边缘地带，但是研究人员逐渐发现，这种行为方式不仅更加符合道义，而且更加有效。¹⁰⁰

在协商式民意调查中，也能看到人们为创建一个更具对话或协商特质的公共领域而付出的努力。协商式民意调查是一种创新的研究方法，它旨在解决民主公共领域中一个古老的难题：如何在现代人群——数量庞大，且每个人过于忙碌，无法聚集在某个公共论坛一起协商每一项公共事务——之中创建一种参与民主制。公共新闻朝着这个方向迈进了一步，因为它努力促进了一种

持续的市民对话和协商，但是它不能保证参与公众具有代表性。相反，传统的民意调查所收集的公共意见样本在统计学上来说具有代表性，但是这些意见缺乏有意义的对话和协商。如果一方是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针对一些精心设计和极具争议的问题而作出自发反应，另一方是通过非对抗的对话和协商过程而达成的一些深思熟虑的判断，那么二者之间就存在着极大的差异。¹⁰¹

协商式民意调查通过召集在统计学上具有代表性的市民样本，然后衡量被抽选市民就某个具体问题充分协商之后所达成的意见，从而调和公众协商的价值观与代表参与的要求。¹⁰²正如费希金所描述的那样：

这个概念很简单：在全国(或地区、地方)范围内随机抽选一个选民样本，然后将这些人……送到某个地方。让这些选民专注于所提出的问题，向他们提供不偏不倚的概述材料，将他们分成小组进行密集讨论，为他们提供机会询问那些相互竞争的专家和政客。经过数天面对面的讨论，让参与者进行详细地投票。在对投票结果进行评估之后，就可以得出一些具有代表性且成熟的公众意见——如果将整个国家(地区、地方)的人们视为理想市民，让他们在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内关注于某些问题，那么他们最后得出的亦是如此意见。¹⁰³

当然，这种民意调查并不能推测出真实存在的公众意见。不过这不是此类民意调查的目的所在。相反，正如费希金解释的那样：

协商式民意调查并不是为了描述或预测公众的意见。相反，它提供的是指导。它具有建议的作用：如果人们能够更全面地知晓这些问题，并且有机会和动机认真审视这些问题，那么这些就是人们最终会达成的结论。它为一部分人——这些人就是整个国家的微观缩影——提供了全面思考某些问题的机会，之后再向我们所有人提供建议。¹⁰⁴

另外，这些建议从根本上来说，都是通过一些非党派和非对抗的集体协商过程而达成的。这种过程更接近于“邀请式修辞”而非说服和辩论。与上述讨论的其他模式一样，协商式民意调查同样也是当今公共领域盛行的竞争文化一种潜在替代模式。不仅如此，这些替代模式或许还能相得益彰。譬如，如果公共新闻的理念能够取代传统的新闻实践，致力于促进公民对话与协商，如果公共新闻工作者开始从传统的民意调查转向协商式民意调查，以这种更具代表性的方式抽查公众意见，如果其他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开始采用双向对称的方式处理公共关系，那么我们可以预见，公共领域将会出现一些更加有效、包容和非对抗的交往模式。

当然，从竞争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设想难免显得不切实际。上述讨论的每一个替代方案在当今都属于边缘理念，要想在当今社会实现这些理念，还需要作出许多其他方面的适应。¹⁰⁵ 不过，它们确实为我们思考和讨论公共交往提供了一些替代的方案。它们以人类的集体调查和主体间认同能力来定义人类，以关联或透视的方式定义人类知识。最后这些方案表示，我们需要些符合这些关于人类本性的替代性观点的社会实践和制度安排。总

而言之，它们为我们提供了瞥见对抗主义规范之替代途径的机会，并为之奠定了理论基础。

5.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

在本章所论述的全部非对抗模式中，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在当今盛行的竞争文化中效果最显著，也是最成功的。鉴于法律对立系统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原告和被告双方遭受极大的情感折磨与挫败，法院案件堆积如山，甚至许多律师和法官都出现了幻灭感，因此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在许多西方国家得到越来越多的拥护——其中还包括美国最高法院前任首席大法官和其他司法领袖的支持。¹⁰⁶

虽然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术语，其范围包括了从直接谈判到强制性第三方仲裁，但是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最典型的形式是调解。确实，各种混合的调解形式贯穿了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全部领域，包括从调解式谈判到僵局的调解与仲裁从人际间调解到经年累月、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公共纠纷解决过程。

作为法律对立系统的替代之道，调解可以采用各种处理方式。不过，大多数调解员将调解视为一种非对抗的争议处理方式，它可以让各方的补偿最大化，同时减少各方的损失（经济上和情感上）。通常来说，调解员的作用是帮助各方将冲突重新定义为集体问题，鼓励各方以合作的态度解决问题。这需要营造一个可以使敌意最小化，同时使合作最大化的基调和环境，确立一些有助于建设性交往的基本规则，协助各方探讨和理清各种潜在利益（包括造成各方冲突的需求、愿望、价值观、恐惧和担忧）协

助各方制定和评估一些全面的“双赢”的解决方案，将各方潜在利益最大化。¹⁰⁷

这种解决问题型或基于利益的纠纷解决模式在当代大多数调解中处于核心位置，因此它是对抗式诉讼的一种明显替代方式——它体现了对抗—互惠连续体（如本书第 34 页图 2 所示从左到右的重大转移。不仅如此，这种基于利益的调解已经被证明不是一种幼稚或乌托邦式的替代方式。相较于那些对抗过程调解已经被证明更加实用和有效的方式，更能满足各方的利益减少许多类型的冲突所带来的损失。¹⁰⁸

然而，除了达到解决实际问题这类目标，一些调解员还将调解视为一种改造竞争文化的手段。¹⁰⁹ 因此，在这些调解员看来冲突不仅仅是一些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它还为冲突各方提供了发展更成熟的社会或“关系”能力的机会。这些能力包括从他人的视角观看世界；与他人实现真正的心意相通；能够思考我们的选择所带来的道德后果；能够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和身份，认识到更广阔的集体利益和人类共同的身份。¹¹⁰

因此，这种具有改造性质的调解方式反对将目光放在“利益满足”这个狭隘的关注点上。照此观点，甚至连基于利益的调解也不过是自由个人主义——此乃法律对立系统之基础——的修改版而已。正如两位最著名的改造式调解倡导者解释的那样：

个人主义者的世界观在描述人类世界和人类潜能时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更重要的是，个人主义将人类断然分割成完全独立的个人，忽视了人类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其中

与他人的联系是人类生活经验中的一个重要特性。另外，它强调个人满足，这明显不足以充当道德理论的基础。¹¹¹

相反，改造式调解方式发轫于“关联世界观”，后者采用本质上非对抗性的术语来定义人类。

与个人主义者一样，关系参照框架认为，世界由拥有个性化意识以及多样需求和愿望的人群组成。不过，它还认为这些多样的人群拥有着一一种内在的意识形式。这种意识形式将他们彼此联结起来。具体来说，每个人都具有两种内在的人类能力。第一种能力是可以感受人类的全部经验——包括痛苦与快乐、喜悦与悲伤、清晰与迷茫，等等。第二种能力是认识到每个人都拥有与自己相同的体验能力。正是这种内在和独特的关联他人经验的人类能力才构成了人类意识结构，这个意识结构将每一个人类个体至少是潜在地联结在一起……因此，在这种关联世界观看来，世界不仅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集合体，还是一个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潜在)统一体。¹¹²

反过来，这种关联世界观也指出，虽然满足双方利益是调解带来的一个重要的附带好处，但是它的终极目标应该更加宏大。

实现这种人类世界的愿景，其最大价值并不在于满足个人的愿望，而在于激发出个人和这个世界更高层次的潜

能，其实现途径乃是通过唤起人类对于自身和他人的意识与关切……而不是将他人视为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¹¹³

由此可知，解决问题型或基于利益的调解方式试图创建一些非对抗的纠纷解决结构，而改造式调解方式试图改造纠纷各方头脑中关于纠纷的概念基础，从而培养一种非对抗文化。

当然，不管目的是为了实际问题还是为了改造竞争文化，此二者之间并不互相排斥。调解既可以满足各种纠纷中的共同利益，也可以同时在纠纷各方之间培养一些新的关系能力。参与到调解式问题解决的过程之中，这本身就是一次教育经历，它可以改造纠纷各方关于冲突的理解。¹¹⁴此外，鉴于纠纷解决的技巧和概念越来越多地进入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课程中，文化改造这个目标在许多课堂中得到了广泛的宣扬，与此同时，基于利益的问题解决——这类目标不再是法庭的一味追求。

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法庭上，不管动机是为了解决利益问题还是改造社会，调解以及相关的纠纷解决形式为竞争文化提供了一些明晰的替代途径。它们为人们思考和讨论冲突提供了一些替代方式。它们从人类以合作的方式解决冲突的能力，以及发展关系能力从而使损失最小化和降低未来冲突的出现概率等方面来定义人类。同样，它们还提出了一些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这些结构和实践符合人类本性的替代性观点。因此，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在逐渐渗透进社会实践的同时，也在逐渐拓展当今的社会想象。尽管这些社会实践在很多方面仍处于文化边缘的位置，但是

它们再一次为我们提供了瞥见主流对抗主义规范的替代途径的机会，并为之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缺乏整合

正如以上论述所示，许多当代理论家、专家、活动家和其他人士都提出了一些替代性的文化构想。有些替代性构想还仅仅停留在直觉理想层面，有些则衍生出了复杂的理论框架，另外一些作为相对成功的社会实践模式而得以应用。然而不管怎样，所有这些替代性构想都将我们对于人类关系的理解从对抗主义—互惠主义连续体(如本书第 34 页图 2 所示)的左侧转向了右侧。与此同时，在竞争文化这个大环境下，所有这些替代性构想相对来说彼此孤立。虽然它们让我们瞥见了一种更加互惠的文化，但是我们很难将它们当成一种全面的替代性文化而加以审视和体验。它们还没有被成功地整合成一个更大、内部一致且相互促进的文化形态。

有鉴于此，许多替代性构想的实际效用依然很难评估。虽然从直觉上来说，它们吸引许多人，可是在其他许多人眼里，它们却显得幼稚和不切实际。毕竟，从竞争文化的角度来看，人类本性自然且不可避免是对抗的。考虑到这种人性假设已经如此普遍，所以这种非对抗的社会实践模式，往轻了说显得不切实际往重了说很容易遭人操纵和滥用。正因为此，在面对这些互惠的社会实践模式时，竞争文化培育出了一种广泛传播的犬儒主义，这种犬儒主义反过来又遏制了这些互惠的社会实践模式的成功应用。

譬如，我们试想一下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在公共政策和规划领域的最新经验。在最近几十年里，作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

公共磋商，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操作形式。然而，这种操作形式却让许多参与者感到非常沮丧和挫败，因为它只不过是精心制定了一些公共关系策略以推销某些政策，或者拟定一些决策。可这些决策的结局早在人们的预料之中——它们受制于或者早已由政党统治的政治经济所决定。不仅如此，即使这些方式具有相对可行性，可是它们的结果却经常受到现存法律和管制框架的制约，而这种框架本身就是由同一个政党系统决定的。将非对抗的纠纷解决途径放置于对抗的统治结构中，这种做法会大大降低非对抗方式的效能，使其远不如在另一种环境中所发挥的功用。

在竞争文化这个大环境中，这些非对抗的方式除了遭遇结构问题之外，还受到内部参与者心理结构的削弱。许多人都是在竞争文化中成长起来，对自我利益的野蛮追逐已经变成了规范化甚至理想化，因此不难想象，他们发现自己很难以非对抗的方式与持不同利益的他人相处。将非对抗的纠纷解决方式放置于对抗的心理结构环境中，这种做法只会导致这些非对抗方式的功能更加失调。

为了评估非对抗方式在处理所有人类事务中的实际效用，有必要找到一种综合或全面的文化形态，并且这种文化形态中所包含的意识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必须能够增强而非破坏公共领域的互惠式思考、讨论和行为方式，最后在这种文化形态中评估这些非对抗模式的应用情况。

第五章 替代性文化形态

竞争文化的替代形式是什么样的?互惠主义如何能取代对抗主义成为我们集体思考、讨论和行动的规范性基础?非对抗的社会组织模式是什么样的?它们必须通过何种社会变革策略才能得以建立?

针对上述这些问题，有一个模式可供我们寻求答案，那就是巴哈伊国际社团。一个多世纪以来，巴哈伊国际社团以一种综合和相互促进的方式，实践着非对抗的社会互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变革的原则。这个全球性社团可以看作一场广泛的社会实验，它有着前后连贯、踪迹清晰和记录完整的历史，具备一套统一的思想、著作和实践体系，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全面的文化形态加以分析。在这个文化世界里，其成员培养、发展并内化着一套连贯的文化规范，且这套文化规范与构成当下流行的竞争文化的规范截然不同。

一、案例研究：巴哈伊社团

1. 研究巴哈伊社团之缘由

遍布全球的巴哈伊社团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独特的例子。这是一个稳步增长的自愿社团，其成员来自 2100 多个不同的种族覆盖了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社会经济阶层。迄今为止，它的成员已经超过 500 万人，是地球上多样化人群的一个缩影。它是一个世界性宗教，但却没有神职人员。相反，这些社团是由一套机构进行管理的，其中包括地方层面选举的管理机构，分布在全球 11700 多个地方；国家层面选举的管理机构，分布在 182 个独立国家和地区；还有唯一一个在国际层面选举的管理机构，它负责协调全球范围内的社团活动。综上所述，它很有可能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样、分布最广泛、组织最民主的社团。¹

不过，不能将巴哈伊社团进行简单的归类。它是一个包容一切的信仰社团，有着灵性的世界观；它是一场世界范围的社会运动，有着明确的社会变革目标；它是一套综合的全球民主管理体系；它是一个由群众阶层组成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项目网络；它是一个分权化的儿童教育和人力资源培训系统；它是联合国体系中一个重要的非政府组织。然而，为便于本书的分析起见，我们将它视为一个独立的话语社团：该社团的人们拥有一套共同的思考和讨论社会现实的方式，并由此衍生出了一些独特的社会机构和社会实践。

巴哈伊社团致力于实现所有人群——不论其性别、种族、国籍或宗教背景——的基本平等和相互依存。为了这个目标，他们

默默奋斗了 150 多年，努力构建了一个团结、公正和可持续的社会实践系统。这些社团成员相信，随着我们进入一个全球相互依存的时代，这个系统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模式，其效用总有一天会展现在世人的面前。²

由此可见，巴哈伊社团在世界舞台上刚开始崭露头角——在人权、妇女进步、普及教育、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其声望正在逐渐提高。³ 迄今为止，他们的工作涵盖了 1700 个群众项目，这些项目并不是简单地满足于向人们提供慈善服务而是注重这些人群自身能力的发展。⁴ 除了这些项目，巴哈伊社团还与其他许多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例如非洲粮食安全倡导协会、世界自然基金会、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心、全民教育网络等等。

巴哈伊社团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另外一个原因是它广泛参与联合国体系内的事务，这种参与行为可以追溯到 1945 年联合国诞生之初。从彼时起，巴哈伊国际社团便成为联合国体系内最重要的非政府组织之一。（巴哈伊国际社团是代表全球巴哈伊社团之机构的正式名称，它是联合国体系中已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它被授予联合国经济与发展理事会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咨商地位。它与大量其他联合国机构存在着工作关系，例如联合国环境署、人居署、人权署、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裁军事务部、和平研究所、联合国区域委员会等。它与一些联合国专门机构的联系也在不断加强，例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粮食与农业组织等。它还在一些重大国际事件中积极担任策划者和参与者的角色，例如 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举

行的地球峰会，1993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大会，1995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世界峰会，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联合国第二次人类居住大会(简称:人居二)，1996年在罗马举行的世界食品峰会，等等。⁵在这些全球会议之后，巴哈伊国际社团的主要代表接着担任了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千年论坛的共同主席，并受邀代表论坛向与会的各国首脑递呈了宣言与行动纲领。

随着巴哈伊社团在国际舞台上的出现越来越频繁，在最近几十年里，巴哈伊社团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1975年，一个国际性的巴哈伊研究协会正式成立，它旨在研究巴哈伊社团的理论与实践。自彼时起，该协会在 18 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附属机构，并组建了专业化的兴趣小组，涉及的领域包括农业、艺术、冲突解决、商业与经济、教育、环境、健康、跨文化问题、科学与技术、科学哲学、宗教研究和妇女研究。该协会还每年在不同大洲召开学术会议，同时发行一份经同行审议的季刊《巴哈伊研究》，偶尔也会发表一些学术专题论文。不仅如此，国家层面的附属机构也发行大量期刊和发表各种专题论文。

除了巴哈伊研究协会的这些活动，截至 1985 年，有超过 80 篇文章和博士论文(仅统计英语文献)问世，其内容涉及了巴哈伊社团的各个方面。⁶虽然无法得到最新的数据，但是这个数字似乎一直在稳定增长，因为通过引文分析可以发现，在最近几十年，研究巴哈伊社团各个方面的学术著作和学术期刊文章的总量一直在持续增长。⁷最后，还有一些事件也进一步表明了巴哈伊社团与当代学术界的关联，譬如马里兰大学在 1992 年开设了巴哈伊和

平讲座，以此将巴哈伊的观点带入了和平与世界秩序问题的正式研究中。同样，希伯来大学在 1999 年也开设了巴哈伊研究讲座，以供针对巴哈伊信仰自身的正式研究之用。

正如以上例子所示，巴哈伊社团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值得引起公众和学术注意。考虑到它致力于非对抗的社会互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变革模式，因此它非常切合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研究。

2. 方法论

为了将巴哈伊社团当作一个独立的话语社团进行分析，我引用了大量巴哈伊社团中心人物和机构撰写或委托撰写的原始材料。这些原始材料包括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和守基·埃芬迪的著作，以及巴哈伊社团国际管理机构——世界正义院——撰写或委托撰写的文献。⁸在由世界正义院委托撰写的这些文献中有许多收集自巴哈伊国际社团向联合国各种大会与机构发表的声明记录。相比于其他巴哈伊文章，这些声明能够更加明晰和简要地总结接下来将要讨论的一些关键的巴哈伊原则和实践。

考虑到这些总结性声明可以方便地获得，因此我会经常地直接引用它们，以此避免在我正在研究的话语体系中掺杂进自己的措辞。不过，当我在讨论一些更具体和细节层面上的巴哈伊实践时，就不必恪守这种做法了。在讨论一些相对抽象的概念时，例如那些构成巴哈伊所倡导的“有机世界观”的概念，我则采取大量引用的方式，尽量保留巴哈伊的真实语言。

另外，为了简单和清晰起见，我在通篇讨论中将巴哈伊看成一个集体，仿佛他们用同一个声音说话。之所以这么做，部分原

因是出于行文风格上的选择，可以让讨论更具可读性。除此之外，它还表明巴哈伊针对他们的核心原则与实践存在着一致的认识。由于巴哈伊社团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自愿社团，其成员依据一套明确的概念、原则和实践而凝聚在一起，因此这些概念、原则和实践在这个社团内不会彼此冲突。此外，社团内还设有一些机构，负责解决经典阐释与应用的问题，同时维护目标和认识的统一。因此，社团内不存在任何派系、朋党或竞争性阐释框架。有鉴于此，若对那些内部具有争议的话语——例如自由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因为它们拥护者很显然并不是在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进行概括，则风险非常大，不过在巴哈伊话语中，这种做法则相对较安全。

由于任何写作都伴随有选择、强调和阐释的过程，因此在接下来的此类分析中，总免不了融入作者自己的解释。有鉴于此作者征询了大量有意于此话题的巴哈伊的反馈，以此使本著作分析的主体间有效性最大化。这些受访的巴哈伊社团成员通晓巴哈伊经典，在地方和国家层面的巴哈伊社团有过多年的服务经验其中有些入选和担任各种巴哈伊机构的职位。通过将我对巴哈伊思想与实践的解释与他们的解释对比，这种“三角测量法”让我确信，本著作分析的主体间有效性将得到最大化，同时结合我所讨论的核心概念，我可以有把握将巴哈伊当成一个集体，好像用一个统一的声音在说话。

最后，任何文化群体或话语社团都可以从两个视角进行研究：本位视角和客位视角。⁹ 有些学科以前只依赖客位视角，所以在20世纪下半叶，一些批判理论家开始出现，他们提出有必要同时

采用本位视角进行研究。因此，女性主义学者所开展的女性主义组织和运动研究长期以来得到人们的认可，就像现在本土人群研究本土文化受到积极鼓励一样。弄清了分析视角之后，人们现在广泛地认识到，客位视角和本位视角相互补充和彼此促进，而非相互排斥。正如上文所说，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作者——一位有着二十多年参与和观察数个大洲各种巴哈伊社团的个人——将从本位视角入手，而巴哈伊社团的客位视角同样非常重要和必要，不过这项工作有赖于其他人士的努力。

二、分 析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首先从整体上谈论巴哈伊社团的有机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衍生出了他们这种非对抗的规范与行为方式。接着，我将详细考察其中一些规范与实践，包括巴哈伊集体决策模式、巴哈伊组织结构和巴哈伊社会变革策略。与此同时我还会详述关于人类本性的假设，这些假设构成了巴哈伊规范理论的基础。最后，通过讨论巴哈伊社团的实际经验，我将评估这些规范与实践的效用，从而结束本章。

1. 有机世界观

巴哈伊社团成员拥有一个共同的世界观，可以准确地称之为“有机世界观”。巴哈伊常常提到人类的有机相互依存、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有机本质、人类集体进化中伴随的成长与适应的有机过程。按照这种有机世界观的观点，巴哈伊不是从竞争或争支配地位的角度，而是从团结、融合与协作的角度定义权力。出于这些观点，巴哈伊致力于学习和建立一些非对抗的社会实践和

组织结构。然而，在考察这些实践与结构之前，有必要阐明“有机”这个比喻，将其与其他有机社会概念区别开来。

从历史上看，一些特权和自利集团或阶层有时会援引有机社会概念，以此将“和谐”强加于其统治的人们身上。因此，这个有机比喻被用以遏制多样性，压制人权，以及让人们对社会现状保持一种虚假(且通常脆弱)的认同。¹⁰ 与这种极度虚伪和强制的有机说不同，巴哈伊援引有机比喻，是将其作为一种促进多样性、维护人权和追求社会变革的手段。巴哈伊认为，社会不公正和不公平的根源之一，在于人类无法认识到他们是有机相互依存的，因此他们无法创造一种集体生活模式。巴哈伊指出，由于缺乏这种认识，压迫和剥削的社会关系就被认为是正常、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因为冲突而非合作被当作了人类存在的根本特征。¹¹

在倡导人类有机团结与相互依存的过程中，巴哈伊针对 20 世纪一些根深蒂固的假设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其中最明显的个假设就是：

人们认为团结是一个遥远、几乎不可企及的理想，若要实现它，则必须首先确保大量政治冲突得以解决，物质需求得以满足，正义得以伸张。(巴哈伊认为)事实恰好相反。困扰社会并给社会带来灾难的主要疾病……就是人类的不团结，而人类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具有合作的能力。直至今日，他们的进步依然取决于他们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能够取得多大规模的统一行动。有些人坚持认为，冲突是人类本性的内在特征，而不是一些习得的习惯与态度

的综合体，此举无异于将一个错误带入了新的世纪，而这个错误已经可悲地束缚了人类的过去。¹²

因此，巴哈伊相信，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相处方式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¹³ 特别是，他们坚称旧有的权力和权威的运作方式由于植根于那些根深蒂固的人类本性之假设，因此有必要重新理解这些概念。¹⁴ 他们指出，纵观历史：

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某些人或群体所享用的特权。确实，在很多时候，它经常被简单地表述为一种用于对抗他人的工具。这种权力解释已经成为分歧和冲突文化的一种内在特征……总体而言，权力已经成为个人、派系、种族、阶层和国家的属性，尤其是一种与男性而非女性紧密相连的属性。权力的主要作用就是赋予其受益人攫取、超越、支配、抵抗和战胜某人或某物的能力。¹⁵

与这些传统和竞争的权力表现不同——巴哈伊认为它们“已经无法可靠地解决复杂的问题”¹⁶——巴哈伊认为，随着社团内部和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增强，人们认识到人类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这将迫使我们学习、实践集体决策和集体行动的权力。¹⁷ 按照上述观点，巴哈伊认为当今的世界形势（从人类取得史无前例的繁衍能力和技术成就，到由此导致的不断增强的社会相互依存，再到由此产生的不断复杂和相互关联的社会与环境问题）催生出了越来越紧迫的进化压力，迫使我们必须“对当今社会机构

进行有机变革”。¹⁸ 因此，巴哈伊相信，这些沿袭至今的社会结构与实践，由于它们是从以前迥异的社会条件下演化而来，因此在面对当今世界形势时，便出现了无法适应的情况。按照巴哈伊的看法，现在的问题是，人类是应该具有前瞻性地回应这些越来越紧迫的进化压力，采取新的社会结构与实践，还是仅仅回应那些越来越多的“由于人们固执地抱守过时的行为模式而造成的”灾难事件。¹⁹

因此，巴哈伊建议，如果我们要采取一种前瞻性的方式来应对我们所面临的不断增加的挑战：

我们必须认识到，要想培养一些思想与行为方式，使之更加符合那些有助于提升生活品质的美德与实践，这个过程需要发生多大的改变！这个“世界性问题”需要人类的心灵和头脑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我们似乎被禁锢在现存的认知模式中，遵循着过时的方式和概念。这些模式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并且植根于诸如民族国家、国家主权、冲突与斗争、胜与负等概念之中。²⁰

因此，巴哈伊表示，“一个能让全世界人们为了集体利益而承担起责任的策略，其基石必须认识到人类一体”。²¹ 他们解释说，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

对当代社会的绝大多数机构履行其职能的方式提出了根本的挑战。不管是在对抗性的公民政府结构里(其倡导的对

抗原则渗透了绝大部分民法，并且崇尚阶级和其他社会团体之间的斗争)，还是在现代生活中如此盛行的竞争精神中冲突已经被视为人们互动的主要动力。²²

巴哈伊继续表示，“只有逐渐认识到所有人都属于同一个利族，这样，地球上的居民才能摒弃那些在过去支配着社会结构的冲突模式，开始学习合作与调解之道。”²³ 此外，他们还坚称如果继续沿袭这些冲突模式，其社会和环境代价只会继续增加。他们指出，“全世界种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

在未来的年月里只会继续增强。随着地球上所有种族和国家越来越彼此依赖，他们逐渐聚为一体……不同种族之间的相互依存持续增强，互动不断增多，这对旧有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提出了根本的挑战。作为个人和社团的我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社团是鼓励、凝聚和进步的，还是不友善、分裂和不可持续的。²⁴

在倡导人们认识到人类的有机统一和相互依存的同时，巴哈伊强烈提醒，要警惕任何会遏制多样性的统一概念。因此，不要将巴哈伊的统一概念误解成是千篇一律。相反，它提倡的是“多样性统一”。²⁵ 不仅如此，巴哈伊还认为，我们不能仅仅简单地接受多样性，而是要将它看作一种必需的集体资源而加以培养和重视。他们解释说，“与人类生命体及其所处环境中的基因库的作用一样”：

人类在过去数千年里积累起来的文化多样性这笔巨大财富，对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必须让这笔遗产在这个全球文明中结出硕果……避免让它在横流物欲中窒息，同时要远离党派出于政治目的的操纵。²⁶

此外，巴哈伊还提醒，要警惕任何会压制基本人权的有机统概念，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与这种压迫式的有机说不同(它有时被用来维护控制他人的权力)，巴哈伊的统一概念意味着社会必须成为基本人权的集体受托人。他们称，“人类社会的每位成员自降生于世，便成为整个社会的受托物”，这种信托关系意味着社会必须承担一系列集体责任。²⁷譬如，这些责任包括保障：

家人与家庭的安全、财产所有权、隐私权……受雇佣权、心理和生理医疗服务、社会安全、合理工资、消遣与娱乐，以及社会成员提出的其他大量合理的期望……(还包括)任何个人皆有权期望那些与他们身体息息相关的文化环境能够受到国家和国际法律的保护。²⁸

因此，在巴哈伊看来，信托这个概念构成了人权的道德基础，而随着人类的相互依存不断增强，过去几代人所竭力宣扬的正是这个概念。²⁹巴哈伊认为，这个概念意味着必须在人类社会与生活其中的个人之间培养一种互惠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个人有义务付出多样和创造性的贡献以支持和丰富社会，而社会有贵

任为个人营造和改善与此相应的环境。所以，巴哈伊不是将多样性和个性视为对社会肌体的威胁，而是把它们看作集体健康与幸福的源泉。

在阐述这个观点时，巴哈伊将人类社会与个人肌体进行了类比。当然，在承认“人类社会并不是由一堆各不相同的细胞组成，而是由大量个人结合而成的，且每个个人都被赋予了智慧与意志”的同时，他们坚称：

然而，(我们)生物本性所体现出的运行模式清楚地展示了一些基本的存在原则。在这些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多样性统一。说起来有点矛盾，可正是构成人们肌体的全部和复杂秩序——以及肌体细胞完美地融入这些秩序之中——使得每个组成部分中所蕴含的独特能力得以展现。任何细胞，不管是为肌体的运行贡献力量，还是从肌体的康乐中分一杯羹，都不可能离开肌体而生存……个体生命所体现出的这些道理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人类意识的运行必然离不开无限多样的个体思维和动机，但这并不会损其基本的统一。实际上，这种多样性正是区分统一与同质或千篇一律的关键。³⁰

然而，按照巴哈伊的观点，要想建立这种互惠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多样性得以培养，人权得到保障)，则必须认识到所有种族是统一和相互依存的。因此，巴哈伊相信，这种有机的社会概念是超越传统和竞争的权力表现——后者是历史上许多社会关系

的特征，并且是大量侵犯人权行为的根由所在——的先决条件。

譬如，在论及暴力侵犯女性的传统时，巴哈伊解释说：

暴力侵犯女性的行为犹如一根标尺，可以据此推断所有人权所遭到的侵害程度。它可以用来衡量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受野蛮统治，被竞争支配，遭暴力管制……(因为)一个遵循支配模式的社会必然会出现诸如暴力侵犯女性之类的权力扭曲。³¹

因此，巴哈伊还认为，那些暴力侵犯女性的人，其本身就是传统和竞争的权力概念的受害者。³²

当不受约束的竞争、侵略和暴政摧毁了社会的结构，每个人将遭受苦难……暴力侵犯女性便是这个大规模失调的严重症候。我们面临的挑战乃是寻找一些新的策略，采取一些新的模式，在各个层面上促进建立一个更加健康和合作的社会。³³

然而，巴哈伊承认，他们所倡导的意识转变将注定是一个艰难且逐步的过程。³⁴ 尽管巴哈伊承认，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人们可以积累一些进步，但是他们相信，要想实现根本的变革，最终还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培养一些新的态度和价值观。因此，他们建议：

应该将精力集中在儿童和青少年身上，因为他们仍处于价值观的形成期，而这些价值观将决定他们的生活。教育

我们的孩子尊重自己 and 他人，认识到人类一体，理解多样性统一，培养世界社团的公民意识，这些举措最能保证在接下来的年月里人权能够得到进一步保障……我们要教育孩子们认识到多样性乃是人类环境的一部分，需要给予整个人类大家庭以尊敬和充分人权，这样，文明就能从这笔不可想象的巨大财富中获益匪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权教育应该被视作当代社会的基础教育。³⁵

当然，巴哈伊同样认识到，当今仍存在诸多因素约束着他们所倡导的意识转变。“迷惑、谬论、偏见、猜疑和狭隘自私”，他们承认说，继续“困扰着国家和种族彼此之间的关系”。³⁶确实他们指出：

侵略和冲突已经如此深入我们的社会、经济和宗教体系之中，以至于许多人已经认可这类行为是人类的内在本性因此是不可消除的。

由于这种观念如此根深蒂固，因此在处理诸多人类事务时，一个禁锢人类发展的矛盾便产生了。一方面，所有国家的人们声称，他们不仅愿意拥抱，而且渴望和平与和谐，从而结束那些折磨他们日常生活的可怕忧虑；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加批判地认可这个假设，即人类的自私和野蛮是如此不可救药，因此人类不可能立刻建立起一个进步

与和平、活力与和谐的社会系统——一个基于合作与互惠，且有助于充分施展个人创造力和主动性的系统。³⁷

这种意志力的缺乏，巴哈伊坚称，必须予以仔细考察，坚决处理。³⁸ 为了克服这个难题，巴哈伊建议，我们“需要一幅愿景——一张关于未来的图画，它可以激发我们的活力，引导我们献身与牺牲”。³⁹ 为了更加生动地描绘这幅愿景，巴哈伊借用了另外一个有机类比，它如此简单，不管是有识之士还是目不识丁者，其中包括处于成长期的儿童和青少年，皆能轻松理解。通过将人类集体进化与个人成长进行类比，他们表示，人类正在经历各种自然成长阶段，现在正在走向成熟期：“人类作为一个独特的有机体，它已经走过的那些进化阶段，就相当于其个体成员所走过的婴儿期和儿童期，现在，它正处于充满混乱的青春期的末端，准备进入期盼已久的成年期。”⁴⁰ 基于这个观点，他们将“近代出现的动荡、突变和躁动”解释为：

不成熟成长阶段的特征。从全球发展的角度出发，我们必须看到，我们作为同一个物种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为更伟大的事业作准备，正在付出更广泛的忠诚，同时培养协作与合作的能力。⁴¹

因此，巴哈伊认为“目前世界混乱的局面和人类事务的不幸状况，乃是一个有机过程中的一个自然阶段，而这个有机过程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把人类统一在同一个社会秩序之下，且该秩序没有任何疆界之分”。⁴² 他们坚称：

今日普遍认为是自然和恰当的关系——包括人类之间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社会成员与社会机构，仅仅体现了人类在更早和不太成熟的成长阶段所取得的认知水平。如果要以人类真正进入成年期，如果要以地球上所有居民融为同一个种族，如果要以正义成为社会组织的管理原则——则必须改造现存的这些思想(此类思想的出现，正是因为人们无视这些日益显现的事实)。⁴³

巴哈伊认为，在这些思想中，最显著者莫过于上文提到的竞争和侵略的权力与权威模式。他们指出，与权力运作相关的习惯和态度：

是人类在漫长的婴儿期和青春期所培养出来的，它们如今已经接近失效。当今时代的这些紧迫问题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全球性的，如果依然将权力理解为人类大家庭中某些人所拥有的特权，这种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是极其错误的，而且对这个世界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毫无实际用处……人类正在为自身成熟的要求所鞭策，力图摆脱传统上对权力的理解和运作方式。⁴⁴

接着，巴哈伊声称，“这样做并不是否定人类的过去，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它”。⁴⁵ 因此，他们在一份致全世界人们的公开声明中宣称：

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偏见、战争和剥削都是未成熟阶段的表现。如今人类正在经受无可规避的混乱，而这些混乱正预示着人类集体成熟期的来临。坦率承认这些事实非但不应成为失望的理由，反而是着手缔造世界和平的先决条件。这项千秋大业可以实现，所需的建设力量确已具备，统一的社会结构也定能建立，这就是我们恳请与您共同探讨的主题。⁴⁶

2. 集体决策

上文讨论了有机世界观，以及人类在面临那些愈加复杂的社会挑战时所需的团结与协作。有鉴于此，巴哈伊相信，当今社会急切需要一些更加成熟的集体决策方式。他们认为，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相互关联，如果不采取“全方位的合作与协调(其程度远非人类集体经验可企及)”，⁴⁷则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为此，巴哈伊主张一种包容的集体决策模式，让所有社会成员共同构思、设计、执行和评估那些与他们自身息息相关的政策和方案。⁴⁸另外，巴哈伊还相信，这种模式必须超越对抗性的处事姿态和拉帮结派，以及那种谈判与妥协模式，因为这些做法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民主决策的同义词。⁴⁹因此，他们解释说：

长久以来，辩论、宣传、对抗方法及整个政党机构已经成为集体行动如此熟悉之特征，可是从根本上来说，它们十分有损集体行动的目的，即从某个给定时刻所汇集的选择中，选出最明智的行动方案……从而相互达成共识。⁵⁰

不过巴哈伊强调，虽然他们提出这些主张，但这并不表示他们贬低现存的民主体系。相反，他们宣称，当代的民主制度“应该被视为漫长的社会进化时期内所结出的果实，代表着社会组织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先进阶段”。⁵¹ 他们作出这些评价，其目的“并不在于批判任何体制，而是为了打开思路，鼓励人们重新审视当代社会的基础”。⁵² 巴哈伊在阐述这个主题时，再一次将人类的集体社会进化与个人的成熟过程进行了类比。

在一个充斥着激荡的活力、反叛精神和狂热青春期行为的历史时期，很难从中甄别出一个成熟社会的特征……旧世界秩序的诸多模式模糊了我们感知成熟社会的视野，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模式正是从反叛中孕育而出，仍然保留着人类社会进入青少年期(虽然这个时期必不可少)所特有的革命特质。⁵³

与那些他们认为诞生于人类社会集体发展早期阶段的系统不同，巴哈伊主张一种非对抗的集体决策模式，他们简单地称之为磋商——他们认为这种模式的“核心任务就是重新定义人类关系系统”，⁵⁴ 即上文提到的那种人类关系系统。

如今，全世界的巴哈伊社团都在践行着这种完全非对抗的模式，巴哈伊发现它可以为任何文化所用。⁵⁵ 他们还发现，实际上在任何需要集体决策与合作的领域，这种模式皆有其用武之地。⁵⁶ 这种方法不仅可以用来指导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巴哈伊社团事务，还可以用在巴哈伊发起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项目、巴哈伊开设

的学校、巴哈伊拥有的企业，以及巴哈伊家庭的日常决策之中。⁵⁷此外，鉴于新闻媒体已经成为一个集体对话与磋商的平台，巴哈伊甚至致力于将磋商的诸多原则和目标应用于巴哈伊社团内的新闻媒体运作过程之中。⁵⁸

磋商的目的在于达成共识，以此团结不同的选民，而非造成分歧。⁵⁹若要达此目的，则必须遵循各种磋商原则，鼓励参与者超越传统决策系统中常见的权力斗争。⁶⁰上文所提到的重视多样性便是其中的原则之一。巴哈伊并不将多样性视为冲突之源，或者集体决策的障碍，相反，他们认为人类的多样性是决策过程中的一笔财富。⁶¹因此，所有决策参与者皆努力求教于全体社团成员，思考他们的观点、关注点、兴趣和专业知识。巴哈伊认为通过重视多样性，积极汇集传统上遭到排斥的观点，社团不同成员之间还可以产生相互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是任何致力于将集体决定转化为集体行动的先决条件。⁶²

与重视多样性紧密相连的另一个原则是超然于个人观点之上。在巴哈伊磋商中，个人参与者须力求超越他们各自的观点。⁶³尽管这个原则乍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但是它体现了一种基本的认识论，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⁶⁴对此，巴哈伊承认，相对于人类周遭世界的无限复杂性，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是有限和片面的，因此我们无法直接和全面地感知或认识现实——不管是其原始形态还是其本质。不仅如此，他们还承认，每个人的观点总是受到其经历、教育、社会地位和历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约束。鉴于我们观点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巴哈伊认为我们只能相对，而非绝对地接近真理。⁶⁵因此，当一些磋商群体就某个主题广泛收集不

同观点时，每个提供观点的个人也必须秉持超然的精神，听取不同的观点——他们相信整个群体会考量他们的观点，同时清楚自己观点的局限所在。

这样，巴哈伊将各种不同观点视为互补而非对抗的——每个观点都有可能启发一个复杂和多维度现实的某个侧面。此外，巴哈伊认为不同的观点和想法一经提出，便成为集体资源，供整个决策集体使用。他们解释说，在巴哈伊磋商中，“当一个想法一经提出，它就立刻归集体所有”。⁶⁶ 巴哈伊承认，这个理念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他们表示：

它可能是最重要的磋商原则。按照这个原则，所有的想法不再归个人、小组或选民所有。当人们遵循这个原则时，它会鼓励人们出于真诚的服务愿望，而非扩张权势或拉拢选民的欲望而提出自己的想法。⁶⁷

当然，巴哈伊认识到，上文所说的超然态度实践起来绝非易事——哪怕是那些熟谙其理论的人。他们解释说，“磋商并非一项可以轻而易举掌握的技能”。⁶⁸ 但是他们表示，遵循磋商方法不仅可以促成更加有效的集体决策，而且有助于使个人参与者以及整个社团趋于成熟。⁶⁹ 因此，巴哈伊将磋商视为一个学习的过程。他们认为在磋商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技能和态度，与在此过程中所达成的具体决定同样重要。

另一个与巴哈伊磋商密切相关的原则是恰当与适度的表达。巴哈伊称，“言论自由必须受到一个必要前提的约束，即充分认识

到自由以及言论的正面和负面两个维度”。⁷⁰ 他们解释说，语言具有强大的力量，因此需要人们具备敏锐的判断力。⁷¹ 巴哈伊在指出言论的非凡特质时表示：

内容、音量、风格、应变能力、智慧和及时性，这些都是决定言论效果的关键因素……因此，对于这项将人类与其他形态生命体区分开来的语言活动，我们必须时刻清楚它的重要性，谨慎地使用它。⁷²

巴哈伊相信，“这种约束可以孕育出一种表达礼节，它非常适合人类即将进入的成熟期”。⁷³ 因此，巴哈伊称，表达自由不能成为纵容极端和分裂言论的许可证。嘲弄、侮辱、最后通牒以及其他攻击性、贬损性和容易引发冲突的表达模式——它们已经成为当今绝大多数公共交流的规范——在巴哈伊磋商中没有立足之地。⁷⁴ 相反，巴哈伊认识到，见解与共识——有意义的集体磋商之前提条件——在一个谦恭、尊重、恰当和适度的环境中最容易出现。巴哈伊称，只有在这种环境下，参与者才能自信地践行上述原则：

讨论过程中任何人提出的想法不再属于其个人，而是属于整个集体，集体可以采纳、放弃或修改这个想法，以最好地服务大家所追求的目标。⁷⁵

巴哈伊相信，只有在一个相互尊重、支持、鼓励，而非侵略和恐吓的环境里，参与者才能理清思路，所有人的观点才能得以

倾听——特别是那些一直以来被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因而缺自信和果断的人。

另一方面，这些关涉表达礼节的规范，它们并不是要求参与者隐藏他们的意见分歧，用假惺惺的礼貌腔调相互交谈，以此掩盖冲突。相反，它们意味着人们必须找到和推崇一些表达模式这些表达模式可以让参与者批判地考查那些相互冲突的观点和利益，并且是在一种宽容的环境下，秉着彼此真诚的精神，这样所有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⁷⁶

同样，这些规范也不意味着这些表达模式只能是冷漠和理性的，不容许牵涉情感。⁷⁷相反，巴哈伊承认，情感对于人类经验和感知至关重要，若要促成集体行动和相互共识，则必不可忽视它。巴哈伊认识到，一方面，情感可以振奋、鼓舞和鞭策人们去追求有意义的社会变革。⁷⁸另一方面，虽然巴哈伊指出磋商过程并非一种集体疗伤形式，但是他们承认，哪怕是悲伤的情感也能揭示人类经验的某些维度，而若要实现相互理解与共鸣，则有时候必须认可这些维度。⁷⁹然而，在这一点上，巴哈伊相信人类经验的情感维度不必通过进攻与防御的姿态，以及极端的表达(我们在政治化的公共表达中已经如此熟悉此类方式)也能得以展现。⁸⁰确实，杜绝此类姿态大概是促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从而生出真正改革意愿的唯一途径。因此，巴哈伊一方面不主张冷漠和毫无情感的磋商，另一方面也极力避免对抗的情感碰撞，因为这种情感碰撞经常会滋生冲突与疏远。⁸¹

此外，巴哈伊表示，不能以上述关于表达规范为借口，认为某人或群体粗鲁、无教养或无理智而排斥之。就此方面来说，个人表达的权利是巴哈伊社团生活的基本原则。⁸² 因此，在巴哈看来，上文提到的成熟的表达礼节并不是参与磋商的先决条件相反，巴哈伊认为磋商是一个集体学习，不断培养更具建设性的表达模式的过程。⁸³ 巴哈伊提醒说，在这种集体学习环境中，每个人仅负责监督和完善自己的表达模式，不可擅作主张监督、纠正或指责他人。⁸⁴ 这样，巴哈伊力求既不攻击他人，也不遭他人攻击。⁸⁵

磋商的另一个基本原则乃是，必须将决策提高到原则的高度，而不能采取政治实用主义的态度。⁸⁶ 在巴哈伊看来，这意味着在决策过程中，大家共同认可的原则必须高于党派利益。⁸⁷ 巴哈伊认为，“政府领袖与所有掌权者在应对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威胁时，如果能够首先找到相关的原则，然后遵循之，那么他们处理起来就会显得游刃有余”。⁸⁸ 他们称，“只有具备原则高度的话语才能促使人们作出道德承诺，从而有可能为这个快速融合的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提供持久的解决之道”。⁸⁹

在巴哈伊社团中，这种原则的实例之一便是上文提到的集体受托人关系，它构成了巴哈伊处理人权方式之基石。在巴哈伊决策过程中，另外一些原则还包括男女平等、消除贫富悬殊、自然环境的可持续保护等。⁹⁰ 巴哈伊社团内的所有集体决策都以这些以及类似原则为指导。巴哈伊认为，所有这些原则的基石是更加普遍的正义原则。他们解释说，在集体层面：

关注正义是集体决策不可或缺之指南，唯有如此，才能达成统一的思想与行动。追求正义绝不等于鼓励惩罚(在过去，惩罚经常以正义之名伪装自己)。正义是针对某种意识的真实表达，而这种意识就是认识到，在实现人类进步的过程中，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密不可分。当正义成为人类互动的指导思想，它就会催生出一个磋商的氛围，从而允许人们冷静地考察各种选择，并选出最佳的行动路线。在这种氛围下，长期以来存在的操纵和党派倾向则不太可能将决策过程带入歧途……

从这个意义出发，任何互动行为，不管是在家庭、邻里或者全球范围内，都必须将正义纳入考量之中。⁹¹

在遵循正义这个大原则的同时，巴哈伊还奉行一些“灵性原则”(即道德或伦理原则)，这些彼此认可的准则指导着他们构思、比较和评估潜在的决定。巴哈伊认为，这种方法可以催生一种与传统党派谈判与妥协完全不同的活动氛围。简言之，他们相信，这种方法将集体决策过程转向了一个新的中心，引导它脱离竞争性利益诉求的泥淖，走进了伦理或灵性原则的庭院——在这里，社会正义这种更加广泛的目标就更容易实现。

通过有意、自觉和系统地遵循这种灵性原则，巴哈伊努力在磋商中达成共识，如果无法达成共识，则采纳多数人的意见。⁹²一旦达成某个决定，哪怕该决定不符合某人在磋商时的意见，或

者他的意见与多数人相左，所有巴哈伊也都要团结一致，共同执行这个决定。⁹³ 巴哈伊在阐述这个重要的磋商原则时解释说：

一旦达成某项决定，则要求全体成员统一行动——不管多少人支持这个决定。这样，磋商过程中就不会出现“少数派”报告或者“反对派”立场。巴哈伊相信，如果某项决定是错误的，那么在执行过程中会很容易被发现——前提是这个决策小组以及整个社团全心全意支持它。人人皆秉承团结的精神，这样可以保证即使这个决定或项目失败了，其问题便可归于该想法本身，而不是缺乏社团支持，或者由于对手的顽固行为作祟。⁹⁴

在这种情况下，巴哈伊建议，“如果在实践过程中暴露出任何缺陷，可随时重新考量先前的决定”。⁹⁵ 这样，这种不断监督、评估、改善和舍弃先前决定的做法，可以看作是磋商过程的延伸。巴哈伊相信，在执行初始决定时众人的团结程度越高，这种延伸过程的有效性也越高。按照这种观点，如果存在政党或派系对立，则很难评估问题是出在某个决定本身，还是由于执行不力。这种对立还会破坏相互尊重和共同追求的氛围，而如果在这种氛围内，要改变或者修正先前的决定要容易得多。从这个意义来说，巴哈伊相信，当今社会的另一种普遍特征，即“抗议文化”也在破坏磋商的基础。⁹⁶

3. 体制结构

尽管巴哈伊认为，若要应对人类所面临的不断复杂和相互关联的问题，则需要更加成熟的集体决策方法，但是他们也承认仅仅有这些方法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相信，新的决策方法必须要与新的制度模式相结合才能开花结果。那么现在的挑战是，巴哈伊认为，“彻底反思那些支配当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许多概念和假设”，“从根本上改造所有社会制度”。⁹⁷

譬如在经济领域，巴哈伊提到了市场体系所固有的问题“很明显，市场体系正在加重大多数人的苦难，同时却让少部分人生活在极度富裕之中，且奢侈程度绝非我们的先辈们可想象”。⁹⁸虽然巴哈伊认可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但是他们解释说当今的市场体系要为“20 世纪末困扰世界各地的社会和经济弊端”⁹⁹负责，其中包括“贫富悬殊问题，它给世界带来了剧烈的痛楚，让世界处于不稳定状态，乃至濒于战争的边缘”。¹⁰⁰因此巴哈伊认为：

若要重新定义人类事务的组织结构，其核心任务乃是就经济的角色达成一个恰当的认识。由于未能将经济置入人类社会与精神存在这个更广阔的背景之中，在世界上经济更加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具有腐化性质的物质主义，同时也导致了世界上大多数民众长期处于贫困之中。经济应该用于服务人们的需求，社会不应该改变自身以适应经济模式。经济系统的最终作用乃是赋予世界人民和体制一种工具，以此实现发展的真正目标：发掘人类意识中隐藏的无限潜能。¹⁰¹

因此他们称，人类“必须根据某些见解发展出一些新的经济模式，而这些见解则是来源于人们共同经验所达成的共识，以及将人类视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¹⁰² 此外，在这些见解之中有一个，人们迟迟未能认识到，即资本与劳动的相互依存。¹⁰³ 按照以上以及类似的见解，他们坚称：

必须重新考虑各种问题孰轻孰重。资源必须撤离那些损害个人、社会 and 环境的机构与项目，转向那些最能促进建立一个富有活力、公正和繁荣社会秩序的机构与项目。¹⁰⁴

在当今这个决策受制于资本积累的逻辑与压力的政治系统内，要想实现这种基本的经济优先权的重新定位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巴哈伊相信，根本的政治改革是实现有意义的经济改革的先决条件。所以，巴哈伊将他们大部分重心转向了传统政治结构的改革。

在这个方面，巴哈伊指出，选举改革便是其中的紧迫任务之一。¹⁰⁵ 然而，一些人提出的改革方案仅仅停留在改良政党选举的层面上，比如改革竞选经费法，实行任期限制，采用比例代表制，等等。与此相反，巴哈伊对于所有这些改革方案中所充斥的这一整套党派理论，都持拒绝态度。他们表示，“党派意识形态虽然在过去为人类进步立下了卓著功勋，但是今天已深陷犬儒主义、冷漠以及由此滋生的腐败之泥淖”。¹⁰⁶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坚称民主“不需要提名、争当候选人、竞选或拉拢选民等政治戏码，并且它们也无甚用处”。¹⁰⁷

与这些传统的竞争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哈伊通过一个毫不牵涉任何提名、竞选或者派系对立的过程而选举出他们的管理机构。¹⁰⁸在地方层面，巴哈伊管理机构由九名成员组成，均从当地巴哈伊社团的全体成员中选举而出。所有成年人均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因此他们既是投票人，又是候选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投票权就与人选后服务社团的责任联结在了一起。这种责任需要责任人牺牲大量的时间、精力和个人愿望。

在巴哈伊选举中，任何人不得宣传自己或者拉选票，这是个原则性问题。实际上，巴哈伊认为，如果某个人拉选票，则说明他不适合服务社团。巴哈伊同样避免与他人讨论他们将要(或者已经)投票给谁，以免影响他人的判断。投票以匿名形式进行，每个人听从自己的良知投票。巴哈伊拥有完全自由的选择权，他们可以投给他们认为最无私、能力最出众和经验最丰富等的九位社团成员。¹⁰⁹在选择这九个名字的同时，巴哈伊还会有意识地让这些入选成员的多样性达到最大化。¹¹⁰

投票统计结束后，票数最高的九名社团成员任职管理机构(即选举采用相对多数票制)。为了遵循多样化原则，在遇到票数相等的情况下，如果一人来自多数群体，另一人来自少数群体，按照巴哈伊选举流程，自动认为来自少数群体的那个人入选。¹¹¹

于是，通过这种方式入选的社团成员担当着社团受托人的角色，他们通过磋商过程代表社团进行集体决策。此外，集体决策权归于整个机构的集体意志，入选的成员在社团里没有任何附加的权威、权力或者特权。

在承担集体受托人职责的同时，这些成员受到一些明确原则的指导，比如“赢得群众的信任、尊敬和衷心支持；与那些利益相关者进行公开和充分地磋商；客观调查所在社区的真正需求与意愿”。¹¹² 这些原则性的义务通过一系列途径得以实施，譬如经常就机构成员所面临的某些具体决定向其他社团成员征询意见建议和专业知知识，以及定期开展公共磋商，机构成员以此聆听和熟悉社团成员的观点、建议、需求、担忧和不满。¹¹³

另外，这些选举产生的管理机构还可以征询一些由巴哈伊教务管理体制委任的机构成员，此即顾问制度。顾问制度是一种独特的巴哈伊组织形式，是政党管理系统中所没有的。简单地说巴哈伊社团的国际管理机构从全世界的巴哈伊中选出一些经验丰富、思想成熟和能力出众的个人，委任他们担当地方和国家层面管理机构的顾问。这些个人在社团中没有立法权、行政权或司法权，也不是神职人员或传教士。相反，他们的职责在于向所选举的机构提供观点、分析、建议和鼓励。他们帮助机构找到相应的原则以指导他们的磋商。他们还帮助不同的巴哈伊社团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积累、交流集体知识与经验。通过这些方式，对于那些之前没有行政经验，而现在入选巴哈伊行政服务的人们来说，顾问可以激发他们发展机构、学习和能力建设。¹¹⁴

通过所有这些方式，巴哈伊管理机构向广大的社团成员咨询和征求意见。然而，与大多数当代民主体系不同——其决策者(基本上都是政治活动家)必须在选民、竞选赞助者、游说团体和活动家的竞争需求之间不断斡旋(为了积累和维持政治资

本)——巴哈伊管理机构则免受外部游说,以及其他影响他们决策的压力的干扰。这是通过一系列途径实现的:首先,正如上文所讨论的那样,这些入选管理机构的成员,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当选,也不会为既得利益而寻求连任(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政治活动家,不在乎积累或维持政治资本);其次,人选成员是根据他们的良知来作决定(这也是他们得以入选的重要原因之一)。¹¹⁵最后,人选成员在权衡所有决定时,不能仅仅顾及各自社团的眼前利益,而是要放眼关注全人类的长期福祉——即使这意味着为了遥远民族或未来子孙的福祉而放弃本地人们的眼前利益。¹¹⁶

由于入选的巴哈伊管理机构成员主动熟悉各自社团的情况和关切问题,邀请全体社团成员共同参与,一起提议、完善、执行、评估和修正那些与他们自身息息相关的项目和政策,并就某些具体情况征求一些经验丰富的顾问的见解与建议,因此,这里不会出现充满竞争的选民、竞选赞助者、游说团体和活动家(这些人的行为旨在向机构的决策过程施压)——因为这些都违背了巴哈伊社团及其选举体系的目标和原则。

由此可见,巴哈伊选举体系既不是一场竞争,也不是为了追逐权力。与政党选举体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是一个团结而非分裂的过程。由于没有人在意是否当选,因此也没有“胜出”一说。与此同时,这个选举过程还明显保留了民主的特征。¹¹⁷正如巴哈伊所解释的那样:

巴哈伊选举体系杜绝政党和派系的权力追逐和讨价还价,远离既得利益者的操纵。每位投票者按照自己的意愿

投票……在政党选举中，每位政治候选人的目的在于追逐权力，从而实施他们最支持的项目——这样，选举变成了一场竞争，那些极力推销自己的候选人只有两个结果，要么“赢”，要么“输”。全体选民被虚夸的言辞和各种形式的诱惑所左右，从而支持这个或者那个候选人。然而，在巴哈伊体系内，投票者是一股积极的力量，他们的目的是选出最适合服务管理机构的个人。那些入选的个人在选举过程中处于被动状态(他们作为投票人时除外)，并且将当选视作一项顺应选民意愿而服务社团的义务。换言之，这两类体系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一类是为了追逐权力，另一类是为了承担服务的责任。¹¹⁸

超过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这种非党派模式一直用于巴哈伊地方管理机构的年度选举——迄今为止，全世界共有 11000 个这样的地方管理机构。此外，这种相同的选举过程还存在一个包含两个阶段的形式，它用于巴哈伊社团国家层面管理机构的年度选举——迄今为止，全世界共有超过 180 个国家层面的管理机构(其中有数个社团的规模比一些小国家还大)。在这个包括两个阶段的选举过程中，由地方社团选举出各自的代表，再由这些代表选举出国家层面的管理机构。¹¹⁹最后，还有一个包括三个阶段的相同模式，它每五年用于全世界巴哈伊社团的国际管理机构的选举。在这个包括三个阶段的选举过程中，通过上文所述的“包含两个阶段的过程”而入选国家层面管理机构的社团成员，由他们作为代表选出这个国际管理机构。¹²⁰

巴哈伊在实践这种选举模式的过程中获得了广泛的经验，因此他们非常确信，假以时日，它可以适用于所有民主社会。确实，巴哈伊认为，当代社会必须采取非竞争和非党派的选举方式，从而选出他们可以托付决策权的人，否则，他们将无法应对自己所面临的那些不断复杂化的问题。¹²¹

有一点需要注意，巴哈伊同样认为，世界各国必须设置和选出一些国际机构，它们可以整合、协调和管理各个国家的集体行动——正如巴哈伊社团那样——否则，人类将无法有效应对当今面临的诸多全球问题。巴哈伊认为，这种困境也迫使人们认识到全球协作的紧迫性。¹²² 为此，在全球层面上，一种整合过程正在出现——那些有组织的民族国家的出现，即是出自这些类似的整合过程。¹²³ 他们指出，在一个世纪里，人类已经有两次试图建立新的世界秩序。¹²⁴ 然而，巴哈伊解释说，这两次努力在很大程度上都算不上成功，因为它们“认识到全球相互依存已经出现，但与此同时，那个将国家主权置于一切之上的体系，却没有丝毫改变”¹²⁵。巴哈伊称，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框架，它超越了那些过时的国家主权的概念。¹²⁶ 他们解释说，界团结，

是饱受忧患的人类所追求的目标。建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在国家主权的背后，无政府正在走向最顶端。一个趋于成熟的世界不能继续沉迷于建立国家，而是要认识到人类关系的同一性和整体性，并且建立大量能够最好体现这种基本生存原则的机构。¹²⁷

巴哈伊主张一种国际联邦或世界共同体的制度，它“将全人类的利益置于任何单个国家的利益之上”。¹²⁸ 他们称，这种体系必须包括某种形式的世界立法机构、世界法庭和世界执行机构，它们皆由所有国家的人们选举而出。¹²⁹ 在这种体系内，国家必须出让某些形式的主权，其中包括为战争目的而维持军备的权力。在这个方面，巴哈伊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主张构建一套集体安全体系，它要求所有国家共同组建一支国际部队，以阻止任何侵略行为的出现，同时也能缓解许多国家不断飙升的军费开支问题。¹³⁰

与此同时，巴哈伊也承认，在设置国际秩序的结构时，“必须格外注意该秩序以后不会沦为任何形式的专制、寡头政治和煽动组织”。¹³¹ 因此，巴哈伊表示，若要减少这种威胁，上文提到的集体决策和选举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巴哈伊相信，可以通过许多途径从结构上抑制历史上的诸多政治腐败趋势——即使不能完全消除——譬如，将管理视为服务与牺牲，而非权力竞争；选举时仅衡量候选人所表现出的政治品质、与人共事的能力以及献身集体福祉的决心；经常开展选举，这样一旦有需要，可方便地更换管理机构的成员；确保在决策过程中遵循某种原则性的方法，将多样性视为一种资源，将人权视为每个成员的信念等等。

另外，巴哈伊还主张制定相应的法律，将决策权授予最底层的群众——正如巴哈伊教务管理体制的情形一样。巴哈伊表示，这种体系可以促进和激励地方决策和基层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也

提供了一种权力机制，可以让全球层面的协作与管理成为可能。¹³²

巴哈伊在阐述这个主题时称：

需要明确和强调的是，任何新的全球管理机构，不管从原则还是从实用性方面，都必须确保决策职责被授予来自各种不同层面的群众。

然而，要想取得这种平衡并非易事。一方面，真正发展和进步的取得还要依赖人们自身，他们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应对他们所处时代和地域的具体问题与需求……另一方面，国际秩序很明显需要一定程度的全球指导与协调。

因此，本着上文所述的地方分权原则，对于那些国家无法独自处理，或者为了维护人们和成员国的权利而无法干涉的国际问题，可以将相应的权力交由国际机构。其他的所有事务则应该交由国家和地方机构处理。¹³³

不仅如此，巴哈伊还承认，在全球政治融合的同时还需要保护人们的文化认同。在这个方面，他们指出：

忠于一个较大存在体与忠于一个较小存在体，二者之间并不冲突。我们生活和工作在许多社会单位和机构环境之中，经常一个包含于另一个之中，二者相互补充且经常彼此支持。一个人爱国家并不会妨碍他爱自己的家庭或社团，相反，它还能够扩大他的关系圈。¹³⁴

因此，巴哈伊建议，现存的社会基础需要拓宽，使之不与任何正当的忠诚出现冲突。“那些将全世界民族和国家区分开来的因素，如种族、气候、历史、语言与传统、思想与习俗等方面的多样性”，他们坚称，“不能被忽视或者压制，相反，我们应该呼吁一种更广泛的忠诚，一个更宏大的追求”。¹³⁵ 这种忠诚应该献给整个人类，且其前提是认识到我们整个人类是相互依存的，正如上文所讨论的那样。

在这个方面，巴哈伊认为，由于认识到全人类是相互依存的，以及由这个认识而促生的更广泛的忠诚，已经开始为一种新兴的人权文化奠定基础。同时，这种文化也在成为一种越来越强大的手段，可以在各个层面遏制权力的滥施与误用。然而与此同时，他们承认人类在这个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步只是历史进程的一半另一半同样重要，即我们将遵循哪条轨迹进化下去。

在这个背景下，巴哈伊再次将上述所有策略——包括认识到全体人类的相互依存，采用非对抗的磋商方式，采取非党派的选举体系，构建一个内部协调的全球管理体系——视为长期的项目，唯有通过数代人的努力方能实现。不过，巴哈伊坚称，将这些项目付诸实践已经刻不容缓。因此，他们指出：

在本世纪，全球的物理联系大大增强，全人类的相互依存得到认可，因此，人类作为同一个种族的历史正在拉开序幕……在过往的年代，人类发展出了丰富的基因和文化多样性。今天，地球上的居民继承了这笔财富，而他们所

面临的挑战是利用这些集体遗产，自觉和系统地承担起勾画未来蓝图的责任。¹³⁶

4. 追求社会变革的策略

假定上文所描述的结构改革是可取的，但仍需要找到可行的策略才能实现它们。为此，巴哈伊社团同样也在寻求系统的社会变革策略。与巴哈伊主张的所有方法和实践一样，这些策略也是非对抗的。

结合本章和第一章的讨论，从历史上来说，社会变革策略通常要么关注心理结构的变革，要么关注社会结构的变革。¹³⁷在连续体的一端，许多人将个人意识的发展或转变视为一条有意义的社会变革途径。而关于这条途径的实践方法，有时是从提高批判意识出发，有时是从灌输美德教育出发，有时是从皈依信仰出发，还有时是从基本教育和技能培训（也就是识字和工作技能等）出发。所有这些情况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假设，即广泛的社会变革可以通过个人变革的积累而实现。

在连续体的另一端，许多人一直以来将基本社会结构的变革或转变视为一条有意义的社会变革途径。而关于这条途径的切入点，则包括经济结构（比如改革生产关系）、政治结构（比如选举改革），以及其他集体社会结构（比如媒体政策改革）。所有这些情况都包含一个共同的假设，即个人可以被他们所处的环境改造，因此，要想实现有意义的社会变革，则必须改变他们所处社会环境的构成方式。

关于这一点，巴哈伊相信，个人心理结构发展与集体社会结

构变革二者都是必要的，且缺一不可。因此，他们主张一种包含二者的双重变革过程。¹³⁸“由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互惠的”他们解释说，“现在必须在人类意识和社会组织结构这两个层面同时实现转变”。¹³⁹为了在这两个层面实现变革，巴哈伊追求着两种不同但却紧密相连的策略。

在个人层面，巴哈伊主要通过教育方法追求社会变革。他们称，“毫无疑问，教育是最有效的一种培养价值观、态度、行为和技能的方法，而这些价值观、态度、行为和技能又可以让教育在一个内部协调的世界中有效发挥作用”。¹⁴⁰在这个方面，巴哈伊当前在全世界开展了超过 1700 个社会与经济发展项目，其中有 750 多个属于教育项目。¹⁴¹譬如，这些项目包括在文盲比例较高的人群中开展非正式的识字教育，在缺乏基本教育设施的地区建立小学和中学，成立地方自主管理的农村大学，旨在发展当地所需的技术和能力。

不仅如此，巴哈伊还从个人道德和灵性发展的角度考量教育。因此，强调道德和灵性发展是巴哈伊家庭和社团生活模式的一个基本特征。在这个方面，巴哈伊致力于培养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和美德，比如诚信、慷慨和同情心，这些都是全世界道德哲学和宗教传统所共有的。¹⁴²他们还强调一些基本的概念，比如人类一体、远离偏见、认识多样性、世界公民等，他们认为这些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紧迫的道德和灵性要求。巴哈伊还遵循每日祈祷与冥思，以及每年一次的斋戒，这些被认为是个人灵性成长与发展的基本原则。

最后，巴哈伊社团目前还在发展一种地方分权化的“研习中心”体系，旨在为世界各地的社团工作培养人力资源。这些研习

中心的运作过程如下，即通过参与式的“学习小组”方式，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群众网络，学习小组的研习对象是一套系统的系列教材，而这套教材旨在培养个人品质，以及开发巴哈伊社团服务所需要的实际技能与自信。

与此同时，巴哈伊还追求一些社会结构变革的集体策略，以此配合这些个人教育、发展和培训策略。上文所描述的整个教务管理体制——包括非对抗的决策模式、非党派的选举模式和全球协调组织结构——并不仅仅是巴哈伊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构想。相反，在过去四分之三个世纪里，巴哈伊一直在积极构建这种教务管理体制，将其作为系统的结构变革的一部分。

在这一点上，巴哈伊认为他们的教务管理体制为他们提供了一套组织框架，他们可以借此进一步发展技术、能力和态度，而在这个越发相互依存和复杂的世界，他们认为这些技术、能力和态度是完成社会变革过程所必须的。¹⁴³ 巴哈伊承认，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具备教务管理体制所要求的那些磋商和组织技能。相反，他们将参与巴哈伊教务管理视为一种学习和完善这些技能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巴哈伊将他们的教务管理体制视作一种有助于培训非对抗决策和非党派组织的体制结构。

巴哈伊教务管理体制除了作为上述技能的培训场，它同时还负责将社团的努力导向具体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项目。从这个意义上说，巴哈伊学习磋商和组织技能并不仅仅是一项抽象的智力活动，然后这些技能只适用于遥远的未来。相反，这些技能正在应用于实际的群众活动。¹⁴⁴ 随着巴哈伊社团的规模和范围持续增长，这些活动的规模和范围也随之增长。

最后，通过建立教务管理体制，巴哈伊同样致力于创建一种明确的模式，即一种从根本上来说民主且完全非党派的模式。他们相信这种模式可以向世人展现其效用，为未来的人类事务管理提供一个参照模式。¹⁴⁵ 当然，巴哈伊承认，他们的教务管理体制仍处在一个长期和有机发展过程中的雏形阶段。¹⁴⁶ 然而他们非常有信心地认为，随着体制逐渐走向成熟，那些面对愈发棘手的问题却束手无策的社团必定会将他们的目光转向它。确实，随着巴哈伊社团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越来越多的外围观察者已经开始认识到这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模式。¹⁴⁷

通过所有这些方式，巴哈伊将同时追求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变作为社会变革的李生策略，这两种策略交织在巴哈伊社团生活的肌体之中。譬如，巴哈伊开展选举，选出那些拥有正直品质，乐意献身集体福祉的个人；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社团内推进个人教育与发展——特别是针对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和少年——以此培养这些品质。反过来，一方面，巴哈伊相信无私和超脱是实现道德或灵性发展的途径；另一方面，要想培养这些品质，从某种程度上说，需要投身巴哈伊教务管理体系内的服务之中。因此，个人发展是巴哈伊教务管理的基石，与此同时，巴哈伊教务管理是个人发展的培训场。

因此，巴哈伊追求一种迭代策略，它通过个人与集体的成长和发展的复杂互动而逐渐展现。由于巴哈伊坚持进化的观点，因此他们将长期投身于这个过程。巴哈伊在描述他们教务管理体制的策略性发展时解释说：

进化观意味着能够在一个长期框架内预想某种制度，认识到它内在的发展潜力，确定规约其发展的基本原则，制定高度有效的短期实施策略……¹⁴⁸

通过策略规划和长期献身，每一代新的巴哈伊在前人的集体智慧、经验和发展成果上进步。与此同时，从总体上来说，巴哈伊追求的社会变革策略是非对抗的。巴哈伊致力于构建一个全球教务管理体制，其目的并不在于对抗任何阶层或群体，也不是为了反对任何现存的政府、政策或项目。实际上，他们明确表示不参与任何形式的政党政治。¹⁴⁹相反，巴哈伊认为，那些脱胎于人类集体青春期的对抗性结构和实践由于不符合时代要求，正在走向衰败。因此，他们解释说：

如果那些被长期信奉的理想和历史悠久的制度，或者某些社会假定和宗教常规，已不能再促进人类大多数的福利，不能再适应不断演进之人类的需要，那就将它们清除并扔进过时与遗忘教义的故纸堆里。在一个受“不变则衰、不进则退”永恒法则支配的世界里，人类所设立的每一项制度都必然会逐渐失效，为何唯独上述这些可以例外呢？¹⁵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哈伊在当今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看到了两个并行的过程，即瓦解过程和整合过程。¹⁵¹一方面，他们看到那些沿袭至今的结构正在陷入腐败和无能的泥淖，它们已经无法应对当今时代的紧迫挑战，而它们本应服务的人群却在挫败和愤世中远离它们，不再支持它们；另一方面，他们看到，在这些逐渐衰败的结构之下，正在涌现出一批极富建设性的活动其方法

新颖，富有创造性，其推动力是一个不断扩大的群众网络——该网络由大量多样、真诚和具有远见的人们组成。

在策略的优先选择上，巴哈伊认为上文所描述的瓦解过程已不另需帮助，因为这些沿袭至今的结构由于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正在瓦解。若参与这些结构过程，则只会占用建设性策略的能量与资源。因此，巴哈伊将他们的全部重心转移到建设一些可行的结构上来，并使之与整合过程相结合。¹⁵² 按照巴哈伊的观点，他们正在建设的教务管理体制的结构与实践将会为这个整合过程提供重要的战略贡献。

5. 关于人性的假设

上文所述的方法和策略构成了巴哈伊规范性社会理论的关键构想。然而，所有的社会理论均是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之上，若不考察那些潜在的假设，则无法正确地评估这些社会理论。譬如，竞争文化的诸多理论便是基于如下假设，即人性从根本上来说是自私和野蛮的。遵照这种假设，当代的西方政府、经济和法律系统等，这种组织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自私自利的个人或群体之间的竞争服务的。

尽管巴哈伊承认人类具有自私与野蛮的可能，但是他们相信，人们同样具备合作与互惠的内在能力。巴哈伊认为人类拥有“低级”本性和“高级”本性，或曰“物质”本性和“精神”本性。¹⁵³ 在巴哈伊看来，前者是自私、野蛮本性与行为的全部表现，换言之，它就相当于一个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政治和经济存在，并且占据着当今大多数西方社会理论的核心地位。这种低级本性是巴哈伊思想的一个核心范畴。按照巴哈伊的解释，压迫

和剥削他人，正是这些态度和行为在个人与集体层面的表现。对于此类充斥于我们集体过去与现在的种种表现，巴哈伊绝不会视而不见。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认识到了这些表现巴哈伊才会按照他们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策略的要求，不断投入时间和精力。

另一方面，高级或精神本性同样也是巴哈伊思想的一个核心范畴。“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们来说”，巴哈伊指出：

人的本性包括灵性层面……这是无需证明的真理。这种对现实的认知可见于人类文明的最早记录，并且数千年来得到了所有大宗教的发展。它在法律、艺术和人际关系教化等方面所取得的不朽成就使人类历史更加充实而有意义，并且以不同形式影响着地球大部分人口的日常生活。正如当今世界各种事件清晰地显示，这种认知所唤起的渴望不单不能被扑灭，更具有无穷的潜能。

因此显而易见，任何促进人类进步的工作都必须设法调动起如此普遍而富有创造性的人的潜能。¹⁵⁴

在实践中，人性的精神层面可以作为一些超越狭隘自私的品质之来源。这些品质包括爱、同情、宽容、诚信、勇气、谦卑合作，以及愿为共同利益而牺牲——这些是文明公民所需具备的品质，它们可以构建一个团结的世界文明。¹⁵⁵

此外，巴哈伊认为这些能力不仅仅限于个人表现，它们还具有集体表现。¹⁵⁶因此，巴哈伊解释说，普选制或废除奴隶制的成就，

诸如此类的成就并不仅仅代表着那些历史上竞争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变迁，而且还是历史上统治集团的能力——放下他们狭隘的眼前利益，让位于整个人类的广泛和长期利益——的集体表现。

在这个方面，巴哈伊指出了文化环境在实现这些互惠能力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毫无疑问，巴哈伊相信个人的意志和努力也会发挥作用，但是他们同时认为，与对抗主义一样，互惠主义可以通过我们文化环境中的社会结构而得以培养或遭到压制。¹⁵⁷ 尽管我们的基因遗传同时赋予了我们自私和合作的能力，但是巴哈伊认为，在人类事务中，二者谁占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文化环境。此外，由于巴哈伊认为人类文化是一个有机的进化过程，它们在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和压力时，要么适应要么消亡。因此他们相信，要想遏制自私和野蛮的冲动，同时培养互惠与合作，这背后需要某种进化力量的支撑。¹⁵⁸ 随着人类社会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不断增加，以及个人利益与不断扩展的社会群体之利益变得息息相关，巴哈伊认为，人类现在正面临一个紧迫的问题，即他们迫切需要拓宽合作与互惠关系领域。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巴哈伊并不认为早期的人类社会比复杂的现代社会更加自私和野蛮，他们只是说，由于早期人类社会机构相对简单，社会群体之间相对疏远，因此他们的互惠与合作的领域也相对受限。随着社会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不断增加，其成员必须培养一种更加广泛的身份感和融入感，并拓展社会融合的结构——不管这些结构多么不完善。¹⁵⁹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尽管迄今为止所有形式的社会组织都划定了某些界限，以区分其内部成员与外部成员，但是巴哈相

信，在一个全球相互依存不断增强的时代，这种界限将不复存在。在以前，氏族、部落、城邦和国家可以发展出相对互惠与合作的内部关系，同时与其他氏族、部落、城邦和国家保持相对竞争或对抗的关系。然而，在一个全球相互依存的社团内，没有“其他人”存在。这正是人类所面临的进化压力实现质变的一个转折点。按照巴哈伊的观点，这是“在各个层面培养合作与协调”的必要条件，“其程度超过人类的任何集体经验”¹⁶⁰——“它是当今社会结构的一个有机转变……这个世界还从未有过（如此转变）”。¹⁶¹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基于一个潜在的假设，即人们实际上具有互惠与合作的能力。尽管许多批评家对该假设持怀疑态度，但是巴哈伊（以及其他许多人士）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中看到了这种能力的迹象——比如人类历史的总体轨迹是朝着越来越庞大、复杂和相互依存的社会群体发展；又如，我们已经有能力进行广泛的社会融合，并从中反思和学习成败经验。这些能力的迹象还体现在，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有无数个人反对人类本性必然自私与野蛮的观点，他们恪守着一种自我奉献、富于同情心与慷慨的生活方式。最后，巴哈伊还从他们自己的社团经验中看到了这种能力的迹象。他们指出，“它的存在向那些盛行的人性理论发起了冲击，为创造一种和平的生活方式描绘了一幅愿景”。¹⁶²

虽然巴哈伊借用了低级（物质）本性和高级（精神）本性这个比喻，以此为一个更加和平与合作的社会存在提供愿景，但是巴哈伊谴责历史上将类似区分用于压迫目的的做法。譬如，在些男权社会，这种区分将女性置于从属于男性的地位，认为女性生来就

只有低级或更加物质的本性，而男性则生来具有高级或更加精神的本性。¹⁶³ 诸如此类的说法与巴哈伊信仰格格不入，巴哈伊信仰明确提出了性别平等的原则，彻底反对此等谬论。¹⁶⁴

有一点需要注意，一些克己和禁欲传统也借用了这种区分以此证明人体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纯洁”或不道德的，所有尘世或身体愉悦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有罪的”。确实，独身主义和禁欲主义的涌现，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那些厌恶女性的态度与此类观念（比如，女性身体被视为尘世诱惑和肉体愉悦的主要来源，男性为了精神发展必须远离之）的共同作用。在有些文化中，这些观念还滋生出了自虐以及其他肉体惩罚方式。因此，在此须再次强调，这类观念与巴哈伊关于人类本性与身体的理解完全相悖巴哈伊所作的高级与低级本性之区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贬低人类的身体，认为它不道德或者不纯洁。相反，巴哈伊认为人体是人类心智发展的积极载体。¹⁶⁵ 因此，我们必须关照和尊敬它使之有尊严。¹⁶⁶ 另外，巴哈伊认为，享受身体的感官愉悦必须遵循适度原则，要以他人的福祉为考量标准。¹⁶⁷

6. 巴哈伊社团经验

毫无疑问，关于人性的假设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解决方案最终不能凭空进行评估，还必须将它们放入现实世界以考量它们的应用情况。幸运的是，巴哈伊社团经验为这种考量提供了机会。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将巴哈伊社团看作是一场社会实验，它正在验证上述关于人性和社会组织之假设。当然，这场实验的时间将会跨越许多代人，其最终结果现在还无法定论。不过，我们可以根据巴哈伊社团迄今为止的经验做一些初步的观察。

为此目的，我根据自己在巴哈伊社团历时二十年的参与式观察，给出了以下初步评估。在这二十年中，我针对三个大洲四个国家的大量社团进行了观察，还参与了数个经选举产生的巴哈伊管理机构，以及一系列巴哈伊倡导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项目。最后，我还在以色列海法的巴哈伊世界中心进行了为期十八个月的志愿者服务。

通过这些观察可以看出，不同的巴哈伊对各种原则和实践的理解程度差异巨大，而且他们对社团工作的时间与精力投入也各不相同。此外，他们在超越各自固有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和习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大小不一。不过总体来说，巴哈伊话语似乎是个人的动力源泉——它激励人们作出巨大的奉献与牺牲。我与无数巴哈伊相互认识、共同工作，他们在这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巴哈伊响应各自社团的号召，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服务那些管理机构。随着巴哈伊社团工作不断增加——特别是在全国和国际层面上——这更加意味着个人需要放弃自己的事业、家庭甚至要离开自己的祖国，主动在一个相对默默无闻的岗位上服务，且时间通常达数年之久。

除了服务人选岗位，成百上千巴哈伊还放弃了相对舒适的物质生活，加入全世界的巴哈伊项目和活动。对于那些成千上万的更多无法直接参与这些活动的人，他们自愿捐赠自己收入的一部分，以此支持巴哈伊社团的工作。他们此举既不争个人名利，也不图物质回报。如此，巴哈伊社团的经验可以理解为一段个人奉

献的历史，同时抨击了人类无可救药般自私的观念。事实上，自巴哈伊社团诞生之日起，已经有超过两万名成员在残酷的迫害面前，坚守巴哈伊信念，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¹⁶⁸从以上方面可以看出，尽管全世界的巴哈伊社团仍处于发展的形成阶段，但是它迄今为止所积累的经验表明，个人确实可以超越狭隘的自我利益，并将重心转向大众利益

巴哈伊社团的经验还展示了非对抗社会结构与实践的效用、当然，在全球巴哈伊社团发展的形成阶段，不同的巴哈伊社团在学习和实践非对抗集体决策，以及与此相伴的非对抗的权力与权威结构时，它们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大小不一的。因此，对于不同社团，其协调能力与遵循集体决策的能力也是差异甚大；一方面，许多新生社团连简单的每月聚会都难以组织，更不用说年度选举了；另一方面，更多成熟的社团由于组织有序，在社会进步方面取得的成果丰硕，因此获得了公众的注意与尊重。相关的例子将会在下文予以讨论。¹⁶⁹

即使在巴哈伊社团发展的形成阶段，巴哈伊教务管理的体系与实践也开始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它们与世界上许多地方习以为常的分裂和党派的民主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譬如，我在以色列海法工作时，适逢1988年巴哈伊大会召开，我目睹了一千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齐聚一处，参加巴哈伊社团国际管理机构的选举。这次选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代表就像人类的一个缩影，其中包括来自各大洲的原住民，甚至有些人还不识字。这场大会的氛围格外震撼人心。与那些充斥着演说、标语权力角逐和哗众取宠的竞争式选举大会不同，巴哈伊大会在一种庄重、虔

诚和冷静的氛围下进行。大会过程中没有拉拢、提名或竞选的情况出现，所有代表秉持服务和谦卑的精神执行自己的使命。更严格的是，上一届的世界正义院成员为了避免人们误以为他们有连任的意图，他们在投票环节之前不公开露面。选举结果宣布后，也没有任何胜选演说或者庆祝活动。

选举结束后，所有与会代表在一种相互鼓励和尊重的氛围下，就全球社团的事务进行共同磋商。在整个磋商过程中，他们坦诚和公开地表达自己的建议与担忧，没有丝毫党派作风或者自我宣扬。在这些正式磋商之余，代表们轻松随意地交流，相互表达关爱与友谊——这些关爱与友谊超越了种族、阶层和性别等方面的差异。

当然，巴哈伊国际大会是巴哈伊教务管理原则相对成熟的表现。然而，即便在地方层面，这些原则也能有效协调各种社团事务，将人们的精力导向诸多社会发展和改革项目。由于巴哈伊教务管理是非党派和非竞争的，因此可以吸引广泛的人群参与其中——否则，人们就不会或者不能参加(党派)管理和决策过程。这样的话，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成千上万的人们逐渐习得一些技能，可以帮助他们组织群众，进行集体决策，开展集体活动。

这些技能最明显的体现，可见于在基层群众中兴起的巴哈伊社会与经济发展活动。与许多国际“发展”机构不同(它们的项目多是由上层决策者规划和设计，然后强加给目标群众，而这些目标群众仅仅被视为外来援助或支持的被动接受者)，巴哈伊发展项目是由当地或地区社团倡导和支持的，他们通过集体磋商确

定他们的发展重点，然后制定相应的实施策略。¹⁷⁰ 与此同时由于巴哈伊社团是一个综合的全球社团，其机构非常便于联络交流和集体学习，因此，一旦某些活动在某个社团显示出了效用，其他社团通常会根据各自的具体需求与情况予以借鉴。

譬如，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巴哈伊就认识到，促进妇女平等是社会与经济持久发展的关键之一。确实，巴哈伊认为，如果某个家庭无法让所有孩子接受教育，那么应该让女孩优先接受教育，因为这能够对家庭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与福利产生最大和最深远的影响。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¹⁷¹ 为了遵循这个原则，全世界的巴哈伊社团长期以来致力于提升女性的地位。¹⁷² 此外，他们最近还开始与一些志同道合的社团和机构合作，共同为此目标努力。举例来说，在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的支持下，巴哈伊借助传统媒体，比如乡村剧院、歌舞等，一起探讨某些主题，比如女孩教育的重要性、夫妻磋商的重要性，以及在抚养孩子、资金管理和家务劳动方面进行全面合作的价值等。¹⁷³ 迄今为止，巴哈伊已经在三个大洲至少五个国家的数十个乡村开展了类似的项目。

在以上所有这些项目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均致力于建设当地机构(比如经选举产生的巴哈伊管理机构)能力，且不论男女皆可参与其中。所有参与者利用各种分析手段和数据收集工具，通过巴哈伊磋商过程，共同分析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分析结果则通过大家熟悉和亲近的传统媒介与全体社团分享。另外，这些项目的关注点在于发展技能和改变态度，而非提供物质资源和服务。朝着这些目标出发，这些项目不管是从事实报道还是数据统计上看，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一些已经开展了这些项目

的乡村，男性开始承担家务劳动，夫妻开始共同磋商家庭财务和其他决定，女性可以更大程度地参与社团决策，女孩和妇女获得了更多的教育和识字培训的机会——所有这些非但没有疏远男性，反而让他们参与其中。¹⁷⁴

与此同时，如果只关注以上这些特定的项目，则很容易忽视整个巴哈伊社团所取得的更广泛的成就。真正有意义的发展须包括技能、态度和能力的发展，而不仅仅是提供物资或服务，因此，可以将整个巴哈伊社团的经验看作一个全面的全球发展项目，且当今有超过五百万人正在通过这个项目发展此类技能、态度和能力。从历史上看，置身于这个更加广阔项目内的巴哈伊社团，各自正以不同的速度走过一系列预定的发展阶段。根据我的经验，新生巴哈伊社团多是在努力组织简单的定期聚会和活动以及如何就一些简单的社团事务进行非正式磋商。一旦社团成员的数目扩大，足以选举出一个管理机构，他们则会努力掌握巴哈伊选举流程，了解这些管理机构对于更加正式的磋商之要求。掌握了这些基本技能之后，巴哈伊管理机构通常会将重点转向在社团建立团结与友爱的纽带，培养他们与自己社团成员定期磋商所需的技能。一旦进入这个发展阶段，巴哈伊社团通常会将重点转向在社团内开展基础教育项目，帮助儿童和成人深化他们对巴哈伊概念与实践的理解。接着，在了解了这些基本的运作之后，巴哈伊社团通常会将重心转向他们所生活的更广大社团的社会与经济需求中去。

近些年，随着巴哈伊“研习中心”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上文所述的发展进程似乎加快了——尽管它的表现在不同地区略有不

同。在许多地区，一些新生的社团在自己或者邻近社团协助者的帮助下，甚至早在管理机构被选举出来之前便组建了学习小组。这些学习小组反过来引导巴哈伊开展各种核心活动，加速社团的成长与发展——同时最大程度提升他们的能力，从而为身边更阔社团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迄今为止，进入最后这个发展阶段的巴哈伊社团已经在全世界开展了大量实实在在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项目。譬如，这些项目包括在那些缺乏基础教育服务的社区建立辅导学校和开设识字课程，在资金匮乏的社团组建小额信贷合作社，为那些历来无法接触大众传播媒介的人群开设本土社区电台，在城市高等教育覆盖不力的地区建立地方分权化的农村大学。所有这些活动都发端于本土或地区的确切需求与重点事务，汇集了本土或地区可利用的资源——特别是巴哈伊社团稳步成长中历经数代而逐渐培养起来的人力资源。因此，虽然外部观察者可能认为，只有这些可见的活动才是“发展项目”，但是，整个社团建设过程（这些活动的开展与实现皆缘起于它）同样也是一种发展。确实，许多外部发展“专家”逐渐认识到，这种长期的社团建设过程是可持续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另外，由于巴哈伊社团最终的全球目标是基于团结和相互依存原则，建立一套新的社会秩序，因此，巴哈伊发展策略的最终实现程度也取决于整个巴哈伊社团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这些原则。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巴哈伊社团已经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成功模式。尽管在其发展的形成阶段，它不断经历各种成长的烦恼，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它所取得的团结堪称其最显著的成就譬

如，在地方层面，这种团结在集体实践中得到了正式表现——该集体实践鼓励多样性，并将其视为集体问题解决的资源。在一些不太正式的场合，这种团结也可见于巴哈伊社团内不同背景人们之间所培养催生的无数友谊、联姻和合作关系。

在全球层面，团结原则通过包容、融合和协调的巴哈伊社团结构，以及激励这种团结的精神中得以表现。这种精神可清楚地见于 1992 年在纽约市举办的第二届巴哈伊世界大会。在此次大会中，超过三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巴哈伊社团成员齐聚一处，其共同回顾过去一个世纪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为接下来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作好准备。大会全面展现了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多样性，见证了整个人类的团结潜力。大会反思了一个世纪以来，社团在一个完全非对抗的参照框架内的组织与发展情况。这种参照框架及其立足之本的“圣约”是巴哈伊社团能够始终保持团结，同时避免拉帮结派或分裂(事实上，历史上多半社会运动和宗教团体都难逃此劫)的主要原因之一。¹⁷⁵

最后，巴哈伊社团经验还可以让我们瞥见非对抗策略和承诺的效用——即使是在遭受直接压迫，或者人权受到粗暴侵犯的状况之下。在这一点上，伊朗巴哈伊社团的经验特别值得一提。自 19 世纪中期巴哈伊信仰诞生以来，伊朗巴哈伊社团就遭受了一波又一波的迫害浪潮。为了将新生的社团扼杀在摇篮之中，其结果是上千伊朗巴哈伊丧失了性命，信仰创始人遭受终生的关押与流放。从那时起，残暴的迫害就不断出现，最近的一次就是 1979 年的伊斯兰革命，其领导人再次宣称要根除巴哈伊社团。¹⁷⁶

尽管遭受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迫害，伊朗巴哈伊仍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譬如，在一个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中，女性被当作则产，或者仅仅是生殖工具，她们实际上沦为了家庭囚犯，人们认为她们不值得接受教育。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中，巴哈伊最先摘下了她们头上的面纱，宣称男女完全平等，并开始将这项原则付诸实践。除此之外，巴哈伊还在伊朗建立了第一座女子学校。这些学校不仅面向巴哈伊，还向所有背景的人们开放。确实，这些学校培养了伊朗第一代职业女性，她们的影响力已经波及整个社会。¹⁷⁷

巴哈伊社团内部也格外强调促进女性的进步。与那些盛行的文化规范不同，在巴哈伊社团运作过程中，女性并不与男性分离开来。女性与男性一起在巴哈伊机构和委员会工作，这样，她们掌握了宝贵的技能，同时在巴哈伊社团中获得了无价的尊严和成就感。截至 1974 年，40 岁以下巴哈伊女性的识字比例已达 100%，而全国女性的平均比例仅为 15%。¹⁷⁸ 反过来，促进妇女进步也推动着整个伊朗巴哈伊社团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许多“发展”专家直到现在才开始认识到的另一种原动力。

伊朗巴哈伊的另一项成就可见于他们对 1979 年伊斯兰革命之后复燃的迫害的具体反应。革命爆发后，伊朗当局对巴哈伊社团发起了全面突袭。巴哈伊被当众殴打，他们的生意被没收或破坏，他们的家园被掠夺或焚毁，许多当选领袖遭到折磨和处死巴哈伊婚姻被宣布为卖淫行为，违者可处以死刑。巴哈伊学生被驱

逐出大学。不仅如此，当局还颁布了一项“报复法”，按照这项法律，任何针对巴哈伊的犯罪皆可豁免。¹⁷⁹

巴哈伊社团待在伊朗没有法律保障，离开伊朗也没有法律途径(当局拒绝向巴哈伊签发护照)，因此，他们能做的只有记录下他们所遭受的暴行，同时与其他国家的巴哈伊社团交流受到压迫的详细情况。于是，其他国家的巴哈伊社团发起了一项全球协作运动，告知全世界的政府、媒体和其他思想领袖有关这场迫害的情形。巴哈伊组建了一个非正式的保护与支持网络，还为受压迫者的孩子们提供非正式的家庭学校。与此同时，随着伊朗境内的巴哈伊找到了一些创造性的生存和发展方式，这场旨在教育各国政府和其他领袖的国际运动也开始显现成果。世界范围的国会和议会，还包括联合国，均谴责这种粗暴践踏人权的行为，并向伊朗施压，要求停止迫害巴哈伊。迫于这些压力，这种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开始逐渐减少。虽然伊朗巴哈伊今天的处境仍不安全，但是关乎巴哈伊社团存亡的威胁实际上已经远去，针对巴哈伊的迫害也几乎绝迹。¹⁸⁰

除了社团成功存活，这场最新的迫害浪潮还给伊朗以及全世界的巴哈伊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伊朗境内，这场经历更加坚定了许多巴哈伊的信念。此外，他们的非暴力应对方式也赢得了伊朗许多温和与进步社团(巴哈伊坚信，这些社团代表着那个社会的未来)的同情和赞赏。伊朗境外，这场因这些迫害而发起的全球外事运动也催生了两个同等重要的发展。第一，它培养了全球协作行动的新能力，标志着巴哈伊国际社团进入一个新的成熟阶段。如今，这些能力正被应用在一些新的全球运动中，比如人权

运动、女性进步运动、扫盲运动、发展运动等。第二，它让巴哈伊社团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其历史、信念和成就开始吸引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在巴哈伊社团逐渐走进人们视野的过程中，它吸引全世界人们的同情与支持，人们越来越熟悉它的基本原则和实践，并深受吸引。

通过所有这些方式，巴哈伊面对迫害和压迫所采取的非对抗反应，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有别于暴力抵抗和对立的有效途径。当然，逾两百人在伊朗这场最新的迫害浪潮中丧失性命，但是如果巴哈伊采取暴力或非法抗议的方式对抗当局（当时当局搜寻一切借口为迫害正名，并试图加快迫害进程），那么死亡人数将远远超过这个数目。相反，巴哈伊的这种反应加快了新的内部能力的发展，并迅速赢得了广泛的外部认可——其速度之快，许多巴哈伊在迫害开始之时根本不敢想象。此外，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巴哈伊对于他们这种非对抗的社会变革策略之效用也获得了许多宝贵的见解。

总而言之，巴哈伊社团可以被视为一场广泛的社会实验，它旨在验证本章开头所述的人性、社会组织和社会变革之假设。虽然这场实验的最终结果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迄今为止巴哈伊社团的经验得出一些初步结论。首先，巴哈伊努力将个人的眼前利益服从于整个社会的长期利益，虽然他们在此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功多寡不一，但是巴哈伊社团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段个人牺牲与献身集体利益的历史。就这段历史本身来说，它向人性不可救药般自私和野蛮这个假设提出了重大挑战。另外，每个巴哈伊社团努力以集体的方式学习和应用非对抗的集体决策以及

与之相伴的非对抗的权力和权威结构。虽然它们在此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功多少不等，但是巴哈伊社团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朝着这些目标取得了巨大进步。即使在这个发展的形成阶段，巴哈伊教务管理的结构和实践也已经与那些分裂和党派模式(这些模式在世界大多数地区已经成为民主的代名词)形成了鲜明对比。其次，事实证明，这些非对抗的结构和实践在协调各种全球社团的事务，以及在将其精力导向大量社会发展与改革项目方面，具有高度效用。最后，通过追求非对抗的社会变革策略，巴哈伊向世人展示了那些有别于暴力和对抗的新途径所具备的效用——即便是在遭受直接迫害和压迫的情况下。面对人权遭到粗暴践踏巴哈伊社团所采取的非对抗策略不但促进了自身的飞速发展，而且赢得了外部认可。

第六章 超越竞争文化

虽然本书的分析相对冗长且复杂，但我们可将其提炼成五个简明的理论命题：

①人类同时具备对抗和互惠行为的潜能。

②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这两种潜力，受到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的影响。

③西方自由社会以竞争文化为特征，这种竞争文化的基石乃是规范性对抗主义的假设(即竞争是一种正常和必要的社会组织模式)。

④尽管对抗的方法与实践并不一定在所有的环境下都会引发问题，但是它们在西方自由社会中无处不在，甚至泛滥，结果造成了社会不公和生态不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表现，对抗主义规范已不适合当今的文化。

⑤这些不恰当的规范为何能久居历史而不消失，霸权

理论可以提供答案:对抗主义规范主要服务特权人群的利益,他们主宰着人类事务,同时利用社会地位之便继续加强这些规范(不管他们是否有意识或故意为之),将其作为一种文化常识。

这些理论命题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首先,它们指出了一系列有待改革的社会结构与实践,但是在今天的竞争文化中,这些社会结构与实践却被认为是正常和不可避免的。关于这些社会结构与实践,本书第三章中已有讨论。上述命题同样表明,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民族主义和竞争性物质主义等,其结构与实践(这些都是过去一个世纪社会改革的对象)都是同一个基本结构的相关表现——也就是规范对抗主义,它几乎影响着现代公共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对于所有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秩序的人们来说,这个基本结构应该成为他们的首要关注对象。

此外,这些命题对社会变革的策略也提出了重要的质疑。如果规范性对抗主义主要服务于那些主宰人类事务的特权集团,那么对抗的社会变革策略最终可能会阻碍社会正义这个长期追求但是这并不是说,对抗策略从未有过结果。相反,在竞争文化这个大背景下,对抗的社会变革策略——或者抗议文化——的效用正在递减。抗议、示威、党派政治组织、诉讼、罢工、公民的不服从,以及其他对抗策略,或许能在各自领域偶尔打赢几场“战役”,可是它们同时也纵容了对抗主义基本规范的继续存在,而这些基本规范才是建设一个更加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的最大

障碍。不仅如此，这些对抗策略有意将社会变革的精力导向更加青睐权力的社会群体，因而分散了本应用于那些更具建设性的策略的精力。因此，在竞争文化这个大背景下，抗议文化或许会使社会改革家长期处于不利地位。

既然我们无法通过抗议文化改造竞争文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实现社会变革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思维方式必须发生彻底转变。为了实现这个转变，我们可以思考“文化博弈”这个比喻。可以将文化制度理解成“博弈”概念，它必须根据一套具体的“规则”进行运作。这个比喻尤其适合思考三方竞争体系及其变革或改造策略。

在竞争文化中，几乎每项制度，或曰文化博弈，都遵循一套竞争规则。这些规则不仅确保有赢家、有输家，还确保最强大的选手最有可能赢得比赛。当不太强大的选手同意加入这些博中，也就等同于他们愿意遵守这些规则，而这只会加速他们的失败。对抗的社会变革策略，比如抗议，与这些竞争规则是一致的。它们不仅强化这些旧博弈的正当性，而且它们本身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同样，它们也确保最强大的选手最有可能获胜。

这个见解为社会改革家提出了诸多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避开抗议、示威、党派组织、诉讼和其他对抗策略而实现社会变革？有没有其他的社会变革策略？对抗难道不是实现真正社会变革的唯一途径吗？

关于前两个问题，本书已经讨论了一系列非对抗策略，可以从中寻找答案。这些策略包括教育与意识觉醒、培养新的价值观和态度、建设新的社会实践模式等（诸如此类的策略可见第四、

五章的讨论)。然而,从广义上讲,这种替代性策略是将旧博中的时间和精力转移到新博弈的建设中去。旧博弈(也就是三方竞争体系以及其他不断强化的社会制度)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其原因在于绝大多数人认同这些规则。如果新博开始产生明显的效果(也就是社会正义与环境可持续性不断增加),那么它们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也就是旧博弈已经不再符合大多数人的兴趣和价值观)。如果有足够的人摒弃旧规则,遵守新规则那么旧博弈就会走向尽头,但不是通过战争或抗议,而是通过自然消减的方式(也就是通过简单的舍弃方式)。这种替代性策略采用的就是建设、吸引和消解的方法。此外,这种策略还是完全非对抗的。它调和了社会变革的途径与社会变革的目的二者之间的矛盾。

乍一看,这似乎是一种幼稚的避重就轻的行为,不愿为社会变革付出必需的辛勤劳动,但是,这种文化博弈模式指出,事实恰好相反。奉行对抗的社会变革策略的活动家正在同意遵守那些会加速他们失败的规则,这就是竞争文化的霸权之体现。即便那些为社会变革而抗议和斗争的人,他们实际上也没有脱离它的霸权疆域。然而,与竞争文化中的“常识”截然不同的是,社会变革并不要求人们通过对抗的手段打倒压迫者,或者击败对手。它也不要求人们攻击那些从旧规则中获利最多的人。相反,它要求我们认识到旧的竞争和对抗博弈的霸权本质,同时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从中抽离出来,然后转移到新博弈的建设中去。

关于最后一点,越来越多的人对此开始有了敏锐的认识。第四、五章所讨论的每个例证都是对这个问题的说明。试想一下第

四章提及的经济合作运动，纵观全球，各种人群都在逐渐意识到，通过各种合作性经济模式，他们的价值观和利益能够得到更好的满足。从经济的供给方来说，工人合作社和小额信贷合作社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因为许多之前遭受剥削的技工、手艺人小型农户以及其他人群开始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减少中间交易环节的费用，同时更多利用他们之前无法接触的信贷、资本和市场，以此追求他们的共同利益。¹同样，从经济的需求方来说消费合作者正在兴起，因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符合社会责任的批量采购追求他们的共同利益。²即便在传统的资本主义企业内，利润分享模式也逐渐盛行起来，因为企业主开始认识到他们与工人之间根本的相互依存关系。

然而，这并不是说未来的经济将会或者必须仅仅遵循所有这些合作原则。如前所述，在一个合理而有序的经济体中，那些奖励勤劳、创新和效率的市场原则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上面的例子只是表明，我们可以通过增加合作活动和增强合作关系的方式使我们的经济有所改观。最重要的是，这些例子表明，经济改革可以通过非对抗的方式——或曰文化博弈的方式——得以实现。

当然，如果第三章所述的三方体系论题是正确的，那么我们面临的主要制度挑战则不再是改革自由市场体系，而是改革我们的法律和政治体系，从而以一种更加公正和可持续的方式调控市场。自由市场本身不是问题，这里的问题在于，在三方竞争体系这个大背景下，市场在结构上主宰着政治和法律体系。

可喜的是，非对抗的社会变革途径同样可见于法律和政治领

域。第四章所讨论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很好地阐述了非对抗的变革途径在法律领域中的应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代表着一种新博弈的问世，它遵循一套非对抗规则，而这些规则可以说完全诞生于一种对抗的法律体系（这种法律体系正在疏远越来越多的人）的环境之中。但是，它的成功并不是依靠“打败”法律对抗体系或者从中获利者。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只是选择退出这个旧博弈，转而加入一个新游戏，因为他们认识到后者更加符合他们的价值观和利益。这些人群不仅包括冲突双方，还包括许多律师和法官，他们认识到法律对抗体系所要付出的高昂经济、情感和道德代价，并且它在许多纠纷中并不适用。

即使在政治领域，非党派选举和决策模式的实验也开始兴起，它们采用非对抗的社会变革策略。当然，在这些实例中，大多数仍处于许多政治观察家的视野之外，这是因为非政府组织而非政府是这方面的主角。不过，这些新兴的模式构成了一些重要的社会政治实验，可供我们好好观察和学习。

第五章所讨论的巴哈伊社团经验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巴哈伊社团是整个人类的一个缩影，它通过一套经选举产生的管理机构来负责其内部事务。这些管理机构不仅是民主的，而且是完全非党派和非竞争的。然而与这个讨论最相关的是，巴哈伊是如何实施这套体系，他们是如何将它纳入更广阔的社会变革框架中的。巴哈伊认为，在当今这个全球依存不断增强的时代，党派统治模式不仅不合时宜，而且问题百出。不过，巴哈伊并不是在抗议或者攻击现存的政党体系。相反，他们服从所有他们所生活于其下的政府，他们也会在那些提供选举机会的社会中履行他们的

公民选举权。巴哈伊避免积极参与党派政治，转而将精力投入到替代性民主管理体系的建设中去，为他人提供一种可供研究和学习的模式。随着巴哈伊社团的能力与声望日增，它确实吸引了外部观察者的注意，比如联合国认为这种体系或许是单一民族国家可以效仿的对象。³

除了这些正式的体制领域，社会变革的文化博弈途径同样可见于其他许多社会实践领域。女性主义学者福斯和格里芬声称她们的邀请式修辞模式(见第四章)的策略基础是退出现存的争论博弈，创建一种更具吸引力的替代博弈。用她们的话来说：

虽然邀请式修辞并不是为了引发某种具体的变革，比如改造压迫体系，使之重视和培养个人，但是它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创建了一种替代体系……展示了这种替代体系的样貌，以及如何运作。因此邀请式修辞能够改造压迫体系，正是因为它跳出了这个压迫体系。⁴

反过来，这些例子也解答了上文提到的第三个问题：对抗难道不是实现真正社会变革的唯一途径吗？这些例子表明，非对抗的社会变革策略确实存在，或许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罢了。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些策略通常不被人注意，也没有人认为它们是社会变革策略。我们很少在历史书本中读到它们，因为它们通常缺乏传统叙事剧的一些要素。我们在商业媒体中很少听到它们，因为它们缺乏“新闻价值”所需的偏激与冲突。同

样，我们甚至很少在一些具有社会变革头脑的学者著作中读到它们，因为这些策略与对抗的社会变革模式(许多学者受其教育的影响，他们“预想”的都是对抗的社会变革模式)背道而驰。

历代以来，全世界无数人默默地为建设性的社会变革付出努力，然而他们的努力却很少在社会变革记录中被提及，因为它们在对抗主义话语中几乎是隐形的。但是很明显，对抗性斗争并不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唯一途径。实际上，如果我们阅读一个真正的社会变革记录就会发现，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内，有意义的社会变革主要是通过非对抗的方式实现的，而对抗策略占用了人类的大量精力，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取得长久成果的却寥寥无几。此外，如果本书的分析正确，那么在这个社会与生态相互依存不断增强的时代，对抗策略已经走到了效用递减的边缘，而非对抗策略正在兴起，成为持久的社会变革的最有效方法。

基于这种逻辑，我们可以在本章开始提到的五个理论命题之后再增加两个：

6.竞争文化的社会不公和生态不可持续之本质在其内部滋生了一种抗议文化。然而，作为一种社会变革策略，这种抗议文化已经走到了效用递减的边缘，因为它认可和强化了对抗主义的规范，而这些规范正是盛行的竞争文化之基石。

7.在这个相互依存不断增强的时代，社会变革可以通过一种非对抗方式更加有效地实现，也就是将时间和精力从

旧的文化模式转移到更加公正和可持续的新模式的建设中去。随着旧模式不断衰落(不是通过战争或者抗议,而是通过自然消减),这种新模式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

一、回应质疑

毫无疑问,如果从竞争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以上所有命题都值得怀疑。按照这个角度,它们都显得不“真实”,因为它们与竞争文化所产生的“现实”格格不入。因此,在竞争文化这个环境中,上文所述的非对抗方法看起来既幼稚又不实用,甚至具有压迫性,因为它们与该文化中培养起来的常识不相调和。

譬如,竞争文化搬出“人性不可救药般自私和野蛮”这个证据,如此一来,我们似乎真的需要将绝大多数社会互动转化成理性竞争,以此控制和约束这些冲动。基于这个明显的证据,非对抗方法不仅显得不切实际,而且很容易受到自私动机和操纵的伤害(西方自由体制声称这些正是它们所要控制和约束的)。另一方面,即便在竞争文化内部,也出现了大量的“异常”,这表明人们同样具备互惠与合作的能力。尽管前一种观点已经深深扎根于西方自由社会,后一种观点在当代也正获得大量拥趸,其中包括人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有名望的学者。⁵

毫无疑问,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很难实际验证哪一个观点更加有效。我们面临着两组相互竞争却又难以验证的人性和文化假说。不过,本书的分析建议,批判地重新审视当下盛行的假说,并且开始系统地试验非对抗的社会结构与实践,这起码是符合我们最广泛的集体利益的。

或许有人会对这个建议提出质疑，他们警告说，要警惕将“和谐模式”“有机说”“共识修辞”以及其他声称非对抗的概念用于压迫目的。⁶正如第五章所承认的那样，在历史上，共识与有机的社会概念确实被特权社会群体借用，以此营造一种虚假的和谐气氛，从而满足他们的自我利益。这样，这些有机比喻和共识修辞被用来扼杀多样性，压制人权，维持社会关系现状。

鉴于这种认识，许多人坚称冲突比虚假或强加的共识更可取，因此，要想改造这种压迫的社会秩序，对抗行为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与“理性辩论比暴力或战争更可取”的说法一样，这个说法实际上为人们呈现了一种错误的选择，因为它掩盖了其他一些选择。正如第四、五章所阐述的那样，有机比喻同样可以作为社会正义与社会变革的概念基础。确实，人类不愿承认彼此的有机依存关系，以及相应地改变集体生活方式，这可以说是社会不公的根源所在。

当然，我们同样很难实际验证这些观点哪个更加有效。但是，本书的分析至少表明，人们基于“常识”而献身规范性对抗主义，这种做法有可能是错误的。如果规范性对抗主义是一种霸权概念，它只服务于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忽略其他人群，那么这种基于常识的献身行为与数代之前一些西方女性坚持反对选举权的做法并无二致。

然而怀疑者还称，以上整个分析都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在批判规范性对抗主义的同时又援用霸权理论，而这种霸权理论通常扎根于对抗的历史观。霸权理论将历史理解为相互争夺利益的社会群体，在话语和文化领域所不断进行的权力斗争。因此，矛

盾就出现了:既然霸权主义是一个对抗概念,怎么又说对抗主义是一个霸权概念呢?

然而,仔细阅读此书你就会找到这个明显矛盾的答案。在前面的分析中,我承认人类历史确实充满着竞争性社会团体之间的各种历史争斗,但是与此同时,我还指出人类历史并不仅限于这些表现,霸权斗争也从来不是人类文化的唯一决定因素。互惠与合作同样在人类历史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尽管它们经常被忽略。对抗主义和霸权斗争只是问题的一半,另一半则是互惠与合作。

此外,对抗主义与互惠主义二者谁相对占优势,这是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定的,且很容易发生转换。就此而言,随着时间推移,同时迫于全球相互依存的压力,对抗性斗争的相对优势可能会逐渐消减。正如第五章讨论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繁衍能力和技术成就正在将人类统一在同一个社会秩序之下,且该秩序没有任何疆界之分,它所关注的问题也愈加复杂和棘手。在这些急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互惠主义越来越多地被证明是一个适合所有社会群体的成功策略,而对抗主义则越来越多地被证明是不合时宜且不切实际的。

如果这样的话,随着互惠与合作模式的兴起,竞争性社会群体之间的那种古老的霸权斗争模式将会逐渐衰退。因此,我们可以预见人类正迈入一个“后霸权主义”世界秩序,其社会结构与实践旨在促进最广大集体的利益。尽管仍有零星的对抗主义表现无法彻底消除,但是对抗主义将不再成为公共领域的规范性思想。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能解开上述那个明显的矛盾。即使后霸权主义不一定会出现，但是它在逻辑上依然是可能的。因此，霸权理论可以用来解读我们的过去与现在，而不会阻碍我们预见未来。确实，如果人类社会与其他大多数复杂的动态系统一样，那么过去和现在的状态就不是预测未来的唯一指标。许多复杂系统强调进化适应的过程，该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产生质变。人类社会难道有什么区别吗？而且，互惠与合作并不是这种质变的唯一可能结果，但它们是可能的结果，值得我们为之努力。因此，我的观点并不是源于颇具宿命论意味的历史决定论而是出于对历史能动性的乐观认识。相反，“个人或社会群体无法超越自私追求或者霸权斗争”这个盛行的假说其实更接近宿命论和决定论的观点。

然而，我们很难实际验证哪个观点更加有效。但是本书的分析至少表明，当今盛行的观点有可能是错误的。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开放的头脑，并愿意评估和试验新的替代途径。

二、实证检验

当然，一个开放的头脑并不等于一个空洞的头脑，因此上述所有意见并非不容批判。上述命题需要实际验证，所以有必要稍加讨论应该如何进行。

对于上述命题，不能简单地将其放入当今盛行的竞争文化中，然后研究人们的行为。竞争文化认为人性从根本上来说是竞争和自利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这些角度来构建我们的集体思维、言谈和行动的。因此很有可能的是，它会培养和强化一些

公共行为，然后认定它们是普遍和必然的。从这个方面来说，竞争文化可能会制造许多“实际”证据，从而借此强化它的正当性。由于存在这种可能性，因此在验证这些命题时，不能仅仅考察那些其成员出生和成长于竞争文化中的社会。然而，考虑到西方竞争文化的影响力几乎覆盖全球，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可行的验证方法呢？

一种方法就是针对那些相对来说仍未染指西方文化的人群进行人类学比较研究，至少可以评估竞争和冲突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生理决定而且是必然的。政治人类学家马克·霍华德·罗斯最近开展了一项跨文化分析，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⁷ 罗斯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冲突与合作的相对比例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异。此外，他认为造成这些差异不仅仅是社会结构方面的因素（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正是这么认为），还有心理结构，或者他所谓的心理文化方面的因素。正如罗斯所解释的那样：“客观环境本身不会引发冲突，对这些环境的解读也会发挥作用”。⁸ “这些实证结果”，他继续说：

清楚表明一个社会的早期社会化过程与冲突和暴力密切相连。心理文化作用绝不等同于只讲利益的结构环境……基于利益的理性选择模式与其说是错的，倒不如说它是有局限的，且其局限程度要大于它的支持者所声称的那样。利益很重要，这一点我同意，但是在如何定义这些利益，以及参与者如何维护这些利益等方面，心理文化力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⁹

与此同时，罗斯还承认，这些社会制度会不断强化这些心理结构特性，且该作用会持续人的一生。

早期的社会关系为社会行为模式(我称之为心理文化特性)奠定了基础，个人终其一生会遵循之……但是，我们对一个培养冲突行为的世界的理解，并不仅仅是在较早的童年时期形成。大量的社会制度和实践都在强化一些重要的心理文化特性，其途径包括鼓励或遏制某些价值观和行为，从文化上定义集体身份(“我们”与“他们”)，从文化上认可那些所有人心知肚明的侵犯行为。¹⁰

当然，在人类是否有能力用互惠与合作取代冲突与竞争这个问题上，罗斯的研究仅仅是朝着经验性理解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不过，他的这种比对分析极具启发性，因为它表明了规范性对抗主义在前工业革命的文化中并非普遍存在，而且特定的文化因素(同时包括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因素)在决定冲突或合作的程度与表现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毫无疑问，不能将针对前工业社会的研究推而广之，应用到复杂的现代社会之中，因为情况有可能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复杂劳动分工造成了结构性利益冲突，从而使竞争性的资源分配模式变得必要且不可避免。然而，即便这种情况是事实它也仅仅意味着超越对抗主义更多地是受限于社会结构，而非人类本性。我们的社会结构与我们的生理本性不同，它们至少属于文化构造，有可能被改造。

不管怎样,根据这些针对前工业革命文化的研究,我们仍然只能得出有限的关于复杂现代社会的推论。因此很明显,我们需要采取实证的方法,以评估非对抗模式在复杂现代社会中的效用。幸运的是,一些此类的评估已经出现,而且取得了类似的可喜成果。譬如,一些在微观和宏观层面针对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评估显示,在处理许多类型的纠纷时,相比于传统的诉讼手段,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处理结果能让冲突各方更满意,且成本更低(包括经济和情感成本)。¹¹此外,针对非对抗性决策模式的初步评估也显示,相比于党派对立模式,这些模式能够产生思想性、创造性和有效性更高的结果。¹²同样,一些针对公共新闻和双向对称型公共关系模式(见第四章讨论)的初步评估也产生了可喜的成果。¹³

随着此类评估不断推进,它们将会揭示出这些替代性实践(它们与上述的广泛命题是相符合的)的效用。然而,这些评估同样具有局限性,我们必须予以考虑。事实上,在西方竞争文化的全球影响下,所有社会的成员都内化了各种对抗性规范与行为。这些心理结构特性很容易阻碍我们衡量非对抗模式的真正效用,因为那些预先内化的规范与行为很容易削弱这些模式的真正效用。即便如此,只要我们意识到这些潜在的倾向,这类评估还是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初步的见解。

有一点需要注意,这类评估研究同样具有局限性,因为它们通常是孤立地研究某个具体非对抗模式的效用。毫无疑问,这类模式最终需要放入一个综合框架中——该框架内的非对抗结构与实

践相互调和且彼此增进——进行验证。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仅因为这种综合框架可以培养个人具备更加合作的心理结构特性还因为不同的社会结构与实践通过一些复杂的关联相互影响，并且任何一个社会结构或实践的效用都会受到这些关联的影响。

以上文提到的公共新闻为例，它通过将关注点从对抗表演转移到民主协商，试图培养一种更加包容和参与性更高的公民文化，因此可以说它体现了许多与上述命题相一致的非对抗理念然而在当下，公共新闻实验多见于由商业广告支持的媒体。在这种环境下，公共新闻的效用很容易受到限制，因为这些媒体遵循的是追逐利润的逻辑，通常会抵触或约束公共新闻的理念。

当然，类似的关联也会影响许多其他社会结构与实践，比如第三章所讨论的三方竞争体系之间的关联。因此，针对任何一个构成系统的孤立实验，都很容易受制于它与其他几个以对抗方式构建起来的系统之间的关联。譬如，在当今，替代性纠纷解决模式是在一个脱胎于竞争性管理模式的法律与法规大框架下运行，而这个竞争性管理模式反过来又服从于一个秩序混乱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且该市场造成了财富、法律资源和政治影响力方面的极度不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充分评估这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模式的全部效用？在这种框架下，特权社会团体通常缺乏采取调解方法的动力，因为在一个维护他们利益的对抗性法律体系中，他们的处境通常很惬意。即便这些团体果真参与替代性纠纷解决过程，他们也要比其他社会团体具备更大的权力优势所以这个过程不可能真正公平或公开。因此，尽管各种非对抗的纠纷解决过程取得了相对的成功，但是这些模式最终还要放入一个

更广阔的框架内进行评估，要将它们与其他政治和经济模式联系起来，且后者必须增强而不是遏制它们。

之前讨论的几个问题，即关联所产生的遏制作用，以及心理结构的预定特性，它们都对在竞争文化中进行的非对抗模式实证评估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要解决所有这些混乱的问题，同时还要概括复杂的现代社会，最理想的情况是，我们在全社会范内开展一项对照实验。这需要从复杂的现代人群中抽取数个子集，同时控制一系列社会机构与实践，然后在长达数代的时间里，将这些子集与来自同一个人群的对照组进行比较。毫无疑问，这种方法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也就是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寻找一些现存的次文化或者人群，并且它们已经将大量非对抗社会结构与实践纳入一个相对全面的框架内。如果能够找到这样的群体，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他们社会的结构与实践同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更大社会结构与实践进行对比，从而评估前者的效用。现实中，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自然发生的实验，且要类似于上述的理想实验。

幸运的是，现在至少存在一个这种自然发生实验的实例。正如第五章的讨论所示，巴哈伊社团与上述替代性文化形态非常类似。当然，其他人群子集同样展示了一些其他形式的非对抗结构与实践。但是，巴哈伊社团为这个讨论提供了一个关于这种自然发生实验的清晰阐述。确实，许多巴哈伊正是如此看待自己的：他们是一个广阔社会实验的参与者，该实验旨在验证非对抗方式在所有社会领域的效用——包括社会变革领域。另外，在秉承这

种社会实验和学习精神之时，巴哈伊社团还为其他人提供了一个研究模式。¹⁴

当然，巴哈伊社团仍处在发展的早期形成阶段，其成员正在努力学习和践行着这些非对抗的结构与实践，发展必备的品质技能和能力。另外，由于巴哈伊不是孤立主义者，他们一只脚踏在巴哈伊文化中，另一只脚踏在主流文化形态中。因此，许多巴哈伊必须不断与他们在周围竞争文化中习得的品性作斗争。然而，随着一代代孩子在发展中的巴哈伊家庭和新兴的巴哈伊社团中成长起来，不断在他们的形成期内内化一些非对抗的原则与实践，同时将这些品性毫不保留地带入成年期，这样，巴哈伊社团自身得到不断巩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针对全世界巴哈伊社团的纵向研究为在一个全面的实证框架内验证上述命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尽管历经数代，这场实验的最终结果或许仍不可知。

注释及参考文献

导言

1. 比如，参阅比尔在《反思生态女性主义者的政治观》，卡里瑟斯在“社会性而非侵略性才是人类的关键特征”，艾斯勒在《金杯毒酒和刀刃》，豪厄尔和威利斯在《和平中的社会》，利基和卢因在《起源》和罗斯在《冲突文化》中的讨论。
2. 例如，参阅翁在《为生存而斗争》及坦嫩在《论争文化》中的讨论。

第一章 文化

1. 关于类似定义，参阅布洛克、斯塔利布拉斯和特朗布利的《现代思想词典》。
2. 格尔茨，《文化解读》。特别参阅该书第 2、第 3 章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
3. 同注 2 第 50 页。
4. 例如，参阅莱旺廷在《作为思想意识的生物学》，罗斯，莱旺廷和卡敏在《并非在我们的基因中》的讨论。
5. 在莱旺廷的《作为思想意识的生物学》和莱旺廷与卡敏的《并非在我们的基因中》也可以发现对这些臆说的详细综览和批判。

6. 罗斯,《竞争文化》。
7. 罗斯用“心理文化”和“社会结构”两个术语为这些范畴命名。我喜欢它们有两个理由:首先,罗斯的术语可以回避下述错误表述:认为只有第一个范畴(“心理文化”)才是由文化确定的。而两者显然都是由文化确定的。其次,“心理结构”这个术语提醒我们,在人的心智中,社会结构有其对应物——即“认知结构”。
8. 罗斯,《竞争文化》第 10 章。
9. 关于文化规范的简明讨论,参阅霍尔的《表征》。又见埃科的《符号学理论》,菲斯克的《交际研究导论》,关于规范概念的补充研究,参阅特纳的《英国文化研究》。
10. 关于符号学理论和历史这个领域的最全面的学术研究,参阅布伊萨克的《符号学百科全书》。下面的讨论很大部分是由斯图亚特·霍尔的论著改变而成,他将包括符号学在内的各种文化传统的概念编织成一个简明而深邃的文化理论。关于霍尔论文的汇编,参阅莫利和陈的《斯图亚特·霍尔》。关于下面列举的许多特定概念的简明讨论,参阅霍尔的《表征》。
11. 奥沙利文,《构建概念》第 265 页。
12. 关于常被忽略的意义的的情感维度,参阅艾伦的《文化意义》。
13. 这种关于单纯但对“事物”“符号”、“意义”的有用区分改编自霍尔的《表征》。这些术语的原型可以追溯到费迪南·德·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索绪尔将“sign”这个术语界定为对“能指”和“所指”两者的体现。在霍尔的用法及本书中,“sign”这个术语和索绪尔的“能指同义——实际的词、音、形象等,被用来表示别的事物。一方面,索绪尔的“所指”这个术语指的是与特定符号有关的精神概念,或者霍尔所说中的“意义”。其他作者(奥格登和理查兹的《意义的意义》)步其后尘,也补充了“指称”这个术语,来指称(与精神概念和同标记有关的意义相比)某个特定标记所指的实际现象。在霍尔的用法及本书中“事物”和“指称”在用法上是相同的。下面的许多符号学理论都是围绕着“符号”、

“意义”和“事物”间三重区分发展而来的，尽管各个作者使用的词汇大相径庭。

14. 关于“表述(articulation)”概念在文化研究中的使用的讨论，参阅霍尔的《种属》，奥沙利文等的《关键概念》第 17-18 页和霍尔的《后现代主义和表述》，以及史莱克的《表述的理论和方法》。
15. 本书使用的话语建构(discursive construct)这个术语是对富科在《知识考古学》里所界定的“陈述”概念的不精确改编。
16. 表述这个术语的使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富科的《知识考古学》。又见霍尔的《表征》，奥沙利文等的第 92-4 页，他对这个术语在文化研究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总结。
17. 参阅雷科夫和约翰逊的《我们生活周围的比喻》，对比喻在塑造人类思想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讨论。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献的简明综览，参阅索恩伯格的《比喻问题》。
18. 作为政治人类学家，马克·霍华德·罗斯在《竞争文化》第 19 页指出除了团体之外，个人这个概念出自西方思想，而非全人类的经历。
19. “综合性的话语形态”这个术语是对富科在其《知识考古学》中所界定的两个术语“话语形态”和“知识”的不精确的改编。在本书中，综合性的话语形态指的是将整个话语和更大的话语综合体连结起来。这样一来，话语建构、话语和全面的表述形态的三者区分，就是被用来指称分析的三个不同层面：分别为微观(micro)、中观(meso)和宏观(macro)。但与此同时，这三个术语并非意味着构成了数学上的明确的量度单位。它们之间的界限很难死板地加以确定。相反，它们是比喻性的建构，旨在辅助关于微观、中观和宏观的文化建构的思考和谈论。
20. 例如，参阅马克斯·韦伯在其《社会学论文集》第 62-3、284-5 页所表述的“选择倾向”概念，华莱士在其《加拿大集团精英》第 283-4292 页中进行了详细说明。

21. 例如，这个主题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这个主题的更多的当代讨论，又见伊格尔顿的《思想意识》。
22. 关于这个主题的更为详细的讨论，参阅伊格尔顿的《思想意识》，拉腊因的《意识形态概念》以及霍尔的“‘意识形态’再发现”。许多关于这个主题的当代讨论可以进一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23. 例如，参阅埃里克森、巴拉内克与尚的《谈判控制》，甘迪的《确定何为新闻》，哈克特的《进入等级》，施莱辛格的《新闻社会学反思》及斯帕克斯的《媒体与国家》。
24. 参阅葛兰西的《监狱笔记》。
25. 关于反对妇女参政的女士们提出的论据综览，参阅乔姆利的《妇女的反对妇女参政权运动》及亚当斯的《美国的反对妇女参政权的妇女》。

第二章 权力

1. 这种区分被许多权力理论学家讨论过，其中包括康诺利的《政治话语的措辞》，科泽的《权力观》，哈索克的《女性主义的历史物质主义》，卢克斯的《权力：一种激进观点》，麦克佛森的《民主论》，皮特金的《维特根斯坦和正义》，瓦滕贝格的《权力形式》，朗的《权力》和道丁的《权力》。
2. 瓦滕贝格的《权力》第 27 页。
3. 后者定义的特征是最具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权力论。例如，可见于巴赫拉赫和巴拉慈的《权力的两面》，达尔的《权力概念》，达尔的《作为行为控制的权力》，卢克斯的《权力》，韦伯的《控制》，以及德·茹弗内尔的《论权力》——作者均为极具影响力的权力理论学家。

4. 这句话及下面的引述都来自卢克斯的《权力:一个激进的观点》。
5. 瓦滕贝格,《权力形式》。
6. 例如,参阅斯坎内尔、施莱辛格和施帕科斯在《文化与权力》以及德克斯、埃利及奥尔特纳的《文化、权力和历史》一书中汇编的论文关于“权力”这个术语的用法。
7. 吉登斯,《社会宪法》第 15、257 页;尽管吉登斯常常将权力同控制联系起来,但他也承认,“权力并不必然与争端有联系……权力并不一定不公平。(第 257 页)
8. “控制权”有时被看做更为普遍的“行动权”范畴的一种特例。例如,参阅吉登斯的《社会理论中的核心问题》,朗的《权力》第 xiii 页以及塔尔科特·帕森斯的“权力和社会理论”。但这些作者中没有人像下面概述的那样提出一个规划,给整个权力关系确定概念。
9. 公正地说,女性主义学者已经将各种合作或共同行动权力关系理论化这些理论将在第四章里进行讨论,但这些女性主义权力论不符合多数社会和政治权力理论。在这方面,由于其相对边缘化的地位,他们实际上说明了关于权力的传统话语的界限。
10. 朗在其《权力》一书的第 237 页的确顺便使用了“压制权”这个措词表示“行动权”的一种特定形式。但是,他没有提供一个全面的框架,来放置这些概念。
11. 权力平衡概念有时被称为分散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布洛的《交换与权力》第 118 页、加姆森的《权力与不满》和赖斯曼、丹尼和格莱泽的《孤独之地》中理论化。在许多方面,党派民主政治的一切多元模式都体现了某些权力平衡的概念。但据我所知,这个概念从未被置于一个全面的框架中,来清楚地区分它是如何同其他权力关系相联系的。
12. 各种女性主义理论家已经提出了“养育权”理论,第四章里将对其进行讨论。此外,瓦滕贝格承认,某些不平等权力关系可能以上述描述的方式有益于弱势代理人。他将其称之为“转变的权

力”，而且在瓦滕贝格的《权力核心》中，他运用同样的养育和教育例证来说明这个观点。然而，由于他混合了对抗主义和互惠主义之间与平等和不平等之间的区别，致使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转变的权力是“控制权”关系的一个特例。本书概括的规划指出这种分析令人困惑，很成问题。

13. 例如，参阅帕森斯在其“权力与社会体制”中提出的权力与等级制的功能理论。正如朗在《权力》第 249 页指出的：“质疑持久的权力关系等级制当然不是肯定某个现存社会权力结构的必然性。功能主义论证常常受到这样的指责：他们正好暗示了帕森斯例证中这个正如我们看到的帕森斯被指责为美化现状，因为他对忽视代表某些利益集团行使权力而牺牲他人利益的行为只是轻描淡写。”
(Wrong, Power:249)

第三章 规范性对抗主义

1. 戈登·费尔曼使用“规范性对抗主义”这个术语概念区分强制性对抗主义。在他的用法中，规范性对抗主义指的是出自同流行的文化规范相一致的那种对抗主义的表述。这种对抗主义形式可能被那些选择它的人蓄意拒绝。相比之下，费尔曼使用强制性对抗主义的概念指称强制性或使人无法自拔的超越意识控制的对抗主义措词（即强烈的心理驱动）。
2. 关于西方社会对抗主义根源的深刻讨论，参阅基欧的《对抗是西方社会的世界观》及翁的《为生存而斗争》。
3. 关于男性与对抗主义历史联系的讨论，参阅布罗克-乌特耐的《女性主义观点》，哈索克的《女性主义的历史物质主义》，斯普莱特纳克的《文化力量》，斯特朗格的《女性主义的军备竞赛观》，里尔登的《妇女与和平》及《性别歧视与战争体系》。
4. 在整个考察中，注释指引读者参阅其他作者特别观点的更为详细的讨论。此外，坦嫩在《论争文化》中提供了一个对抗主义的精致语言分析（或如她所称的“动机争胜性行为”），触及了一系列下述观点。

5. 史密斯,《国富论》。
6. 史密斯,《道德情操论》。
7. 伊文斯基,《伦理学与古典自由传统》第 61 页。
8. 彼得雷拉,《超越竞争神话》第 246 页。
9. 例如,参阅帕皮尼、帕万及扎马尼的《走向合作竞争》,及梅洛尼的《合作竞争》。
10. 在《超越对抗民主制》中,曼斯布里奇讨论了党派政治体系的许多局限性,并提出了解决方案:非党派的基于共识的“整体民主制”,作为许多背景下可供选择的合适替代物。
11. 布赖恩德,《实用政治》第 154 页。
12. 莱昂,《绿色政治》第 129 页。在下一句话里,莱昂继续评论道:“但是,如果人们注意到未受节制的经济市场如何威胁公众利益,那么这种从经济市场推演而来的类比并不会让人安心。”
13. 例如,参阅顺彼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制》及唐斯在《民主制的经济理论》中的讨论。
14. 海尔德,《民主制的模式》第 170 页。
15. 例如,参阅贾米森在其《肮脏政治》中的讨论。
16. 关于“地位的”和“原则性”决策,参阅费希尔、乌里和巴顿的《达到“是”》。
17. 关于这一现象更为深入的讨论,参阅布卢门撒尔的《持久运动》。
18. 例如,关于对党派政治幕后本质的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参阅克利夫特和布雷扎伊蒂斯的《不流血的战争》。
19. 例如,参阅哈伍德·格鲁普在《公民与政治》一书里于这个题目的讨论。
20. 当然,某些人提出竞选运动金融改革和类似措施的建议,以便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正如第 5 章的讨论所提出的,完善党派政治体

系的选举程序，并不能解决党派政治带来的其他根本问题，它只是易于提高金钱在政治竞争舞台其他领域的影响。

21. 例如，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参阅布雷迪的《扭转堵塞》，考克斯和谢内尔的《分裂的政府》，格雷的《民主的堵塞》，约翰逊和布罗德德尔的《制度》，琼斯的《党派，制度和堵塞》，斯科特的《司法堵塞》和克里斯李普的《连根拔除》。
22. 例如，赫尔德在《民主制模式》里将此称为“竞争性精英民主制”。又见格雷德的《美国民主制的背叛》，帕伦蒂的《少数人的民主》及埃德萨尔的《新的不平等政治》。
23. 兰兹曼在《竞争体系》中对法律竞争制度的历史发展作了简明概括，包括司法结构的改革和上述对罗马法系的排斥。关于另外的背景，包括正式争端和论辩传统的讨论，参阅马耶鲁的《中世纪大学的训练》，门克尔-梅多的“竞争体系的麻烦”，莫尔顿的《竞争方式》，翁的《生存斗争》和斯特里克的《对所有人的不公》。
24. 关于这一点的深入讨论，参阅斯特里克的《对所有人的不公》第11章又见富兰克林的《司法论战》第94页以及孔德、弗里登索尔和米勒的《民事程序》第2页。
25. 兰兹曼，《竞争体系》第4-5页。正如兰兹曼所指出的，“竞争体系中的党派法庭交锋似乎与战斗如此相像，目的是要表明对抗过程的真正源头是古代称之为‘借决斗来证明’的那种解决争端的模式”（第8页）。但为了捍卫对抗体系，兰兹曼继续证明说，没有证据支持“决斗审判”和法律竞争体系的演进之间的直接联系。但他疏于考虑的是使两者均有可能的对抗主义更大的文化环境。例如，这种文化环境的特征是法律竞争体系和决斗的共存——后者直到19世纪还被视为文化上可被接受的争端解决惯例。关于决斗审判和法律竞争体系之间的许多文化联系的讨论，参阅斯特里克的《对所有人的不公》。
26. 例如，关于对热情宣传原则以及律师为客户赢得诉讼而不顾事实目标的富有影响的表述，参阅德肖维茨的《最佳辩护》。

27. 关于在司法对抗体系中许多掩盖真相活动的讨论，见弗兰克尔的《党派正义》寻找真相》，戈尔斯基的《对抗体系》，门克尔-麦杜的《争端的转化》，派伊的《隐瞒真相》，舒驰曼的《律师欺诈问题》，斯帕克曼的《失败的正义》，斯特里克的《对所有人的不公》和扎卡莱亚斯的《协调职业与客户利益》。
28. 弗里曼，《对抗体系中的律师道德》第 3 页。正如法律学家齐特林在《道德指南》第 168 页得出的结论：“对抗体系培育欺诈，无论律师参与谈判、诉讼和日常咨询，他们都是将生意放在一起，提出草拟的意见和财产意见，或帮客户服从政府的法规。
29. 这其中最成问题的例证是强奸受害人在对抗性盘问中再次受辱。正如塔斯利兹在《强奸和法庭文化》一书里所断言的，二次盘问程序是司法对抗体系的结构产物。
30. 关于影响对抗性司法体系的不计其数的对抗性比喻的深刻讨论，见索恩伯格的“比喻问题”。
31. 例如，参阅加兰特的《为何先要蒙骗？》阿僧的《O.J.辛普森的审判》斯帕克曼的《失败的正义》，斯特里克的《对所有人的不公》，史密斯的《法庭与穷人》和柯廷的《阶级正义》。
32. 斯特里克，《对所有人的不公》第 16-17 页。
33. 同上第 110 页。
34. 同注 32 第 21 页，关于同一现象以及强奸受害人在法律对抗体系中再次受辱的深刻讨论，参阅塔斯利兹的《强奸与法庭文化》。
35. 关于法律对抗体系中固有的这些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讨论及非对抗性改革的提议，参阅塔斯利兹的《强奸与法庭文化》，斯特里克的《对所有人的不公》，奥尔森的《诉讼爆炸》，斯帕克曼的《失败的正义》，门克尔-梅多的《竞争体系的麻烦》，伦奎斯特的《对抗社会》以及瓦尔帕莱索大学的《对抗体系的状况》。
36. 下议院，1947 年 11 月 11 日。
37. 例如，参阅福山的《历史的终结》。

38. 有人会质疑道，即使娱乐博弈也存在着固有的问题。关于娱乐博弈对社会和人们心理的危害方面，参阅科恩的《人性》。
39. 许多当代社会学理论家对市民公共价值观受到的腐蚀和竞争性个人主义及自我陶醉在整个西方自由主义社会的泛滥进行了评论。参阅贝拉等的《心灵习惯》和艾特泽翁尼的《新黄金律》和《共享核心价值观》。
40. 参阅阿克曼在其《不平等的政治经济》中列举的数据和讨论，夏皮罗和格林斯坦的《扩大的收入鸿沟》，菲什洛和帕克的《日益扩大的分裂》及黑斯勒的《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公正新世界》。
41. 参阅格布纳和格罗斯的《暴力侧面》，艾伦和西顿的《对抗的传媒》，阿诺和迪萨纳亚克的《国际和国内冲突中的新闻媒体》，鲁本斯坦等的《解释争端的框架》和格拉斯纳的《恐惧文化》。
42. 参阅斯密特的《附属国之路》，莱斯、克兰和嘉里的《广告规范》
43. 戴森，《心智的滥用》。参阅嘉里在其《文化环境的危机》中对乔治·格布纳的访谈。
44. 卡尔贝格，《新闻与冲突》。
45. CNN 的《池鱼之殃》和 CBC 的《对决》都是这一类型的首要例证。
46. 对媒体话语的各种社会和政治后果的讨论，参阅艾尔特舒尔的《权力代理》，海波特的《大众传媒的影响》，克尔纳的《民主的危机》，达尔格伦的《电视与公共领域》，霍尔的《思想意识的再发现》，霍尔的《监督危机》，赫尔曼及乔姆斯基的《制造共识》，吉特林的《全世界的注视》，甘迪的《超越日常事务处理》，哈凯特和赵的《勉强维持的民主制》，摩根和西格诺里里的《养育分析》和格布内尔的《跋》。
47. 参阅埃里克森、巴拉内克及尚的《谈判控制》，甘迪的《控制的构建》安德森的《咨询—传媒关系》，戴尔的《绿色和平组织》和尼尔森的《公共关系》。

48. 这是最广受支持的关于媒体生产社会学的论断之一。参阅哈凯特的《人口的等级制》，甘迪的《超越日常事务处理》《新闻资助》和《控制的构建》。施莱辛格的《反思新闻社会学》，埃里克森、巴拉内克及尚的《谈判控制》，甘斯的《确定何为新闻》和斯巴克的《媒体与国家》。
49. 参阅卡佩拉和贾米森的《愤世嫉俗的急剧上升》，法洛斯的《爆炸性新闻》，迪翁的《美国人为何讨厌政治》，罗森的《正确地连结》，梅里特的《公共新闻和公共生活》和马修斯的《为民政治》。
50. 参阅劳埃德的《反向性和类比》。
51. 翁，《为生存而斗争》。
52. 当然，并非所有古希腊哲学家都具有这种辩论性劝诫或论争作风，苏格拉底似乎拥有较多的指导和探寻的对话与合作方式，他以此推动他人(以相对谦逊的方式)通过提问重新评价他们自己的假设和信念，旨在鼓励批判性思维(如柏拉图在其《对话》里所记载的那样)。关于《苏格拉底法》是如何被混淆为较为对抗性的逻辑和询问模式的深刻讨论参阅莫尔顿的《对抗方式》。
53. 翁，《学术界的对抗性结构》和《为生存而斗争》。
54. 杭德里克，《牛津哲学指南》第 496 页。
55. 翁，《学术界的对抗性结构》第 2 页。
56. 例如，亚里士多德将女性形态视为人类状况的一种畸形。
57. 下述历史概要多归功于诺贝尔的《没有妇女的世界》。
58. 虽然西方科学被理解为对宗教权威的反抗，对基督教会传统的脱离，但这种观点是极端不顾史实的，因为西方科学很大程度上是从基督教会文化中诞生的。
59. 关于中世纪教育方面正式争论的讨论，参阅马耶鲁的《中世纪欧洲的大学训练》和翁的《学术界的对抗结构》。

60. 关于这个主题的更为详细的讨论，参阅马耶鲁的《中世纪欧洲的大学训练》。
61. 同上第 5-6 页。关于这个主题的更为详细的讨论，上述总括曾得益于它，参阅翁的《为生存而斗争》。
62. 莫尔顿，《对抗方式》第 153 页。
63. 同上第 149 页。
64. 伯特，《作为武士的哲学家》第 33 页，括号内文字为原文内容。
65. 参阅科佩-卡斯滕的《支配理性》，汤普金斯，《战斗词汇》，关于多种学科里学者的类似论断，参阅坦嫩的《论争文化》。
66. 正如莫顿在《对抗方式》第 53 页所说的，“对抗环境好像并没有引出最佳推理方式”。
67. 又见莫顿的《对抗方式》和雷科夫的《语言和妇女地位》。
68. 同上。
69. 参阅第四章的讨论。
70. 汤普金斯，《战斗语言》第 587-9 页。
71. 同 70 第 589 页。
72. 伯特，《作为武士的哲学家》第 35 页。
73. 虽然对这些替代选择的全面讨论已经超越了本文范畴，但在其后的章节里将讨论其要素。例如，参阅第四章关于生态学/环保主义方面的讨论。又见关于《磋商性认识论》的讨论——其中把不同观点视为以合作方式，通过互相激励的对话而非论争所进行的潜在互补和探询方式——在第五章中涉及。关于这种磋商认识论的更为详细而深入的讨论，参阅史密斯的《社会结构的相对性》。
74. 关于简明总结，参阅吉特林的《身份政治的兴起》。关于新左派经历的更为广泛的批判以及作为 20 世纪末美国社会特征的更为广泛的文化战争，参阅吉特林的《共同美梦的黄昏》。

75. 吉特林,《共同美梦的黄昏》第 34 页。
76. 吉特林,《身份政治的兴起》第 175-7 页。
77. 吉特林,《失败的信仰之后》第 66 页。
78. 对这些环境趋势的概览,参阅布朗、雷内和哈维尔的《致命征象》,以及布朗、弗莱文和弗伦奇的《2000 年的世界状况》。
79. 例如,参阅阿克曼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夏皮罗和格林斯坦的《日益扩大的收入鸿沟》菲什洛和帕克的《日益扩大的分裂》,哈斯勒的《不公正的新世界》。
80. 关于这个主题的深入讨论,参阅戴尔,《绿色和平组织》。
81. 参阅皮尔拉,引自《绿色和平组织》第 183-9 页。
82. 对这种观点的更为著名和明显的支持者包括洛伦茨的《论侵略》,莫里斯的《赤裸的猿》,阿德里的《土地要事》,斯托尔的《人的侵略》,康纳的《扭结的翅膀》,泰格和福克斯的《帝国动物》,爱布尔-艾贝斯费尔特的《和平与战争生物学》。关于对这些及类似观点的深入批判,参阅罗斯、柳文廷和卡敏的《并非在我们的基因内》及柳文廷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生物学》。
83. 关于西方哲学中的这些假说的讨论,参阅科霍的《争端是西方的世界观》。
84. 参阅罗斯、柳文廷和卡敏的《并非在我们的基因内》第 5 页,关于霍布斯观点的更为详细的考察,又见瑞安的《人性的本质》。
85. 关于这个主题的更为深入的论文汇编,参阅曼斯布里奇的《超越自我利益》,又见布罗克-乌特耐的《女性主义观点》,罗斯的《冲突文化》,班杜拉的《侵略》,蒙塔古的《学习非侵略》,坎普的《非暴力》,蒙塔古的《人类侵略的性质》,科恩的《人性》和马克与艾文的《暴力与智慧》。
86. 豪厄尔和威利斯,《和平中的社会》第 10-2 页。

87. 利基和卢因,《起源》第 209 页。又见贝特森的《合作》,卡里瑟斯的《社会性》。他们均有类似论断。
88. 关于这一论断的一个精辟说法,参阅塞维尔的《论暴力》——世界各地 20 位科学家的共同声明,他们在联合国国际和平年汇聚一起,考察和平、战争和人性的关系。又见罗斯的《冲突文化》。
89. 参阅贝克的《社交论》《基因健康》。科勒德的《利他主义和经济》,弗兰克的《人类经济》,哈蒙德的《慈善活动、利他主义与合作性利己主义》,霍兰德的《自愿合作》,马戈利斯的《自私、利他和理性》,萨格登的《博爱经济学》,扎马尼扎马尼的《利他经济学》和卢纳蒂的《利他与合作》。
90. 例如,参阅阿克洛夫的《忠诚过滤》,弗兰克的《理性激情》,何示雷佛的《威胁与承诺》,阿克塞罗德的《合作的演进》,曼斯布里奇的《超越自我利益》。
91. 参阅阿克塞罗德的《合作的演进》,贝格斯图罗姆和斯塔克的《利他主义如何取胜》,贝克的《基因健康》,萨姆艾尔森的《利他主义》,卡斯提的《合作》及西门的《成功的利他主义》。
92. 对这些研究的杰出评论,参阅弗兰克、基洛维奇和雷根的《经济学会抑制合作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研究也表明,在最后通牒式讨价还价的方案中,经济学家通常没有非经济学家那么成功,因为后者更为看重互助合作,这才是更成功的策略。参阅拉提莫的《理性的才是理性的吗?》。
93. 卢纳蒂,《论利他主义与合作》第 69 页。
94. 扎马尼,《利他主义经济学》第 xxi 页。类似讨论,见拉什顿的《利他主义和社会》。
95. 陶冶论还表明,陶冶过程一旦确立,就可能加强现存文化观和行为。尽管经验上证明这些主张的显然是困难的,但陶冶分析已经产生了对这些假说提供了有力支持。关于对陶冶论、方法学及其发现的杰出评论,参阅摩根和西格诺里里对这个主题的论文汇编:《陶冶分析》。

96. 基欧,《冲突是西方世界观》第 59 页。类似讨论请参阅鲁宾斯坦的《国际安全》,萨沙-阿南德的《从暴力到非暴力话语》及沃克的《当代军国主义》。

第四章 古今互惠主义

1. 艾斯勒,《金杯毒酒和刀刃》。
2. 例如,参阅比尔在其《反思生态女性主义政治学》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3. 罗斯,《冲突文化》。
4. 参阅科尔的《费边式社会主义》。
5. 关于马克思对人性和社会对抗的观点的深入讨论,参阅麦克默特里的《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弗罗姆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
6. 蒲鲁东,《何为财产?》。
7. 彼得·克罗波特金,《相互援助》。
8. 例如,参阅哈索克在其《女性主义的历史物质主义》和《政治变革》,莫尔顿的《对抗方式》,布罗克-乌特耐的《女性主义观点》,麦卡利斯特的《重新编织生活网络》,塔斯利兹的《强奸与法庭文化》及沃伦与卡迪的《女性主义与和平》中的讨论。
9. 当然,这些联系是生物学的还是文化学的,并非绝对。男人展示的陶冶与合作,甚至和女人展示的好斗与竞争一样。关于这些文化与历史的复杂性和矛盾,特别是有关女性军国主义表现的讨论,参阅艾尔施泰因的《妇女与战争》。
10. 例如,参阅莫尔顿在《对抗方式》及拉考夫在《语言与妇女的地位》中的讨论。
11. 例如,参阅里尔登在《妇女与和平》及布罗克-乌特耐在《女性主义观点》中的讨论。

12. 例如，参阅以下各书中的讨论：福尔布雷的《家庭经济学》，贝克的《无偿劳动》，布劳的《妇女经济学》和《男人与工作》，加德纳的《性别、照料与经济学》，德瓦尔特的《养家》和比斯利的《妇女经济学》。
13. 例如，参阅赫斯顿、韦纳和赫尔本的《无声危机》，CCHRSC 的《育儿保姆》以及 CCCW 的《值得做的工作》。
13. 例如，参阅西瓦德等的《世界军事和社会开支》。
14. 福利特，《权力》第 101-16 页。
15. 同上，第 101 页。
16. 埃米特，《权力观》（提交给亚里士多德学会议程的论文，伦敦，1953），
17. 阿伦特，《论暴力》。
18. 阿伦特，《论暴力》第 44 页。
19. 同 18，第 43 页。
20. 同 18，第 43-4 页。
21. 米勒，《趋向新的妇女心理学》第 115 页。
22. 同 21，第 116 页。
23. 米勒，《妇女与权力》第 1 页
24. 同 23，第 1-2 页。
25. 同 23，第 5 页。
26. 汉斯·克拉马莱和特赖希勒在其《女性主义词典》里说，“权力这个术语已经被男士界定为‘一言堂’和侵略，被女士界定为养育”。
27. 这是哈索克自己在《女性主义的历史物质主义》里的说法。
28. 同 27 第 210 页。
29. 同 27 第 224 页。

30. 同 27 第 253 页。
31. 关于和平运动中妇女领导权的历史，参阅阿朗索的《作为妇女问题的和平》以及博尔丁的《妇女》。关于许多妇女参与的更普遍的“和平政治的深入讨论，参阅里尔登的《妇女与和平》及鲁迪克的《母亲的思维》。
32. 钦的《和平与权力》深入讨论了数件非对抗性的女性主义实践活动。
33. 这一观点是许多女性主义者提出的。参阅沃伦和卡迪的《女性主义与和平》，沃伦的《权力与承诺》，胡克斯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回嘴》及伍德的《性别的活力》。
34. 例如，诸如曼斯布里奇这些理论家在《超越对抗民主制》里以及表达了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党派对抗性质进行了深刻批判。正如弗雷泽在《女性主义政治理论》第 58 页指出的，“许多女性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一样希望并旨在获得真正自治的集体管理，即理性管理。尽管在她们的例证中，存在着批判传统意义政治的特别理由——即与男性的历史性联系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运动，女性主义拒绝传统组织形式，特别是党派形式”。再者，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处于运动前哨，旨在创造司法对抗体系的替代形式等，使其从竞争转移到合作教育模式。例如，参阅门克尔-麦杜的《转变和争端》《对抗体系的麻烦》，塔斯利兹的《强奸与法庭文化》，布罗克-乌特耐的《女性主义观点》和里尔登的《学习和平》的有关讨论。
35. 埃尔斯伯格和梅拉梅德，《皇帝的新衣》第 88 页。
36. 关于对这个领域的评论，参阅冯·拜尔陶隆菲的《普通系统论》，许特纳的《普通系统论》，及恩格尔哈特的《系统论》。
37. 塔尔科特的论著是这些传统功能主义思想的最突出的例证。参阅帕森斯的《权力和社会系统》。关于帕森斯功能主义的精辟评论，参阅吉登斯的“塔尔科特·帕森斯最新论著中《权力》”一文。
38. 系统论模式显然被学者们用作批判媒体功能的手段，例如梅多斯的《通过信息领域改变世界》，帕克的《环境交流》。其他许多媒体学者虽然不是系统论者，而且如前注所提的常常批判帕森斯的

功能主义，但他们采用了上述界定的批判性的功能主义观点。例如，参阅达尔戈蓝达尔格伦的《电视与公共领域》，凯尔纳的《民主制的危机》，库兰的《再谈大众媒体与民主制》，贝克的《广告和新闻界》，吉特林的《美国政治的分歧》以及哈克特和赵的《勉强维持的民主制》。

39. 经济不可持续的经典批判系统分析是罗马俱乐部在其《增长局限》里所表述的。最新同类分析，参阅卡西奥拉的《工业文明的死亡》，甘斯的《内生的局限》，斯图亚特的《论增长局限》，米山的《经济增长的代价》，雅各布斯的《绿色经济》，杜思韦特的《增长幻想》和伊金斯的《绿色经济学》。

40. 莱昂，《党派的未来》第 115-18 页。

41. 拉斯洛，《内在局限》，他用《内在局限》这个措辞来描述这些内在的机能障碍——意在同罗马俱乐部 1972 年研究中所支持的外部/环境《增长局限》形成对比。

42. 同 41 第 109-15 页。负和博弈、零和博弈、正和博弈关系是数学博弈术语，分别指的是博弈对手双输、输赢相抵和双赢的关系。

43. 同 41 第 112 页。

44. 博尔丁，《三相权力》。肯尼斯·博尔丁的论著是竞争文化边缘的有趣个案研究。在他的整个一生中，曾担任过横跨社会科学领域的 6 个重要学术团体的会长，出版了 30 多部著作和上百篇论文，获得过 33 个名誉学位和多项其他奖励。虽然他拥有崇高声誉和成就，但他的《消极权力论》却对当代权力理论的创建影响甚微。社会理论家可能会这样论说道，其所以这样，是由于他的理论缺少实用性。但本书的分析提出的替代解释是，他的理论没有迎合竞争文化构建的《现实主义》潮流。

45. 同 44 第 25 页。

46. 同 44 第 109、121-2、182、211 页。

47. 同 44 第 110-15 页。

48. 同 44 第 250 页。
49. 拉斯洛,《内在局限》第 123 页。
50. 同 49 第 128-9 页。
51. 例如,“社会生态学”的概念和整体原则应用于人类事务已经在波里特的《看见绿色》、汤普森的《盖娅》、斯普莱特和卡普拉的《绿色政治》苏厄德的《绿色民主制》和莱姆科夫的《整体原则》中被讨论过。
52. 例如,参阅马古利斯,《互惠星球》及马古利斯和费斯泰的《互惠主义》。
53. 例如,这些论断在塞维尔的《关于暴力的声明》中被明确表述过——声明由来自世界各地的 20 多位著名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联合国国际和平年期间共同签署。这一声明明确驳斥下述论断:诸如战争、暴力和侵略这类对抗行为是我们的进化遗产,因而是内在的人性。在承认这些人类行为能力的同时,这份声明断言,人类即使并不具有更大,也是具有同等合作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可以且应更系统地加以培养。
54. 下述讨论特别受惠于沃伦和切尼的《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系统生态学》文。
55. 同上,第 253 页开始的插入成分。关于生态竞争范式的历史使人想起了物理学上早期关于波/离子的争论,同样导致了现代人类观察互补模式的出现。
56. 同上,第 252 页开始的斜体字部分。
57. 例如,参阅莱昂在《绿色政治》一文中的讨论。
58. 巴克维斯和内维特,《绿色》第 158-9 页。
59. 正如第 5 章的讨论所表明的,非党派民主决策模式维护了没有党派动机和姿态而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当代决策的那种变革过程的能力。

60. 关于作为党派政治特征的《过分简单化的祸根》的讨论，参阅布隆德尔的《政党》第 19-21 页。
61. 关于对抗性诉讼也进行了类似论证。例如，蒂德马什和特兰斯格鲁德指出，“在复杂的诉讼中，对抗程序即使不是根本上，也是很少起作用有如此众多的党派、文件、事实或问题，使律师、当事人和陪审团实在难以行使对抗诉讼过程传统上赋予他们的使命”。（蒂德马什和特兰斯格鲁德，《复杂诉讼》第 V 页）。关于法律对抗体系衰落的讨论，见斯特里克的《对所有人的不公》。
62. 参阅巴里，《反思绿色政治》。
63. 当然，人们可以质疑道，真正的问题不是对抗性政治，而是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诚然，在这方面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提出，结构性经济改革是创造更公正、人道和可持续管理体系的前提。但是，正如第 5 章的讨论所表明的，事实上颠倒才是真相。因为经济资源的再分配根本上是个政治过程（即要求一种管理制度，能够调节资本的积累和消除极端经济分化），似乎真的可以认为，政治领域的结构性转变是富有意义的经济变革的前提。正如第 5 章所讨论的，这正是巴哈伊社团明确提供的更为详细的分析。
64. 《环境种族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环境歧视政策与实践是证据充足的现象例如，参阅海曼的《种族、浪费和阶级》，诺德奎斯特的《环境种族主义》，佩特里金的《环境正义》和布拉德的《面对环境种族主义》。
65. 这个论题的影响重大的声明是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其《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份报告中发表的。
66. 例如，参阅代库斯的《国防与环境》，理查森的《战争对环境的影响》，凯考嫩的《绿色安全》，麦金农的《战争浪潮》，米尔社的《作为和平教师的地球》以及威斯汀的《战争的环境危险》。
67. 例如，参阅本奈特的《绿色战争》，德巴戴雷奔和汉尼甘的《环境安全》，凯考嫩的《绿色安全》和《环境冲突》。

68. 例如，参阅沃克的《安全、主权和世界政治的挑战》，格林的《全球温暖的军事意义》，洛维和肖的《环境与安全》，莫里斯的《中东地区的水短缺和安全问题》，迈尔斯的《终极安全》及美国国防部的《防务行为》。
69. 这并不意味着对抗政治惯例是多数环境评论的首要目标。消费文化、经济扩张主义、技术/工具理性等通常是多数环境保护主义者的主要关注。此外，许多环境保护主义者显然参与了来自有组织的环境保护党派(即绿色组织)的各种形式的对抗政治，进行抗议、非暴力反抗甚或企业破坏活动。另一方面，以上概述的生态世界观的许多要素的确支持对对抗主义的批判，而且这些批判始于环境保护主义者正式或非正式的表达。
70. 许多作家对这些问题的不可分割性进行了考察。例如，参阅波里特的《看见绿色》，米尔布拉思的《建立联系》，斯普莱特纳克和卡普拉的《绿色政治》，沙别科夫的《和平的新名称》，沃克的《和平、环境和发展》，考赫勒的《争取替代选择的世界秩序的绿色对话》，纽科姆的《和平的进一步反映》，诺兰的《生态与合作教育规划》，博格斯、舒曼和斯维克的《和平条件》及乔治的《和平与生态伦理》。
71. 虽然绿色和平组织和许多具有类似思想的组织追求和平与环境的可持续双重目标，但它们依然常常在这些活动中使用了对抗(尽管一般都是非暴力)方式，注意这一点是很有趣的。事实上，即使在公开声称和平与协和理想的环境保护积极分子中间，许多人在追逐自己的理想时，也似乎仍然不能超越对抗方式(参阅第3章有关激进主义的讨论)。
72. 参阅波里特的《看见绿色》第 ii 页。
73. 例如，参阅沃伦汇编的经济女性主义者文集，《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哲学》。
74. 凯利，《妇女与权力》第 114、118-19 页。
75. 例如，参阅威尔莫特和霍克在其《人际冲突》中关于人际交流和冲突的文献评论。
76. 坦嫩，《论争文化》第 84 页。
77. 同上第 83-4 页。坦嫩至少部分地将其归因于公共交际的“对抗”模式对人际交流所产生的影响。正如坦嫩所写的，“公民们学会的不仅是他

们阅读和听到的思想，而且还有态度、口气和话语……公共话语悄悄进入了个人谈话、个人思想中……为个人谈话提供了一个模式：人们学会了自己听到的这些措辞、思想和态度，并且重复着，好像它们已经是自己的东西——他们重复着，因为这些已经成了他们自己的”。

78. 这个措辞来自杜威和哈伯马斯哈伯马斯在费尔森的《合作探究》里的比较分析。
79. 关于杜威和哈伯马斯哈伯马斯表述的对“合作探究”模式的更为详尽的分析，参阅上书，特别是其在第六章中的比较性总结。关于这些高产作家的有关作品，其良好开端包括杜威的《公众及其问题和敏制作与教育》以及哈伯马斯的《交际行为理论》和《反思公共领域》。又见菲尔森著作中的德维和哈伯马斯的更多的参考书目。
80. 例如，参阅弗拉泽的《反思公共领域》及兰德的《妇女与公共领域》。
81. 吉尔哈特，《修辞的女性化》第 195、201 页，最初的强调部分。关于类似的讨论，又见科普-卡斯滕的《控制理性》。
82. 吉尔哈特，《修辞的女性化》第 197 页。值得注意的是，甘迪也将某些交际形式与暴力同等看待。关于甘迪的围绕着非暴力语言、人类关系的维护、坦率与灵活等观念的非暴力交际论的讨论，参阅博德的《甘迪的修辞论》和《非暴力交际》。
83. 吉尔哈特，《修辞的女性化》第 201 页。
84. 吉尔哈特和其他女性主义者的结论并不必然意味着男性和女性交际风格的绝对区别（无论在生物学或文化学意义上），鉴于两者的日常经验和研究，这种区别显然成问题。关于这些有问题区别的讨论，参阅艾尔施泰因的《妇女与战争》。另一方面，社会语言学和其他研究交际中的性差异的学者在《相对倾向》中已经发现了男女在适应冲突方向上有相当差异。正如坦嫩在《性别与话语》第 40 页指出的，“对性别和语言的研究都一致发现，男性说话者富有竞争性，更易于引起冲突（例如，通过争论、发号施令和采取反对立场）。女性则是合作式的，更倾向于避免争端（例如通过附和、指出和提出建议而非命令）。”见开始的插入部分。

- 关于类似的论断，又见于翁的《为生存而斗争》第 51 页以及赫林的《性别与民主制》与《人的语言》。
85. 福斯与格里芬，《转变的修辞》第 15 页。又见其《招致转变》。关于另一位女性主义作者的类似讨论，参阅艾尔施泰因的《女性主义话语》。
 86. 福斯、格里芬和福斯，《转变的修辞》第 2 页。
 87. 福斯与格里芬，《超越劝诫》第 3 页。
 88. 同上第 5-6、8 页。
 89. 研究界资料中心，《手册》第 15 页。这个比较是该中心(SCRC)所做的，它帮助各种人参与对话和对有关紧迫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解决。关于更多的资料，请上 www.studycircle 网站。这份资料节选自雪莱·伯曼提供的基于波斯顿社会责任教育家对话群体(ESR)讨论的文章。关于 ESR 的将对话作为处理有争议问题的工具的规划和资料的更多信息请上 <http://esrnational.org/contact.tm> 网站。
 90. 参阅博姆在《论对话》和艾米在《环境调节》中的讨论。
 91. 参阅马修斯和麦卡菲在《共同选择》，布赖恩德在《构建磋商式社区》和《实用政治》，布里奇斯在《磋商和决策》，狄龙在《磋商问题》，以及杰尼罗特在《复杂的磋商世界》。
 92. 例如，参阅狄龙在其论文汇编《教育和社会中的磋商》中的讨论。
 93. 例如，参阅 SCRC 简报《学术界的焦点》。又见凯特林基金会的简报《联结》及其杂志《凯特林评论》。
 94. 伦敦，《提供公共磋商造就公民》。
 95. 罗森，《建立正确联系》。
 96. 关于这些公共新闻原则的讨论，参阅梅里特的《公共新闻和公共生活》罗森、梅里特和奥斯汀的《公共新闻理论和实践》，切利提的《从事公共新闻》及严克洛维奇的《让公众裁判》。
 97. 关于新闻工作者在社会冲突中实际存在的调解作用以及传媒在这方面应起更为建设性作用的讨论，参阅鲁本斯坦等的《解释争端的架构》。又

见争端分析与解决协会的《暴力争端的解释》以及瓦尔哈弗提什的《争端与媒体》及《新闻与冲突解决》。虽然所有这些讨论都没有和公共新闻运动的正式联系，但它们显然都支持公共新闻方式。

98. 参阅皮尔逊的《商业伦理》和《超越公共关系中的伦理相对主义》，格鲁尼格和亨特的《处理公共关系》，格鲁尼格的《相称的预设》，以及克鲁克贝格和斯塔克的《公关与社区》的讨论。

99. 格鲁尼格和亨特的《处理公共关系》。

100. 参阅格鲁尼格在《公共关系模式》和《关于激进主义的研究计划的评论：四国影响、激进公众、激进团体策略和对激进主义的组织反应中》对这些发现的综览，以及格鲁尼格的《公关意义》。

101. 例如，参阅严克洛维奇在《让公众裁判》中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102. 关于审议观点投票的理论和实践，包括在英国和美国国家层面方法学的实际应用分析的详细讨论，参阅菲什金的《民主与审议》及《人民的声音》。

103. 菲什金，《人民的声音》。

104. 同 103。

105. 例如，在许多西方国家主宰公共领域的由广告支持的媒体内，公共新闻业的理想受到高度限制。

106. 例如，参阅格兰特的《司法仲裁》。

107. 关于对仲裁和替代争端解决方式普通原则和实践的概览，参阅艾米在《环境仲裁政治》，布什和福尔格在《仲裁承诺》，考密克在《环境仲裁》，多诺霍，艾伦和伯勒尔在《仲裁中的交流策略》，利特尔约翰沙伊乐和皮尔斯在《仲裁现状的深层结构》，菲舍和布朗在《聚集起来》即费希尔、乌里和巴顿在《谈判力》中的讨论。

108. 例如，参阅皮尔逊的《替代评价》，凯利的《调停的和对抗的离婚解决方式》，利伯曼和亨利的《教训》，乌里、布雷特和戈德伯格的《使争端得到解决》，克劳福特和翁德莱克的《环境争端》，萨斯坎德的《调停公共争端》，萨斯坎德和克鲁克香克的《突破绝境》，科尔布和鲁宾

的《仲裁》，鲁宾和扎特曼的《不对称的谈判》，宾汉姆的《解决环境争端》。

109. 例如，参阅福尔格和布什的《趋向冲突的意识形态和目标》，门克尔-梅多的《调停的多种方式》。

110. 福尔格和布什，《趋向冲突的意识形态和目标》。

111. 同 110 第 19 页。

112. 同 110 第 19-20 页，开始的斜体和括弧部分。

113. 同 110 第 20 页，开始的斜体部分。

114. 关于这些目标的互相兼容性的讨论，参阅门克尔的《调停的多种方式》。

第五章 替代性文化形态

1. 这些数据于 2001 年 8 月 1 日取自世界正义院数据部。关于已经发表的巴哈伊国际社团的规模和发展情况的数据，参阅《巴哈伊世界(2001-2002 年)》。关于巴哈伊社团以外的确认资料，参阅《不列颠百科全书》发表的数据。

2. 例如，参阅守基·埃芬迪在《世界秩序》中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

3. 对巴哈伊社团在朦胧中历史崛起的精辟概述，参阅柯林斯的《在世界的眼目中》，又见哈彻和马丁的《巴哈伊信仰》。

4. 在 <http://www.bahai.org> 可以发现有关这些计划的描述和数据。登录后依次链接“社会行动”“社会与经济发展”“巴哈伊发展规划”“一个全球性学习过程”。

5. 关于巴哈伊国际社团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简明历史和概述，参阅巴哈伊国际社团的《与联合国积极合作史》，或者访问 <http://www.bicun.bahai.org/about.cfm>。

6. 关于这些论文的带注释的参考书目，参阅柯林斯，《参考书目》第 303-319 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包含在《书目》中的论文有社会学家彼

得. I. 伯杰(伯杰和勒克曼的《存在的社会建构》——在第 1 章被引证为 20 世纪社会建构理论一流的阐释者之一)。伯杰的《巴哈伊运动的社会学解释》作为其博士论文,是 1954 年在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完成的。

7. 法泽勒和丹尼士,《巴哈伊学术:一种运用引证分析的考察》。
8. 巴哈欧拉是巴哈伊社团的创始人和巴哈伊教务管理体制的《建筑师》。从 1853 年 36 岁时到 1892 年离世,他都被波斯和奥斯曼帝国囚于囹圄之中,罪名是他领导的一个“异端”运动致力于构建一个新社会体制——这个体制根源于一个灵性世界观,奠基于公正、团结、互相依赖和消除根基于性别、宗教、国度、种族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偏见与歧视的这些原则。在其长达 40 年的囚禁和流放生涯中,他笔耕不辍,包括与整个中东地区支持这个稳步成长社团的人士的大量通讯。在这些圣作中,他表述了巴哈伊社团的基本原则和组织架构。在他逝世前,他指定其长子阿博都-巴哈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建设和加强初生的巴哈伊社团。阿博都-巴哈不负父望,期间直到 1808 年,他都被囚于监牢。出狱后他肩负这个使命,直到 1921 年长眠于世。期间他任命守基·埃芬迪继承他的事业。在阿博都-巴哈和守基·埃芬迪的努力下,新兴的巴哈伊社团终于发展成一个独具特色的全球性组织有素的运动。1957 年守基·埃芬迪逝世后巴哈伊社团的成长达此程度:能够选举中级的国际管理机构——世界正义院,现在,它指导和协调着全球巴哈伊社团的工作。关于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和守基·埃芬迪生平和成就的杰出的学术史,以及巴哈伊社团本身的历史发展状况,参阅哈彻和马丁的《巴哈伊信仰》。
9. 见黑德兰、派克和哈里斯的《音位学和语音学》。
10. 关于有机比喻应用于压迫目的的内容,参阅纳德的《和谐模式》茹弗内尔的《论权力》,施魏策尔的《和谐思想》以及罗斯的《和谐政治》。
11. 关于这个主题的更为详细的讨论,参阅世界正义院的《世界和平的承诺》。
12. 巴哈伊国际社团,《谁在书写我们的未来?》第 7 页。
13. 同 12,《妇女与和平进程》。

14. 同 12,《一个融合世界中的可持续社团》。在一个相关的声明中,巴哈伊主张,“传统的权力和权威概念迫切需要重新加以界定”。(巴哈伊国际社团,《人类的繁荣》第 28 页)。
15. 巴哈伊国际社团,《人类的繁荣》第 28 页。
16. 同 15。《妇女与和平进程》。
17. 同 15。《一个融合世界中的可持续社团》。
18. 守基阿芬第,《世界秩序》第 43 页。
19. 世界正义院的《世界和平的承诺》。
20. 巴哈伊国际社团,《裁军与发展》。
21. 巴哈伊国际社团,《人类的繁荣》第 28 页。
22. 同 21。
23. 同 21,第 8 页。
24. 巴哈伊国际社团,《一个融合世界中的可持续社团》第 3 页。
25. 同 24。
26. 巴哈伊国际社团,《人类的繁荣》第 13 页。
27. 同 26。
28. 同上第 12-13 页。
29. 关于这个主题的更为详细的讨论,参阅巴哈伊国际社团的《世界各国的转折点》第 4、16-18 页。
30. 巴哈伊国际社团,《人类的繁荣》第 16-17 页。
31. 巴哈伊国际社团,《终止对妇女的暴力》。
32. 同 31。
33. 同 31。
34. 巴哈伊国际社团,《联合国十年人权教育》。

35. 同 34。
36. 世界正义院,《世界和平的承诺》第 4 段。
37. 同 36,第 6-7 段。
38. 同 36,第 15 段。
39. 巴哈伊国际社团,《裁军与发展》。
40. 巴哈伊国际社团,《世界各国的转折点》第 4 页。
41. 巴哈伊国际社团,《裁军与发展》。
42. 巴哈伊国际社团,《世界各国转折点》第 4 页。
43. 巴哈伊国际社团,《人类的繁荣》第 14 页。
44. 同 44,第 28-29 页。
45. 世界正义院,《世界和平的承诺》第 9 段。
46. 同 45,第 10 段。与此同时,巴哈伊承认军队在维护正义的法律、保护民众免遭外来侵略和对付暴政及压迫方面是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巴哈伊并非和平主义者。世界正义院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霍恩比在其《导引的明灯》中第 437 页第 1429 条中予以引证。但巴哈伊对过去和现代社会中的普遍不公并非视而不见。正如上述讨论所示。不过,他们鼓吹的是社会结构和实践正以这样的方式转化,他们相信其能够使人们都会更有效地发表关于不公、争端和战争根源的看法。
47. 巴哈伊国际社团,《可持续发展》。
48. 巴哈伊国际社团,《重视发展中的灵性》第 12 页。
49. 巴哈伊国际社团,《人类的繁荣》第 15 页。
50. 同 49。
51. 世界正义院,《个人权利和自由》第 10 段。
52. 同 51 第 23 段。
53. 同 51 第 21 段。

54. 巴哈伊国际社团,《人类的繁荣》第 15 页。
55. 巴哈伊国际社团,《政治参与的平等》。
56. 巴哈伊国际社团,《关于磋商声明》。
57. 同 56。
58. 世界正义院,《个人权利和自由》第 37-41 段。
59. 巴哈伊国际社团,《关于磋商声明》。
60. 同 59。
61. 巴哈伊国际社团,《政治参与的平等》。
62. 同 61。
63. 巴哈伊国际社团,《人类的繁荣》第 15 页。
64. 巴哈伊认识论注解:我们能够直接认识现实的信念根源于欧洲启蒙运动的经验哲学。常常被称之为实证主义的这些哲学的最极端的表現,断言经验主义科学的方式允许人类客观地或实证地解释或认识宇宙及存在于其中的一切现象的实在性。这一观点来源于这个假设:一个(经科学训练的)头脑可以充当现实的一个透镜。但这种假说在过去和现在的世纪里都遭到过这样一些哲学家的广泛挑战:他们指出人类的知识始终都是由语言、思想和经验的架构传达的这个架构塑造着我们的世界观——所以,人类的头脑从来都不能达于现实。举例来说,这些洞见反过来又导致某些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哲学家认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接近过任何现实,即使有一些存在于我们话语之外的东西——这种认识立场被称之为相对主义。从这一相反的极端角度来看,人类的知识被完全视为社会建构。巴哈伊既不赞成这些极端的认识论或认识论。相反,他们假定外部有一个独立于人类意识的真实世界,至少可以部分地为人类所理解。他们还承认,人类理解现实的努力受制于语言、思想、经验等。从这些基本前提出发,巴哈伊源于一种可以被称之为“磋商认识论”,无论集体决策还是学术探究均可应用——各种角度在其中都被视为以合作方式,通过见多识广的对话而非争吵的辩论所进行的智能互补和探寻过程。关于这种磋商认识论的更为详细的讨论,参阅史密斯的《社会建构的相对

性》。简言之，斯密斯证明了极端实证论和极端相对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巴哈伊的磋商中通过一种明显的理解得到协调：认为知识的社会建构本身是一种相对现象。一方面，现实的某些方面比其他方面更为实在。另一方面，当我们考查现实的某些特定方面时，某些概念上的架构比其他的更有启迪作用。因此，人类的理解力也就同时受制于我们所考察的现象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以及我们借以考察它的那种概念架构的相对适当性。基于这种明确理解，巴哈伊采用了一种对现实的磋商态度，以此来寻求各种各样的解释架构，这是由于它们能够提供互补的洞察力。

65. 守基·埃芬迪，《世界秩序》第 58 页。
66. 巴哈伊国际社团，《关于磋商的声明》。
67. 同 66。
68. 世界正义院，《指导的源泉》第 96 页。
69. 巴哈伊国际社团，《政治参与的平等》。
70. 世界正义院，《个人权利与自由》第 24 段。
71. 同 70，第 27 页。
72. 同 71 第 37 页。
73. 同 71。
74. 关于对此主题的更为详致的讨论，参阅世界正义院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和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关于磋商的声明》。
75. 巴哈伊国际社团，《人类的繁荣》第 15 页。
76. 世界正义院 1994 年 5 月致美国全国灵理会的信。
77. 例如，参阅世界正义院的《社团运作》第 12 页所引证的守基·埃芬迪的声明。
78. 例如，参阅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在《选择》第 38、81 页以及世界正义院在《社团运作和磋商》中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
79. 世界正义院，《社团运作》第 10~13 页。

80. 例如，参阅世界正义院关于这个主题的上述讨论。又见《指引明灯》第 592、180 页所引证的守基·埃芬迪以及世界正义院《磋商》第 7~8 页所引证的阿博都一巴哈的有关论述。
81. 世界正义院，《社团运作》第 13 页。
82. 例如，参阅《指引明灯》第 583、177 页所引证的守基·埃芬迪以及世界正义院《个人权利和自由》段 24-26 的有关论述。
83. 例如，参阅世界正义院的《社团运作》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
84. 例如，参阅《指引明灯》第 317、92 页所引证的守基·埃芬迪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
85. 例如，参阅上书第 590、180 页所引证的世界正义院的有关论述。
86. 世界正义院，《世界和平的承诺》段 47。
87. 巴哈伊国际社团，《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秩序》。
88. 巴哈伊国际社团，《地球宪章》/《里约热内卢宣言》
89. 同 88.
90. 关于这些及其他有关巴哈伊基本原则的讨论，参阅阿博都一巴哈的《选择》。又见世界正义院的《世界和平的承诺》，巴哈伊国际社团的《自然宣言》和《人类的繁荣》。
91. 巴哈伊国际社团，《世界各国的转折点》第 12~13 页。
92. 巴哈伊国际社团，《关于磋商的声明》。
93. 巴哈伊国际社团，《人类的繁荣》第 15~16 页。
94. 巴哈伊国际社团，《关于磋商的声明》。
95. 巴哈伊国际社团，《人类的繁荣》第 16 页。
96. 同 95, 第 15 页。
97. 同 95, 第 32 页。

98. 世界正义院,《世界和平的承诺》段 19。
99. 同 98 段 20。
100. 同 98 段 30。
101. 巴哈伊国际社团,《重视发展中的灵性》第 20 页。
102. 同 101。
103. 世界正义院,《世界和平的承诺》段 45。
104. 巴哈伊国际社团,《重视发展中的灵性》第 20 页。
105. 巴哈伊国际社团,《人类的繁荣》第 31 页。
106. 同 105 第 30 页。
107. 同 105 第 31 页。
108. 关于上面列举的选举模式各种要素的讨论,参阅汇编本《巴哈伊选举》。
109. 关于巴哈伊确定选谁应考虑的品质的讨论,参阅上书第 3~4 页引证的守基·埃芬迪的论断。
110. 例如,参阅上书第 4 页引证的守基·埃芬迪的论断。
111. 同 110。
112. 巴哈伊国际社团,《人类的繁荣》第 30 页。
113. 参阅《巴哈伊磋商》和《寻找天国之明灯》论文汇编中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
114. 关于这个独特的行政体制的这些及其他职能的讨论,参阅《顾问制度》论文汇编。
115. 例如,参阅守基·埃芬迪在《世界秩序》第 153 页和《指引明灯》第 59、18 页就这个主题的讨论。

116. 例如，参阅巴哈伊国际社团在《繁荣》（口头声明）和《自然宣言》关于这些主题的讨论。
117. 在这方面，联合国委托的对新独立国家纳米比亚的研究表明，纳米比亚人《考察了世界范围的巴哈伊选举条款》，研究总结道，这些条款当然比大多数国家进行的选举都更为民主。（联合国纳米比亚研究协会《比较选举制度》第 6~7 页）。
118. 世界正义院编辑的《社团运作》。
119. 关于选举这些巴哈伊全国灵理会的程序的详细研究，参阅《全国大会》论文汇编。
120. 守基·埃芬迪，《巴哈伊教务管理体制》第 84 页。
121. 巴哈伊国际社团，《人类的繁荣》第 30~31 页。
122. 巴哈伊国际社团，《世界各国的转折点》第 1~2 页。
123. 巴哈伊国际社团，《防止歧视》。
124. 巴哈伊国际社团，《世界各国的转折点》第 2 页。
125. 同 124。
126. 世界正义院，《世界和平的承诺》段 44。
127. 守基·埃芬迪，《世界秩序》第 202 页。
128. 巴哈伊国际社团，《世界各国的转折点》第 6 页。
129. 关于这个主题更为详细的讨论，参阅世界正义院的《世界和平的承诺》段 44-45 又见守基·埃芬迪的《世界秩序》。
130. 世界正义院，《世界和平的承诺》第 44、48 页。
131. 巴哈伊国际社团，《世界各国的转折点》第 6 页。
132. 同 131 第 5 页。
133. 同 131。

134. 巴哈伊国际社团,《联合国关于人权教育的十年》。
135. 巴哈伊国际社团,《防止歧视》。
136. 巴哈伊国际社团,《人类的繁荣》第 2 页。
137. 下面的讨论特别受惠于法赞姆·阿巴博的《社会转变的程序》。
138. 巴哈伊国际社团,《人类的繁荣》第 8 页。
139. 同 138。
140. 巴哈伊国际社团,《教育、媒体和艺术》。
141. 这方面最新的数据在 <http://222bahai.org> 可以找到,其下链接的书目有《巴哈伊发展规划:一个全球性学习过程》。
142. 关于这一点,巴哈伊承认,“促进特定的道德或价值观可能引起争议特别是在这个人本行动主义时代。然而,我们坚信,的确存在着一种共同价值观,不过被那些因政治目的而夸大宗教或文化实践中的微小差异之人的认识遮掩了。所有宗教团体所教导的这些基本价值观,构成了道德发展的一个根本架构。(巴哈伊国际社团,《世界各国的转折点》第 20 页)。”所以,巴哈伊提出,“置于宗教核心的普世灵性原则——包容、同情、博爱、正义、谦卑牺牲、诚信、为他人福利的身精神和团结——都是进步文明的根基。”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又承认,“对宗教的曲解是各个时代社会分裂、褊狭、仇恨、性别歧视、贫穷、压迫和战争首要根源。的确,今日许多看似棘手的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宗教权威的腐败和滥用。”(巴哈伊国际社团,《社会发展中的宗教》)。
143. 例如,参阅巴哈伊国际社团,《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秩序》。
144. 关于巴哈伊对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态度的深入讨论,参阅维克的《社会与经济发展》。
145. 世界正义院,《世界和平的承诺》段 56。
146. 例如,参阅守基·埃芬迪在《世界秩序》第 23、185、195 页的讨论。

147. 在这方面关于巴哈伊社团在朦胧中的历史崛起的精辟概述，参阅柯林斯的《世界眼中的巴哈伊信仰》。
148. 巴哈伊社团，《世界各国的转折点》第 7 页。
149. 关于本主题的首要巴哈伊文献的杰出汇编，参阅坎的《政治不参与》。
150. 守基·埃芬迪，《世界秩序》第 42 页。
151. 巴哈伊国际社团，《世界各国的转折点》第 1 页。
152. 关于本主题的首要巴哈伊文献的杰出汇编，又见坎的《政治不参与》。
153. 例如，参阅阿搏都一巴哈在《巴黎谈话》第 60 页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
154. 巴哈伊国际社团，《人类的繁荣》第 19 页。
155. 巴哈伊国际社团，《可持续发展》。
156. 例如，参阅守基·埃芬迪的《指引的明灯》第 115 页 393 号和世界正义院《对世界宗教领导人的声明》。
157. 对这些主题的讨论，参阅阿搏都-巴哈的《已答之问》第 214 页及其《公布》第 330、440 页。又见巴哈伊国际社团《重视发展中的灵性》第 14~15 页引证的守基·埃芬迪的论断。
158. 参阅巴哈伊国际社团在《世界和平的承诺》中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
159. 同 158。
160. 巴哈伊国际社团，《可持续发展》。
161. 守基·埃芬迪，《世界秩序》第 43 页。
162. 巴哈伊国际社团，《人类未来的新憧憬》。
163. 例如，参阅诺贝尔在《没有妇女的世界》里对这一遗产的讨论。
164. 关于巴哈伊首要文献对男女平等的概述，以及关于巴哈伊在实践中致力于促进这种平等的概述，参阅坎与坎的《妇女的进步》。

165. 巴哈伊国际社团,《人类的繁荣》第 19 页。
166. 例如,参阅《指引的明灯》第 194-195 页的 637-642 编段、第 20 页 668 编段、第 291 页 986 编段。
167. 同上第 344 页 1156 编段。
168. 巴哈伊在伊朗遭受迫害和自我牺牲的历史记录,参阅西尔斯《心灵的哭声》。自从那段历史撰写后,巴哈伊在伊朗因其信仰而持续遭到迫害、监禁和被否定了基本人权。关于当时这些迫害的第一手记录,包括巴哈伊妇女和女孩们被监禁和处以极刑的情况,参阅露西扎德干的《奥丽雅的故事》。
169. 又见柯林斯的《世界眼中的巴哈伊信仰》中关于巴哈伊社团近年所获得的公众注意的概述。
170. 参阅维克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对巴哈伊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概述。当代巴哈伊发展规划的详细描述,参阅《一个国度》——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在线出版物,可以在 <http://www.bahai.org> 查阅。
171. 例如,参阅坎与坎在其《妇女进步》以及博伊尔斯在其《实现全面伙伴关系的目标》中关于这一原则的讨论。
172. 关于这些奉献的概述,又见坎与坎的《妇女进步》以及博伊尔斯的《实现全面伙伴关系的目标》。
173. 关于这些传统媒体的主动性,参阅 <http://www.bahai.org/94-0605.htm> 发表的文献。
174. 关于这些主动性的轶事以及数据证明,又见 <http://www.bahai.org/950826g.htm>, 以及博伊尔斯的《实现全面伙伴关系的目标》第 259-263 页。
175. 关于促进和保障巴哈伊社团内部团结的《圣约》的概述和讨论,塔赫尔扎德的《巴哈欧拉的圣约》。
176. 马丁,《伊朗巴哈伊少数派的例证》。
177. 博伊尔斯,《实现全面伙伴关系的目标》。

178. 同 117。

179. 马丁,《伊朗巴哈伊少数派的例证》。

180. 同 119。

第六章 超越竞争文化

1. 例如,参阅格兰姆斯和米尔格拉姆的《工匠与合作》,梅里特和沃尔泽的《合作参考书目》以及联合国的《微型贷款在战胜贫困中作用》。
2. 例如,参阅哈珀与罗伊的《合作的成功》以及纳多和汤普森的《合作生效!》。
3. 联合国委托纳米比亚的《比较选举制度》第 6~7 页。
4. 福斯与格里芬,《超越劝诫》第 16~17 页。
5. 回顾第 3 章的讨论。
6. 例如,参阅纳德在《协和模式和法律建构》中表达或总结的批判,施魏策尔的《和谐思想在工厂起作用》,布什和福格尔的《调解承诺》以及德·茹弗内尔的《论权力》。
7. 罗斯,《竞争文化》。
8. 同 7,第 11 页。
9. 同 7,第 9~10 页。
10. 同 7,第 10 页原文的括弧部分。
11. 返回参阅第 2 和第 3 章里提供的讨论和证明。
12. 例如,参阅考尔斯托的《通过磋商改善思维》。

13. 关于对公共新闻的评论，参阅奥斯汀的《公共新闻：一种进步报告》夏丽蒂的《做公共新闻》，沙费尔、米勒和克雷默的《六项个案研究》关于对双向对称公共关系的评论，参阅格鲁尼格的《行动主义研究计划的评论》，格鲁尼格和格鲁尼格的《公关模式》。
14. 世界正义院，《世界和平的承诺》第 56 页。

外文参考文献

Aaseng, Nathan, *The O.J. Simpson Trial: What It Shows Us About Our Legal System*. New York: Walker, 1996.

‘Abdu’l-Bahá. *Paris Talks*.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95

—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2.

—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Abdu’l-Bahá*.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78.

— *Some Answered Questions*.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1.

Ackerman, Fran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equality*.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0.

Adams, Jane. '“Better Citizens without the Ballot”: American Anti-Suffrage Women and Their Rationale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in Marjorie Wheeler(ed.). *One Woman, One Vote: Rediscovering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Troutledge, OR: New Sage Press, 1995.

Akerlof, George. 'Loyalty Filt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3, no. 1 (1983), pp. 54-63.

Allan, Kenneth. *The Meaning of Culture: Moving the Postmodern Critique Forward*. Westport, CT: Praeger, 1998.

Allen, Time, and Jean Seaton (eds.). *The Media of Conflict: War Reporting and Representations of Ethnic Violence*. New York: Zed Books, 1999.

Alonso, Harriet Hyman. *Peace as a Women's Issue: A History of the U. S. Movement for World Peace and Women's Rights*.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3.

Altschull, Herbert. *Agents of Power: 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Human Affairs*. New York: Longman, 1984.

Amy, Douglas. 'Environmental Mediation: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Policy Stalemates'. *Policy Sciences*, no.15(1983),pp.345-65.

—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Mediation*. New York: Columbia Press, 1987.

Anderson, Alison. 'Source-Media Relations: The Prod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Agenda', in Anders Hansen (ed.). *The Mass Media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51-80.

Arbab, Farzam.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Bahá'í Faith and Marxism: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Held January 1986*. Ottawa: Association for Bahá'í Studies, 1987,pp.9--20.

Ardrey, Robert. *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 New York: Atheneum, 1966.

Arendt, Hannah. *On Violence*. San Diego: Harvest Books, 1969.

Arno, Andrew, and Wimal Dissanayake (eds.). *The News Media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4.

Austin, Lisa. 'Public Journalism: A Progress Report'. New York: Project on Public Life and the Press, 1994.

Axelrod, Robert.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Bachrach, Peter, and Morton Baratz. 'Two Faces of Power', in Roderick Bell, David Edwards and Harrison Wagner (eds.). *Political Power: A Reader in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9, pp.94-9.

Bahá'í Consultation.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rev. edn. 1990.

Bahá'í Elections: A Compilation.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90.

Bahá'í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all Bahá'í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documents see <<http://www.bic-un.bahai.org/index.cfm>>.

— Building a Just World Order A Statement to the 41st Session beyond the culture of contest of th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Bangkok, 1985.

— 'The Earth Charter/Rio De Janeiro Declaration and the Oneness of Humanity: A Statement to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1992.

— 'End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 Statement to the 51st Session of the 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Geneva, 1995.

— 'Equality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A Statement to the 34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Vienna, 1990.

— 'History of Active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1999.

— 'A New Vision for Humanity's Future'. New York, 1999.

— 'Prevention of Discrimination and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 Geneva, 1995.

— 'Prosperity: An Oral Statement Presented to the Plen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Summit on Social Development'. Copenhagen, 1995.

— *The Prosperity of Humankind*.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95

— 'The Prosperity of Humankind: A Statement to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Summit on Social Development, Copenhagen, Denmark'. Haifa: Office of Public Information, 1995.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armament and Development: A Statement to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armament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1987.
- 'The Role of Education, Media and the Arts in Social Development: A Statement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the World Summi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New York, 1994.
-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Social Development: A Statement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the World Summi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New York, 1994.
- 'Statement on Consultation'. New York, 1999.
- 'Statement on Nature'. New York, 1988.
-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in an Integrating World: A Concept Paper Shared at the Second un Conference on Human Settlements'. Istanbul, 1996.
-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in an Integrating World: A Statement Presented to the Plenary of the Second un Conference on Human Settlements'. Istanbul, 1996.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Human Spirit'. Rio de Janeiro, 1992.
- Turning Point for All Nations: A Statement of the Bahá'í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n the Occasion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1995.
- 'United Nations Decade on Human Rights Education: A Statement to the 53rd Session of the 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Geneva, 1996.
- Valuing Spirituality in Development*.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98.
- 'Valuing Spirituality in Development: Initial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the Creation of Spiritually Based Indicators for Development: A Statement to the World Faiths and Development Dialogue'. London, 1998.

- *Who is Writing the Future? Reflections o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99.
- 'Women and the Peace Process: A Statement to the 37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Vienna, 1993.
- The Bahá'í World 1993- 1994: An International Record*.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94.
- The Bahá'í World 2001-2002: An International Record*.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2003.
- Baker, C. Edwin. *Advertising and a Democratic Pres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Bakker, Isabella. *Unpaid Work and Macroeconomics: New Discussions, New Tools for Action*. Ottawa: Status of Women Canada, 1998.
- Bakvis, Herman, and Neil Nevitte. 'The Greening of the Canadian Electorate. Environmentalism, Ideology, and Partisanship', in Robert Boardman (ed.) *Canadian Environmental Policy: Ecosystems, Politics, and Process*.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44-63.
- Bandura, Albert. *Aggression: A Social Learning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3.
- Barry, John. *Rethinking Green Politics: Nature, Virtue, and Progress*. London: Sage, 1999.
- Bateson, Patrick. 'Co-operation'. *Cambridge Review*, vol. 150, no. 2 (1985).
- Beasley, Chris. *Sexual Economyths: Conceiving a Feminist Economics*. St Leonards, NSW: Allen and Unwin, 1994.
- Becker, G. 'A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no. 82 (1990), pp. 1063-93.

- Becker, Gary.' Altruism, Egoism, and Genetic Fitness: Economics and Sociobi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no. 14(1976),pp.817—26.
- Bellah, R.,R. Madsen, W. Sullivan, A. Swidler and S. Tipton.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85.
- Bennett, Olivia (ed.). *Greenwar: Environment and Conflict*. London: The Panos Institute, 1991.
- Bergstrom, Theodore, and Oded Stark. 'How Altruism Can Prevail in an Evolutionary Environ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83, no.2 (1993),pp.149 55.
- Bertalanffy, Ludwig von. *General Systems Theory: Foundations, Development, Applications*. New York: Braziller, 1998.
- Biehl, Janet. *Rethinking Ecofeminist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1.
- Bingham, Gail. *Resolving Environmental Disputes: A Decade of Experience*. Washington DC: The Conservation Foundation, 1986.
- Blau, Francine. *The Economics of Women, Men, and Work*.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1998.
- Blau, Peter.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1964.
- Blondel, Jean. *Political Parties: A Genuine Case for Discontent?* London: Wildwood House, 1978.
- Blumenthal, Sydney. *The Permanent Campaign*. Boston: Beacon, 1980.
- Bode, Robert. 'Gandhi's Theory of 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Gandhi Marg*, no. April-June (1994),pp.5-30.
-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s Rhetorical Theory: Implications for Communication Ethic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regon, 1987

- Boggs, Grace Lee, Michael Shuman and Julia Sweig. *Conditions of Peace: An Inquiry: Security, Democracy, Ecology, Economics, Community*. Washington DC: EXPRO Press, 1991.
- Bohm, David. *On Dialogue*.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 Bouissac, Paul (ed.). *Encyclopedia of Semiot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Boulding, Elise. *Women in the 20th Century World*. New York: Sage, 1977.
- Boulding, Kenneth E. *Three Faces of Power*: Newbury Park: Sage, 1990.
- Boyles, Ann. 'Towards the Goal of Full Partnership: One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of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in *The Bahá'í World 1993--1994*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94, pp.237—76.
- Brady, David. *Revolving Gridlock: Politics and Policy from Carter to Clint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 Briand, Michael. *Building Deliberative Communities*. Charlottesville, VA: Pew Partnerships for Civic Change, 1995
- *Practical Politics: Five Principles for a Community That Works*.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 Bridges, David. 'Deliber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in J.T. Dillon(ed.). *Delib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Society*, Norwood, NJ: Ablex, 1994, pp.67—80.
- Brocke-Utne, Birgit.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Peace and Peace Education*.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9.
- Brown, Lester, Christopher Flavin and Hilary French (eds.). *State of the World2000: A Worldwatch Institute Report on Progress toward a Sustainable Society*.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00.
- Brown, Lester, Michael Renner and Brian Halweil (eds.). *Vital Signs 1999: The Environmental Trends That Are Shaping Our Future (World Watch Institute)*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99.

- Bullard, Robert (ed.). *Confronting Environmental Racism: Voices from the Grassroots*. Boston, MA: South End Press, 1993.
- Bullock, Allan, Oliver Stallybrass and Stephen Trombley (eds.). *The Fontana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 London: Fontana Press, 2nd edn. 1988.
- Burt, Edwin. 'Philosophers as Warriors', in Robert Ginsberg (ed.). *The Critique of War*.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69, pp.3041.
- Bush, Robert A. Baruch, and Joseph P. Folger. *The Promise of Mediation. Responding to Conflict through Empowerment and Recogni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94.
- Cappella, Joseph, and Kathleen Hall Jamieson. 'News Frames, Political Cynicism, and Media Cynicism', in Kathleen Hall Jamieson (ed.). *The Media and Politics*.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6, pp.71-84.
- *Spiral of Cynicism: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Goo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Carrithers, Michael. 'Sociality, Not Aggression, is the Key Human Trait', in Signe Howell and Roy Willis (eds.). *Societies at Peac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1989, pp.187--209.
- Casti, John. 'Cooperation: The Ghost in the Machinery of Evolution', in John Casti and Anders Karlqvist (ed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General Evolutionary Processe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94, pp.63-88.
- Center for the Child Care Workforce. *Worthy Work, Unlivable Wages: The National Child Care Staffing Study, 1988—1997*.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the Child Care Workforce, 1998.
- Charity, Arthur. *Doing Public Journalism*.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95.
- Child Care Human Resources Steering Committee. *Our Child Care Workforce*.

- From Recognition to Remuneration: More Than a Labour of Love, Study Summary.* Ottawa: Child Care Human Resources Steering Committee, 1998.
- Chinn, Peggy. *Peace and Power: A Handbook of Feminist Process.* New York: National League for Nursing, 2nd edn. 1989.
- Cholmeley, Robert. *The Women's Anti-Suffrage Movement.* London: 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 1970.
- Chrislip, David. 'Pulling Together: Creating a Constituency for Change'. *National Civic Review*, Winter (1995), pp.21—9.
- Clement, Wallace. *The Canadian Corporate Elite: An Analysis of Economic Power.*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75.
- Clift, Eleanor, and Tom Brazaitis. *War without Bloodshed: The Art of Politics.* New York: Touchstone, 1997.
- Club of Rome. *The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 University Books, 1972.
- Cole, Margaret. *The Story of Fabian Socialism.* New York: Wiley, 1964.
- Collard, David. *Altruism and Economy.* Oxford: Martin Robinson, 1978.
- Collins, William. 'The Bahá'í Faith in the Eyes of the World: What the Print Media Report About the Bahá'í Faith', in *The Bahá'í World 1992--1993: An International Record.*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93, pp.147-67.
- Bibliography of English-Language Works on the Bábí and Bábí Faiths:1844—1985.* Oxford: George Ronald, 1990.
- Connolly, William. *The Terms of Political Discourse.* Lexington, MA: D. C. Heath, 1974.
- Cope-Kasten, Vance. 'A Portrait of Domination Rationality'.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Newsletter on Feminism, Law, Medicine Teaching.* vol. 88, no.2 (1988), pp.29—34.
- Cormick, Gerald W.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Mediation'. *The Environmental Professional*, vol.2(1980), pp.24—33.

- Coser, Lewis. 'The Notion of Power: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in Lewis Coser and Bernard Rosenberg (eds.). *Sociological Theory: A Book of Readings*. New York: Macmillan, 1976, pp.150-61.
- Cound, John J. , Jack H. Friedenthal and Arthur R. Miller. *Civil Procedure, Cases on Pleading and Procedure*. St Paul, MN: West Publishing, 1968.
- Cox, Gary, and Samuel Kernell (eds.). *The Politics of Divided Government*.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1.
- Crowfoot, James, and Julia Wondolleck. *Environmental Disputes: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Conflict Resolution*.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0.
- Curran, James. 'Mass Media and Democracy Revisited', in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Arnold, 1996 pp.81—119.
- Curtin, John. *Class Justice: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merican Criminal Jurisprudence*. Dubuque, IA: Kendall/Hunt, 1996.
- Dahl, Robert. 'The Concept of Power', in Roderick Bell, David Edwards and Harrison Wagner (eds.). *Political Power: A Reader in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9, pp.81—119.
- 'Power as the Control of Behavior', in Steven Lukes (ed.). *Powe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37—58.
- Dahlgren, Peter.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Citizenship, Democracy and the Media*. London: Sage, 1995.
- Dale, Stephen. *McLuhan's Children: The Greenpeace Message and the Media*.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1996.
- DeBardeleben, Joan, and John Hannigan (eds.).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Quality after Communism: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5.

- Defens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Performance Review: Environmental Security Committee, Final Report July 15, 1993*.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93.
- Dershowitz, Alan. *The Best Defense*. New York: Random House,1982.
- DeVault, Marjorie. *Feeding the Family: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aring as Gendered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Dewey, John.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6—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Chicago: Swallow Press, 1954.
- Dillon, J.T. *Delib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Society*. Norwood, NJ: Ablex, 1994.
- 'The Questions of Deliberation', in J.T. Dillon (ed.). *Delib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Society*. Norwood, NI: Ablex, 1994, pp.3—24.
- Dionne,E. J. *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 New York: Touchstone, 1991.
- Dirks, Nicholas B., Geoff Eley and Sherry B. Orthner (eds.). *Culture, Power History: A Rea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Donohue, William A., Michael Allen and Nancy Burrel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Mediation'. *Mediation Quarterly*, no.10 (1985),pp.75—89.
- Douthwaite, Richard. *The Growth Illusion: How Economic Growth Has Enriched the Few, Impoverished the Many, and Endangered the Planet*. Tulsa, OK: Council Oak Books, 1993.
- Dowding, Keith. *Power: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Downs, Anthony,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5.
- Dycus, Stephen. *National Defense and the Environment*. 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6.

Dyson, Rose. *Mind Abuse: Media Violence in an Information Age*. Montreal, QC: Black Rose Books, 1999.

Eagleton, Terry. *Ideology*. London: Longman, 1994.

Eco, Umberto. *A Theory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Edsall, Thomas Byrne. *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mpany, 1984.

Eibl-Eibesfeldt, I. *The Biology of Peace and War*.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9.

Eisler, Riane. *The Chalice and the Blade: Our History, Our Future*. San Francisco: Harper, 1987.

Ekins, Paul. *Green Economics*. London: Gaia Books, 1992. Ellsberg, Patricia, and Elissa Melamed. 'Seeing through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Two Women Look at the Nuclear Issue', in Diana Russell (ed.). *Exposing Nuclear Phallacies*.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9, pp.84--92.

Elshtain, Jean Bethke. 'Feminist Discourse and Its Discontents: Language, Power and Meaning'.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vol.7,no.3 (1982) pp.603—21.

— *Women and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nd edn. 1995.

Emmet, Dorothy. 'The Concept of Pow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London, 1953.

Engelhart, Kurt. *Application of Systems Theory to General Social Theory*. Rohnert Park, CA: Engelhart, 1995.

Ericson, Richard, Patricia Baranek and Janet Chan. *Negotiating Control: A Study of News Sourc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9.

Etzioni, Amitai. *The New Golden Rule: Community and Moralit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London: Profile. 1997.

- 'Sharing Core Values', in Amitai Etzioni (ed.). *The New Golden Rul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6, pp.85--118.
- Evensky, Jerry. 'Ethics and the Classical Liberal Tradition in Economic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24 (1992), pp. 61--77.
- Fallows, James. *Breaking the News: How the Media Undermine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7.
- Fazel, Seena, and John Danesh. Bahá'í Scholarship: An Examination Using Citation Analysis'. *Bahá'í Studies Review*, vol.5,no.1(1995).
- Fellman, Gordon. *Rambo and the Dalai Lama: The Compulsion to Win and Its Threat to Human Surviva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 Filson, Gerald. 'Cooperative Inquiry as a Theory of Practice: Contributions of John Dewey and Jurgen Haberma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92.
- Fisher, Roger, and Scott Brown. *Getting Together: Building Relationships as We Negotiate*. New York: Penguin, 1988.
- Fisher, Roger, William Ury, and Bruce Patton. *Getting to Yes: Negotiating Agreement without Giving In*. New York: Penguin, 2nd edn. 1991.
- Fishkin, James. *Democracy and Deliberatio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Public Opinion & Democracy*.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Fishlow, Albert, and Karen Parker. *Growing Apart: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Global Wage Inequalit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 Fiske, John.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London: Methuen, 1982.
- Folbre, Nancy (ed.). *The Economics of the Family*. Cheltenham: E. Elgar Publishers, 1996.

Folger, Joseph P., and Robert A. Baruch Bush. 'Ideology, Orientations to Conflict, and Mediation Discourse', in Joseph Folger and Tricia Jones (eds.). *New Directions in Medi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erspectiv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4, pp.3--25.

Follett, Mary Parker. 'Power', in Henry C. Metcalf and L. Urwick (eds.). *Dynamic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1942, pp.95--115.

Foss, Sonja, and Karen Foss. *Inviting Transformation: Presentational Speaking for a Changing World*.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1994

Foss, Sonja, and Cindy Griffin. 'Beyond Persuasion: A Proposal for an Invitational Rhetoric'.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vol.62, March(1995), pp.2—18.

Foss, Sonja, Cindy Griffin and Karen Foss. 'Transforming Rhetoric through Feminist Reconstruction: A Response to the Gender Diversity Perspective' *Wome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vol. 20, no.2 (1997), pp.117-35.

Foucault, Michael.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avistock, 1972.

Frank, Robert. 'If Homo Econumus Could Choose His Own Utility Function. Would He Want One with a Consci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7(1987), pp.593—604.

— *Passions within Reason*. New York: W.W. Norton, 1988.

Frank, Robert, Thomas Gilovich and Dennis Regan. 'Does Studying Economics Inhibit Cooper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7, no. 2, Spring (1993), pp.159—71.

Frankel, Marvin E. *Partisan Justic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0.

— 'The Search for Truth: An Umpireal View'.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975).

- Franklin, Marc. *Biography of a Legal Dispute*. Mineola, NY: Foundation Press 1968.
- Fraser, Nancy.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in Bruce Robbins (ed.). *The Phantom: Public Sphe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p.1—32.
- Frazer, Elizabeth. '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 in Stevi Jackson and Jackie Jones(eds.).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eories*. Washington Squar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50—61.
- Freedman, Dean. *Lawyers' Ethics in an Adversary System*. Indianapolis, IN. Bobbs-Merrill, 1975.
- Fromm, Erich. *Marx'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Continuum, 1998.
-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AvonBooks.1993.
- Galanter, Marc. 'A Settlement Judge, Not a Trial Judge: Judicial Medi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vol. 12 (1985), pp.1—18.
- 'Why the "Haves" Come Out Ahead: Speculations on the Limits of Legal Change'. *Law and Society Review*, vol. 95(1974).
- Gamson, William. *Power and Discontent*. Homewood, IL: Dorsey Press, 1968.
- Gandy, Oscar. *Beyond Agenda Setting: Information Subsidies and Public Policy*. Norwood, NJ: Ablex.1982.
- 'Information in Health: Subsidized News? '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2no.2 (1980), pp.103--15.
- 'Public Relations and Public Policy: The Structuration of Domina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n E. Toth and R. Heath(eds.). *Rhetorical and Critical Approaches to Public Relations*. Hillsid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2, pp.131-64
- Gans, Herbert J.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New York: Vintage.1979.

Gans, Joshua. *The Many Endogenous Limits to Economic Growth*. St Lucia, Qld: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1989.

Gardiner, Jean. *Gender, Care, and Economics*.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7.

Gearhart, Sally Miller. 'The Womanization of Rhetoric'.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2(1979),pp.195—201.

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Fontana, 1973.

Genelot, Dominique. 'The Complex World of Deliberation', in J.T. Dillon (ed.). *Delib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Society*. Norwood, NJ: Ablex, 1994, pp.81—98.

George, Carl, *Peace and the Ecological Ethic, a Unity*. New Paltz, NY: Mohonk Trust, 1969.

Gerbner, George. 'Epilogue: Advancing on the Path of Righteousness (Maybe)', in N. Signorielli and M. Morgan(eds.). *Cultivation Analysis: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90,pp.249—62.

Gerbner, George, and L. Gross. 'Living with Television: The Violence Profil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26(1976),pp.173—99.

Giddens, Anthony.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Power” in the Recent Writings of Talcott Parsons’. *Sociology*, vol. 2, no. 3 (1968), pp. 257—72.

Gitlin, Todd. 'After the Failed Faiths: Beyond Individualism, Marxism, and Multi-Culturalism'.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21, no.1(1995),pp. 61—8.

- 'Bites and Blips: Chunk News, Savvy Talk and the Bifurc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in Peter Dahlgren and Colin Sparks(eds.).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New Media Age*. London: Routledge, 1991,pp.119—36.
- 'The Rise of Identity Politics: An Examination and a Critique'. *Dissent*, vol40, no.2 (1993),pp.172—7.
- The Twilight of Common Dreams: Why America is Wracked by Culture Wars*.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1995.
-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 Glassner, Barry. *The Culture of Fe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Gorsky Morley. 'The Adversary System'. *Philosophical Law: Equality, Adjudication, Privacy* (1978).
- Gramsci, Antonio.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Edited by Ouinton Hoare and Geoffrey N.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 Gray, Virginia.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and Democratic Gridlock'.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vol. 20, no.4 (1995),pp.531—52.
- Green, Patrice. *Military Implications of Global Warming*. Carlisle Barracks, PA: U.S. Army War College, 1999.
- Greider, William. *Who Will Tell the People? The Betrayal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2.
- Grimes, Kimberly M., and B. Lynne Milgram (eds.). *Artisans and Cooperatives. Developing Alternative Trade for the Global Economy*.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0.

Grunig, James. 'Implications of Public Relations for Other Domains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43, no.3 (1993), pp.164—73.

—Symmetrical Presuppositions as a Framework for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in Carl Botan and Vincent Hazelton (eds.).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89, pp.17—44.

Grunig, James, and Larissa Grunig. 'Models of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in James Grunig (ed.). *Excellence in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2, pp.285-326.

—'Review of a Program of Research on Activism: Incidence in Four Countries. Activist Publics, Strategies of Activist Groups, and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to Activ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ourth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Symposium, Manag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Lake Bled, Slovenia, 11—13 July 1997.

Grunig, James, and T. Hunt. *Managing Public Relations*. New York: CBS College Publishing, 1984.

Habermas, Jürgen. 'The Public Sphere'. *New German Critique*, vol.3(1974), pp.45—55.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ranslated by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Hackett, Robert. 'A Hierarchy of Access: Aspects of Source Bias in Canadian TV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vol. 62, no.2 (1985), pp.256—65, 277.

—*News and Dissent: The P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Peace in Canada*. Norwood NJ: Ablex, 1991.

Hackett, Robert, and Yuezhi Zhao.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Toronto: Garamond Press, 1998.

- Hall, Stuart.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vol. 10, no. 2 (1986), pp. 45—60.
- 'Race, Articulation, and Societies Structured in Dominance', in *Sociological Theories: Race and Colonialism*. Paris: UNESCO, 1980, pp. 305-45.
-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 in Michael Gurevitch, Tony Bennett, James Curran and Janet Woollacott (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London: Routledge, 1994.
- 'The Work of Representation', in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1997, pp. 13—74.
- Hall, Stuart, Chas Critcher, Tony Jefferson, John Clarke and Brian Roberts.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Macmillan, 1978.
- Hammond, Peter. 'Charity, Altruism or Cooperative Egoism?', in E. Phelps (ed.). *Altruism, Morality, and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75.
- Harper, Malcolm, and A.K. Roy. *Co-Operative Success: What Makes Group Enterprise Succeed*. New Delhi: Oxford and IBH Pub. Co., 2000.
- Hartsock, Nancy. *Money, Sex, and Power: Towards a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w York: Longman, 1983.
- 'Political Change: Two Perspectives on Power'. *Quest: A Feminist Quarterly*. vol. 1, no. 1 (1974), pp. 10—25.
- Harwood Group. *Citizens and Politics: A View from Mainstreet America*. Dayton, OH: Kettering Foundation, 1991.
- Haseler, Stephen. *The Super Rich: The Unjust New World of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 Hatcher, William, and Douglas Martin. *The Bahá'í Faith: The Emerging Global Religion*.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rev. edn. 1998.

- Headland, T. K., Pike and M. Harris (eds.). *Emics and Etics: The Insider/Outsider Debate*. Newbury Park, CA: Sage, 1990.
- Heibert, Ray (ed.). *Impact of Mass Media*. New York: Longman, 4th edn. 1999.
- Heiman, Michael. *Race, Waste and Class*. Oxford: Blackwell, 1996.
- Held, David. *Models of Democra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nd edn. 1996.
- Herman, Edward, and Noam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8.
- Herring, Susan, 'Gender and Democracy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3, no. 2 (1993)
- 'Men's Language: A Study of the Discourse of the Linguist List', in André Crochtiere, Jean-Claude Boulanger and Conrad Ouellon (eds.). *Proceedings of the XV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s*. Quebec: Université Laval, 1993.
- Heston, Alan, Neil Weiner, and Suzanne Helburn (eds.). *The Silent Crisis in U. S. Child Care*.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9.
- Hirshleifer, Jack. 'On the Emotions as Guarantors of Threats and Promises', in John Dupree (ed.). *The Latest and the Best: Essays on Evolution and Optimalit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7, pp. 307—26.
- Hollander, Heinz. 'A Social Exchange Approach to Voluntary Coope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0 (1990), pp. 1157-67.
- Honderich, Ted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Hooks, Bell.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4.
- Talking Back: Thinking Feminist, Thinking Black*.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9.

Howell, Signe, and Roy Willis. 'Introduction', in Signe Howell and Roy Willis(eds.). *Societies at Peac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1989,pp.1--28.

Institute for Conflict Analysis and Resolution. *Interpreting Violent Conflict: A Conference for Conflict Analysts and Journalists*. Fairfax, VA: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1990.

Jacobs, Michael. *The Green Economy: Enviro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Future*. Vancouver: UBC Press, 1991.

Jamieson, Kathleen Hall. *Dirty Politics: Deception, Distraction, and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Jhally, Sut. *The Codes of Advertising: Fetishism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aning in the Consumer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1987.

—*The Crisis of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Media and Democracy in the 21st Century*. Northampton, MA: The Media Education Foundation, 1997 (video).

Johnson, Haynes, and David Broder. *The System: The American Way of Politics at the Breaking Point*.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6.

Jones, David Richard. 'Parties, Institutions, and Gridlock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sis, UCLA,1998.

Jouvenel, Bertrand De. *On Power: The Natural History of Its Growth*. Translated by J. F. Huntington.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93.

Käkönen, Jyrki. *Green Security or Militarized Environment*. AldershotDartmouth,1994.

—(ed.). *Perspectives on Environmental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s, 1992.

Karlberg, Michael. 'News and Conflict: How Adversarial News Frames Limit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Alternatives: Perspectives on Society,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vol. 23, no.1(1997), pp.22—7.

Kassiola, Joel. *The Death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he Limits to Growth and the Repoliticization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Kehoe, Alice. 'Conflict is a Western Worldview', in Vivian Rohrl, M. Nicholson and Mario Zamora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Peace*. Williamsburg, VA Studies in Third World Societies, 1992, pp.55-66.

Kellner, Douglas. *Television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0.

Kelly, Joan. 'Mediated and Adversarial Divorce Resolution Processes: An Analysis of Post-Divorce Outcomes'. The Fund for Research in Dispute Resolution, 1990.

Kelly, Petra. 'Women and Power', in Karen J. Warren (ed.). *Ecofeminism. Women, Culture, N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12—19.

Kemp, Graham. 'Nonviolence: A Biological Perspective', in Chadwick Algeand Michael Stohl (eds.). *A Just Peace through Transform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8,pp.112—26.

Khan, Janet, and Peter Khan. *Advancement of Women: Bahá'i Perspective*. Wilmette, IL: Bahá'i Publishing Trust, 1998Khan, Peter (ed.). *Political Non-Involvement and Obedience to Government: [Sydney]: Bahá'i Publications Australia,1984.*

Kochler, Hans (ed.). *Green Dialogue for an Alternative World Order.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Green-Alternative and Peace Movements Held in Sirte, 12-14 June 1992*. Vienna: Jamahir Society for Culture and Philosophy, 1995.

- Kohn, Alfie. *The Brighter Side of Human Nature: Altruism and Empathy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 No Contest: *The Case against Competi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2.
- Kolb, Deborah, and Jeffrey Rubin. ‘Mediation through a Disciplinary Kaleidoscope: A Summary of Empirical Research Findings’. *Dispute Resolution Forum*, October (1989),pp.3—8.
- Kolstoe, John. ‘Improved Thinking through Consultation’, in *Developing Genius: Getting the Most Out of Group Decision Making*. Oxford: George Ronald,1995, pp.231—48.
- Konner, Melvin. *The Tangled Wing: Biological Constraints on the Human Spirit*.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4.
- Kramarae, Cheris, and Paula Treichler. *Amazons, Bluestockings and Crones: A Feminist Dictionary*. Muriel Schulz and William M. O'Barr (eds.). London: Pandora, 1992.
- Kropotkin, Petr. *Mutual Aid: A Factor in Evolution*.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89.
- Kruckeberg, Dean, and Kenneth Stark.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ty*. New York: Praeger,1988.
- Lake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 Lakoff, Robin. *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1975.
- Landes, Joan.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 Landsman, Stephan. *The Adversary System: A Description and Defense*. Washingt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84.

Larrain, Jorge.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Brookfield, VT: Gregg Revivals, 1992.

Laszlo, Ervin. *The Inner Limits of Mankind: Heretical Reflections on Today's Values, Culture and Politics*. Oxford: Oneworld, 1989.

Lattimore, Ralph. "Is It Rational to Be Rational?" The Case of Economists'. *Economic Notes*, vol.21 (1992), pp.395—417.

Leakey, Richard, and Roger Lewin. *Origins: What New Discoveries Reveal About the Emergence of Our Species*. London: MacDonald and Jane's, 1977.

Leiss, William, Stephen Kline, and Sut Jhally.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Advertising: Persons, Products & Images of Well-Being*. London: Routledge. 2nd edn. 1997.

Lemkow, Anna. *The Wholeness Principle*. London: Quest Books, 1990.

Lewontin, R.C. *Biology as Ideology: The Doctrine of DNA*.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1.

Lieberman, Jethro, and James Henry. 'Lessons from the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Movemen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 53 (1986) pp.424 -39.

Lights of Guidance: A Bahá'í Reference File. Compiled by Helen Hornby. New Delhi: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5th edn.1997.

Littlejohn, Stephen, Jonathon Shailor and W. Barnett Pearce. 'The Deep Structure of Reality in Mediation', in Joseph Folger and Tricia Jones (eds.). *New Directions in Medi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erspectiv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4 pp.67—83.

Lloyd, G. E.R. *Polarity and Analogy: Two Types of Argumentation in Early Greek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 London, Scott. *Creating Citizens through Public Deliberation: Eleven International Case Studies*. Dayton, OH: Kettering Foundation, 1997.
- Lorenz, Konrad. On Aggression. London: Methuen, 1966 Lowi, Miriam, and Brian Shaw.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 Discourse and Practic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 Lukes, Steven. *Power: A Radical View*. London: Macmillian, 1974-(ed.). Powe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6.
- Lunati, Teresa. 'On Altruism and Cooperation'. *Methodus*, vol.4, December (1992), pp.69—75.
- Lyon, Vaughan. 'The Future of Parties-Inevitable ...Obsolete? ' *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 vol. 18,no.4 (1984),pp.108—31.
- 'Green Politics: Parties, Election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Robert Boardman (ed.).*Canadian Environmental Policy: Ecosystems, Politics, and Process*,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pp.126—43.
- Macpherson, C.B. *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Maieru, Alfonso. *University Training in Medieval Europe*. Translated by D. N. Pryds. Leiden: E. J. Brill, 1994.
- Mansbridge, Jane. *Beyond Adversary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ed.), *Beyond Self-Inter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 Margolis, Howard. *Selfishness, Altruism, and Ration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Margulis, Lynn. *Symbiotic Planet: A New Look at 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8.
- Margulis, Lynn, and Rene Fester (eds.). *Symbiosis as a Source of Evolutionary Innov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1

Mark, Vernon Hershel, and Frank Ervin. *Violence and the Brain*. San Francisco: Harper and Row, 1970.

Martin, Douglas. *The Case of the Bahá'í Minority in Iran*. Haifa: World Centre Publications, 1993.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67.

Mathews, David. *Politics for People: Finding a Responsible Public Vo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

Mathews, David, and Noelle McAfee. *Making Choices Together: The Power of Public Deliberation*. Dayton, OH: Kettering Foundation, 1997.

McAllister, Pam (ed.). *Reweaving the Web of Life: Feminism and Nonviolence*. Philadelphi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82.

McKinnon, Michael. *Tides of War*. London: Boxtree, 1991.

McMurtry, John. *The Structure of Marx's Worldview*.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Meadows, Donella H. 'Changing the World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sphere', in Craig L. LaMay and Everette E. Dennis (eds.). *Media and the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1, pp.67—79.

Menkel-Meadow, Carrie. 'The Many Ways of Medi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s, Ideologies, Paradigms, and Practices'. *Negotiation Journal*, vol.11, no.3 (1995), pp.217—42.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sputes by Lawyers: What the Dispute Paradigm Does and Does Not Tell Us'. *Journal of Dispute Resolution*, vol.25 (1985).

—'The Trouble with the Adversary System in a Postmodern, Multicultural World'. *William and Mary Law Review*, vol. 38, no.1 (1996), pp.5—44.

- Merloni, Vittorio. 'Cooperative Competition Is Possible', in Roberto Papini Antoni Pavan and Stefano Zamagni (eds.). *Living in the Global Society*. Sydney: Ashgate, 1997, pp. 235-8.
- Merrett, Christopher D., and Norman Walzer. *Bibliography of Cooperatives an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Macomb, IL: Illinois Institute for Rural Affairs, 1999.
- Merritt, Davis. *Public Journalism and Public Life: Why Telling the News Is Not Enough*.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8.
- Milbrath, Lester. 'Making Connections: The Common Roots Giving Rise to the Environmental, Feminist and Peace Movements'.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olitical Psychology*, July (1988).
- Miller, Jean Baker. 'Colloquium: Women and Power'. *Work in Progress (Stone Center for Developmental Services and Studies)*, vol. 82-01 (1982), pp. 1—5.
- *Toward a New Psychology of Women*. Boston: Beacon Press, 2nd edn. 1976.
- Mirsche, Patricia. 'The Earth as Peace Teacher', in Elise Boulding, Clovis Brigagao and Kevin Clements (eds.). *Peace Culture and Society. Transnational Research and Dialogu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1 pp. 133—46.
- Mishan, Edward J. *The Costs of Economic Growth*.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93.
- Montagu, Ashley. *The Nature of Human Aggres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ed.). *Learning Non-Aggress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Morgan, Michael, and Nancy Signorielli. 'Cultivation Analysis: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thodology', in N. Signorielli and M. Morgan (eds.). *Cultivation Analysis: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90, pp. 13—34.

Morley, David, and Kuan-Hsing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6.

Morris, Desmond. *The Naked Ape*.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8.

Morris, Mary. *Water Scarcity and Security Concerns in the Middle East*. Abu Dhabi: Emirates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and Research, 1998.

Moulton, Janice. 'A Paradigm of Philosophy: The Adversary Method', in Sandra Harding and Merrill Hintikka (eds.). *Discovering Reality: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Epistemology, Metaphysics,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Boston: Kluwer Boston, 1983.

Myers, Norman. *Ultimate Security: The Environmental Basis of Political Stability*.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6.

Nadeau, E.G., and David J. Thompson. *Cooperation Works!: How People Are Using Cooperative Action to Rebuild Communities and Revitalize the Economy*. Rochester, MN: Lone Oak Press, 1996.

Nader, Laura. 'Harmony Model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aw', in Kevin Avruch, Peter Black and Joseph Scimecca (eds.). *Conflict Resolution: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1, pp.41—60.

National Convention: A Compilation. Mona Vale, Australia: Bahá'í Publications Australia, 1993.

Nelson, Joyce. *Sultans of Sleaze: Public Relations and the Media*.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1989.

Newcombe, Hanna. *Further Reflections on Peace*. Dundas, ON: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1995.

Noble, David. *A World without Women: The Clerical Christian Culture of Western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Nordland, Eva. *Project for Ecological and Cooperative Education(P. E.A.CE.)*.
Malmo, Swede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Research
School of Education, Malmo, Lund University, 1994.
- Nordguist, Joan. *Environmental Racism and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 A Bibliography*. Santa Cruz, CA: Reference and Research
Services, 1995.
- Ogden, Charles, and Ivor Richar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London:
Routledge, 1923.
- Olson, Walter. *The Litigation Explosion: What Happened When America
Unleashed the Lawsuit*. New York: Truman Talley Books, 1991.
- Ong, Walter. 'Agonistic Structures in Academia: Past to Present', *Interchange: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5 (1974), pp.1--12.
- Fighting for Life: Contest, Sexuality, and Consciousnes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 O'Sullivan, Tim, John Hartley, Danny Saunders, Martin Montgomery and John
Fiske (eds.). *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nd edn. 1994.
- Papini, Roberto, Antoni Pavan and Stefano Zamagni. 'Towards Co-operative
Competition', in Roberto Papini, Antoni Pavan and Stefano Zamagni (eds.)
Living in the Global Society. Sydney: Ashgate, 1997, pp.233—4.
- Parenti, Michael. *Democracy for the Few*.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6th edn
1995.
- Parker, Lea.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Messages, Media & Methods*.
Dubuque, IA: Kendall/Hunt, 1997.
- Parsons, Talcott. 'Power and the Social System', in Steven Lukes(ed.). *Powe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94—143

Pearson, Jessica. 'An Evaluation of Alternatives to Court Adjudication'. *The Justice System Journal*, vol.7 (1982),pp. 420 44.

Pearson, Ron. 'Beyond Ethical Relativism in Public Relations: Coorientation, Rules, and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Symmetry', in James Grunig and Larissa Grunig (eds.).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Annual*.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89,pp.67—86

—'Business Ethics as Communication Ethics: Public Relations Practice and the Idea of Dialogue', in Carl Botan and Vincent Hazelton (eds.).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89, pp.111—31.

Petrella, Riccardo. 'Beyond the Myth of Competitiveness: Disarming the Economy for a New Social Contract', in Roberto Papini, Antoni Pavan and Stefano Zamagni (eds.). *Living in the Global Society*. Sydney: Ashgate, 1997,pp.246—56.

Petrikin, Jonathan. *Environmental Justice*. San Diego, CA: Greenhaven Press, 1995.

Pitkin, Hannah. *Wittgenstein and Justic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orritt, Jonathon. *Seeing Green: The Politics of Ecology Explaine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5.

Proudhon, Pierre-Joseph. *What Is Proper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ye, A. Kenneth, 'The Role of Counsel in the Suppression of Truth'. *Duke Law Journal* (1978).

Reardon, Betty. *Sexism and the War System*.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6.

—*Women and Peace: Feminist Visions of Global Securit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 (ed.) *Learning Peace: The Promise of Ecological and Cooperative Education*. Edited by Eva Nordlan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4.
- Rehnquist, William. 'The Adversary Society'. *University of Miami Law Review*, vol. 33, no.1 (1978),pp.1—20.
- Reismann, David, Reuel Denny, and Nathan Glazer. *The Lonely Crow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1.
- Richardson, Meryyn, *The Effects of War on the Environment: Croatia*. London: E. and F. N. Spon, 1995.
- Roohizadegan, Olya, *Olya's Story: A Survivor's Dramatic Account of the Persecution of Baha'is in Revolutionary Iran*. Oxford: One world Publications 1993.
- Rose, Laurel L. *The Politics of Harmony: Land Dispute Strategies in Swazi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Rose, Steven, R.C. Lewontin, and Leon Kamin. *Not in Our Genes: Biology Ideology, and Human Nature*. New York: Penguin, 1987.
- Rosen, Jay. *Getting the Connections Right: Public Journalism and the Troubles in the Press*.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Press. 1996.
- Rosen, Jay, Davis Merritt and Lisa Austin. *Public Jour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Lessons from Experience*. Dayton, Ol: Kettering Foundation, 1997.
- Ross, Marc Howard. *The Culture of Conflict: Interpretations and Interest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Rubenstein, Richard, Jannie Botes, Frank Dukes and John Stephens. *Frameworks for Interpreting Conflicts*. Fairfax, VA: Institute for Conflict Analysis and Resolution,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1994.
- Rubin, Jeffrey, and William Zartman. 'Assymetrical Negotiations: Some Survey Results that May Surprise'. *Negotiation Journal*, October (1995), pp.349—64.

- Rubinstein, Robert. 'Cultural Analysi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Robert Rubinstein and Mary Le Cron Foster (eds.). *The Social Dynamics of Peace and Conflict*.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8.
- Ruddick, Sara. *Maternal Thinking: Toward a Politics of Peace*.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 Rushton, Phillippe. 'Altruism and Society: A Social Learning Perspective'. *Ethics*, vol. 92, no.3 (1982), pp.425-46.
- Ryan, A. 'The Nature of Human Nature in Hobbes and Rousseau', in J. Benthall(ed.). *The Limits of Human Nature*. London: Allen Lane, 1973.
- Saltzburg, Stephen. 'Lawyers, Clients, and the Adversary System'. *Mercer Law Review*, vol. 37 (1986), pp. 647—99.
- Samuelson, Paul. 'Altruism as a Problem Involving Group Versus Individual Selection in Economics and Biolog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83, no.2(1993), pp.143—8.
- Satha-Anand, Chaiwat. 'From Violent to Nonviolent Discourse', in Elise Boulding, Clovis Brigagao and Kevin Clements (eds.). *Peace Culture and Society: Transnational Research and Dialogu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1, pp.124 —33.
- Saussure, Ferdinand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London: Peter Owen, 1960.
- Scannell, Paddy, Philip Schlesinger and Colin Sparks (eds.). *Culture and Power. A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Reader*: London: Sage, 1992.
- Schaffer, Jan, Edward Miller, and Staci Kramer (eds.). *Civic Journalism: Six Case Studies*. Washington DC: Pew Center for Civic Journalism, 1995.
- Schlesinger, P. 'Rethinking the Sociology of Journalism: Source Strategies and the Limits of Media-Centrism', in M. Ferguson(ed.). *Public Communication. The New Imperatives*. London: Sage, 1990, pp.61—83.

Schumpeter, Joseph.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76.

Schweitzer, Mary. 'Harmony Ideology Works at the Mill', in Alvin Wolfe and Honggang Yang (eds.). *Anthrop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Conflict Resolution*.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p.199—30.

Scott, Steve. 'Legislative Gridlock: California Isn't the Only Place Where the Legislature Has Trouble Getting Things Done'. *California Journal*, vol. 24,no.7 (1993),pp.31—4.

Sears, William. *A Cry from the Heart*. Oxford: George Ronald, 1982.

Seeking the Light of the Kingdom: Compilations issued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on the Nineteen Day Feast and Bahá'í Meetings.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5.

Seville. 'Statement on Violence, Seville, May 16, 1986'. *Medicine and War*, vol. 3 (1987),pp.191--3.

Seward, Michael. 'Green Democracy', in Andrew Dobson and Paul Lucardie (eds.). *The Politics of Nature: Explorations in Green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93.

Shabecoff, Philip. *A New Name for Peac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6.

Shapiro, Isaac, and Robert Greenstein. *The Widening Income Gulf*. Washington DC: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1999.

Shoghi Effendi. *Bahá'í Administration*.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4.

—*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2nd edn. 1974.

Shuchman, Philip. 'The Question of Lawyers' Deceit'. *Connecticut Bar Journal* (1979).

Simon, Herbert. 'A Mechanism for Social Selection and Successful Altruism' *Science*, vol. 250, December (1990), pp. 1665—8.

Sivard, Ruth Leger, Arlette Brauer, Lora Lumpe, and Paul Walker. *World Military and Social Expenditures 1996*. Washington DC: World Priorities, 1996.

Skyttner, Lars. *General Systems Theory: An Introduct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6.

Slack, Jennifer Daryl.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Articulation in Cultural Studies', 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s.).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 112—27.

Smith, Adam.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2 vols, vol. 2 London: J. M. Dent, 1910.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Smith, Christopher. *Courts and the Poor*: Chicago: Nelson-Hall, 1991.

Smith, Todd. 'The Relativity of Social Construction: Towards a Consultative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Health, Illness, and Diseas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97.

Smythe, Dallas W.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NJ: Ablex, 1981.

Sparkman, Richard. *Failed Justice*. Naples, FL: Easterly Publishing, 1998.

Sparks, Colin. 'The Media and the State', in James Curran, Jake Ecclestone, Giles Oakley and Alan Richardson (eds.). *Bending Reality: The State of the Media*. London: Pluto Press, 1986, pp. 76—86.

- Spretnak, Charlene. 'Naming the Cultural Forces that Push Us toward War', in Diana Russell (ed.). *Exposing Nuclear Phallacies*.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9, pp. 53—62.
- Spretnak, Charlene, and Fritj of Capra. *Green Politics*. Sa nta Fe, NM: Bear and Company, 1986.
- Storr, Anthony. *Human Aggress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8.
- Strange, Penny. 'It'll Make a Man of You: A Feminist View of the Arms Race' in Diana Russell (ed.). *Exposing Nuclear Phallacies*.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9, pp. 104—26.
- Strick, Anne. *Injustice for All*. New York: Barricade Books, 1996.
- Stuart, Alan. 'On the Limits to Growth-an Update'. MIT, 1987.
- Study Circles Resource Centre. *The Study Circle Handbook: A Manual for Study Circle Discussion Leaders, Organizers, and Participants*. Pomfret, CT: Topsfield Foundation, 1993.
- Sugden, Robert. 'On the Economics of Philanthropy'. *Economic Journal*, vol. 92(1982), pp. 341—50.
- Susskind, Lawrence. 'Mediating Public Disputes: A Response to the Skeptics'. *Negotiation Journal*, vol. 1(1985), pp. 117—20.
- Susskind, Lawrence, and Jeffrey Cruikshank. *Breaking the Impasse: Consensual Approaches to Resolving Public Disput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7.
- Taherzadeh, Adib. *The Covenant of Bahá'u'lláh*. Oxford: George Ronald, 1992.
- Tannen, Deborah. *The Argument Culture: Moving from Debate to Dialogu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 *Gender and Discour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Taslitz, Andrew. *Rape and the Culture of the Courtroo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Thompson, William Irwin (ed.). *Gaia, a Way of Knowing: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Biology*. Hudson, NY: Lindisfarne Press, 1987.

Thornburg, Elizabeth. 'Metaphors Matter: How Images of Battle, Sports, and Sex Shape the Adversary System'. *Wisconsin Women's Law Journal*, vol. 10 (1995) pp.225—81.

Tidmarsh, Jay, and Roger Transgrud. *Complex Litigation and the Adversary System*. New York: Foundation Press, 1998.

Tiger, Lionel, and Robin Fox. *The Imperial Animal*.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71.

Tompkins, Jane. 'Fighting Words: Unlearning to Write the Critical Essay'. *The Georgia Review*, vol. 42 (1988),pp.585—90.

Turner, Graeme,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Boston: Unwin Hyman, 1990.

United Nations. *The Role of Microcredit 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8

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Namibia. *Comparative Electoral Systems &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ptions for Namibia*. Edited by N.K. Duggal. Namibia Studies Series No 14 Lusaka: United Nations, 1989.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72.

—*Individual Rights and Freedoms in the World Order of nian: To the Followers of Bahá'u'llá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9 December1988).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9.

—*The Institution of the Counsellors*.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2001

—*Issues Concerning Community Functioning: A Memorandum Prepared by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Granville, New South Wales: Bahá'í Publications Australia,1993.

- Letter to the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the Bahá'i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 May 1994.
- The Promise of World Peace*. Thornhill, ON: Bahá'í Peace Council of Canada. 1985.
- Wellspring of Guidance.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6.
- Ury, William, Jeanne Brett, and Stephen Goldberg. *Getting Disputes Resolved. Designing Systems to Cut the Cost of Conflic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8.
- Valparaiso University. 'The State of the Adversary System 1993'. *Valparaiso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27, Spring (1993).
- Vick, Holly Hanso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Bahá'í Approach*. Oxford: George Ronald, 1989,
- Wahrhaftig, Paul. 'Conflict and the Media: Building New Allies'. *Conflict Resolution Notes*, vol. 11, no.2 (1993).
- 'Journalism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Conflict Resolution Notes*, vol. 13, no. 2(1995).
- Walker, Brian. *Peac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Project for Peace Studies, 1989.
- Security, Sovereignty and 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litics*. Canberra: Peace Research Centre,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0.
- Walker, R. B. J. 'Contemporary Militarism and the Discourse of Dissent', in R. B.J. Walker (ed.). *Culture, Ideology, and World Order: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4, pp.302—22.*
- Warren, Karen J. (ed.). *Ecological Feminist Philosoph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The Power and Promise of Ecological Feminism'. *Environmental Ethics*, vol.12,no.3 (1990),pp.125-46.

—(ed.). *Ecofeminism: Women, Culture, N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Warren, Karen, and Duane Cady. 'Feminism and Peace: Seeing Connections' in *Bringing Peace Home: Feminism, Violence, and N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pp.1—15.

Warren, Karen, and Jim Cheney. 'Ecological Feminism and Ecosystem Ecology' in Karen J. Warren (ed.). *Ecological Feminist Philosoph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pp.244 —62.

Wartenberg, Thomas E. *The Forms of Power: From Domination to Transform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Weber, Max. 'Domination by Economic Power and by Authority', in Steven Lukes (ed.). *Powe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6,pp.28—36.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lated by H. H. Girth and C Wright Mil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Westing, Arthur (ed.). *Environmental Hazards of War: Releasing Dangerous Forces in an Industrialized World*. London: Sage, 1990.

Wilmot, William, and Joyce Hocker. *Interpersonal Conflict*. New York: McGraw Hill, 1998.

Wood, Julia. *Gendered Lives: Communication, Gender, and Culture*. Belmont, CA: Wadsworth, 1994.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Wrong, Dennis H. *Power: Its Forms, Bases, and Use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7.

Yankelovitch, Daniel. *Coming to Public Judgement: Making Democracy Work in a Complex World*.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1.

Zacharias, Fred. 'Reconciling Professionalism and Client Interests'. *William and Mary Law Review* (1995) .

Zamagni, Stefano. 'Introduction: The Economics of Altruism', in Stefano Zamagni (ed.). *The Economics of Altruism*. Aldersho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5, pp.xv—xxii.

—(ed.). *The Economics of Altruism*. Aldersho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5.

